

Wie geht's, Deutschland?

德国统一现状

【德】米夏埃尔·于尔格斯 著
徐静华 译




人民出版社

译 歌德学院(中国)
翻译资助计划

Wie geht's, Deutschland?

德国统一现状

【德】米夏埃尔·于尔格斯 著
徐静华 译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可扬
装帧设计:徐 晖
版式设计:东昌文化
责任校对:孟 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统一现状/(德)于尔格斯 著;徐静华 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

ISBN 978-7-01-010444-7

I. ①德国… II. ①于…②徐… III. ①国家统一—研究—德国
IV. ①D7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43781 号

Wie geht's, Deutschland? by Michael Jürgs © 2008 by C. Bertelsmann Verlag,
a division of Verlagsgruppe Random House GmbH, München, Germany

德国统一现状

DEGUO TONGYI XIANZHUANG

[德]米夏埃尔·于尔格斯 著 徐静华 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0.5

字数:252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0444-7 定价:2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真正好的故事总是这样开头的：“很久很久以前，……”而没结束的故事总是这样收尾：“如果他们没有死，就一直活到了现在。”【9】^①

很久以前，1989年11月9日，发生了奇迹，柏林墙倒了。奇迹发生的时候，没放一枪一炮，无一伤亡，所以，绝大多数奇迹制造者一直活到了现在。20年后的今天，我踏上旅途去寻访他们。路上，在无数个德国火车站上上下下，常常需要拨开迷雾，才能找到那个断裂、转折和崛起时代的历史真相，因为它们时过不久就被埋在德国的历史书里了。

此书不是一本历史书，而是一本充满人物历史的回忆，这些人通过和平方式使曾经强大的统一社会党^②失去执政地位。而他们自己却得在统一后的德国重新开始，塑造新的人生。他们当中，有的沉沦落魄，有的飞黄腾达，各以不同的方式来适应统

① 方括号中数字为原书页码。

②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的执政党。本书中东德均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西德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一后的新生活。我见到过兴高采烈的赢家,垂头丧气的输家,保持警惕的梦想家和顽固不化的怀旧者,也遇到过趾高气扬的获益者和知识渊博的爱国者。无论是在巴特施密德贝尔格,坎普林特福特,还是在贝斯勒局^①,联邦总理府;无论是在汉堡的易北河畔,柏林的阿特米拉尔剧院,还是在莱比锡的东德死刑中心、查德拉斯的精神病院,到处都有这样的人。

【10】 我问他们是如何度过1989年11月9日之夜以及前后的日日夜夜的,也想知道他们后来过得怎么样,在这类带点隐私意味的会面中,他们当中有的人会塞给我一些文件,甚至档案材料,但让我绝不要在书里点名致谢。无数次,我乘的火车行驶在夜幕笼罩下的德国,霏霏黑暗中,东德和西德看不出什么区别,我昏昏睡去,做着光怪陆离的梦:梦见许多美女和一位金发公主,把心当作王冠戴在头上;梦见居住在外星的野狗;梦见小罐装的巧克力慕思。这一切听起来是那么匪夷所思,其实都可以解释,它们正是我白天所经历的那些事情的反面:跟不上时代的老人,污浊的平房,所谓的充饥物。我最忠实的旅伴是我的iPod,她能够让我重新苏醒,里面存满了尼尔·扬(Neil Young)和莫扎特,卡特·鲍尔(Cat Power)和诺拉·琼斯(Nora Jones),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和勃拉姆斯(Brahms)的音乐。

德国,你还好吗?

蛊惑人心者利用资本主义的危机美化社会主义的过去。于

^①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档案管理局,通常以其局长名字相称,先叫高克(Gauk)局,局长易人后叫贝斯勒(Birthler)局。

是怀旧便在东部风起云涌。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建设东部^①。西部很多人则要求结束耗资巨大的建设东部项目。考察德国现状之旅也是回顾柏林墙倒塌历程之旅。调查中我不仅发现了迄今鲜为人知的东西,而且遇到了鲜为人知的民族精英,他们每日每时、在各个地方,以一切可能和不可能的方式,为实现国歌所唱出的理想、祖国的繁荣而奋斗着。

有一次我竟然遇到了自己。我任《明星》杂志主编时写的最后一篇社论的标题是《苏占区应该留在原地吗?》——是问号,不是惊叹号——,文中说了不少对那些当时对我来说还很陌生的德国人所表现出的勇气表示敬佩和赞叹的话,但是,还说了一句,“在我对90年代的想象中不存在统一的祖国”。四天之后,1990年1月30日,我被开除了。这大概可以说明:统一也改变了我的生活。【11】

许多回忆,无数细节,各种颜色绘成了一幅德国镜框中的图画,但它并不是唯一真实的德国图画,也可以画出另外一幅,关键在于视角。一个记者的所见所闻提供的德国印象和一位靠档案编写当代史的史学家提供的肯定不同。一个记者,他去采访1989年革命的见证人,询问他们剧变的个人经历,所描述的是一个微缩的现实,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会觉得它渺小得可笑,因为他们眼观全局,认为只有这样才有资格作评判。

此外,每个视角都有可能蒙上偏见。我有这类偏见的证据:说东边人都贪得无厌,品位低劣,怨天尤人,总觉得受了委屈,渴望着回到过去,虽然不喜欢东德,但至少觉得熟悉和温暖。西边

① “建设东部”是德国统一后政府东部建设项目的名称和口号。

人都趾高气扬,把兄弟姐妹看作20年来靠自己生活而不知足的亲戚,抱怨自家财政由此产生的亏空,希望自己那个老联邦共和国能回来。

我对统一的总结是暂时的、主观的,是用今天的眼光描述逝去的时代,这对德国东部的人们来说尤为重要。我与东边人的交谈确实比西边有意思得多。当年,德国西部只是紧张地注视着革命,而德国东部勇敢地进行了革命。

很久以前……发生了一个奇迹。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不相信奇迹,但1989年11月9日在柏林墙上手舞足蹈的人们真实地证明了,地球上不时地还是会有奇迹出现的。当时,所有德国人一齐吃惊地闭上眼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当他们睁开眼睛的时候,这个美妙的、不可思议的事实仍然存在着。我想知道的是,如今这个奇迹还剩下多少。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民 怨	1
第二章 日薄西山	45
第三章 被遗忘的英雄	76
第四章 平庸的邪恶	108
第五章 德国制造	133
第六章 右边下车:邻家的纳粹小伙儿	172
第七章 左边下车:顽固不化的老头子	201
第八章 能言善辩的无权者	240
第九章 废墟上的建筑师	268
致 谢	302
大事年表	303
参考书目(摘选)	306
人 名	310

第一章 民 怨

在较远的东部，靠近波兰边境的地方，我结识了一位企业家，这是个假如不是在萨克森，同样可以在罗伊特林根、帕德博恩或兰茨胡特^①生活的人。像全德各地一样，他身上的背心裹住了滚圆的肚子，他的大狗酣睡在脚边，他的女秘书煞有介事地忙活着。只有他身后墙上挂着的那玩意儿在西部会显得突兀，黑色相框中是他任人民军^②军官时的照片。【13】

2005 年联邦大选前的几个星期，他让公司的 120 名员工全体集合在院子里，向他们介绍一个人，这人尴尬地微笑着和他一起站在平时停靠卡车的装卸货台上。“这是我的朋友，”他说着大概的意思，到底准确的应该怎么说他也不知道。“他是基民盟^③的，你们选谁我不管，但第一票，直接候选人的那一票你们必须投给他，明白吗？”

“明白。”

① 萨克森在德国东部，罗伊特林根、帕德博恩和兰茨胡特都是德国西部的小城市。

②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时期军队的名称。

③ 全称基督教民主联盟，德国最大的保守党，现政府中的主要执政党。

“还有问题吗？”

“没有。”

现在的公司领导就是他们以前的上级,当年,员工中的大多数和他一样身穿军服,那时服从他的命令是天经地义。现在,必须投票给基民盟候选人的要求对他们来说并不具有当年在另一个院子里,从前东德的某个军营里的命令那样的威力,但那个已逝去、已不存在的制度的代表对他们讲话时,他们还是下意识地【14】表现出了同样的接受态度。这么解释虽不算离谱,但还是错了。过去已成为历史,他们自身的那一章也已翻过去了。他们的老板现在是社会支柱,早已把各项现行规则融化在思想中,落实在行动上了,就像当年对旧制度中的各项规则一样。他的雇员们也都和他一起,在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制度中进入了角色。他们都有一份固定的工作,不用为未来担忧。德国统一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这是一个比过去的日子要美好的生活。

今天的好日子靠的不光是他们自己的努力,更要感谢他们的老板。他对即将到来的市场需求有着惊人的预感,早在1990年夏就建立了这家散热器和洁具企业,为他们找到了新的活路。为了保住这条活路,他们有时就得妥协点儿。而妥协的所有形式他们在专制时期都经历过,出于经验,他们知道,有疑问的情况下最好闭嘴。老板不容反驳的那番话就是这种情况。即将举行的大选的结果不像东德那时候,未选已定,他们还有自由把第二票投给真正拥护的民社党^①候选人。

^① 全称是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东德统一社会党的后续党,现已与其他左翼党合并。

心理分析师、心理医生汉斯-约阿希姆·马茨(Hans Joachim Maaz)在德国1989年秋季革命之后,以题为《情感堵塞,民主德国心理分析》一书,做了一个极为大胆的试验:把一个民族放在长沙发上^①,对其由于几十年日常生活中不得不压制真实情感而产生的扭曲心理作了分析。除了以前制度造成的后续心理问题以外,马茨认为,反复出现在他的东部同胞们身上的那种惘然若失和不知所措,其根本原因在于对生计的担忧与恐惧。因此他们急需治疗。“如今,有工作的人比从前谨小慎微了。当年的斯塔西^②(Stasi)虽然可怕,但大家知道怎么跟他们【15】打交道,学会了不在他们面前表露真实看法,而现在,大家担忧失去工作,是否有工作关乎生死存亡。”

马茨在分析中没有大声疾呼。这位哈勒基督教社会救济部门所属的心理和身心医学诊所的主任医师,德国精神分析和深度心理治疗协会主席显得颇为疲倦,似乎随着退休已经心灰意懒。他认为,虽说现在不仅可以想,而且可以把想要什么说出来了,但是说了之后不会有任何效果,因而说也就毫无价值了。意志衰退,听天由命等正是由此而来,西德人掠夺了我们的革命成果,这是剧变^③后的第一大失望。

马茨没有把这一失望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失望比喻为一次抢劫,那种感觉更像是一次精神上的失窃。他认为,这绝对是一次没有意识到的侵权。当年,随着不断行进的示威队伍,不仅柏

① 心理医生作治疗时通常让病人躺在一个长沙发上。

② 指东德国家安全部及其工作人员。

③ 指1989—1990年间发生的动荡和革命,民主德国瓦解,德国重新统

林墙倒塌了,而且其他形形色色的墙也都倒塌了;不仅思想自由了,言论也自由了。然而,当官僚们被撤了职见了鬼,当恐惧终于烟消云散,人民终于胜利后,这一胜利却在短短几个月内被人从胜利者手中偷走了。

被政治动荡搞得精疲力竭的人们没有抵抗,况且,他们自己也已经开始对之前所表现出的勇气进行反思了。他们毕竟首先是天生的德国人,而不是天生的革命者。

“这样说来他们的成就就更为难能可贵了,”当我后来请莱因纳·艾波曼(Rainer Eppelmann)解释他的东部同胞缺乏自信的原因时,他这样回答。他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基金会,负责处理统一社会党执政期间留下的一些棘手问题,从他的政治经历来看,他无疑是担任这一工作的最佳人选,他不是1989年才学会【16】抵抗的。在柏林萨马利特教堂^①担任牧师时,他就鼓励人们不要屈从,当时这样的抵抗会招来大麻烦。但是他从来没有畏惧过,年轻时就没有,他拒绝服兵役,连工程兵也不当,为此蹲了八个月监狱;后来因为和罗伯特·哈维曼^②(Robert Havemann)一起在《柏林呼吁书》中要求不用武器创造和平以及取消学校的军事课,斯塔西对他进行了严厉惩罚,他也没改。他说:“革命不是德国人喜欢的词,所以东边人也不以曾参加过革命为自豪。”

只是由于那个“工农天堂”里的现实状况已变得实在难以

① 在东德的变革中教会曾起了重要作用,萨马利特教堂是当时民权运动的一个重要据点。

② 化学家,东德时期的异议人士和民权活动家。

忍受,他们才不得不喊出“我们是人民”的口号来抗争。而这事儿非剧变,非革命不可。他们不可能全都逃离东德^①,他们还得待在那儿,这事儿明摆着,那么,他们不走,就得让这个国家走,这事儿也明摆着。现在,目的已经达到了,该赶紧安静下来了。太多的东边人没有以所取得的成果为自豪,没有把自己放到和西德人平等的地位上,而是容忍西德人把他们的胜利果实窃为己有。“我们并不要求特权,不需要什么东边人的东部优待,我们又不是要人精心看护的小白兔,我们只想受到和你们西部人一样的对待。”(艾波曼语)

西德人虽然没受过辩证唯物主义的训练,但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话能行得通。他们大言不惭地说,更好的制度证明了它的成功,而他们作为更好的制度的代表就是真正的胜利者。马茨说:“西德人说,你们的革命思想是不错,可现在不需要了,现在是我们来关照你们了,当西德人说这种话的时候,我们东边人就那么听着,这得怪我们自己不好,可还是把责任往西德人身上推。”在这样一种负罪感和推诿罪责的诡异组合中,马茨对分裂的民族性格的分析显然对人颇有启迪。

西德人在日常生活的时时处处所表现出的胜利者的傲慢至今让东边人痛苦和不满,而且不光是统一的输家,输家的愤世嫉俗还可以理解,就连赢家也一样。他们拿自己得到的和西部四十多年繁荣经济下经过艰苦劳动所取得的成就相比,而没有(他们完全该这样做)把自己的新生活和其他从前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情况去比一比。在通往市场经济的道路上,那些国

① 东德的动荡从大量公民经匈牙利、捷克逃往西方开始。

家过去和现在都面临很大的困难,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富有的大姐姐可以在清理遗留下的瓦砾时帮他们。虽然他们的生活水平远不及德国东部高,但他们没有加入喋喋不休的抱怨。

对西方物质世界幻想的破灭,也加剧了普遍的沮丧和失望。原以为统一后人人什么都能买得起了,而事实并非如此。因此,结果就成了与刚刚经历的政治激情完全相反的政治冷漠,这是马茨的看法。“东边人在剧变之后应该自己反思历史,自己收拾那个烂摊子,自己审判罪犯,但我们做这些需要多一点儿时间。之后再谈谈判统一的具体条件。”说这些话的同时,马茨也承认,心理医生的这种分析与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格格不入的。“这在政治上该如何操作我不知道,事实上,在当时的那种时间压力下也确实做不到。”用今天的眼光回望起来,没有这样做对于东边人的心理发展是个很大的失误。

很多东边人都不愿再回忆他们已逃离的那段黑暗,是西德人在提醒着他们,昔日压迫他们的不仅仅是斯塔西,还有统一社会党,它的继承者左翼党如今在新联邦州几乎都已成为第二大【18】党。艾波曼认为,左翼党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当年抵抗运动中真正的积极分子只是极少数,不到千人。”着装规则变了,一夜之间大家都换了装,但大多数东边人至今都还没有真正进入角色。

没能适应新时代,只停留在似乎好像适应的阶段。他们中不少人声称统一让他们心力交瘁,西德人认为这是东边人的司马昭之心,目的在于再多捞点钱,没别的。

马茨属于统一的获益者,但在他自己的地盘上,在他的治疗室里,我觉得他看上去也是一副失落的样子。右边靠墙放着一

张长沙发,外面有一位病人正等着他治疗。按他的理论,新联邦州内得有几百万这样的病人。对他们病因的诊断大致是这样的:由于已失败的生活规划无法得到补偿而产生的忧郁型的绝望、放弃;对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全人类解放者们背叛了理想依然怒火中烧;以及由于要靠另一部分德国人的善意去生活而产生的自卑心理。没有心理医生能治疗得了这样综合而复杂的病症,于是许多人便用一种简单的方法来自救:美化自己的过去,这一条,那些自封的胜利者们总拿不走了吧。“你们只不过是旁观者罢了”,艾波曼对我高声批评道,他把我作为他所指的那些人的代表,“你们凭什么为我们的革命自豪?”

西德人对东边人的过去根本不感兴趣。很多西德人把东德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表现等同起来,好像在一切都由上面决定的社会中就根本没有自主的生活了似的,没有爱情,没有生儿育女,没有朋友、家庭。好像在黑暗的德国^①【19】没有四季,没有日出和星空。如果有人不加区别地批判原东德的国家制度,东边人会觉得个人受到了攻击,好像说他们个个都生活在斯塔西监视的笼子里。在我的德国之旅中,一再听到这样的指责:你们从没真正关心过我们的生平和历史。

东边人觉得受了伤害,于是他们退到自己的历史中躲了起来。哪有什么“勇往直前,决不后退”,当年的社会主义是用这一口号鼓励人的。如今,在这里,谁不前进就意味着后退。国家的许诺、保证,描绘的美好前景与他们经历的现实毫不相干,这一点东边人最知道了。在原来的东德曾设有“德意志民主共和

① 指东德。

国设计奖”，如果一个姑娘学了商业广告设计，以后想去装饰橱窗，她一定会在现实中碰壁。

橱窗中根本没有可以让她通过设计装饰以吸引犹豫不决的顾客的东西。无论卖的是什么，顾客个个都坚定不移地排着队。如今，假如我在西边的步行街随便问行人，另一边留在他们记忆中的典型印象是什么，“国营商店前的长队”准在前三个回答之中。

在东德匮乏的经济中，几乎没有可以让一个商业广告设计师姑娘实践一下她的新思想的东西。小伙子则不同，他们可以争取“内政部优秀民兵奖”或“工人民兵奖”，有很多机会表现自己。“国家安全有功人员”也比比皆是，只是他们的奖章不便公【20】示于人，只能私下保存。同样每年由国家颁发“优秀建筑奖”的建筑，1989年后明显成了能住的废墟，这个奖应改称“人民棚户村奖”更恰当。在东德建筑业工作的同志们困难很大。原德累斯顿市长沃尔夫冈·贝尔格霍夫(Wolfgang Berghofer)曾竭尽全力来挽救城市的衰落，他相信，假如东德的解体再晚来三四年，他领导的德累斯顿市，以及皮尔纳、利萨这样的城市内部早已无可救药地败光了。

事实是，东德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道义上都不成功，因此这个德意志国家没必要再存在了。但是，“多多后退”作为对德国新时代的另一选择，在许多东边人看来更适合他们头脑中的那个世界，那里最基本的线条是对未来的某种隐隐的、普遍的担忧：几乎70%的东边人害怕社会变迁；60%的人觉得生活像无休止的战斗，让人疲惫不堪；50%的人觉得过去关心他们的国家现在把他们抛弃了。

难道他们都失忆了吗？我问心理治疗师马茨大夫，东德时期他们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样子，很多人都忘了吗？他们真的想要回到原来的那个国家去吗？借用一句玩世不恭的结论：前政权留下的瓦砾废墟都清理干净、修整一新了，可以再尝试一次了吗？

当然不。是想后退，但不是退到原来的状况。对于由混杂的东部怀旧情绪推动起来的群众运动，马茨的解释很简单：“如果西德人整天对我的事情指手画脚，我当然会变成更坚定的东边人。”真正经得起考验的东部民族感是不存在的，即使是在似乎被围墙^①永远砌住的时代也不存在，尽管统一社会党总是一再努力，试图将短暂的体育胜利带来的自豪感稳定成长久的民族感。叛逆的，并不总是以搞笑的外表显示出的东部民族感，如【21】东部迪厅中出现的游戏性、挑衅性的情侣装——男的身着人民军军服，女的身穿共青团蓝衬衫，这种情绪在统一后的德国膨胀起来，是逆流，但是可以理解。

从前虽然有窃听，有斯塔西的袭击队，没有香蕉，想什么不能说，想去哪儿去不了，但他们每人都有工作，尽管因材料不够常常没工可做。隐藏的失业率大概在15%左右，但在企业的报表中是见不到这个数字的，因为说谎的国家制度没有设计这一条。从数字来看，这与新联邦州目前的平均失业率差不多。

下班以后才开始真正的、紧张的工作：寻找零部件啊，为老房子找灰浆啊，涂料啊。因而，外观丑陋、内部时尚的预制板楼住宅极受欢迎，这种中心供暖的住宅楼里，居室的温度是可以靠

① 指柏林墙。

开窗调节的。租到这样的房子,至少有单独的卫生间,而不是常见的过道上公用的蹲坑,这不是显而易见的进步吗?

艾波曼说,和大多数人一样,他那时候也相信,“东德一定比他们活得更长,自己只能适应现实情况。于是便尽可能把自己在不可改变中安排好,始终怀有一线希望,对生活的不高的要求中至少有一部分可以得到满足。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没有料到的事情、奇迹真的发生时我们会一下子变得那么没有耐心,我们没有你们那样的40年,可以一点点建设起来,我们的多半辈子已经过去了,再不想为碰运气等到80岁。”

【22】 难道革命前那里只是一群胆小鬼、探子与趋炎附势的干部组成的乌合之众?从幼儿园就开始受训,每逢列宁生日必得背诗?才不是呢!在自家的小天地里,他们看的是西方的电视节目;嘲笑的是经年不变的计划^①胜利完成的消息;讲的是有关政治局那些执政老头们的笑话:您知道他们的会议怎么开始吗?首先,要打开心脏起搏器,假如它们运转正常,接着便同声高唱“我们是年轻的革命卫士”。出生于东柏林的“德国战车”^②乐队键盘手福拉克·洛伦茨(Flake Lorenz)调侃道:“在我的眼里,东德也是有自由的,因为那时整个国家像个玩具国,人人都像是没长大的孩子。”

他所指的另一个生活,平行于被标准化的、斯塔西监控下的生活而存在。现已去世的联邦德国当年在东柏林的常驻代表京特·高斯(Günter Gaus)是一位冷静的政治分析家,他首先使用

① 东德是计划经济体制,这里指国家经济计划。

② 1994年成立的德国重金属摇滚乐队。

了“夹缝社会”这一经典说法,离任后他成了心里放不下的东部的长期代表。由于受到斯塔西迫害而于1979年移居西方的诗人京特·库耐特(Günter Kunert)的看法正相反,“只要有更高的利益需要,即使是在夹缝中也无处藏身,在这个国家,你无时无地不在国家机器的监控之下。”这话也不假。现已揭露出不少出自原以为没有窃听的私人范围的告密和背叛。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斯塔西的兼职工作人员不仅在外面、在街上窥视着,他们常常就在人们中间,是你的朋友、同事甚至家人。又有另一些人反对说,至少有两个夹缝国家是不干预的:养鸽人协会和科学院。

回首往事,你的看法无论是天真、美化,还是愤懑、怨恨,或提出批评或充满偏见,都不是典型的东边人和东部现象,西边人【23】和西部也同样,对此,都可以从心理层面作出解释,只是原因不同罢了。从前没有东边人的时候我们的日子好多了,这是西边的倒退口号。根据一次独一无二的历史性机会算,已有近一万亿欧元资金转移到了五个新联邦州,天哪,这要在我们国家,拿它干什么不行啊?

统一不仅是一次独一无二的历史性机会,更是道义上的义务。几十年来,它被宣布为西部的国家目标,各个党派的政治家们也都随口这么说。实际上,他们和他们的选民都不相信统一有朝一日真会实现。而当这未曾预料的事情真的发生时,自然无法朝那边来一句,基本法上是写着呢,可我们不是那意思,自由还是比统一好啊。假如举行公民投票,1989年或1990年西部虽然大多数人会赞成重新统一,但是联邦德国人对统一并不是心向往之。

“那边的那些人，”年事虽高仍不失锋芒的社民党偶像埃贡·巴尔(Egon Bahr)说，他的声音一下就盖过了柏林“常驻代表处”酒馆^①内的嘈杂声，这里天天晚上用科隆啤酒为难忘的、酷爱的波恩共和国干杯，“所以那边的那些人至今觉得没有得到我们西边人真正的认可。”

埃贡·巴尔 86 年前出生在那边，他也是统一的受益者，在他的出生地，图林根州韦拉河畔的特雷弗尔特有一条街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在统一前根本不可能。1989 年剧变后的外交【24】活动极为出色，否则科尔/根舍政府也不可能实现统一，但柏林墙倒塌后至关重要的目标——内心的统一我们没有做到，因为我们没有能够把东边人对他们成功进行的不流血的革命的自豪纳入全德并给予尊重。

他们用行动证明了，即使是在德国，只要机会合适，理由充分，不但可以发动革命，而且可以活着看到胜利。他们也证明了，德国人骨子里比他们的欧洲邻居喜欢平静反对动乱，喜欢秩序反对造反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我小心翼翼地作个比较，德国这场不流血的革命，其影响完全可以和 200 年前，1789 年法国的那场流血的革命相媲美。但是，短时间迸发过的自豪感很快就被对日常生活的担忧吞噬掉了。

英雄们不久就被遗忘了，英雄自己也忘却了曾经的勇敢，他们之所以宁愿忘却，是因为除了节日，再也没有记起他们英雄行

^① 常驻代表处是当年联邦德国驻东德的常驻代表机构，相当于大使馆，因与东德的关系被视为德国内部关系，所以用此名称，这个酒馆是迁都后西德人在柏林开的，反映出西部人的怀旧情绪。

为的时候了。20年过去了,没有一块纪念那场伟大革命的纪念碑。假如有,那将是一块共同经历的快乐、幸福的纪念碑,一块参与革命的人值得自豪的纪念碑。毕竟,1989年秋天的那场革命是德国历史上唯一成功的一次。

一如既往,到处充盈着让人想起德国的罪恶与耻辱的纪念碑。“所以我们不仅需要要在柏林建一块统一纪念碑,而且应该在所有发生革命的地方统统建立纪念碑。”萨克森-安哈特基民盟州长沃尔夫冈·波梅尔(Wolfgang Böhmer)对我说,他不是个虚荣的人,既不抱怨也不美化什么,“我们得为活着的人的勇气多多建立纪念碑,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德意志帝国的各个村落都有追忆死者的战争纪念碑那样。”【25】

离纪念1870—1871年战胜法国的胜利柱不远的地方,步行15分钟的样子,我听了一个艺人的单口相声,他的那些包袱和笑话,在信奉天主教的巴伐利亚地区的老人午后聚会上可没人敢讲,而在这里却赢得了统一后的人民的阵阵掌声和欢呼。只要一针对政治家,只要一针对同性恋,尤其是针对某一个同性恋的政治家,只要是令人尴尬和难堪了,气氛便分外热烈,掌声便此起彼伏,就像从前人人都能跟着哼德国民歌里唱的——圣灵降临节,波勒去潘可^①,丢了孩子也不走,欢天喜地接着游。

此外,位于弗里德里希大街101号的阿特米拉尔剧场大厅,就是1946年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被强制合并为统一社会党的地方,暗含讽刺和隐喻的粗俗闹剧总是成为文化活动的高潮而大受欢迎,黄段子最刺激。

① 柏林的一个区。

很多生活在这个大都市下层的人,无论来自东部还是西部,都不太关心他们的子女,但对针砭世风却感兴趣。前联邦劳动部长诺尔伯特·布吕姆(Norbert Blum)(西部)和前“案发现场”^①警长彼得·索丹(Peter Sodann)(东部)也加入了这一群体,后者曾被左翼党提名为联邦总统候选人,大概是为了让全体人民开开心。这两个总是无精打采地来到演出现场的笑星,主要是在东部,讲些2007年秋季流行的偏见。听众的赞同反映了那边不平衡的心态,因为当年统一社会党的老朽统治者在日常生活中是很庸俗的,这种庸俗自然也影响到臣民们的思想。至今,东部缺乏的是它那些背井离乡,在西部建立起新事业的公民。

【26】 这种缺失当然也影响到精神生活。

“2007年用药分布图”倒很能说明问题。东边人服药比西边多,因为他们比西边人肥胖。西部男人的平均腰围是96.97厘米,东部是98.27厘米,东部妇女腰围最大的要数图林根女人,87.10厘米,西部最大的汉堡女人只有83.63厘米。东部的医保公司要负担的老人也比西部多。这可以从人口统计数字上看起来。在那些根本没有机会找到工作的城市,像德累斯顿、莱比锡、耶拿、魏玛、波茨坦等地方,能活动的年轻人都走了,只有老人留了下来。老年疾病像风湿、关节炎、高血压等虽然有相应的治疗,因为1990年后,与过去不同,有了足够的药品供应,整治了工业污染源后环境也比过去健康了,总体来说人的寿命在延长,但是,发生心肌梗塞而死亡的危险在东部还是比西部高。

① 德国电视一台播出的一部侦探连续剧的片名。

根据柏林济慈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调查,五个新联邦州在这点上都高于西部的老联邦州。科学家们认为,除了全德相同的危害因素以外,东部的“社会经济因素”,如失业、紧张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据统计,45岁至74岁年龄组的死亡率最高的是萨克森-安哈特州。

开业行医的大夫奇缺,据说他们宁愿失业呆在柏林,也不愿到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当主治医师,根据格赖福斯瓦尔德大学的预测,到2020年,那里每四个居民中就有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现在那里的私人诊所,只要大夫退休,97%无人接替。当波茨坦-米特玛克区1500人的小镇格尔克镇上唯一一位全科医生得重病而不得不停诊时,镇长于尔根·巴特罗格(Juergen Bartlog)为寻找接班人,提供900个病人的卡片,专业医辅人员,设备更新和装修完善的社区所属诊室,免五年租金,却毫无结果,他垂头丧气地说:“这些大夫们对未来工作地点的期望是屋后有阿尔卑斯山的风景,屋前是选帝侯大街^①。” [27]

虽然我在国内跑了不少地方,见过各种人,经过不少事,但是,要对柏林墙倒塌20年后德国各地的不同现状作出恰当中肯的描述,还远远不够。德国统一这件事还真有点复杂,什么地方是如何操作的,什么地方它不成功,谁是统一的受益者,谁又是受害者。德国,你到底怎么样啊?我试着在现场打听,常常被作为隔阂象征的人们头脑中的那道墙,在似乎永久分裂德国的真实的柏林墙倒塌后是不是反而增长了?据说只有13%的东边人对统一给予他们的感到满意,这倒符合马茨的分析,而3/4的

^① 选帝侯大街是柏林最繁华的商业街。

西边人认为,耗资巨大的建设东部项目该结束了,这也符合了头脑中的墙仍存在的论调。

柏林自由大学统一社会党国家研究会主任克劳斯·施罗德(Klaus Schroeder)了解的比我多,可以用很多数字加以说明。他的同事分别对北威州,巴伐利亚州,柏林和勃兰登堡州的【28】5 000名九至十一年级的学生进行了询问调查,在此基础上可以描绘出“师生心目中的东德”。施罗德的结论是在民意调查的基础上对德国现状所拍摄的一张照片。他本人则用一句话来加以总结:“想象中,那是一个贫穷、怪异又搞笑的国度,但不管怎么说还有点社会保障。”

被访者当中1/3的人认为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和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是东德政治家,1/4的人认为建柏林墙的这个国家可以作为联邦德国的另一种民主选择,因为学生中有70%觉得联邦德国并不比东德好多少。每三个年轻的勃兰登堡人中只有一个知道建墙的时间,知道这是1961年根据统一社会党的命令建起来的,原因是逃离这个不讲公民权国家的人与日俱增。

在政治国情知识方面,勃兰登堡州的学生们排在最后,而北威州^①的同龄人在对东德历史的了解上也同样存在巨大的不足。在那里,不存在因教师本身是那个制度的支撑者而有意向学生隐瞒什么的问题。是学生不感兴趣。成功自救的另一个德国对德国西部的人们来说一如既往地陌生,其程度可以从一项

^① 勃兰登堡州(Brandenburg)在东部,是新联邦州,北威州(Nordrhein-Westfalen)在西部。

调查中看出,老联邦州的失业大军中,40%的人即使给他们提供稳定的工作也不愿搬到东部去。

这两项调查既震惊了政治家也吓着了记者。政治家们总是说罪在他人,在前任当权者,无论是联盟党的,还是社民党的;记者们则在评论年轻一代之愚蠢的同时,把问题归罪于那些沉默的父母们,更归罪于负责政治教育的机构和部委。

牧师约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k)是一位知识渊博的民权人士,他负责监管止于1989年的东德国家全部秘密档案,【29】很快老百姓就把这个部门称做“高克局”。他能享受生活中最普通的东西,此刻是一勺菠菜加土豆泥。之后他把盘子推到桌子边上,吃下一口的时候再从远处拉过来。他认为学生们对历史的无知来自东部教师们内心的顾虑,他们在以前的制度中工作太久了,因而在课堂上尽量避免涉及东德,因为这也是他们自己生平中的污点。

高克的简短分析得到了很多教师的证实,饭后我们就遗忘、排挤和美化等题目进行了讨论。当年,这些教师怀着极大的热情要求从西柏林调往东柏林,认为那里更需要他们,可是没过几个月就灰心丧气地回到开明的西部来了。他们说,在那边,只要一在课堂上谈及统一社会党的专制,就会受到东部同事的系统排挤。前异见人士,如今的柏林荣誉市民沃尔夫·比尔曼(Wolf Biermann)对所有的德国丑闻都有犀利的评论,他说,这个问题只能靠自然淘汰来解决了,东边的老师在过去的制度中陷得太深了,因此害怕谈这个问题,一堂诚实的讲座总是会变成自我控告。

抱怨很无趣,而反抗让人兴奋。什未林州一位名叫扎布

内·贝克(Sabine Beck)的女职员,静悄悄地反对遗忘采取了行动,用简便易行的方式开始尝试。她制作了一本名为《在你出生之前的那个国家里》的连环画,本来只是给她四岁的儿子看的。她编写了一个很简单故事,想要解释从前是什么样子,如今幸亏不是那样了。故事里有一个凶恶的国王,为了防止他的臣民逃跑,围着国土盖起了城墙,而臣民们则按照孩子也能懂得的三只猴子的原则行事: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更要紧的是一言不发。当她把这个故事作为一个为时三天的活动讲给小学生们听的时候,孩子们都兴奋不已,提出了无数个为什么。

而父母们并不欢迎这个活动,有些甚至以那个国家,他们那个时代的方式作出反应:禁止。他们禁止自己的孩子参加扎比内·贝克的讲座。

后来成为作家的东德尖子运动员伊内斯·盖波尔(Ines Geipel)认为所谓“东部法西斯化”,她指的是东部新联邦州年轻人的暴力倾向,其原因不仅在教师的失职,而且来自被她称为“砌在墙中的情感”。这是她对未经反思的德国当代史的定义,滋养它的是祖父母一辈的梦魇和父母一辈的沉默。马茨认为:“我们没有对过去进行反思,于是臣仆作风再次大行其道,我们缺少西部被称为‘68运动’的那种革命。东部应该也来那么一场才是,与父母一辈展开辩论,他们是真正承载东德的一代。”

马茨所描述的状况令来自西部的我警醒地回想起解放初,曾为纳粹工作过的教师被联邦德国学校录用的情景,因为几乎没有别的人可供选择。这些当年的纳粹追随者安排的德国历史教学计划中,到中学毕业,只讲到魏玛共和国。这样一来,他们就不需要向我们解释自己在那个千年帝国的所作所为了。从父

母和祖父母那里,同样难以得知有关他们刚刚逃离的那个时期的信息。这种普遍存在的沉默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才被大学里的静坐抗议、街上的示威口号所打破。因此,如果东德人【31】缺乏反思自己历史的意愿,以自我批评的眼光回顾一下西德的历史倒是颇为有益的。

我回忆起一次公开的研讨会,台上的发言者善意地历数着众所周知的东部和西部的种种矛盾与对立,他说这些对立都是客观存在,只能接受,这时,观众中传来一声高呼:“那是一次占领,是接轨,不是统一。”全场沉默,这时,我以西部的傲慢回答道:“不是你们自己过来的吗?我们又没叫你们。”我没有指望这话能被理解为讽刺,让我大跌眼镜的是绝大多数人竟发出了德国人少有的爽朗笑声。

当年,斯塔西的正式工作人员差不多有10万,此外还有19万兼职的,至今没有全部暴露身份。他们利用了人们的恐惧心理。按照历史学家弗里茨·施特恩(Fritz Stern)的观点,斯塔西是“世界上最完善的收买人的机构,比盖世太保规模大得多,没有那么残暴,但更阴险。卡尔·马克思早就预言过,在社会主义【32】的高级阶段,国家将会消亡。我无法想象一个现代国家的消亡,但是,东德也许最接近这个目标。”

无知和愚蠢不仅会导致美化日常生活中可怕的事情,有时也会对再次发现的证明当年统治者之残暴的证据发出公开的、愤怒的呼喊,这些证据本来已不是什么新闻,就像2007年夏天成为头条的那件。按照官方德语的说法,在“对越境行为的一项研究申请”进行审理的过程中,时间是建墙46周年前夕的8月,在马格德堡斯塔西档案馆的一个分馆,发现了一份引起轰动

的文件。据称,该文件命令斯塔西特种部队(到东德消亡时,这支部队拥有 91 015 名成员),如果越境者在偷越时带有妇女和儿童,同样可以使用武器。原文:“使用武器时不必犹豫,即使发现偷越边境时携妇女和儿童同行,这是叛逃者惯用的伎俩。”

这份命令放在特种部队一名中士的文件包里,该中士 1971 年至 1974 年间曾在两德边界服役。直至 1985 年,始终存在有射击权的连队。所有报纸都报道了这件耸人听闻的事情。联邦政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档案管理专员”玛丽亚娜·贝斯勒(Marianne Birthler)证实了这一发现的巨大现实意义,理由是,东德的政治家们始终否认存在过射击令。东德前国家领导人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正是其中之一,他马上在《图片报》上表态称:“杀人令,或者如你们所说的那个射击令是不存在的,我不是从档案中知道的这一点,而是从我自己的经历中知道的,假如有这样一个命令,那是违反东德宪法的。”

当弄清楚这份引起玛丽亚娜·贝斯勒和其他许多政治家震动的文件早在 10 年前就已被发现,而且几乎一字不差地被镶入镜框,就挂在以局长名字命名的“贝斯勒局”的文献大厅供大家参观时,风波很快就平息下去了。这可真让人难堪,尤其对玛丽亚娜·贝斯勒来说,她抱歉说这是个“令人恼火”的判断错误。1993 年就已发现过一个含有射击令的工作指令,包括对妇女和儿童。四年后的 1997 年,发表在由历史学家马蒂亚斯·约特(Matthias Judd)主持出版的《文献中的东德历史》一书中。大惊小怪了半天,媒体在这方面的歇斯底里从中可见一斑。

这份有意思的文件剧变前一直静静地放在“东德军事档案馆”。它的内容就是被克伦茨和前东德国防部副部长弗里茨·施特雷勒茨(Fritz Streletz)矢口否认的射击令。东德退休上将施特雷勒茨认为所谓射击令的说法是影响了西德人民思维的“冷战时期的战斗口号”，“从来也不存在什么射击令，……因此，据我所知，无论是在政治局，还是在国防委员会和国防部都从没讨论过这样一份文件。”

这话能信吗？

看来不能。

后来我亲手拿到的那个命令的复印件上，盖有“机密文件”的图章，签发日期是1961年10月6日，地点是施特劳斯堡，由当时东德的国防部长海因茨·霍夫曼将军(Heinz Hoffmann)签署。原文是：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

【34】

国防部命令

编号:76/61

内容 人民军边防部队使用武器的有关规定

人民军边防部队各部的任务是保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边境任何情况下不受侵犯，保证其主权不受侵犯。为了保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边境的安全，我命令：

即日起，人民军哨位规则 DV-10/4 有关武器使用的规定适用于边防部队的固定哨位和巡逻队。

此规定适用范围扩大后，西部国境和海岸边防军的哨位和巡逻队有义务在下列情况发生时使用武器：

抓捕、逮捕或消灭侵入东德领土及试图向西穿越边境的武装人员或武装犯罪团伙时,如果他们不听从放下武器的要求,或在被抓捕时企图以武器相威胁或通过使用武器逃跑;

【35】 抓捕不服从边防军指令,在听到“停下,站住”的命令和鸣枪警告后仍试图侵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边境的人员时;

抓捕借助任何一种车辆企图越境者时,如果他们无视边防军按规定发出的停车信号和鸣枪警告,撞翻、冲破或越过街障,无其他可能对这类武装人员实施抓捕时;

对侵犯边境者使用武器时只允许朝东德领土方向或国界平行方向射击。下列情形不准使用武器:

外国军队和军事使团的成员;

外交使团的成员。

儿 童

在有关武器使用命令的附件 I 中,霍夫曼再次确认,“可以根据所要达到目的的需要使用武器”,在第 6 点中要求边防军司令至 1961 年 10 月 10 日报告这一命令的执行情况,结尾:“如不撤销,此命令始终有效。”

至 1989 年,有 421 人在两德边界失去了生命。查理检查站^①旁的柏林墙纪念馆记录的数字是 1 245 人。

【36】 向逃亡者直接射击这一事实,就连否认存在射击令的人也

^① 当年东西柏林边界(即柏林墙)旁最著名的检查站,现仍保留着一些标志供游人参观。

不否认了,就是这些人,至今仍用“转折”这个概念称呼1989年那场把他们扫进历史垃圾堆的革命。弗里茨·施特雷勒茨虽然仍坚持声称“没有一项法律,一个命令和一项规定允许使用武器杀人”,但就连他也对此表示了遗憾,尽管只是干巴巴地几句:“边境上的死者,无论是越境者还是边防军士兵,都是不该死的”。

这些顽固不化的老朽早已失去了任何意义,向他们发问是赋予他们一点意义,其实也无碍德国现状的大局。在东德国防委员会,在停滞不变状态下那个神秘莫测的应急政府里(据说一旦有什么情况,他们就在政治局封闭居住地万特里茨专门建造的防核弹地堡里开会),1974年5月3日的会议记录里记着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①的话:“遇有偷越边境的,仍然需要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器,有效使用了武器的同志应该受到表扬。”与1960年至1989年间所有会议不同的是,这次会议有一份详细到每一句话的会议记录,因为这一天代替霍夫曼出席会议的弗利茨·施特雷勒茨让人把每句话都记录下来。

撇开过去回到现实中来,在流向入海口的易北河旁,我见到了那位曾被东边人痛恨之极的女士,比尔吉特·布罗伊尔(Birgit Breuel),她不得不时刻带着六名保镖。她的前任,托管局局长,德特勒夫·卡斯滕·罗威德(Detlev Karsten Rohweder)1991年复活节时在杜塞尔多夫的家中被杀。他坐在开着灯的书房窗前,为杀手提供了最佳目标。罪犯最终也未能落网,

^① 东德执政党总书记,国家主席。

只有一点联邦刑侦局可以肯定,杀手来自红军旅(RAF)^①而非斯塔西。持阴谋论观点的人是这么认为的。罗威德是唯一一位【37】为统一付出了生命代价的人,这么说当然并不能安慰他的遗孀。从托管局所作的那些与几百万人生存相关的决定来说,无论是必要还是痛苦,没有再牺牲更多的生命,真是1989年后德国历史中无数小奇迹中的一个。“我们确实给了人们不小的压力,”基民盟政治家、托管局长比尔吉特·布罗伊尔解释说,“但是我们必须那样做,别无选择。”

托管局按政策委托行事,一旦在对东德计划经济进行私有化改造的进程中、在处理东德国家遗留事务中有了差错,是需要替罪羊的,布罗伊尔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这一角色。“虽然我们也很愿意把更多的东德管理人员放到领导岗位上去,但我们一下造不出这样的人来。”是啊,如今说起来容易,当时“我们大家都在巨大的时间压力之下感到力不从心,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好事,因为需要迅速作出决定,而迅速作出的决定往往是最好的决定。是的,当时没有更积极地帮助东德人积累财富是不对,否则会给予他们更多的自信。”

自信是至今仍然缺乏的东西。这是集体主义教育、不出头、守纪律、严厉压制个性的结果,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个人需要自觉、自信地活动,克服阻碍实现目标,也得准备承受失败。话说回来,即使在一个不是由自己的过错造成的被迫状态下,自信仍然可以得以成长,因为“我们在一种备受压制的生活中仍然

^① 红军旅是20世纪70年代在联邦德国进行暗杀、绑架等恐怖活动的左派极端组织。

正直地生活过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强大,这是很有价值的东西,可惜没有人谈到这些”(马茨语)。而艾波曼认为:“我们并不觉得自己比别人笨、懒、胆小,但我们生活的基本条件和你们的完全不同。”

“你发觉了吗?”我问他,“你始终在用‘我们’和‘你们’说话,难道你是分裂主义者?”他当然发觉了,他是在等着我发觉,我俩一齐笑了。【38】

这个曾长久分裂的民族目前所感受到的状况比实际状况要差,2008年1月,3970万德国人有着拥有社会保障的固定工作,统一以来,这个数字还从未达到过这么高。2006年,东部的经济增长为3%,甚至比西部还高0.3%,新联邦州的房租低,养老金高,学校里班级小,公路、铁路都得到扩建,为了改造破旧落后的基础设施已斥资近670亿欧元。

平均14.7%的失业率的确仍比老联邦州高一倍,但其他数据可以表明,这个纯粹的统计数字并不能说明多少全德的真实情况。格尔森基尔欣的失业率是18%,多特蒙德是15%。但是,按照援助计划II,至2019年还将向东部提供1560亿欧元的援助,西部的这些贫困县还得从本来已空无一文的钱袋里掏出几百万来。假如不支付援助东部的费用,多特蒙德市的财政主管只需要应对5亿欧元的债务,而不是9亿欧元。

在已统一的共和国的最西边,有些县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11300欧元,低于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①,举目所见,这里的情况与东部无二:寥无人迹的村落,钉死的门窗,废弃的厂房。

^① 东部五个新联邦州中最穷的一个州。

以前这里遍地是鞋厂,现在遍地只剩下大自然生长出的东西。所以双桥地区的17个县一起起诉了他们所在的联邦州,表示不愿再承担至2019年援助计划II规定的义务,也就是不愿继续【39】援助东部了。在自身负有100万欧元债务的情况下,每年还得划拨70万欧元给东部。一审他们败诉,困境让他们决心继续上诉直至联邦行政法院。叛逆的西边人想不通,为什么只因为住在西部,就得给东边出钱,东边有些县早就比他们有钱了,应该给西部付援助税才对。

德国最大的联邦州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社民党主席汉内洛雷·克拉夫特(Hannelore Kraft)甚至要求一个与建设东部类似的建设西部项目:“在鲁尔区的某些城市,已经没钱维持他们的幼儿园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还被迫继续借债,把钱划给东部那些已发达起来的地区。”德累斯顿就是这样一个发达地区,出售了市属住宅后,债务归零,可是还继续得到来自西部的援助,实际上西部的许多城市早已更需要援助计划的资助了。

这一切对于东部德国人和人数多于他们四倍的西部兄弟姐妹之间的气氛来说当然不无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受到损害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西德人觉得经济上、财政上受了剥削,被忽略,吃了亏。80%的西德人要求取消5.5%的援助税,这个税东部的德国人当然也得缴,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主张保留。

需要提及的是,援助计划和援助税不是一回事。援助计划的原意是在东部“减少统一带来的特殊负担”,可是这些年来,总是哭穷的新联邦州在利用这个计划减轻自身的财政负担。当再曝出援助金额的半数都被挪作他用时,西部愤怒了。比尔吉特·布罗伊尔对目前的不正常状况所作的冷静分析是:“只要

新联邦州还在滥用援助计划的资金,这种辩论就不会停止。”好【40】
钢要用在刀刃上,不能搞平均主义。

这与东部德国人那总也提不起来的自信有什么关系呢?尽管在每年10月3日的统一庆典上都一再肯定他们的所作所为。庆典发言者虽在变换,但都一致称赞东部德国人过去20年能够勇敢战胜生命中的巨大挫折,这本身就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了。那是完全对立的两个世界和两种制度的碰撞——中央集权与联邦分治;专制与法制;新闻检查与言论自由;一党制与多党竞争;计划经济与社会市场经济;封口与自由辩论;独裁与民主。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斗争获得了民主,同西部60年代以后的情形不同,无论在中学、大学还是在企业,他们都从来没有学过抗上。所以他们应该大大地为此感到自豪才对,等一下,我们也有话要说呢:“我们不像你们那样什么事都往前挤。”艾波曼笑着对我说:“这与我们的正直有关。”

德国的现状不能只看经济情况,或借用时下流行的说法:统一虽说是买来的,但不是感觉来的。从前的东德公民觉得受了伤害,一定还另有原因,他们以前从未练习过抗议,却勇敢地通过游行示威推翻了政权。简单地用“东部怀旧”来解释未免太肤浅了。正如历史学家格哈德·里特(Gerhard Ritter)在其宏篇巨著《德国统一之代价》一书中列举了众多实例后所论证的,在某些怀旧当中存在着“对过去的某些积极追忆,施普雷森林牌酸黄瓜^①就是好吃,为什么要买西德的酸黄瓜呢?”

不平等的感觉让人受到深深的伤害,这是决定性的。低人【41】

① 这是东德时期的一个名牌产品,至今仍在生产和畅销。

一等,属于穷亲戚一族,总被教训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在成长心理学中,”马茨解释说,“有一项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要能够不依赖他人的恩惠,自己独立成就什么。你们根本就没有认真对待过我们的经历,更不用说尊重它们了。”

格雷戈尔·居西(Gregor Gysi)喜欢穷亲戚的比喻,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买便宜货,那一时期虽没有人会饿死,但也没有人得到他还想得到的东西。这位能言善辩的左翼党明星政治家手持一杯意大利白葡萄酒坐在他的议员办公室,打了一个对人颇有启迪的比喻:“关键在于统一的方式,统一如何实现。出于心理原因,我反对简单地加入。例如一个有钱的姑姑和一个穷光蛋侄子要搬到一起住,姑姑说,我的房子里还空着一个房间,你可以住里面,但每天早上7点要吃早饭,生活起居一切要按我的规则,侄子必须服从。这是决定性的。假如姑姑和侄子一起搬进另一个新居,即使是其中一个先付租金,他们也会共同重新布置和安排。”

拿这个比喻来说统一,应该事先认真研究一下联邦德国和即将消失的东德的制度结构,然后共同商定:好的,80%用你们西边人的,因为它已经过考验证明是行之有效的,10%用我们的,因为它的结构更合理,还有10%我们一起建设新的。这么一来,“就连基尔的妇女或别的什么地方的人也会觉得统一使【42】他们有所收获,而不仅仅是光为它出钱(我们给了钱东边人还总牢骚满腹,选举时还投民社党的票);我们东边人的自信也会增强,不用总得听西边的教训:你们没做任何让我们感兴趣的事情。”

事实是,1989年以前,东边对西边生活的了解仅限于电视

广告；而西边对东边的了解也仅来自于杂志、报纸以及电视一台和二台的报道。开始的时候，只想过来从远处看看这些遥远的陌生人。结果，随着统一社会党统治机制和蔑视人的探子、告密者制度的日益曝光，西部的德国人更不愿意与这样一群人分享自己的繁荣幸福了，他们不是一直骂我们是冷酷的资本家、帝国主义者、战争发动者吗？

在那个历史性夜晚^①我们曾出人意料地亲近，满含欢乐的泪水相互亲吻的经历令人陶醉。但这种感觉来得快去得也快，几乎一夜之间已消失殆尽。柏林洪堡大学神学教授理查德·施罗德(Richard Schröder)挥了下手似乎抹去了回忆，点上支烟，喷了一口，以他特有的干练语气说道：“蜜月不可能延续几十年，对持续热恋的期待是一首蹩脚的浪漫曲。”

他的比喻令我信服。

理查德·施罗德透过他的眼镜带点嘲讽地，保持一定距离地观察着这个世界本来的样子，而不是它应该成为的样子。当年，他和其他业余选手一样从异见知识分子的行列被卷入了政治，在延续至1990年秋天的东德第一届自由选举的人民议院中担任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他的萨克森口音很明显，虽然说话简练而明确，不怕伤着东边或西边谁的感情，但听起来还是很平缓而柔和的。【43】“不应该那么敏感，把什么都往统一这一锅粥里搅。某些差别和敏感点会永远存在，就像巴伐利亚和普鲁士之间一样。我们那儿不是有句话吗：要是你有三分钟，你就揍个萨克森种。”

^① 指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打开的那一夜。

我还没来得及为他那有说服力的例子叫好,他又补充道:“从西部转移到东部的资金都计算得很清楚,虽然这是国家的义务,但始终要求我们感恩戴德,养老金、助学金、劳动市场、高等院校、修桥筑路、子女费、联邦军军营、失业救济金,等等,都算在内。把我们这里所有的失业者都迁到西部去不是更简单吗,支付给他们的生活费就不计算在转移资金内了。”

说这话时,他笑了,这个萨克森人。他对过去和现状的严肃分析都勤奋地写进了一部部著作和一篇篇文章里,他毫不顾忌同党们的感受。他认为,一个国家从解体到建立稳定的制度,其间需要变革,但不需要革命。西部为什么要适应呢?对80%的德国人来说一切照旧,只对20%的人来说一切都变了。西部对纳粹罪行进行了彻底清算,而东部的反法西斯神话却迷雾重重。施罗德以哲学家的逻辑反驳德国统一失败的论调:“假如统一是失败的,自由的人一定会走上不同的道路,民族亦如此。德国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因而这论调已不攻自破了。”

说完了,就这样!

这一点,让人想起另一个来自汉诺威的男人,曾担任过德国总理,两人的党证一样。除了同属一党和同姓以外,理查德·施罗德和格哈德·施罗德两人的共同点其实很少。出身东部的施罗德从没有忘记过西部的这位在评论内心早已看不起的穷亲戚突然闯进门来,坐下就要一起吃饭时的出言不逊,他说这些人现在已拥有他们曾梦想得到的一切,同时还想留住以往社会主义的悠闲安逸。

理查德·施罗德讲了一件逸事,让我明白了为什么对过去那种沉闷的渴望会大于对一定程度的自由的渴望,因为那沉闷

虽令人感到压抑,但也感觉温暖。“我的祖父在他家乡曾致力于改善多子女家庭的住房,让他们能得到四五个房间。当他过了一段时间再去探望他们的时候,看到他们又都挤在一个房间里了,他一头雾水地问他们,为什么要挤在一起而不去利用其他的房间,得到的回答是:这样更舒服,我们还出租了一间。”

理查德·施罗德在教会中的兄弟姊妹们,无论他们属于教会中的哪一支,对德国统一后的现状都不那么乐观。2007年底,教会组织和辅助机构,其中包括五个新教州教会,门诺教区,四个教会慈善组织,许多世界基督教运动组织以及天主教工人运动,在《公平与正义年鉴》一书中以听起来就不祥的标题《四分五裂的国家,德国统一之前景》发表了他们对国家真实现状的分析。

在他们看来,情况相当糟糕:“要想弥合东、西部间的裂缝,缩小地区差别,使所有人都能平等参与社会生活,五个新联邦州以至全德国都得重新制定发展道路。由于双重剧变,让东部照搬西部的试验已经失败。”文章作者要求退出所谓“转移经济”, [45] 这里所说的“转移”与国家援助计划中的转移只是用词上的巧合罢了,说的是另一回事。它的意思是,东部的消费必须与当地生产的商品和服务挂钩,不要从西部运过来。

他们知道,这事情不能像计划经济时期那样由国家来指挥安排,而是靠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因此,他们建议,未来15年给予新联邦州增值税减少一半的特权,这样就会刺激需求,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他们援引了早已提出过这个建议的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的话作为根据。谁敢反驳赫赫有名的经济学

家、前总理呢？沃尔夫冈·蒂尔泽^①(Wolfgang Thierse)敢,这个大胡子,是东、西部关系方面所有问题的道德法庭。他认为这个主意原则上不错,但是来得晚了十七八年,现在实行不了了。连短期设立一个专门负责发展东部经济部委的要求也争取不到多数了。政治家们的答复是,不是已经有一个东部建设部长了吗?至于他应该做的没能做到,是另外一回事,归另外的地方管,归政府管。

对另类能源研发的支持,所有人的基本收入保障,家庭与社区工作的新模式,为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真正有机会获胜向他们的风险资金提供政府担保等都不是什么新问题,所有政党早【46】已统统讨论过了。然而,基督教经济学家们的结论是,结束空谈,拿出行动,而且是具体行动,像新药研发那样,在普遍试用前,先在实验室试验。这就是先在东部斥资建立试验点。

我读到,恰巧是在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当年抨击僵化制度的那个城市的郊区,进行了一个这样的试验,被称为“巴特施密德贝尔格的小奇迹”,号称一年之内,失业人数减半。奇迹嘛,就是这样,可以信,也可以不信,我准备以后亲自去那儿看看。

目前我还得在柏林再待些日子。

东德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自由选举产生的总理把他事务所里挂着的那幅铜版画指给我看,那是从前的边境线,是两米厚的城墙。但是可以通行,哈雷门、施潘道门和勃兰登堡门,穿过这些城门,乘着马车进入柏林,也可以随时离开,不会受到警卫的

^① 联邦议院议长,来自东部。

任何干扰。13 世纪时,柏林四周是有深深的壕沟和高高的城墙的。

洛塔·德梅齐埃(Lothar de Maiziere)冷笑着。

从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多罗苔名人墓,那里安息着德国名人,他们来自德国的东西南北,在此共享天国统一的安宁。贝特霍尔德·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和迪特里希·邦赫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京特·高斯(Günter Gaus)和海伦·魏格尔(Helene Weigel),鲁道夫·巴罗(Rudolf Bahro)和约翰内斯·R. 贝歇尔(Johannes R. Becher),托马斯·布拉什(Thomas Brasch)和赫伯特·马库泽(Herbert Marcuse),施特凡·赫尔姆林(Stefan Hermlin)和约翰内斯·劳(Johannes Rau),海涅尔·穆勒(Heiner Müller)和格奥尔格·塔波里(George Tabori),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和阿诺尔德·茨威格(Arnold Zweig),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和鲁特·贝尔格豪斯(Ruth Berghaus),汉斯·冯·多纳尼(Hans von Dohnanyi)和约翰·哥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和格奥尔格·威廉·黑格尔(Georg Wilhelm Hegel)以及另外许许多多的名人都安葬在这里。“有的人死了,我们觉得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我们觉得他已经死了”,这是沃尔夫·比尔曼(Wolf Biermann)曾写过的诗句,原来他就住在离此不远的舍赛大街 131 号,直到有一天,当局再也容忍不了他的讽刺歌曲把他驱逐出境。 [47]

出身于胡格诺教徒家庭的洛塔·德梅齐埃,本来的生活爱好是音乐和艺术,后来,(我要特别强调:违心地)搞上了政治,虽生长在东德,但仍不失为德国知识阶层的代表,他死后也愿意

埋葬在这个名人公墓里,当然不想马上啊,他补充道。德梅齐埃具有一种东边人少有的天赋,能够带着嘲讽来看世界。这一点让他和格雷戈尔·居西,理查德·施罗德,莱因纳·艾波曼以及沃尔夫冈·朔伊普勒(Wolfgang Schäuble)成为相互直呼其名的好朋友。现任内政部长^①和他同属一党,都是基民盟的。四人帮里这唯一的西边人是他在统一条约谈判时认识的。他俩还有一点共同之处:都曾在起来反对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时被他羞辱,两人至今都还耿耿于怀。身为联邦总理的科尔,自认是小市民,他凭政治直觉抓住了统一的历史机会,在外交方面不愧为伟大的领导人。

法学家德梅齐埃曾为很多因拒服兵役和出于和平主义理念拒绝使用武器而受到起诉的年轻人担任律师。在统一社会党执政时期,那就是违法行为。服兵役是光荣的任务,而和平主义思想被视为阶级敌人进行的心理战。德梅齐埃清楚地知道那个制度下是没有法律保障的,因此他并没有不惜一切代价地要求无罪释放的公正判决,而是让他的当事人虽坐牢但仍有前途。他知道公正、有理和能赢是不同的。“追求公正是我始终坚持的,但真正的公正只存在于天上,来自于恩典。”

【48】 基督教现实主义德梅齐埃从自己在东德的生活经历中知道,用上帝对人的统治来对抗国家对人的全面彻底统治有多么难。因此他才在其1990年4月19日发表的第一个政府声明中说这样的话:“我们不存法律与道德相等,通过法律可以实现道

① 指朔伊普勒,他是西德人。

德的幻想。”这也是他对新论坛^①创始人之一，当年被激情地称为“革命之母”的贝贝尔·博莱(Baerbel Bohley)抱怨民权人士追求的是公正，得到的只是法治国家的回答。他是务实的，在世上得到一个法治国家难道不比空等天上的公正好吗？三权分立，基本权利保障，基于宪法的各种法律，执法手段恰当，司法独立，简言之，每一个公民无论地位高低都享有法律保障。

这位基民盟人士退出政界以后，又全身心地致力于巩固统一的事业了。德梅齐埃的律师事务所主要代理统一的后果造成的或统一引发的纠纷案。例如东德公民维尔纳·施瓦茨(Werner Schwarz)一案，他被“商业协调局艺术品与古玩有限公司”搞破了产，还因为所谓偷漏税被判了重刑，而整他那个公司的头目就是现在生活在特格尔恩湖的神秘人物亚历山大·沙尔克-格罗德科夫斯基(Alexander Schalck-Golodkowski)^②。用了十年之久的时间，德梅齐埃才在法治国家的条件下从联邦德国争取到了赔偿。

他不想把这称为公正。他的当事人没有能活着等到判决。从道德层面看，对毁了维尔纳·施瓦茨一生负有罪责的那个人，【49】如今是德国统一的受益者。他在波茨坦附近拥有度假村设施，受到当地名流的追捧，因为他为那里创造了就业岗位。这个人，我也打算专门去探访一下。

在德梅齐埃任总理的那些疯狂的日日夜夜里，现已完全远

① 东德1989年剧变时成立的群众组织，后并入左翼党。

② 东德外贸部高级官员，主要负责为东德创收外汇，据报道曾从事不少非法活动，同时中饱私囊。

离尼古丁的他那时一边一支接一支吸烟，一边看文件，从没有过午休，也没有时间拉拉他心爱的中提琴，体重从 65 公斤下降到了 52 公斤，直到 1990 年 10 月 3 日科尔解除他身上的政府重担。当时他曾问过西班牙驻东柏林的大使，佛朗哥的独裁统治被推翻后，你们是如何做到在民主派和佛朗哥的追随者之间不发生内战的。

大使的回答是，通过大赦，大赦法西斯政权的跟随者。这是一个非常智慧的和解行动，就像你们德国人一样，阿登纳^①以其政治智慧让那些纳粹的小喽啰们都融入德国社会，虽然他们并没有在一夜之间变成民主派。西班牙只对杀人凶手和施酷刑者进行了追究审判，这是得到大家共识的。“但我们是天主教徒，”大使补充道，“你们德国新教徒肯定要毫不留情地彻底翻老账，大赦在你们那儿做不到。”他说的没错，事实果然如此。德梅齐埃说：“确实，除了杀人凶手、施酷刑者，反人类罪犯外，对其他入实施大赦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建立法律和平。”然而为什么这一切没有发生，是另一段故事，属于另一个章节。

苍白的东德母亲已病入膏肓，她的病床边已等满了从西边过来收尸的人。作为东德的总理，德梅齐埃的月薪是 3 500 马克，他的部长们拿 2 500 马克，这点钱，在当时西边的首都波恩【50】当门房都没人干。德梅齐埃和他的内阁同事们是人民的代表，人民的日子也不比他们好过。他向我讲述这些时不带任何情绪，他不喜欢抱怨过去。

对他的某些同胞如今像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找不到北的孩子

① 战后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

这种状态,他能通过很形象的例子来加以解释,在类比的发明方面他和理查德·施罗德,格雷戈尔·居西一样有才华,也许正是这点使他们成了朋友。“东德人虽然勇敢地、不顾后果地摆脱了严厉的父亲(国家),”这当间,他最喜爱的嘲讽又来了,“可同时也失去了温暖他们的、关怀备至的母亲,从此他们觉得全成了孤儿,这一心态一直影响着他们到现在成年。”

但是不管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全孤儿们可以提出一个属于他们之一的,在他们那里长大的人,国母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德国在历史上第一次由一名妇女来领导,而且她是来自东德的。默克尔从最后一届东德政府的发言人上升为统一德国的女总理,还有比这更能说明国家已实现统一的例子吗?难道恰恰是在她身上,属于一起的生长到一起了吗?

东部的妇女很早就学会了自强,因为计划经济需要她们的劳动力。这是“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之一,男女平等在我们国家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实践中都已得到彻底实现”,1971年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就这样说过,“地球上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敢这么说”。这种表面上的进步,东德的男女平等与另一边德国从男人那里争得的妇女解放是大相径庭的,那里实现的是妇女自主作决定和掌握自己命运的基本权利。在每时每刻为即将胜利的社会主义所进行的斗争中,需要每一个劳动力。所以东部的男女平等不是基本权利,而是基本义务。【51】

从前东德90%的妇女就业,而西德只有40%,这只是个统计数字,与自由发展个性的权利毫不相干。那边根据指令和需要安排妇女们做的工作,生产队长、吊车司机、拖拉机手和西边那些典型的女性职业,护士、理发师和招待员完全不同。存在决

定意识,东部妇女与西部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在男性职业中有和男人一样的义务,从中引出享有同等权利,享受同样待遇的要求。

东部母亲常常是单身的,因为她不需要孩子生父的供养,国(家)父(亲)帮她,上班前把孩子放到托儿所就行。免费日托属于社会主义模式里的基本保障。免除了照料孩子后顾之忧的母亲们享有同工同酬的待遇,每年的三八妇女节都能收到同事送的红色康乃馨。从人口总数看,东部妇女占53%,是多数,但她们进入政治领导层的机会和西部的姐妹们一样微乎其微。

真正的权力在政治局。在统一社会党执政40年的历史上,政治局没有过一位妇女。部长会议里唯一的女性是负责教育的玛戈特·昂纳克^①(Margot Honecker)。“我们的共和国需要所【52】有的妇女,所有的妇女都需要我们的政策。”——这是当年统一社会党麻痹人民的简单口号之一。实际上他们需要的是妇女们的劳动力,用于实现他们的政策,妇女们呢,需要这样的政策吗?

用东边的因素,什么熟知男性世界的游戏规则啊,什么不惧上啊,并不能解释联邦女总理为什么能这么有效地战胜她党内的男性竞争对手。默克尔虽遇阻挡,但终究不可阻挡的升迁虽说是妇女在男性世界成功的典范,但更多的应被视为民主的胜利。某些特殊的领导才能,马茨认为属于现任女总理的典型特征,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她能在基民盟党内过关斩将,那里的权力斗争原本按照传统的经典模式只在男人团体间展开,从没有女性参加的份儿。

① 东德国家主席、党总书记埃利希·昂纳克的夫人。

科尔的父权统治中,强悍的儿子们都被他视为潜在的威胁清除了,羸弱的要靠他的恩惠和怜悯生存。被科尔恩赐为“我的小姑娘”的默克尔,长时间像姑娘般沉默着,以此迷惑了那些男人,他们都没有把她当回事,很晚,太晚了才发现,东边来的这位女物理学家在策略上比他们都高明得多。马茨认为:“认真努力把自己的才能发挥出来,对她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很多男人当然也是这样。加上很早就学会的防备和谨慎,在东德,这是生存所必需的。”基于这样的经验,她很会把握,在什么情况下不能等待,必须行动,在什么情况下不能行动,必须等待。因此敢于在一个正确的时刻起来反对老前辈科尔,而这是任何一个男人都没敢做的事情。东部妇女的女性自觉虽然帮了她,但更多的是马茨所说的属于他同胞性格特征的东西:除了东德那种专制制度造成的集体心理后果外,迫于环境还会产生具有超凡力量和能力的个体心理保护机制。执政的国母正具备这种能力,虽然她自身从未做过母亲。【53】

对冬季的汉堡来说,那是个典型的阴天。上午,我找到了前市长海宁·福舍劳(Henning Voschrau),让他给我讲那个两德接近的故事,事情虽然没成功,但却长时间地改变了政治环境。像许多当年消失在迷雾中的事情一样,如今它才又浮现出来,好像就发生在昨天。福舍劳是个真正的汉萨人,坚定不移、清醒冷静、喜欢成功,虽然他已自愿辞去了所有政治职务,但仍一如既往地参与社民党的事务,有时甚至走到台前。他从自己的公证员职业中获得了许多满足。一大摞手写的笔记堆在他面前,那是他为了刷新记忆让人从国家档案馆借出来的,上面是他在德国的另一个秋天亲手写下的记录。其实他根本不需要这些笔记

的帮助,所有一切都储存在他脑子里呢。

那天打电话到市政府找他的那个人是他半年前认识的。作为汉堡的友好城市、德累斯顿市的市长,1989年5月1日他来参加易北河旁这座港口的800周年大庆,拜会了福舍劳,两座城市都坐落在缓缓流动的易北河畔。但真正引起轰动的还不是访问本身,而是德累斯顿人准备乘坐一艘名为“德累斯顿号”的汽轮顺流而下到汉堡。两周前,“德累斯顿号”的总机械师哈拉尔特·克里姆(Harald Kliem)打来电话,询问汉堡5月1日的最低水位在什么时间,这时汉萨人才有了把握,那边的人是真准备来了。柏林墙建成以来,还是第一次有一条载人的船通过内德边境。这无疑是个历史性事件,贝尔格霍夫和他的同伴们都感受到了,当他们到达时,港口停留的所有船只都鸣笛致敬,消防水龙带向天空喷射水柱。

客人们停留了几天。海宁·福舍劳对他这位东部同行的印象是个“在体制内尽可能走比较正直的路,在肯定没有斯塔西监听的时候讲真话”的人。1989年深秋的这个电话来自萨尔茨堡,东德的市长应奥地利友城的邀请正在那里访问,那里的边界此时已对大家开放。

贝尔格霍夫的建议听起来实在耸人听闻,假如真的接受,将是石破天惊的政治事件。在僵化的统一社会党庸人队伍中,这位开放的另类思维者在西方报纸上被誉为东部的肯尼迪。他建议,利用剧变独一无二的时机,举行一次具有象征意义的行动,统一社会党20万名基本没有参与过安全部工作的党员,集体加入东德新成立的社会民主党。经过一段过渡时期再并入西德的社民党,这样就为社民党在未来的选举中获胜打下一个基础,其

他政党,像科尔的基民盟和根舍(Genscher)的自民党都是通过接收东德从前的结盟党派^①这样做的。

福舍劳把此事通知了他的党主席汉斯-约亨·福格尔(Hans-Jochen Vogel),他这样做,不仅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东德社民党在1990年3月18日东德的第一次自由大选将会有怎样的机会,而且是因为,他眼前仿佛已看到了那番动人的情景,想象一下:东柏林的维尔纳-泽伦宾德大厅,贝尔格霍夫带着一大帮同志入场,发表一个讲话,激烈控诉当年社民党被迫与共产党合并的屈辱,之后宣布回归社民党,剩下的让共产党去收拾残局。【55】

这是海宁·福舍劳对已流失的过去想象的画面。他出身于一个演员家庭,所以很早就具备了设计表演效果的能力。他的父亲卡尔受聘于距他的商社50米远的塔利亚剧团,那里的新戏首演时,当年的汉堡市长无一不到场。出于道德原因福格尔立即拒绝了 this 建议,就是1946年那场与共产党的强制合并,成为统一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人不会忘记,他们的很多同志后来都被统一社会党关进了监狱,有的甚至又到了当年纳粹统治下蹲过的集中营。因此,我们与统一社会党的后续党不想有任何瓜葛。此外,福舍劳想到,在波恩的社民党理事会里还有鼓吹第三条道路而对统一不感兴趣的人。

福舍劳把这一次的拒绝称为“历史性的失误,其后果至今仍反映在那边社民党的选举结果中”。埃贡·巴尔苦涩地补充

^① 指东德时期与执政党统一社会党结盟的其他政党,其中有基民盟,自由民主党,德国农民党等。

道：“其他党都自动把结盟党全部接收了，只有我们拒绝了。”当时真应该听威利·勃兰特的，他建议：“所有赞同我们纲领的，没干过坏事的都可以理直气壮地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福格尔拒绝自有他崇高的理由，不仅是因为尚未消化的过去。他想保护东边的新同志免被吞噬。

东部社民党的民权人士，比如马库斯·梅克尔 (Makus Meckel) 也反对，他们不想在剧变不久收容“追风派”，统一社会党干部贝尔格霍夫在他们眼里就是属于这一类的。此外，他们也知道，贝尔格霍夫的改革派名声很大，与他竞争他们无法树立起自己的形象，也没有机会在选举中获胜。尤其是他们后来的主要竞选人伊普拉希姆·波梅 (Ibrahim Boehme) 坚决反对。他的话很有分量，因为他那时是个亮点人物，是第一次自由选举的总理候选人。

东部社民党在选举中败北，他们只取得了 21.7% 的选票，在贝尔格霍夫的家乡最惨，只得到 9.7%。事后不久，《明镜》周刊便爆料出伊普拉希姆·波梅是国家安全部多年的工作人员，他反对社民党接收统一社会党员恐怕不是出于道德原因，而完全另有受命。

以上是社民党如何错过机会，没能在东部发展成为一个大众党的故事。海宁·福舍劳对自己党所作出的拒绝表示遗憾，认为是个错误，但还是以公证员的冷静把这一决定通知了贝尔格霍夫。同时给他提了一个紧急建议，在统一社会党更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之前退党，绝不要让人选为该党主席，东德的很多同志都准备选他呢。贝尔格霍夫没有听从这个建议，以 98.3% 的高票当选为格雷戈尔·居西的副手，党的副主席，这个得票率

让人想起从前的党代会。福舍劳认为这是个巨大的错误,贝尔格霍夫如今也是这么看的,吃一堑长一智嘛。不管怎么说,当选几周后,1990年1月,贝尔格霍夫带着德累斯顿的一伙同志退了党。

退党的理由发人深思,既有批评,也有自我批评:“统一社会党及其领导人令人羞愧地,不负责任地在政治、经济和道义上都搞垮了东德。任何穿着这双旧鞋走新路的企图都只会让人们担心这个党的卷土重来。怀着对我们国家深深的忧虑,所有签名者宣布退出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迈出这一步的同时,我们要求解散这个党。我们不想以退党的方式推卸我们对过去的责任,我们愿意参与民主革新。”【57】

福舍劳亲身经历了这一革新的开始,所有细节如今都还历历在目。1989年11月,他带着上千名汉堡市民乘专列去了德累斯顿,一下车就被淹没在了人海里。森珀歌剧院内汉堡市长坐的贵宾包厢里的“臭虫”当然都还在,但另一边是否还有人在监听福舍劳很值得怀疑。

演出结束后,他在副市长安德烈·朗格(Andre Lang)的陪同下穿过市区去十字教堂。经过老集市时,看到那里已经搭起了一个圣诞装饰的舞台,前面聚集了不少人。“朗格忽然问我,作为友城的市长是否可以对大家讲几句话,讲话对我来说不成问题,只是在我这一生中,还从未与一个东德的普通老百姓说过一句话,我不知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不知道他们怎么想,会怎么感受。我带着自己的本事就这么站到了台上,得说点什么,人越聚越多,因为十字教堂的大门开了,人群在往那里涌。”

天才的演讲者小心翼翼地开讲了,先开了个小玩笑,说九个

月以后大概可以有个汉堡-德累斯顿新公民出生,他将是这个特殊的统一之夜的象征。笑声、掌声。“接着我泛泛地说了些民主的福祉,不久你们也会得到她了。”

【58】 热烈鼓掌。

“再往下,我大胆地涉及比较棘手的题目了。我说,对我来说很清楚,战后你们生活在阴暗的一边不是你们的错。你们人数比我们西德人少,所以,想不想要统一得由你们自己单独决定。”

死一般的寂静。

“简直像在做礼拜,”福舍劳停了一会儿,在记忆库里找到了当时接下去说的那句结语:“如果你们要统一,我们张开双臂欢迎,如果你们不要,我们仍然会帮助你们。”

欢呼声起。

这样的民族节庆在两个月前,秋风渐起,秋叶泛黄时还是无法想象的。警察和斯塔西肯定把老百姓都驱散了。当权者们坚信,吹起的风只是短暂的一阵,国家的局势不久就又会回到他们的掌控之下了。只有一个人不相信,早就不信了,虽然他的职务要求他必须相信。沃尔夫冈·贝尔戈霍夫经历了阵风如何变成了风暴,当权者如何日薄西山,东德如何走向灭亡。

为了理解现在,我和他一起走进过去,回到1989年秋天。

第二章 日薄西山

【59】

要想挑起巷战，一块石头、一根警棍、一粒子弹足够。接着就会乱石横飞，接着就会乱枪齐发，从天黑就聚集在各个侧街小巷里等候着的武装力量就会按照命令冲向步行区，把乱说乱动的那些人揍回老地方老规矩里去。

被官方称为“武装力量”的警察、士兵和斯塔西便衣那时比人民还厉害得多。四天前他们刚显示过自己的战斗力。老百姓从广播中得知了满载逃亡者的列车将从布拉格经过此地，于是大约两万人开始向火车站方向聚集。两德政府达成的协议是让这列从捷克来的火车从德累斯顿和东德境内穿过。在到达西德之前，在边境收掉所有证件。想在联邦德国生活的人，就失去东德国籍。这点损失谁都承受得起，眼泪横飞是到达之后的事，欣喜之泪。

全国各地的人，不仅仅是德累斯顿和萨克森人在这一天晚上，1989年10月4日的晚上都往火车站来了，背着行囊、拎着箱子、怀着明确的意图。他们虽然都没有车票，但他们都想截住这列火车，乘上去跟着走。上半年，德累斯顿已经有几千人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不归之旅。国家安全部的秘密报告中记录下的精

【60】

确数字是 18 182 名。9 月底,全国申请移居和已经移居的人数是 160 785。办事部门后来根本就不接受申请了,理由表面上是“保护国家安全和国防”,实际是为了修改统计数字,这是那边官员们的拿手好戏。

对这种小逃亡会收紧的担心促使着人们。昨天开始,通往捷克的边界已经关闭了。不祥的预兆。拥有众多耳目的国家政权,虽然时刻监听着时间的跳动,却根本没有把握住时代的脉搏,他们已经为对付这些搭车者做好了一切准备。几百名警察在站台和轨道上设下了障碍。企图冲破障碍的人在车站前广场就已被水龙、催泪弹和警棍压倒了。人群投掷着石块,玻璃被打碎,一辆巡逻信号车被点燃。这情景,上一次在东德出现还是在 1953 年 6 月 17 日反对提高劳动标准的起义时。那时候出动了坦克,开了枪,对那些所谓的操纵者宣判和执行了死刑。

车站广场上混战到最后,抓捕了 200 名“暴乱分子”和其他大量非暴力的旁观者,说他们是旁观者,是因为他们还没到冲突发生的地方已被阻拦住了。为了掩饰对这些人的逮捕,当局一直以来把它称为“收容”,但每一个东德公民都清楚收容的意思,就是任意逮捕。收容,过去和现在都是专制独裁的标志,如果早上有人摁门铃,你得想到,来的不是邮递员。

【61】 那些日子里,被收容的德累斯顿人有一千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被装上囚车或卡车运到集散点,在那里遭警察的暴打。他们被强迫长时间面壁站立,只要稍微一蹲,膝窝处就遭一脚。不让喝水,不给吃饭,只有定时挨打。当然更没有权利找律师。还有不少人从德累斯顿被遣送到臭名昭著的保岑(Bautzen)监狱,只要在审讯中问到自己的罪名是什么,将会怎么样,尤其是

指出东德宪法第30条(至少纸上写着)保护人的尊严时,得到的回答总是棒打。

这里我想到了洛塔·德梅齐埃的观点,没有大赦那些追随者是个错误,对统一后国家的持久和平不利。他的观点固然有理,但公正也有其内在的吸引力。至少可以问问那些打手,如今是否对自己的行为感觉羞耻。他们从没受到过什么惩罚,因为据说他们只是执行命令,并不是出于兴趣。

虽然布置了让严格保密,但是里面国家工作人员挥舞大棒的所作所为还是被外面的老百姓知道了,他们不再像从前那样,为了自身免遭危险而沉默不语,而是齐声要求释放所有被收容者。一天不放人,就抗议一天。他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两天后,5 000 德累斯顿人上街,高唱他们曾必须唱的那首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这一次他们是自愿唱的,唱给自己,也唱给邻人,这首国际歌就这样陪伴了这场国家起义。几个月前,他们还不敢用当局者自己的战斗歌曲来发起挑战。如今他们的愤怒远远超过了恐惧。在火车站出动军队和警察,对被收容者施虐也没有吓到他们。相反,对很多人来说,正是逮捕擦亮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一改多年来在专制制度下学会的观望等待,走上街头,参与进去。【62】

10月8日晚上,通往火车站的布拉格大街上气氛异常紧张。一边是老百姓,另一边是穿制服的,其中也有斯塔西的便衣,打手,一切都准备好了开战。内瓦饭店顶层遮暗的房间里有安全部的人在摄像,那里对步行街上发生的一切一览无余。酒吧,老百姓已经不怕了,他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关起来。

还没有石块扔出,也没有枪声响起。除了“我们是人民”的

口号外，“不准动武”是这个德意志秋季第二个最重要的口号，这一季的狂风在后来的几个星期里把旧制度吹垮了。第三个口号“我们留下来”的前提是东德的现行制度不能再留下去了。在这个星期日的晚上，理智在人群中、在大街上是起着作用，但偶然性也同时起了作用。大约一千个德累斯顿人在警察的包围下，在冰冷的石头地上已经坐了好几个小时了。他们的市长，沃尔夫冈·贝尔戈霍夫在距此地 500 米的市政府办公室里，虽然关闭的窗户滤掉了一些，但仍可以不时听到示威者的喊声。

继莱比锡每周一的静默示威之后，现在，人民的呼声已响遍全国。当权者已日薄西山。迄今一直在教会庇护下活动的妇女、环保和和平组织也不再畏惧当局的监控。秘密警察甚至把【63】他们的气味都搜集在密封罐里的事，是革命成功后才得知的。

各类民权人士，以往都归属在宗旨不同的团体里，常打出些一语双关的口号，如“只有死鱼顺流而下”，“宁要床上的臭虫不要墙上的”等。每年在东柏林拯救教堂的和平工作小组开一次会，1989 年 7 月初到 9 月底这段时间里，他们已经扩建起了支持者相互联系的网络。从西德的电视节目里，他们清楚地知道有大批的同胞逃亡匈牙利，知道最近一次地方选举中的舞弊。很多记者不顾利诱阻拦进行了报道，用他们的方式揭露老朽的政权。

图像很有效果，它们比语言更有力。它们留在人们头脑中，安全人员挥舞的大棒再次打来时，他们也没有忘记。统一社会党一言堂的时代早已结束，他们建再高的墙也挡不住天上传来的电波。第一，东德人知道内外发生的所有事情，虽然他们自己的报纸和电台并没有报道；第二，他们知道西边的生活比这边美

好得多；第三，到目前为止他们一直认为他们只能在现有的环境内安排生活，他们对能自主决定的更好生活的渴望似乎无法企及。

突然，那条地平线不再那么遥远而变得近了，他们盯住它再不愿放开。渴望温暖着他们，希望给他们力量，自由在向他们召唤。

革命开始了。

他们的诉求可能千差万别，但他们的目标一致。他们虽然还没有否定这个国家，但已彻底否定了迄今为止在运行的制度。【64】他们公开向官员要求自己的权利，给这个僵化的制度弹奏自己的音乐，让它随之起舞。当权者拒绝了起舞的邀请，1989年秋天曾是他们唯一的机会，不久，便只剩下熄灯落幕前的最后一曲华尔兹了。

由于官僚主义者们没有诚恳对话的态度，和几十年来一样，只会封锁、检查和逮捕，因此，持异见者对他们的要求一天比一天多。现在他们要求一切，要求一切都现在实现：结束一党制，取消结盟党，实行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旅行自由。这些诉求也受到了士兵和警察的欢迎，虽然不久前他们还按照上司的命令出发去镇压公开怀疑现行制度的人，但他们也不是瞎子，不需要通过秘密的形势报告来认清形势，每次巡逻经过斑驳破落的老城，他们看到了真实状况，国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在执行任务时，他们也已经看清，面对的不是什么阶级敌人的帝国主义嘴脸，而完全是熟悉的面容。假如不是穿着制服，他们和对面人群里的人一样。

人民军德累斯顿行动指挥部的一份报告，对火车站事件及

其引起的反应作了真实的描述：“在头两天(10月4日和5日)的行动中,战士们无一例外都具有明确的敌人意识并毫无保留地做好了行动准备,尽管我们这支百人队伍已感觉不到在【65】场民众道义上的支持,相反,得到的是嘘声、口哨声和谩骂。个别党员也对动用军队表示反对,虽然军队只是在警力不够的情况下才被启用。示威者加强了与行动部队战士及下级军官的接触,目的在于引起他们的道德质疑。常有年轻人、姑娘、妇女和孩子被派过来。战士和下级军官中提问、怀疑和动摇在增多。”

1989年10月8日21点07分,贝尔格霍夫得知,电话预告过要来的三位先生到了,请他立即前去谈话。他的副手,市政府负责内政的汉斯·约尔克(Hans Jörke)特别用了“先生”一词,因为教会代表像州主教约翰·亨佩尔(Johann Hempel),区教长克利斯托夫·齐默尔(Christof Ziemer)当然不是像他和贝尔格霍夫这样的同志。他们在市政府大厅旁的一个小房间里表达的愿望很简单:请市长先生明天早上会见示威群众代表,作为回报他们现在就劝说示威者和平解散。

贝尔格霍夫同志当即就表示了同意,其实,没有上级党领导的允许他根本无权做这么重大的决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他属此列,严格禁止与反对派有任何接触。本来他什么也决定不了,他没有对地方警察的命令权,当然更没有军权,也没有对安全部人员的指挥权。斯塔西高级军官采取行动也得得到当地党领导的批准。

贝尔格霍夫至少想向统一社会党专区书记汉斯·莫德罗(Hans Modrow)通报一下此事,他离开房间,去给莫德罗打电

话,但是没找到他,因为他正在森珀歌剧院参加歌剧《菲德里奥》^①的第二次首演,舞台上被囚禁在铁丝网牢笼里呼唤自由的合唱恰恰成了外边大街上现实情况的象征。这一巧合给了贝尔格霍夫成为主角的机会,他回到房间,谎称上面已经都批准了。他虽然知道,这样做已经到了犯“叛党叛国罪”的边缘,但是他更知道,外面步行街上的局面随时有可能激化,导致流血事件的发生。他和另外三位一起草拟了一个稿子,由齐默尔去宣读。【66】

市政府里面的几个人不知道的是,这时天主教会的神甫弗朗克·里希特(Frank Richter)在同人民警察的一个便衣军官,行动指挥队长德特勒夫·帕佩尔曼(Detlef Pappermann)商量后,已经站到了刚停止喷水的喷泉围栏上,手持麦克风,宣布了要从4000名示威者中选出50位代表同市长对话的打算。20人进入了最后一轮,行动指挥队长检查了他们的证件、记下了姓名,里希特也记下了,出于另外的原因。他信不过国家政权,说不准,这20人明天一下子全进了保岑监狱。在选出的人当中包括民权人士弗朗克·诺伊伯特(Frank Neubert),一个坚定的新教基督徒。一天以后,他去莱比锡向教友们报告了这里发生的事情以及这一夜和平示威的结果。

贝尔格霍夫回到了他的办公室,外面还在不断传来呼喊声,接着突然静了下来,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这是齐默尔,他说:“我们和市长贝尔格霍夫先生谈过了,他让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明天早上9点,他将在市政府同你们选出的20名

^① 《菲德里奥》(Fidelio)是贝多芬创作的唯一一部歌剧,以解放和追求自由为主题。

代表对话。我得到了保证,如果你们现在平静地解散回家,警察会给你们放行。”

【67】 几分钟后,行动指挥少校普拉格打来电话,向市长证实,他的手下都撤回军营。几乎是同一时间,按照标注是22点10分,德累斯顿专区斯塔西头目霍斯特·波姆(Horst Böhm)给国家安全部副部长格哈德·奈伊伯(Gerhard Neiber)打去电话,报告他“那俩秃驴^①对示威者讲了话,之后队伍就散了。这是莫德罗同志做的政治决定,他负全责”。奈伊伯认为莫德罗是个动摇派的看法得到了证实。在这一天的晚上,10月8日,他们在柏林已经做了决定,以经过考验的方式来解决国内目前出现的危机,不进行对话,用武力来威胁。对示威者绝不手软的命令已经发往各地。革命最激烈的两个城市,德累斯顿和莱比锡,派去了带有特殊命令的特使。明天,10月9日,他们将到达那里。

此时,莫德罗对布拉格大街上发生的事情及和平解决方案仍然一无所知。贝尔格霍夫一直没有跟他联系上。午夜过后,莫德罗终于来电话了,询问情况。非暴力、不动武,相互对话沟通的策略,他支持。他要求沃尔夫冈同志随时向他报告会谈的进展。对话的结果第二天晚上在市教堂向大家宣布。两天以后,所有被“收容”的人都被释放了。

这一切,昂纳克一点也不喜欢。总书记虽然身患癌症,手术后在8月份休息了好几周,现在又在主持工作了。一如既往地顽固不化,“社会主义前进的步伐无可阻挡,逃走的那些人更阻止不了,没有人对他们的离去惋惜,因为他们的行为违背了道

① 指亨佩尔和齐默尔。

德。”这是他通过国家通讯社德通社发表在所有报刊上的言论。【68】而他的这些话恰恰证实了一切都已经变了,不再是从前的样子了,人们开始用脚投票,反对他和这个政权。地方选举作假半年后,人民表达真实的态度了。

昂纳克所指的是离开这个衰败国度的集体逃亡,这点大家心里都明白。“虽然西德电视一台和二台的节目我们收不到,人称‘生活在一无所知的山谷’,其实我们什么都了解,我们靠听广播,广播节目的详细报道常常比电视还精确。”阿诺尔德·瓦茨(Anold Vaatz)回忆道。他是新论坛的创建者之一,不久,新论坛便发展壮大为东德最大的反对派组织,后来他担任过萨克森州的环境部长,如今是基民盟联邦议会党团的副主席。

对觉醒的人民表达愤怒的那些日子的回忆使他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55岁要年轻。瓦茨是学数学出身,讲起话来字斟句酌,但谈到亲身经历的萨克森起义他就变得激动了,他曾因为拒服兵役蹲过监狱。这时他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当年他并不认为很重要,如今他坚信是“在德累斯顿粉碎了那个制度继续存在下去的可能,我承认莱比锡英雄城市的地位,但他们那里是一步一步从传统的星期一祈祷发展起来的,开始只是静默示威,而我们这里是几天之内发生的,并且一开始就大声疾呼。”

当人民以不容喘息的速度反对现今寻找未来的时候,昂纳克还抓住过去的老办法不放,动武。他决定采用武力方式来解决骚乱,恢复平静。这样做会死人,他显然不在乎。昂纳克毫不隐讳地表示,对人民的质问用这种方式回答是合适的。1989年4月虽向军队和安全部边检部队发过不准使用武器的命令,但是只适用于阻止“越境行为”。【69】

他的接班人埃贡·克伦茨到流血事件发生地表示了支持之后,完全同意昂纳克的意见。埃里希·米尔克^①(Erich Mielke)也相信事情还有转机,他主张宣布戒严,然后不惜使用一切手段了结。他在人民议院结结巴巴说出的那句“我是爱你们大家的”,1989年末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不仅在德累斯顿和莱比锡,就连普劳恩这样的小地方自发的集会也已经发展成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因为载着逃亡者的列车经过了这里,“人民的沉默终于变成了爆发”(高克语)。没有许可,整齐划一的东德媒体是不敢随便印发暗藏所指特定“解决方式”危险性的文章的。统一社会党报《新德意志报》是这样写的:“从国外的反革命暴乱以及目前发生的反对东德的运动中总结出的根本教训是,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坚持“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权”。在当时的制度下,人们都学会了从字里行间捕捉真正的信息,所以读者都看明白了。

此前,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昂纳克提到过其他国家的做法,他不光在理论上认为这是国家可以作出的反应,而且确实下了开枪令。“但要拿出证据来,不容易,因为没有书面文件。”贝爾格霍夫说这话时从他的写字台后面站起身来,现在他不在德累斯顿而到了柏林了,走到墙前的一幅油画那儿,又重新坐下来,向前探过身,仿佛要确认我真在认真记下每一个字,并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一个可能的结论是,那些知道此事的人至今一直保持着沉

① 东德国家安全部部长,斯塔西的负责人。

默。其他人呢？不仅是莱比锡和德累斯顿，而是统一社会党所有专区一级 10 月份的行动记录都荡然无存，这事绝非偶然。销毁档案作为一种政治策略是党的干部早就当作保持共产主义警觉的一部分学过的，同样，不能留下对敌人有用的书面材料。

从未经过选举，而是由党安排的德累斯顿市长，出生于保岑，共和国逃亡者的儿子，由具有社会民主思想的祖父母抚养长大，大学学的是历史，共青团专职干部，至 1981 年底被安全部以“法尔克”的化名记录为兼职工作人员，之后因拖延阻挠工作被停止使用，在官方的行话里叫作“在一些有针对性的问题上他佯作不知或避重就轻”，1990 年 1 月退党后下了海。如今，贝尔格霍夫早已在新德国立了足，担任着一个“社区和企业供应公司”的老总，1986—1990 年间，他在那些急需重建的社区积累的经验有了用武之地，因为他非常了解城市和企业以及他们的员工需要解决的问题。【71】

现在的情形与当年的自然不可同日而语。那时，他对易北河畔的佛罗伦萨^①的供应状况简直绝望极了，再荒诞的主意他都愿意考虑。他曾让人把各个理发店剪下的头发收集起来，把它们作为制假发的原料卖到西边去，介绍人就是神通广大的商业协调局局长亚历山大·沙尔克-格罗德科夫斯基，通过他的关系，已经搞来过一台急需的扫雪车了。利用同一条渠道，贝尔格霍夫也出让过市博物馆库存的瓷器和银器，给市政府换取一台带打印机、至少能用的个人电脑，如果钱够，再加一辆垃圾运输车。

① 指德累斯顿。

贝尔格霍夫放不下从前的经历。现已 65 岁的他,准备用生命的最后三分之一研究统一社会党的历史,这样做会在以前的朋友中制造敌人,这一点他不在乎。

假如昂纳克的射击令真得到通过,假如他不得癌症,在位的时间不是指日可待,会是什么情景?那些将军们真会服从他的指令把坦克开到街上威慑吗?他的话虽说很长时间里就是命令,但 1989 年秋,东德几乎已经不存在了,这一点,参与将这个国家推向崩溃的人也都一清二楚。“10 月 8 日在德累斯顿作出的决定已不符合中央的指示,”莫德罗比较婉转地说,指的其实【72】就是当天柏林要求采取强硬措施的命令。这是他的风格,他要说的是什么,听者是很清楚的。他已站在柏林政治局的对立面。

他当年和如今的党内同志格雷戈尔·居西曾给我讲过埃贡·克伦茨告诉过他的话,有五千示威者的时候还可以动武,事情会有转机,一万人就不行了,更甭说十万了。是他,克伦茨,他一个人,10 月份通知的内务部长、人民警察最高指挥,如果昂纳克下射击令,绝不要服从。该由其他人来做决定了,不再是那个又病又顽固的老头了,其他人,比如他。

老政权中的特殊人物还在起作用。他们是政权核心圈子里的影子人物,官方电话簿上找不到他们的名字。在当权者的行话里他们被称为指导员。这倒准确地描述了他们的任务:他们负责把皇上,埃里希·昂纳克所想、所愿、所命令的直接传达给各方诸侯,各专区的书记。

这类关起门来的谈话一般进行两三个小时。先向党的领导干部进行口头宣讲,柏林要求他做什么,然后给他们看一份相关文件,看完签上“已阅”。之后把文件收回,藏到自己的文件包

里,下次再见。

十五个专区各由一名指导员负责,因此有十五个专区指导员。昂纳克的特使们以主子的名义去专区寻访时,虽携带书面文件,但那些被列入秘密命令的材料是定期收回的。他们直接受总书记领导,出访的组织安排,对他们工作的监督检查则由分管党组织工作的政治局委员霍斯特·多鲁斯(Horst Dohlus)负责。统一社会党在柏林的档案馆负责收集文件材料。贝尔格霍夫当然对这些材料感兴趣。准备统一社会党特别党代会期间(就是友城汉堡市长海宁·福舍劳竭力劝他别去参加的那一次),贝尔格霍夫想看看德累斯顿条目下的文件,结果发现已被销毁一空。【73】

如今,还有谁有兴趣想确切了解这一切呢?

我。

也许可以弄清楚,假如当时昂纳克身体还健康,政府还有行动能力,他们会怎么做呢?为此,在我顺着如今仍清晰可见的痕迹寻访德国统一的旅途上,我一次次走进过去。只有了解了当年发生的一切才能明白,为什么那时的希望之星现在成了死不悔改的。

比如汉斯·莫德罗,他本来也不是纯粹的民主派,很长时间里一直是那个国家忠心耿耿的公仆。与那些单独居住在柏林附近万特里茨别墅区的党魁们不同的是,他不受权力及随之而来的各种好处的诱惑。昂纳克每月8 000东马克的工资,爱吃腌肉。政治局委员们每月4 000—6 000东马克的工资并不值得人们议论,而是他们那些因自身经济匮乏而只能到西方去满足的愿望。负责操办的是亚历山大·沙尔克-格罗德科夫斯基领

导的商业协调局下属的雷特斯公司。每年给领导人预备的经费是 700 万西马克。

有时东西要得急,立刻去西柏林采办,来不及把阶级敌人的标记从衣领上去除。有一次,为参加每年一次纪念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被害的游行,昂纳克突然想要一件厚实【74】保暖的绿色外套。马上就买来了。他自豪地穿在了身上。匆忙之中,只是忘了把 Bogner 牌的明显标记 B 去掉。

莫德罗只穿当地能买到的衣服。他和德累斯顿的同志们打成一片,大家称他“诚实的汉斯”。前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在其回忆录中也间接证实了这一点,他甚至称赞东德统一社会党最后一届政府的总理推行的“务实政策和所作的减轻人们日常困苦和烦恼的努力”。

政权内部的情况莫德罗当然是一清二楚的,他也知道党想要什么样的选举结果。因而难以想象,1989 年 5 月德累斯顿地方选举作假发生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统一一年后,贝尔格霍夫为此被告上法庭。选举作假在东德是一贯的,无一例外。还记得全国选举委员会主席埃贡·克伦茨 1989 年 5 月的那次电视讲话,他宣布 99% 赞成票的选举结果,一边假笑着对选民们向国家领导表达的信任致谢。东德 40 年,或灰心丧气,或怒火无言忍受着作假的选举结果,这一次不会了。被克伦茨表扬的人们记住了这个伪君子,他们会回报他的,不是有朝一日,而是很快。

德累斯顿的选举当然也是做了手脚的。而且一直做到符合“大楼”的,党内行话中党中央的标准为止;97.81% 的参选率,2.51% 的反对票。最后一次地方选举的结果也是这样。阿诺尔

德·瓦茨根据教会独立选举观察员了解的情况估计,1989年5月7日,确实有40%的选民投了统一社会党和其他结盟党候选人的票,但这也可能是夸张了。贝尔格霍夫补充道:“按照斯大林主义的榜样,在东德,选举是一件神圣的事情,被视为人民对党和政府政策毫无保留的支持。”当年东德流传的众多笑话中的一则用在这儿倒正合适:一个同志问另一个,你听说了吗,昨晚党中央秘书处被撬了,怎么着,偷走了什么?没什么重要的,只是明年的选举结果。【75】

1989年秋,与同级的其他同志相比,莫德罗灵活、不教条、肯学习。这引起了一些人的不信任。他们认为他是改革的同情者,是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开放政策的追随者。以前,偏离党的路线在正统教条的统一社会党国家是有严重后果的。对此,莫德罗肯定也已经做好了准备。1月,柏林派了上百名党的干部来德累斯顿,检查他这个专区的工作,但什么也没查出来。后来,在6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对他的“政治工作开展不利”提出了公开的批评。

但掌权者已经不再有那样的权势,不仅批评他,而且对他采取措施,撤销他的职务,他们做不到了。克里斯托夫·齐默尔说:“他虽然没有提出改革的方案,但他能倾听。”自由选举产生的他的继任洛塔·德梅齐埃就职时称赞他说:“他谨慎细致的政策肯定减少了我们很多麻烦。”遇到矛盾摩擦时,莫德罗不是像其他当权者那样马上就以武力相威胁。

例如1989年4月,德累斯顿市话剧院上演《圆桌骑士》一剧时,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虽然此剧影射东德当时局势的意思是再明显不过了。克利斯托夫·海因(Christoph Hein)这出关

于一个老人政权衰亡的戏,写的不仅仅是看起来发生在遥远的中世纪的一个故事。作家巧妙地运用传奇式的人物和故事,用以展现自己国家目前的状况:阿瑟王,帕吉瓦尔以及其他骑士们都已江郎才尽。他们围坐在著名的圆桌旁,而身下的椅子都已经松动摇晃,但是他们还没意识到,或者不愿意承认。贝尔格霍夫以为,首演后的那个星期莫德罗就要被撤职了,但柏林那边显然在忙着处理他们内部的阴谋了。

他们的国王阿瑟,坐在桌子尽头的总书记昂纳克没有前途了这一点,领导同志们都清楚。于是他们集结人马准备应对将要开始的权力斗争。可能的接班人中,米塔格(Mittag)和克伦茨相互监视,党实际成了群龙无首,基层组织像剧中的椅子开始剥落松动。数万民众经匈牙利或布拉格逃离了东德,专区的干部们已经感觉到,10月7日将要举行的“庆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40周年”的活动不再是祝寿,而将是葬礼。

东德的掘墓人在柏林共和国宫举行中心庆祝大会,观看卡门·内波尔(Carmen Nebel)的演出,外面,群众在齐声高呼戈尔巴乔夫,带来希望的苏联人。这是新动向,从前那个有名的口号“向苏联学习意味着向胜利看齐”被群众改为“向苏联学习意味着向衰败看齐”。现在,老百姓真的愿意向苏联学习了。戈尔巴乔夫在说了那句善意的规劝“谁来得太晚,将受到生活的惩罚”之后便回家了,对了,雷特斯公司在西边为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准备了价值100西马克的兰花。米尔克及其同伙这时开始了最后一次报复,谁让你们喊这样不靠谱的口号,派出手持警棍的队伍,逮捕反抗的民众。被抓的有547人,被带到收容点,遭到惩罚。

德累斯顿市政府大楼里的庆祝会已经不再是以往社会主义自我陶醉式的了,因为党内的贵宾们也都已经清楚,德国式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成功。贝尔格霍夫站在大厅后边的一个角落里,作为市长的他,本该坐在第一排才是,他无所事事地掀开厚重的丝绒窗帘往外看去,只见昏暗的街上,成千上万的民众在静默游行,这时,他心里想的什么,小声地说了出来:“完了。”

德累斯顿专区第一书记莫德罗大概也是同意贝尔格霍夫这一看法的,但明确说出来,是在这场和平革命很多年以后,在他的回忆录《我曾想要一个新德国》一书中。当东德已无可救药地失去知觉变成植物人的时候,主治医生米尔克、米塔格和威利·斯多夫(Willi Stoph)^①还在顽固地声称病人只不过是睡美人,随时都可能苏醒。麻醉师埃贡·克伦茨用力地点着头,口中叨唠着马上会出现的转机。而现实是,“低垂的脑袋,沉重的眼皮,拴紧的喉咙,弯曲的肩膀”,这就是莫德罗对当时东德的描述,他本人曾属于这个国家的领导层40年之久。

当时,他可是什么也没有说。

有人这么说他。

是这样吗?

与示威者进行对话而不是驱散他们,在这个未经批准的决定作出之后的第二天早上6点半,贝尔格霍夫向专区书记详细汇报了所有细节。他一声不吭地听完之后便把谈判全权授予了市长。几个小时以后,市长再次回到莫德罗的办公室,来汇报谈判进行的情况。这时他听到了莫德罗和一个男人的几句对话, 【78】

① 民主德国(东德)部长会议主席、总理。

市长认识那个人,知道他是来自柏林的指导员。

原话是怎么说的他回忆不起来了,可以肯定的是,莫德罗将一张纸退回给指导员,说的话的大概意思是,不能这样做,他不会这样做的。贝尔格霍夫坚信,那就是“那个决定性的命令”,口头传达的,最后的开枪令,直接来自昂纳克。

莫德罗虽然知道,柏林方面“考虑过,如果局势更加激化将实行戒严”,这是他现在既模糊又明确的说法。但他肯定知道的是,“在那个阶段,指导员本身已经是个没有把握的人,他传达上面的指示,把下面的情况报告上去,以往那样介入和检查的事他已经不做了。”

他即使要做也行不通了,莫德罗在那次谈话中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他,不会再让人干预自己的决定,“我自己负全责”。但是他也已记不清,对指导员具体是怎么说的,当然更不知道他到了柏林是怎么跟他的上司报告的。和市长一样,他只想在德累斯顿阻止一场“威胁生命的灾难”。他成功地做到了。

去问指导员,他什么也不说。所以贝尔格霍夫始终不知道,指导员带来的那张纸上是一字一句地写着还是只是按意思是开枪令。这里还有一个原因是,在对东德这个病人的诊断上曾意见一致的两个同志贝尔格霍夫和莫德罗后来互相不说话不来往了。当时两个人都属于改革派,都有可能领导另一个更新后的国家。钳工出身的经济学家莫德罗博士被称为“德累斯顿的好人”,贝尔格霍夫当年的头衔是“贝尔巴乔夫”。

【79】 如今呢?

莫德罗已是80高龄,仍忠实于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贝尔格霍夫指责这位东德第一次自由选举前的过渡总理胆小和无骨

气。在控告贝尔格霍夫选举舞弊的起诉中,他装扮成无辜的羔羊,说自己一无所知,对此贝尔格霍夫只有嘲笑:“好像我这个市长没有党领导的知情和同意就能修改数字似的。”很多人都有可能错误地解释莫德罗的表现。“大多数情况下他总是隐藏在一副痛苦的表情和无产阶级的扮相后面,和他打交道你得有这个准备,要是我们俩一起挑起一场冲突,如果胜了,他是赢家,如果败了,我是输者。这就是他的毛病,两面派。”1993年,莫德罗因三次选举舞弊和在萨克森州议会作伪证获刑10个月,和两年前贝尔格霍夫一样,监外执行。

当年的市长对当年的专区第一书记的主要批评是,他作为政府首脑没有承认和处理统一社会党的过错,而是立即为国家道义上和实际上的灭亡寻找替罪羊。因为党永远是正确的,她的领导地位写进了东德宪法的第一条,所以她不可能有罪。贝尔格霍夫引用莫德罗在党中央的一次会议上说过的话:“同志们,如果我们想挽救这个党,我们需要找出有罪的。”莫德罗说这是无中生有地捏造历史。

很多当年的党干部都相互心存芥蒂,虽然表面上仍然一同高唱国际歌。莫德罗同志的回忆录《我曾想要一个新德国》出版后,甚至收到了书面的指责信。当年专为国家安全部培养干部的波茨坦高级政法学院院长,少将威利·欧皮茨(Willi Opitz)在一封给不再亲爱的汉斯的来信一开头就怒气冲冲地承认:“对你的很多说法非常失望,非常愤怒。我原期望你会写出另外一本书的,没想到你写出这么一本自我保护传来,我问自己,从1950年年初就担任领导职务的你是如何坚持下来的。昂纳克不喜欢你,别的领导干部不理解你,怀着对重要政治领域的种

【80】

种怀疑,你不得不搞政治。你是个未被识破的抵抗者吗?还是牺牲品?”讽刺莫德罗是40年都用割裂的舌头说话的演员,援引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话说,稿酬最高的历史书,是按照资产阶级意愿编纂的。

欧皮茨主要捍卫的是他始终热爱、但现在这么不光彩地消失的斯塔西,指责莫德罗以西方媒体的风格对其进行攻击以推卸自己的责任。“国家安全部在东德从未拥有过领导地位。在东德,宪法规定的领导是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安全政策不是由安全部而是由党中央制定的,20多年里你都是其成员之一。”信的作者欧皮茨到1998年仍是其顶头上司米尔克的忠实信徒,他把这封用干部德语写成的抗议信寄到民主社会主义党理事会,当时莫德罗还担任着党的名誉主席。

莫德罗则认为贝尔格霍夫是工人阶级的叛徒,在这一点上

【81】 他与那些攻击他的老干部们是一致的。当年的很多同志都恨贝尔格霍夫,他曾多年是那个制度的忠实公仆,官运亨通,后来不仅退党,而且毫无保留地承认个人应承担的责任。“前同志”们的憎恨他不在乎:“他们这么大年纪还这么来劲,是仇恨在支撑着他们。”从他们受迫害,被投入集中营的时候起,他们就从对敌人的仇恨中汲取力量。当年的敌人是法西斯,他们的仇恨是有道理和可以理解的。现在成了来自西部的占领者以及与资本家联合的从前的党内同志。毫不奇怪,他们对1989年的人民起义没有像1953年那样被镇压下去备感遗憾,应该不惜一切手段。

1989年秋,昂纳克即使身体还健康,武力解决方案也已经不可能通过了。苏联兄弟部队有戈尔巴乔夫的严格命令,决不

介入德国的冲突。莫斯科和东柏林之间的关系也早就不是兄弟般的了,苏联的新电影在这里被禁演,1988年11月开始停止订阅苏联杂志《卫星》。对其原因的解释是社会主义新闻报道最有说服力的例子:“邮政及长途通讯部新闻处通知,《卫星》杂志已被从报刊订阅名单中去除,它已无法再为巩固德苏友谊作出贡献,它有很多歪曲历史的报道。”当时的邮政部长是结盟党派基民盟的,他是从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的。

从苏联方面是得不到帮助了。

自己的军队呢?

他们在等待。“我们想了很久,是的,到处都在闹事,但东德不会,假如这里也闹起来,一定会出动坦克。在人民军的高级军官当中也早就存在反对派了。话说回来,假如国防部长在这危急时刻没去古巴进行正式访问,就有可能是另一番景象,也许就开火了。海因茨·凯斯勒(Heinz Kessler)是想动用坦克的。但很可能没人听他的,当年的一位高级军官这样告诉我。”统一后这些年,他在柏林郊区建立了一个欣欣向荣的企业。他在统一的德国开始新生活的故事,是千千万万个到今天才能写清楚的典型故事之一。【82】

他的故事,以后有时间再给我讲。

坦克确实按照上面的命令进入了战备状态,但各地的指挥官们大多消极抗命。他们已经不再服从党内大佬的命令了。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前途也正是毁在这些人手里了。这才1989年,曾几何时,不到十年吧,最高领导同志们还坚信,他们的人民军有足够的力量抵抗阶级敌人的任何进攻,此外也有能力在必要的情况下占领西边的敌对领土。

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但我认为这是谣传。这实在是太离谱了,统一社会党的那些高官真会相信他们能夺回分裂祖国的西半部分?政治局和国务委员会里那些僵化的脑袋不至于脱离实际到这种地步吧。我先是寻找这一说法不对的证明,等到一直找不到,才开始改变看法,寻找相关文件。

在编号为 GVS-A 477145 的机密文件中,记录了 1980 年 6 月 23 日国防委员会第 61 次会议的情况,记录显示,一笔所谓军用货币的储备已经完成,这为“保障东德货币稳定以及部队在敌对领土的需要”创造了前提。国防部长受命“继续完善这一工程的解决方案”。

这确实是个大工程,可以称之为备战,不是冷战。国防部财政部门的头头要向国防委员会主席和委员们作出详细报告。今天听起来这一切是那么不可思议,但当时那些同志看来是真的坚信,一定要为可能出现的情形及时做好准备,他们已经将 49 亿马克分头存放在国家银行在柏林、莱比锡、魏玛、施滕达尔和贝尔根的五个仓库里了。

那份机密文件中继续写道:“在敌对领土行动时,为保证人民军供给和军饷可以启用军用资金。启用及印发特种货币的必要性来自于:

1. 保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货币的稳定,战争状态下,我国货币作为国内货币的性质不变,保障国家对货币总量的监控,保护货币流通不受外来不利因素的影响。

2. 保证人民军领导和部队拥有资金,使他们能继续通过商品—货币结构在敌对领土上购买所需物资。军用货币作为敌对

领土上的第二种货币与当地的有效货币等值并只在这一领土上使用,由人民军战地银行系统负责提供。”

同样打着机密印章的 A478109 号文件的第 21 页上写着报告结尾,经济专家以军队方式报告:“主席同志,报告结束。”

在这一荒诞的计划中,有朝一日以他们的方式强行统一,与【84】他们的统治值得深思的结束之间相隔九年。如五一游行时大家齐声高唱的那样,领导国家和监管所有领域的党手中始终有真理,但是在 1989 年,连大多数党员都不再相信了。没有曾忠实于党的路线的干部们的愤怒和不满,也就没有革命的成功。不仅人民警察、人民军队、专区领导一级中有愤世嫉俗的干部,就连斯塔西总部也不乏其人。只剩下政治局那些脱离实际,不肯正视现实的人还没明白,局势已无法挽回。

自称是改革派的克伦茨还在梦想出现转机,以便保住党的领导权。没等他将“转折”一词说出口,早已过了时辰,没有什么可以转来折去的了,只剩下收摊了。革命前一年的莱比锡书展上,在对早已清晰可见的计划经济带来的问题进行辩论时,贝尔格霍夫对克伦茨说的话,证明他一直就看不起这位政治局委员埃贡同志。克伦茨只会说些干部的口头禅和套话,什么只要加强政治工作,经济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等等。贝尔格霍夫冲着这位曾经的青年团战友大骂道:“你这个蠢货,什么也不懂!” 1988 年,那时克伦茨还有权力撤他这个市长的职,把他贬到某个地方去当个小厂长,他的职位远在贝尔格霍夫之上,但他也没敢那样做。

无处不在,常被誉为党的盾牌和利剑的斯塔西也好,军队也

【85】好,都比不上统一社会党的位高权重,党是掌握一切的。10万党的全职工作人员比任何人都害怕德国统一,他们是整个制度的载体和支柱。200万党员只是或多或少地跟着口号跑。与管理体制平行存在的统一社会党是国中之国,民族统一战线里的那些结盟党,基民盟、自由民主党和国家民主党、德国农民党都没有说话的份儿。他们只是人民议院里的装饰罢了。什么都是统一社会党说了算。让人心生恐惧的斯塔西人员也只有是经党批准之后才能去制造恐怖。

当儿女被抓、被关、被打、被驱逐的父母们走上街头,当以往总是俯首帖耳、逆来顺受的人们在这个秋季敢于向国家权力抗争时,统一社会党的政权垮台了。绝大多数示威者是党的忠实党员,不能把他们都打成反革命分子。

1989年10月9日那一天,早上,汉斯·莫德罗赶走了昂纳克的来使,晚上,将决定革命的成败,地点是在莱比锡。像每个星期一样,在各个教堂的祈祷结束后,人们汇聚到了街上,开始齐声高呼要求变革的口号。没有人站出来发表火热的演讲,人们不需要领头的,他们已足够有力量。莱比锡是9月18日开始的,最初只有1500人参加,被“收容”了130人。这才过去三个星期,好像已是几年前的事情了。10月2日在尼古拉教堂周围聚集的人已经增加到15000,从静默、小声抗议到大声地喊出那个口号——“我们是人民”!

【86】现在,仅仅一个星期之后,上街的已经是7万人了。像每个星期一样,在各个侧街旁巷里站满了人民军、警察和斯塔西,时刻准备以武力驱散示威者。新增加的是守候在外围区域的坦克部队;展览馆和AGRA场地——如今已成休闲广场,搞活动、

办展览、开音乐会——被改建成了拘留所；医院备好了血浆，打算着会有成百上千的伤员。

在莱比锡的各个教堂进行完传统的和平祈祷之后，人们开始在夜幕笼罩下的市内游行示威。路德城维滕堡的牧师弗里德里希·朔雷梅尔(Friedrich Schorlemmer)是群众示威的积极参与者之一，他谈到当时心里对“武力”的担忧，因为国家权力一触即发的阵势谁都看到了，“长期受到斯塔西监视和胁迫的人承认自己感到害怕，害怕那些穿军装的，他们只能提醒：武力不解决任何问题，武力是不人道的。”

电台和广播里一直在宣读著名音乐总监库尔特·马祖尔(Kurt Masur)、牧师彼得·齐莫曼(Peter Zimmermann)和讽刺剧演员伯特-鲁茨·朗格(Bernd-Lutz Lange)撰写的非暴力呼吁书，这本来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仍然处于无权地位的人们的此类呼吁那些日子在东德已是司空见惯，这一份的独一无二之处在于上面的另外三个签名，它们出自莱比锡专区统一社会党的三位书记之手：罗兰特·沃泽尔(Roland Wotzel)、库尔特·迈耶(Kurt Meyer)和约亨·波莫尔特(Jochen Pommert)。叛国罪有时真是个日期的问题，他们在10月9日这一天宣布的事情，假如发生在不久以前，他们仨肯定会因叛国罪被单独监禁很多年。【87】呼吁书中写道：“我们需要就我国社会主义如何继续下去自由发表意见，因此今天签字的这些人向全体人民保证，这样的对话不仅会在莱比锡专区进行，而且要跟政府进行。”

要想对付7万示威者，部队和警察也许会被迫使用武力。有的国家曾这样做，它在地理上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遥远，那位负责宗教事务的统一社会党高官一天前还对牧师这样说过。

但当地没有人愿意下开枪令。假如命令从柏林来,他们会拒绝执行。因为没有开枪,这天夜里,莱比锡革命的女儿们便最终抛弃了他们的政府。接下去,它的寿终正寝只是时间问题了。

埃贡·克伦茨至今声称,他为和平解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称,10月8日是他代昂纳克起草了给各专区的一封电传,要求专区书记们就“加强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政治思想工作在区县进行讨论”。这是统一社会党高官们惯用的含混不清的术语,但克伦茨把它解释为阻止了10月9日发生流血的指示。四天后他带着军队和斯塔西的高官飞到莱比锡,进行现场勘查,与行动总指挥一起讨论时确定“警察只有在对方使用暴力时,为保护人员和财产可以采取行动。第二,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使用武器。”

一周后,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昂纳克出于健康原因辞职,对此,他本人颇感意外。米尔克对他说:“我们做了很多了,【88】不可能再派坦克去开枪。埃里希,结束了。”昂纳克从他那伙人围坐着的桌旁站起身来,又重申了一遍,他不是作为一个虚弱的人离开的,而是一个完全健康的同志,他对这样的背叛非常伤心。说完便离开了会议厅。克伦茨赢了政治局内部的接班人之争,但他的喜悦持续不了多久。任职后第一次讲话:“亲爱的同志们,”一开口就已失去了民心。老百姓的回答写在标语上:“改革的进程无可阻挡!”^①

^① 这句的原文是“Die Perestroika in ihrem Lauf halten weder Ochs noch Egon auf”,这里有一个双重的文字游戏,一是把原短语“weder Ochse noch Esel”(牛和驴都不能)改成了“weder Ochs noch Egon”,Egon是克伦茨的名字,与Esel字形相似;第二,这句话借用的是昂纳克的名言“社会主义的进程无可阻挡”来讽刺他和他的继任不搞改革。

留在东德的知识分子,那些社会主义的精英们,在他们的呼吁书《为了我们的国家》中,也提出了改革要求,但那只是历史的一个注脚,老百姓们早已不想再听克伦茨之流的胡言乱语了。克丽丝塔·沃尔夫(Christa Wolf)^①11月4日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百万人游行集会时说出了大家的心声:“我对使用‘转向’这个词很有保留,我好像看到一艘帆船,船长说,风向变了,转向!可船员们不听他的,是不是?我们惊讶地看着那些转向的人,老百姓把他们叫作‘风派’,正是他们妨碍了新政策的可信性。建议:五一游行时领导人从人民面前走过,接受人民的检阅。这几个星期以来最重要的、呼喊千万遍的句子是:我们是人民。这是个根本的观点,我们绝不能忘记。”

与国家政权平起平坐的立场解放了人们的头脑,想象力插上了翅膀。以往游行时歌颂社会主义的标语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充满讽刺、调侃的语句:“大棒、选举作假,埃贡·克伦茨,快滚回家”,“免签去——夏威夷”,“不要套话要改革”,“退位是进步”,“你只交出了背心,现在我们要裤子”。

五天后,人民要到了裤子。

【89】

像四周前的德累斯顿一样,偶然性又扮演了一个角色。这次的舞台是在柏林。台上一排面色晦暗的人中央坐着政治局委员京特·沙博夫斯基(Guenter Schabowski),他是柏林的市委书记,东德4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殴打示威者的第一责任人。大厅里挤满了各国记者。意大利通讯社(ANSA)记者里查多·艾尔曼(Riccardo Ehrmann)在新闻中心前没找到停车位,所以进来

^① 东德著名女作家。

晚了,大厅里已经没有空座,他只好在沙博夫斯基的台面向厅内的同行盘腿坐在地上。

新闻发布会开得很勉强。外边发生的一切可谓惊心动魄,沙博夫斯基的种种回答早都落在了现实之后。艾尔曼什么也没往本子上记,他觉得没有值得报道的东西。将近 19 点的时候他站起来,直对着沙博夫斯基,用几乎纯正的德语问道,两天前政府公布的新旅行法是否太官僚主义了,是否是个巨大的错误?沙博夫斯基随口应付了几句,突然,大厅静了下来,刚才,他真说了这样的话吗?“政府决定,今天开始实行一项新的规定,每一个东德公民都可以出境。”

什么?现在?立刻?也可以通过西柏林吗?

沙博夫斯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等他念完了上面的字以后,1961年8月13日建起的这道割裂德国人的生活,令许多德国人在这儿失去生命的柏林墙便不复存在了!“据我所知,啊,这一规定,啊,立即生效。”当 NBC 的记者追问道,这是否意味着“旅行自由”时,已经“啊”了 31 声的沙博夫斯基说:“是的,当然。”“这不是指出境旅游,而是允许离开东德。”从这一刻起,【90】广播电视开始播报这条闪电新闻,柏林墙打开了。老百姓都想亲眼看看,所有的人都上路了,这就开始了柏林的德国之夜。

它已被载入史册,众所周知,有典可查。

我寻找的是这一夜里另外的故事。

电话铃响起的时候,格雷戈尔·居西早已睡下了。来电话的是他当时的女伴。“她说,格雷戈尔,柏林墙开了,”他睡意朦胧地嘟囔道:“都半夜两点了,我明天有重要的庭审,别跟我开玩笑。”她说:“格雷戈尔,你打开电视看看,这是真的。”他挂

上电话,打开电视,看到人群真的在涌过开放的边境,心想,东德的末日到了。电话又响起来:“格雷戈尔,走,我们也过去看看。”他不想去,作为律师他想得远一些:“要是能这么容易就开墙,也可以把它再关上。我知道,关上的能力他们已经没有了,这场运动来势太猛,但是,我很希望能有一个法律基础,能保证它一直开放。”想到这些,他又上床接着睡了。

理查德·施罗德一直在伏案工作,外面发生的事情一点也不知道。会发生一些根本性的改变这一点,他相信,昂纳克的下台正与此有关。被寄予希望的是汉斯·莫德罗和马库斯·沃尔夫(Makus Wolf)。第二天,他和一个朋友一起过去看了看,但他的夫人留在家里没去,她怕墙会再关上。很多人都有这个担心。最后没发生这样的事,“还得感谢戈尔巴乔夫,他给撒切尔、布什以及科尔都打了电话,问他们的看法。据说他们的回答都是,全民庆祝,没有危险。”至少科尔是这样讲给他听的。

埃贡·巴尔在这个星期四的下午告别了联邦议会,在他看【91】来,议会议事日程上没有别的惊天动地的事情了。晚上,他在家打开电视,看到了惊天动地的事:柏林墙上手舞足蹈的人群,相互拥抱的东德人和西德人。“我的第一个念头是,东德完了,第二个,可惜我父亲没能见到这一天。”这时,他家的电话也响了,是威利·勃兰特。

知道了吗,发生了什么?

知道了。

吃惊吗?

是的。

没想到吧?

没想到。

柏林市长瓦尔特·蒙佩尔(Walter Momper)请威利·勃兰特第二天到西柏林参加市政府前的一个集会并讲话,1961年8月13日,勃兰特^①曾以柏林市民的名义发表过反对建墙的讲话。他的朋友和战友埃贡·巴尔与他同行前往。在波恩飞往柏林的飞机上,勃兰特把讲话要点像往常那样记在四方卡片上。其中就有那句在那个星期五晚上备受人们欢呼,让人激动流泪,打动了几乎所有德国人的句子:“原本属于一体的,现在终于长到一起了。”

长到一起的进程比当时所想象的要长,柏林墙倒塌20年后,这一进程仍远未完成。

两天后,这一进程也差点夭折。11月11日一早9点,国防部长凯斯勒在国防部会议厅召开会议。他本人离开了会场,据说勃兰登堡门前要出事。10点刚过,人民军陆军总司令、统一

【92】社会党中央委员霍斯特·施特西巴特(Horst Stechbarth)接到部长来电,问他是否愿意带两个团赶到柏林。他问:“这是问题还是命令?”同时马上指出,假如有5000士兵的波茨坦第一机械化师穿过柏林向勃兰登堡门进军,将会发生什么。人民军总长施特勒勒茨向各部首长介绍着凯斯勒指示的提高第一机械化师和空袭团战备等级的执行情况,只有坦克是不能动用的。当他“简短、就事论事地介绍时,我们随意地站在讲台周围”,当年的中将曼弗雷德·格莱茨(Manfred Graetz)回忆道:“大家的反应各不相同,有压抑的沉默,也有不满的呼声。”直到国防部副部

① 时任西柏林市长。

长、武器装备与技术部长、上将约阿希姆·格尔德巴赫(Joachim Goldbach)对着大厅喊道：“扯淡,这要干什么?让他们怎么去柏林?我不干!”这是决定性的一句话,绝大多数高级将领都站在了他一边,看来他们都等着这样一个明确的表态呢。

这位格尔德巴赫是一个德国英雄吗?不,不是,他的朋友格莱茨谈到这位 2008 年去世的战友时,说他执著、诚实,是个“彻头彻尾的战士”,不,他从没想过要当英雄。如果他是英雄,格莱茨苦涩地补充道,法制国家应该不会在几年后判他多年监禁了。“难道可以这样对待英雄吗?”

革命的真英雄们,早已被遗忘。但是我要去寻访他们。

第三章 被遗忘的英雄

【93】 大门外是喧闹的妇女，叮叮咣咣敲着锅盖，要求入内。其他示威者也声援着。东、西德的电视台都在拍摄。自发造反的这些日子里，觉醒的人民提出的任何要求所有电台都觉得有趣。迄今为止一直处于严格监管之下的东德国家电视台也不例外。他们的年轻记者站在革命的风口浪尖上调查事实、报道真相，再不是像以往那样让写什么写什么。步调一致的各级党报还不相信新的自由，因而只是充满忧虑地评论着国家不稳定的局势，没有挖掘阴暗的过去，把老底揭出来。钻牛角尖，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解释世界，不向读者解释说明沉重的时代问题，东德的不少编辑至今仍保留着这种喜好。不让他们自由发表个人见解的时间太久了，现在，他们每天都在追上来。

东部的媒体像是一块未被开发的处女地。装备精良的种植队来了。西德的大出版社利用开放的边境，开始在东边出售此前一直遭禁的报纸和杂志。这种做法不具备法律基础，但没有因此让他们望而却步。他们实施的就是戈尔巴乔夫几周前临上飞机时提醒昂纳克同志的那句话，谁来得太晚，就将受到生活的惩罚。《色彩》和《明星》，《明镜》和《时代》，《图片报》和《喝

彩》都被一抢而光，常常来不及卸货，从运输车上直接就开卖了，或者就在边界相邻的地方推销，像纽伦堡和格拉，格拉市长当场拍板，进口的晚报按 1.5 东马克出售，《明镜》13.5 东马克一本，《明星》11.4 东马克，《图片报》1.4 东马克一份。【94】

接着东德政府发言人提出对等要求：“联邦德国市场上也得允许销售我们的报刊。”他无法想象，这不是一个销售的问题，言论市场谁都可以参与，他们的报刊在西边会败在无人问津上。统一进程中，从前备受追捧的社会主义新闻之花，如《为你》和《每周邮报》，《地平线》和《FF 在现场》，《新时代》和《早晨》，以及著名的小报《开唱》（“开心地唱”之缩写）在自由开放后的东部媒体市场上都慢慢枯萎了，发行量只有 50 万份。

托管局在向不同的大、中型出版社出售报纸和杂志中获得 8.5 亿马克的收入。单统一社会党就拥有 17 家报纸，发行总量为 970 万份，在报亭它们也从不需要相互竞争，因为里面的内容全一样，主编们都得听从新闻局的指令。西德这边把人员也都全部接收下来了，因而，当其中某些人后来被揭露出来是斯塔西兼职工作人员时，就不得不把他们再吐出去。

2008 年 3 月，当著名的《柏林日报》出现这样的历史遗留问题时，玛丽亚娜·贝斯勒回忆起那纷乱的变革年代：“当时，西德的出版社很轻率地包揽了东德的报纸，很少问及过去的经历。可见党报巨大的发行量及其垄断地位对西部报业的吸引力。”

1989 年 12 月 7 日这一天，西德的记者和喧闹的民众一样【95】在等消息。那时还没有手机。门外寒气逼人，两个半星期后就是圣诞节了，这个季节的气温是该这么低了。属于赫尔胡特教区，位于齐格大街 30 号的迪特里希-邦赫费尔大楼楼门紧闭。

里面正紧张地为这个历史性的日子作最后的准备,东德的第一次圆桌会议将在这里召开。

到处忙成一片。根据报名的人数看,这个厅是够大了,但是看看门外的情景,里边的人知道,很可能挤不下。再数一遍,桌旁为代表们摆好的椅子够不够,按照名单需要 35 个座位。3 位主席,坐在桌子头儿上,正好在墙上挂着的降临节星下。“新生力量”占 15 席,“旧势力”15 席,还有两个座位是给媒体的。

新生力量主要是民权运动中的反对派,包括 1985 年成立、一直被作为反革命组织受到统一社会党迫害的“和平与人权动议”,十个星期前刚建立,但迅猛壮大的“新论坛”,“民主现在”和“民主崛起”都是 9 月中旬开始发出声音的,此外还有“绿党”、“社会民主党”和“左翼联合党”。

“旧势力”是统一社会党领导的民族阵线,包括基民盟、民主农民党、自由民主党和国家民主党。它们不同的名称让人产生各有不同纲领的错觉,实际上,它们是头戴大小不同,但裁剪式样完全一致帽子的兄弟姐妹。但自从洛塔·德梅齐埃 11 月当选为结盟党基民盟主席后,他们原本整齐划一、听从统一社会党指挥的态度变了。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德梅齐埃至今还会偷着乐:当新当选的基民盟主席以他特有的讥讽口吻对那时还对自己的前途抱有希望的埃贡·克伦茨说,今天是个极其特殊的日子,为什么?从现在开始,所谓民主同盟里不包括基民盟了,从现在开始,每个党单独作战了。听了这话,克伦茨平时那一成不变的狞笑僵在了脸上。自由民主党立即效仿了基民盟的做法,农民党和国家民主党三天后也跟了上来。

对统一社会党内的力量来说,明天的日子比今天更重要。

他们正准备他们自己的代表大会。12月8日,他们将在离迪特里希-邦赫费尔大楼不远的共和国宫召开特别党代会。共和国宫是昂纳克不惜工本建造起来的,甚至用了来自意大利的大理石,当然是格罗特科夫斯基搞来的。参加圆桌会议,贝尔格霍夫和居西都报了名。他俩都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虽不是预言家,但多年身在其中使他们非常了解同志们的习惯。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23人组成的工作小组一致提议格雷戈尔·居西律师任未来党的主席。

这一提议会获得多数支持这点,无人质疑。与之竞争的第二个候选人是没有的。统一社会党看不上这类民主恶习。为了显示对过去错误认识的严肃性,总得有一个看得见的变化,在那个不受欢迎的名称后补充一个听起来进步些的,于是就叫民主社会主义党了,缩写民社党。1990年2月选举前,统一社会党被最后埋葬了。但只是从名单上消失,其怪影至今仍游荡在所有坟墓和沟壑的上方。贝尔格霍夫是同志们长时间以来期待的党主席的理想候选人,但他本人不愿意担任。“别提这事了,那不适合我。”他们反驳说:“不行,沃尔夫冈,你得干,你有名气,大家都信任你。”

最后,他是怎么把让他坐的这把交椅成功转给居西的呢?

贝尔格霍夫做个鬼脸回忆起过去。在某次预备会议上,居西发表了一个热烈的即席讲话,这方面,当时他已和现在一样是个高手,讲话中,“他也列举了我应该担任党主席的理由。我对他说,格雷戈尔,你讲得太好了,只要把我的名字改成你的就对了。”居西马上回答说,好吧,那就他来干。“人事问题就这么解决了。”

事实的确如此。表决结束后,一把大扫帚被举到台上交给了新任民社党主席格雷戈尔·居西,意思是他得负责清除统一社会党遗留的垃圾。他的副手,贝尔格霍夫立即对彻底清除垃圾的打算产生了怀疑,这只是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举动罢了。接下来,在贝尔格霍夫继续主持的18、19日会议上,他清楚地意识到,“这些人实际上根本不想革新”。他们想的是赢得时间,安抚民众。

现在,在圆桌会议上,居西和贝尔格霍夫还得肩并肩地一起维护他们党的利益。这里没有位子给外面吵吵闹闹的女权主义者。第一次会议的组织者,是分别来自新教教会、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工作组的三位代表,他们都不认为这个具有女权色彩的【98】独立妇女协会有多重要。在此之前,他们甚至都没听说过这个组织呢。这当然不能怪他们,因为这个组织刚成立三天。只是现在不可能听不到了。

从前是让别人上当,现在,在1989年的12月,自己搞错是常事。昨天算数的,明天已变得一文不值;今天不重要的人,后天有可能位高权重,反之也同样。汉斯·莫德罗,前天他还被贝尔格霍夫敦促着与布拉格大街的示威者选出的20人小组进行对话,如今,甚至来不及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他的女秘书告别一下,就被召到柏林去当总理了,威利·斯多夫总算放弃了抵抗,自动辞去了总理职务。

和他一样的老干部们不是逃之夭夭就是暂时躲起来了。总之,圆桌会议召开之际,他们都已退出历史舞台,昂纳克不见了,米尔克不见了,蒂施不见了,辛德曼不见了,阿克森不见了,米塔格也不见了。米塔格因“严重违反党内民主,违反党和国家纪

律及损害党”被开除出政治局,接着被开除出党。德累斯顿理工大学校委会跟着在12月1日撤销了米塔格的荣誉博士称号。像1986年10月授予称号时一样,这一次的決定也是一致通过。半年前,事实是什么,不管是真是假,都由米塔格说了算。1988年的預算他让人做了多少手脚,直到赤字变黑,国家财政形势大好。向人民议院提交的报告中现实状况完全符合计划要求。

一切都是谎言。

负责经济的部长自然是了解这一切的。其他政治局委员也【99】都阅读了标题不那么刺激的《东德经济形势分析及结论》,这份“b5 II58/89 秘密文件”由懂行的专家们撰写,他们对毫不留情地描述的国家现状也是负有责任的,他们是国家计委主任格哈德·许雷尔(Gerhad Schürer),外贸部长格哈德·拜尔(Gerhard Beil),商务协调局的亚历山大·沙尔克-格罗德科夫斯基,财政部长恩斯特·霍夫纳(Ernst Höfner)以及中央统计局的阿诺·东达(Arno Donda)。对于下面三条根本真相来说,文件标题真可以用“所有希望都破灭了”。1989年秋,这个政权不仅在道义上,而且在经济上都走到了尽头。东德五位智者的客观分析如此令人绝望,这要是在西部经济中,就只剩下申请破产的份儿了。

1. 从国际比较来看,东德目前的生产力落后西德40%。
2. 在非社会主义经济地区的负债达到高点,东德的支付能力出现问题。消费大于自身生产,造成在非社会主义经济区债务的增加,1970年为20亿西马克,1989年已达490亿西马克。
3. 停止债务继续增加将使人民生活水平在1990年下降

25% 到 30%，造成无法统治的局面。

根据这些数字再来看统一后的种种抱怨，尽管它们常常是有理由的，但抱怨的情况已是东德从未达到过和根本不可能达到的水平了。

昂纳克的接班人埃贡·克伦茨同样了解这份秘密文件的内容，然而他不是正视现实，向人民说明真相，或许加上一句请求，【100】请人民给他一次机会，而是表示，他和他的同志“虽然未来将更好地行使领导权，但并不准备交权”。

于是人民给了他一张红牌，罚他下场了。大家再也不想看到他那张脸，不想再听他那些废话，不再相信他预告的事情。邦赫费尔大楼里第一次圆桌会议开始前四天开始了他的告别演出：先辞去党总书记，然后是国家主席。大幕落下，没有人要他再次登台，他周围那些人的演出也统统都结束了。党中央先解散，政治局效仿之，但在这类事情发生时应该注意些什么，他们谁也不知道。当然无从知道，专制制度从不需要民主规则。难怪总书记结结巴巴说出这样的话：“同志们，现在我面临一个问题，不知如何回答，党中央已经自行解散了，……现在得由工作委员会来管了吧，是这样吗？”

无所谓啦，没有人再关心此事。12月6日，克伦茨的前途结束了。他的下一次出场是在圆桌会议上，在那儿他只有回答的份儿，不允许再提什么问题了。

现在，东德权力最大的人是原德累斯顿专区书记汉斯·莫德罗。他领导着由他组建、统一社会党和结盟党联合执政的政府，试图管理好混乱的局面，做的却是西西弗斯的无用功，每天

把石头搬上山,夜里石头又都滚回到山脚下。街上一直还在示威,要求更多的自由,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一个根本的政治要求是清除宪法规定的统一社会党的单独领导权,最好是直接把这个可恨的党解散。这点老百姓倒不用久等,党的同志们自己就干了,原因在于,挽救党积蓄的财产免遭国家没收。本来,1949年至今,党和国家始终是一体的。他们把统一社会党的名称去除,把自己的组织更名为统一社会党-民社党。【101】

新杯盛旧酒?可以这么说,很多人都这么看。无论如何,在圆桌会议上,民权人士不用再面对共产党反动派克伦茨之流,而是与居西及其副手贝尔格霍夫共事,他俩是不存幻想的务实派,不是不着边际的意识形态分子。

政治局在偶然性下发生的柏林墙倒塌后,还以虚假的对话态度企图继续对革命的进程施加影响。建立圆桌会议便是其中之一。有点有所认识的味道,听起来像是接受公开的民主。人民议院和政府都不具备民主的合法性。但是党愿意做东请客人上桌,以便掌握对食物、酒水及客人和谈话题目的控制。政治局官僚们希望建立一个他们不受约束的讨论机制。1989年11月28日的记录中写道,一定要阻止“反对派取得对社会发展事务的参与发言权”。

但是他们早已获得了。政治局作了这一企图最后把持一点权力的尝试后五天,它本身也不复存在了。结盟党的代表还在民族阵线里,统一社会党的同志还在人民议院里,工会干部也都没离开。但民权人士不同意由他们出面组织。圆桌会议的想法是民权人士提出的,而不是那些干部们,目的是为了拯救处于危机中的国家,他们的国家,而不是那些人的国家,所以应该由他

们来提条件,而不是那些人。教会,以往他们曾在那里躲避,得到过保护,免遭斯塔西和警察迫害。现在应由教会出面邀请他们和那些人。神甫和牧师是高一界的代表。上街示威的反对派和他们上街反对的那些人,准备在中立代表的主持下,一起尝试建立一个秩序,这一次是一个民主的秩序。

反对派坚持要求待遇平等,统一社会党不干。12月3日,党的单独领导权被从宪法中剔除之后,承认了失败,但只是暂时的,改变策略,以为可以找到合适的机会,轻而易举地玩过这些外行。又错了。中央圆桌会议上的讨论,很多城市纷纷效仿也都举行了各种各样的圆桌会议,全部由广播和电视进行实况转播,比任何侦探片都更紧张更有趣,观众超过百万。这是民主的预习,革命的儿女们听得分外专注。

教区只答应将迪特利希-邦赫费尔大楼的大厅提供给圆桌会议的开幕大会使用,起初预计也就开四五个小时吧,其实一直开到了第二天早上。以这种场合适宜的用词开始,经过新旧势力间激烈的辩论角逐后,寥寥数行词语,冷静地表达了挽救国家的要求和目的:“怀着对我们深陷危机之中的国家,其独立自主和长远发展的深深忧虑,圆桌会议的代表们聚在一起,要求彻底公开我国环境、经济和财政状况。圆桌会议虽然不是议会,也不具备政府职能,但它要向公众提出克服危机的建议,要求人民议院和政府及时向其通报重要的法律、经济和财政决定,并要求参与权。它将自己视为我国公共监督的组成部分,计划将这项职责履行至自由、民主的不记名选举之后。”

【103】 当大厅的大门终于打开时,邦赫费尔大楼里变得和刚才外面大街上一样喧闹和混乱了。电视小组、摄影师、记者,共有大

约 200 多人,不问是否允许,个个理直气壮地挤了进来。13 点 30 分,第一次圆桌会议的主持人、教会理事马丁·齐格勒 (Martin Ziegler) 到场时,所有的位子都被占满了。通道也被堵住了,他只能一点点往里挤,最后总算到了他的座位上。他旁边是天主教会的卡尔-海因茨·杜克 (Karl-Heinz Ducke) 和基督教会工作组的马丁·朗格 (Martin Lange) 牧师,他们将和他共同主持会议。齐格勒先得维持秩序,他要让各组织、党派派来的正式代表能够坐到他们的座位上。

先前在外面吵闹的妇女们也已经进来了,并且不准备让出占着的座位。不请自来的其他群众组织代表也同样,谁都知道,他们从没表达过自己的意见,只是统一社会党的忠实走卒。厅里乱成一团,相互指责,大呼小叫,平时用来祈祷的场所,这时简直像个精神病院。两个男人出来帮着妇女说话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社民党的伊普拉希姆·波梅和“民主现在”的沃尔夫冈·乌尔曼 (Wolfgang Ullmann),前者是斯塔西的人,但这时还无人知晓,后者是正直的教会历史学家、民权人士。

最后,齐格勒神甫只好放弃了。他点了一下各党派和组织代表的名,请他们坐好,一边是统一社会党和结盟党,另一边是“新论坛”、“民主崛起”、“民主现在”、“绿党”、“社民党”、“和平与人权动议”和左翼联合党。妇女们他只当视而不见,她们自己也不在乎,反正已经坐到了桌旁,接着还要发言呢。在第一次会议上就已经引人注目,后来的会议上(在祈祷大厅又开了两次,之后转到下朔恩豪森宫),更加突出的一个人是“民主现在”的沃尔夫冈·乌尔曼,只要他一发言,人人都洗耳恭听。直至 1990 年 3 月 12 日的第十六次,也是最后一次圆桌会议,他始

【104】

终是一个核心人物,这是自始至终坐在第二排,以观察员和听众身份参加的政治学者乌韦·泰森(Uwe Thaysen)充满敬佩地记录下的。

乌尔曼帮着说话的妇女之一至今仍对他赞不绝口,可惜这位圆桌会议英雄已于2004年过早地去世了。坚定的无神论者塔佳娜·波姆(Tatjana Boehm)不仅仅“高度评价这位人道主义者和神学家,我简直是崇拜他”。她本不是崇拜英雄的人。1989年12月到1990年3月的日子里,她证明了自己不光能闹动静,而且能为讨论增添实质性的内容。她是会议最后通过的社会宪章执笔者之一,宪章的重点内容是劳动权、全民就业、男女平等和社会保障。

我问她:“哪里来的勇气,就那么堂而皇之地冲进去参与了?”东德的学校里可是没有练习过反抗的。塔佳娜喝一口咖啡,用吸烟者惯有的沙哑嗓音谈起了她那在政治解放前就已完成的自我解放。远在东德解体前,她的自我救赎就开始了,柏林的科学院里有一个“女权主义科学家讨论组”,起因是“尽管妇女的考试成绩比男士好,但总是他们得到好题目和好项目”,她这个社会学家对此极为反感。她是统一社会党员,没法给她施加别的罪名和不用她,所以她的自我意识不受影响地得以继续发展。

【105】 1989年11月她退了党,和别的妇女一起建立了独立妇女协会,12月7日开始的圆桌会议上她是妇女协会的代表。“承认,我们的组织建立得晚了一点,但是我们知道,没有妇女是建立不起国家的。”有时她说着话还会带出过去的词儿,当然不止她一个这样。有一个代表提议,14岁以下的孩子经父母同意应

该允许成立组织时,别的代表认为这不是众多问题中的当务之急,这时的会议记录上写着:“这里我想到的是少先队组织,啊,对不起,是儿童组织……”

塔佳娜·波姆边想边乐地回忆着坐在她旁边的那个男人,沃尔夫冈·施诺尔(Wolfgang Schnur),司法和刑法工作小组恰恰归他领导。民主崛起组织的这位明星人物是斯塔西,她当时自然不知道。他的双重身份直到1990年3月18日第一次自由选举前才被爆料出来,结果造成民主崛起组织大量失票。塔佳娜·波姆记得她从一开始就不喜欢这个人的样子。什么样子?“不喜欢他那姿势。”圆桌会议上的其他男人,她喜欢的和政治观点接近的,她为他们感到遗憾。选举还没进行,昨日的英雄似乎已成了明日的输家。“看看我那些留着胡子的东部战友们,我已经感觉到,普通老百姓绝不会选这些人的。他们看着就像闹事的,革命的疯狂日子里已经闹够了事,这辈子都够了。”

对她来说,完全可以继续这样疯狂下去。圆桌会议上的政治讨论是“我一生中最有意思的时光”。后来她在内阁担任不管部长,有发言权,但没有决定权。“不管怎么说,我的工资是2 200 马克,与从前的800 马克相比是质的飞跃。”她在人民议院为数不多的几次出场非常引人注目:红红的长指甲,紧身裙,高跟鞋,在大厅中大多数灰白头发的老者们眼里,显得那么另类和桀骜不驯。对此,她至今感到自豪,从外表上先显示出对通行的东德妇女形象的反叛。“我们东边的女权主义者在很短的时间里为妇女争取到的东西比西边斗争多年所达到的要多。”她还认为:“假如西边当时能从我们这里也吸取一些东西而不是全部排斥,统一的情况会更好些。”我告诉她,居西也这么看,塔

佳娜·波姆说：“他说对的地方，就是对。”

他俩不仅在这点上看法一致。他们都认为，东德加入联邦德国是统一的先天性错误，应该先召开两国议员共同参加的国民代表大会通过一个新宪法。1949年通过的联邦德国宪法第23章规定：“此宪法先在巴登州、巴伐利亚州、不来梅州、大柏林地区、汉堡市、黑森州、下萨克森州、北威州、莱法州、石霍州、夫巴州和夫霍州实施。德国其他地区待其加入后生效。”居西·波姆以及圆桌会议上超越党派界限的大多数都竭力主张第126条所表述的另一种方式：“全体德国人民自由表决通过的新宪法生效之日，此宪法即失效。”

虽然设立了一个专门准备未来共同新宪法的工作组，他们咨询了30位专家，撰写了各个章节，直到大家认为可以拿出一份提交给人民议院和联邦议会审查的草案，之后可以交给国民代表大会表决。然而现实走在了他们前面。东德老百姓不惜一切要求尽快统一的压力太大了。

历史事实是：大多数东德人对是不是有一个新宪法，仅仅加入老的宪法够不够都不感兴趣。其他目标：西方能提供的物质好处更要紧。他们希望自己不久也能拥有那一切，不想再要东马克，想要硬通货。圆桌会议勇敢地对此作了斗争——“通过递交加入声明，臣服于联邦德国的基本法，谁通过这样一条道路寻求德国的统一，既伤害了自身价值也伤害了人民的尊严。”但是东德的人民并不认为这是臣服，既没有觉得伤了自身价值，也没有觉得伤了尊严。因此，最后还是按照第23章办的。

在德国总工会短暂工作了一段，用尚不熟练的英语到美国作了关于左翼妇女政策的报告，这是塔佳娜·波姆“政治生涯

中的第二次原始体验”，现在，她进入了现实政治，1992年以来，在勃兰登堡州社会部任处长，负责妇女避难所和移民中包办婚姻等事务。她的最高领导是圆桌会议上就认识的，“当时，绿党的马蒂亚斯·普拉采克(Matthias Platzeck)是我们当中政治色彩最淡的一个”。如今，这位社民党人士是勃兰登堡州的州长。

圆桌会议其实不是圆的，是方的。只在第一次会议上，双方各15名代表相对而坐，女权主义分子那次没有被写进会议记录。一周后的第二次会议上，新旧势力都变成了19人。妇女代表得到了正式认可，另一方增加了两名工会代表；当又有两名来自绿色协会的“新人”加入时，“旧势力”召来了“农民互助联合会”的两个人。【108】

新生力量的19个人里，有几个的历史和旧势力旗鼓相当这点，暂时大家还都不知道。不同的组合中有时是16个，有时是14个或10个是斯塔西的人，17个工作组里面的不算在内。新生力量中的大多数，领军人物，革命的推动者，为信念曾受到迫害，他们都被国家安全部记录在案。对他们都“采取了措施”，就是说，被24小时监听、监控。

“民主现在”的圆桌会议代表，民权人士乌尔丽克·波佩(Ulrike Poppe)后来才读到斯塔西档案中关于自己和丈夫的内容，才知道是谁在监视他们。她当时的丈夫格尔德代表“和平与人权动议”参加会议。“是很多很多团体干的”，她对我说，她虽不主张审判所有人，但要求他们自首，这是他们欠受害者的，而她是其中之一。作为“妇女和平”组织创建人之一，她和贝贝尔·博莱一起在1983年因“涉嫌传递叛国情报”罪被逮捕和关押了六个星期。虽说按照东德法律每个人都有义务时刻为

和平而战,可“妇女和平”组织却遭到当局高度怀疑。

【109】在此之前斯塔西已经注意到她了,因为她在东柏林建了一所独立幼儿园。这简直已接近叛国了。国家控制的幼儿园在统一社会党干部眼里是实施其思想意识形态的苗圃。他们要的不是开发每个孩子的个性,而是要尽早培养适应集体的能力。忠于党的路线的幼儿教师决定,孩子们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玩耍,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一起蹲便盆大小便,什么时候小同志们得齐声高唱这种可怕的歌曲:

我哥鲁迪格,参军当大兵,他保卫幼儿园,我天天有安宁;军帽我戴还太大,军装还太重,等我长大那一天,也去当大兵。

和参加过圆桌会议的很多人一样,乌尔丽克·波佩从没忘记过当年的讨论中最独一无二的是什么,尽管大家常为会议日程争得面红耳赤,常因意见相左各不相让。“但是始终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在那里,这就是,我们都知道,原来的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而对将要来临的是什么,我们都不清楚。”这些人都是同样的感觉:洛塔·比斯基(Lothar Bisky)和格雷戈尔·居西,沃尔夫冈·贝尔格霍夫和洛塔·德梅齐埃,乌尔丽克·波佩和京特·诺克(Guenter Nooke),莱因纳·艾波曼和马蒂亚斯·普拉采克,贝贝尔·博莱和维尔纳·舒尔茨(Werner Schulz),理查德·施罗德和维拉·沃伦贝尔格(Vera Wollenberger),沃尔夫冈·坦佩林(Wolfgang Templin)和克里斯托夫·马奇(Christoph Matschie),马库斯·梅克尔和施特芬·赖歇(Steffen Reiche),康拉德·魏斯(Konrad Weiss)和玛丽亚娜·多夫勒

(Marianne Doerfler)。

民权人士曾畏惧过的国家政权,远比他们想象的要虚弱,但是,“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的开放政策,剧变仍是不可能的,”塔佳娜·波姆补充道。她没有忘记1987年9月举行奥拉夫-帕尔梅和平示威时跟在一旁的斯塔西说的那些威胁人的话,当时昂纳克正在波恩进行国事访问,因此上面有严格的指示,要克制,把警棍藏进口袋或风衣里。“等着吧你们,等昂纳克一回来,你们瞧吧,看怎么收拾你们。”后来果真是这样。【110】

乌尔丽克·波佩现在在柏林-勃兰登堡基督教科学院担任政治和当代史教师。当年的民权人士(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神学家,以致那时的媒体评论员们讥讽说看来要从一个“干部共和国变成神甫共和国了”),如今在曾保护过他们的基督教会工作。波佩在统一中找到了归宿。作为“东德所有宁折不弯地坚持自己信仰的男女公民”的代表,波佩和另外两名妇女一起获得古斯塔夫-海涅曼奖以及联邦德国嘉奖公民的最高荣誉——联邦十字勋章。

当时的局势非常不稳定,因为“出气口可能只打开一小会儿”。波佩今天的分析是有根据的。曾经的权威虽然已动摇,但并没有灭亡。也没有停止发声。第一次圆桌会议召开后两天,12月9日,格拉区国家安全局便直截了当地要求柏林的负责同志们进行反扑。他们把革命称为反革命。他们这份“今天我们——明天你们”的电传也发到了国防部和内政部,发到了国家安全办,这是国家安全部现在的名称,发给了总理,人民议院的各党派,那里坐着的还是只会点头的民族阵线议员。电传的内容是:

同志们、公民们，现在，我们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受一小撮人的唆使，把仇恨指向从前的国家安全部，现在的国家安全办，如【111】果我们不能一起在短时间内揭露这些教唆者、煽动者和对国家政权充满仇恨的行为，这些力量就会煽动起更多的民众反对国家、政府和社会，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为了我们大家的利益，保卫和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合理的要求只有在我们共同的家园，民主德国的武装力量继续存在并积极行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

这里说的武装力量的积极行动是什么意思，无须向收件人作进一步的解释，就是要求向在共和国大街上挑衅的那伙人开枪。威胁确实造成了恐惧。居西说：“确实存在足够的武装力量，但是，当汉斯命令他们放下武器回家去的时候，他们都服从了。这是莫德罗的功劳。他的话他们听，因为他被视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如果是我发这样的命令或一个民权人士说这样的话，他们肯定不会干的。也许他们内心深处确实是这么想的，为人民站岗放哨。当人民说，我们不需要你们了，他们也只好作罢。”

虽然所谓反法西斯护卫墙^①几周来已不再是密不通行的屏障了；虽然统一社会党的头头们不是退休就是逃跑了；虽然来自底层的压力丝毫没有减少，但是有消息说人民军有可能搞政变；有关于工人民兵武器库的报道和斯塔西武器装备的谣传。国家安全部门的武器储备的确很充分，充分到足以对自己的公民开

① 这是东德官方对柏林墙的正式称呼。

战。当莫德罗政府的一位代表将一些具体数字公布出来时，圆桌会议上一片可怕的沉默。国家安全部存放的装备包括：12 459 支手枪，76 592 支自动手枪，3 611 支步枪，449 挺轻机枪，766 挺重机枪，3 537 支反坦克步枪，103 支特种弹药发射器，48 支散弹枪和 3 303 支轻便手枪。【112】

突然讨论起“新纳粹危险”成为威胁的话题那天，贝尔格霍夫正好在圆桌会议现场。在柏林-特雷普特为二战牺牲的苏联红军建的纪念碑近日被涂上了民族主义色彩的标语，如“要人民共同体，不要阶级斗争！再也不要无产阶级专政！未来属于人民，不属于掌权者！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前进，占领军滚出去！”等标语刚被发现的第二天，民社党、反法西斯抵抗战士委员会和德苏友协便号召举行战斗游行，组成反右统一战线。贝尔格霍夫说：“我马上就问，真是新纳粹吗？还是斯塔西的人，在为开火制造借口？”如今，他更相信：“这是诺曼大街^①为引出自己的部队所为。”这里边的调子都是他耳熟能详的：“东德的百姓们，你们看，假如没有了我们，法西斯就抬头了。”果真有 25 万人参加了游行。

关于地下纳粹在伺机出手的谣言，是斯塔西有意散布的，它当然符合人们对西方的想象。在官方的历史书里，居住在东德的都是反法西斯人士，而法西斯分子都到西边去了。根据历史学家亨利·赖德(Henry Leide)对东德秘密历史政策的调查，真实的情况是，国家安全部“系统地有意识地”将很多纳粹罪犯甚至杀人凶手安排为线人和情报员，有的被派到了西部。人们知

^① 东德国家安全部，即斯塔西的所在地。

道,那里生活着很多隐名埋姓的纳粹,也有不少不隐名的,很久,【113】太久了没有受到惩罚。继承了相同信念的后代聚集到了德国国家党和共和党^①的麾下。然而,民众中为他们提供滋生土壤的不仅是西部。但统一社会党把矛头指向对面:因为反法西斯护卫墙倒塌了,所以肮脏的右派就渗透进来了,在清洁的东部把水搅浑,所以出现了反革命。

直到1991—1992年霍耶斯维尔达越南人居住的平房被纵火;而邻居们欢呼着对纵火者行纳粹礼表示支持;直到消防队在灭火时受到普通百姓的阻挠;直到弄清楚,东部根本无须从西边进口新纳粹,本地培养出来的已足够多了。如今,他们在各新联邦州发展壮大,其成员也早已不是愚蠢的打手,而是衣着讲究、举止得体的纳粹,他们给文明社会带来的危险更大。勃兰登堡州的检察长艾拉多·克里斯托夫罗·劳滕贝尔格(Erardo Christoforo Rattenberg)由于工作关系非常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在我的德国之旅访问到他那一站时,他向我提到了东部褐色网^②,那里面的幕后指使者是西边的。

对民权人士来说,德国第二个专制制度刚垮台不久的12月里,主要危险是红色而不是褐色。毕竟红色在昨天,而褐色属于前天。斯塔西仍然一如既往对一切都了如指掌这点,他们还毫无察觉;对一起坐在圆桌会议上的伊普拉希姆·波梅和沃尔夫冈·施诺尔的双重人生,也一无所知。虽然开始有一点模糊的迹象,但施诺尔所属的“民主崛起”立即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很

① 联邦德国具有新纳粹倾向的极右政党。

② 褐色在德国政治中象征纳粹。

多党派,报纸及教会人士都收到了匿名信件,信中诬陷某些党和组织的成员,曾为斯塔西效力。这样的信中有一封指向沃尔夫冈·施诺尔。目的很明显,以这类很难反驳和解释清楚的怀疑【114】摧毁他的威信和对他的信任。这让人不得不产生这样的印象,信的作者就是前国家安全部的人,企图通过这种行动再次显示他们的能量。”

施诺尔和波梅两人不仅是斯塔西的普通兼职工作人员(1989年的统计,这类人在东德有11万),而且他们是负有特殊使命的IMB。IMB是个缩写,其全称是东德典型的对某项职责的烦琐描述,叫作:“参与对有敌对联系和敌对行为的嫌疑人直接采取行动的非正式工作人员”。因此,当圆桌会议他们这一方有人提出要求解散国家安全部更名后的国家安全办,但必须停止销毁其档案时,曾化名为“拉尔夫·席尔梅尔”的IMB沃尔夫冈·施诺尔和化名“马克西米利安”的伊普拉希姆·波梅(以上只是他们众多化名中的两个),表现得异常活跃。他俩主张销毁所有档案,但又不能表达得太露骨而引起怀疑。美国中央情报局早就用几百万马克从变节人员或苏联克格勃手里把这些被称为“玫瑰木”的卷宗买去了这点,他们自然无从知晓。

秘密警察机构从前叫国家安全部也好,现在改称国家安全办也罢,对圆桌会议上的大多数来说无所谓,改了名字其实是换汤不换药,两个他们都不想要。贝尔格霍夫和居西在圆桌会议的预备会上就已经一起提出了“尽快解散”这一机构的提案,这种提法当然不符合党的路线。汉斯·莫德罗尽管多次保证他不想与斯塔西有任何关系,只是为人民服务,不为他的党,更不为昨天的势力,但无济于事。没有信任,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差距【115】

在拉大。斯塔西武器库的情况公开后恐惧开始升级,圣诞节放了几天假也无法让人们平静下来。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政府,两个都不是选出来的,一个受人民议院支持,另一个受人民爱戴。

因此,对旧势力来说,把新生力量拉进圆桌会议参与决策不仅是策略上的需要,而且是度过第一次自由选举前这段时间的唯一战略,选举原定于1990年5月6日举行,后来提前至3月18日。局势有多棘手,被马丁·齐格勒记录在案。那是圆桌会议三位主持人与汉斯·莫德罗的一次谈话:“政府认为局势的危险在增加,国家全部解雇的人已成为社会的不稳定部分,复仇的因素已明晰可见,政府的执政能力在降低,政府、圆桌会议和人民议院必须合作,可能性有二:容忍现行政府,或新党派接管政府,第三种可能:联邦德国来接收。”

莫德罗说,面对“国家解体的威胁”,本不属于一体的力量很快在一个民族责任政府内凝聚到了一起,有快人快语的女权主义者塔佳娜·波姆,第一天她差点被人从祈祷大厅赶出去;有绿党的马蒂亚斯·普拉采克和“民主崛起”的莱因纳·艾波曼,当然少不了各方都尊重的沃尔夫冈·乌尔曼。共任命了八位不管部长,他们参加两边的会议,圆桌会议和内阁会议。

【116】 只有在这样的组合里面国家安全办的问题才能得以解决。1990年1月11日,政府总理还宣布,他不准备解散这个机构,因为“揭露和阻止破坏和平的阴谋”是宪法保护的任务。其他国家也都有这样的机构。把宪法保护的任务恰恰托付给那些从来不尊重人权的家伙,老百姓能答应吗?讲话发表不久,示威者就上街了,建筑工人戴上了头盔。这让年纪大一点的人不禁回想起1953年6月17日的起义。晚上,鸣笛的车队也加入进来

了,人民议院前,东德的国旗被扯下,国徽被从旗上剪掉,第一次出现了要求统一的呼声。这正是莫德罗和他的同志们不愿听到的,圆桌会议上的反对派们也同样不愿意。

莫德罗又退了回去。第二天上午他就宣布,国家安全办将被解散,今后这类机构如何建立将由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合法政府决定。一个三人委员会将负责处理善后事宜。它的组成人员是:德国民主农民党的格奥尔格·波姆(Georg Boehm)、“和平与人权动议”的维尔纳·费舍尔(Werner Fischer)和柏林-勃兰登堡州基督教会主教哥特弗里德·福克(Gottfried Forck)。圆桌会议认为:“据我们了解,原国家安全办的工作能力已丧失,目前也不存在国家安全力量重新组合的威胁。但是我们得注意不能让事情变成与砍了头又不断长出新头的恶龙作斗争。”

被砍去的头如今又再次昂起并矢口否认的事实,当年白纸黑字写在三人委员会告全东德人民书里:“原国家安全部是一个违宪的机构,对很多人犯下了罪行。”这是正确的认识,是真相。【117】

按照基督爱人如己的原则,加上大概与洛塔·德梅齐埃一样,坚信世上无完全的公正可言,三人补充道:“但是,不是所有斯塔西工作人员都是罪犯,也许,永远也无法搞清,谁负有何种程度的罪责。我们知道,人民的愤怒是有道理的,但于事无补,我们大家都清楚,同事圈,朋友圈甚至家庭都被牵涉其中。为了今后我们能够坦诚地相互直视,我们必须做些什么。对这些历史遗留的负担,我们既不能佯装不知,也不能很快忘记,我们必须学会把它们当作生活的一部分来对待。如果我们希望建立法

治国家,那么也必须依法对待斯塔西从前的工作人员,只有在某个事件中有了证据,他们才算有罪。作为负责解散国家安全办的受托人员我们一致认为,要尽一切努力,把罪犯告上法庭,并创造条件,使这类机构不再有机会重生。”

历史上,一场革命胜利过后,与旧制度卫道士之间的冲突总是在所难免。冲突可以像法国大革命那样以流血的方式解决,也可以像这里这样,通过和平的对话方式解决:加害者和受害者,英雄和恶棍共同寻找解决办法,有的甚至关系亲密,保持至今。社民党的圆桌会议代表理查德·施罗德知道,每一场革命都不可避免地会引发“重新寻找方向”的问题,“以往的规则不算数了,以往的权威被推翻了,新的在哪里呢?”

受终于可以自由讲话激情之鼓舞,每个人都想说话。民权【118】人士在以往的经历中不知发言时间有限这一规则,其他人同样不知,因为他们那里始终是一个人讲话,可以一讲几个小时,之后从没有讨论。要不是基民盟这位法学家的先见之明,在第一次会议上做的第一件事就提出大家都要遵守的规则,会议肯定变成了谁也听不清、听不懂的大杂烩。洛塔·德梅齐埃在这里显示了他的一项特殊才能,后来他任总理时这一才能得到充分展示,这就是在混乱中建立秩序。他的孩子们嘲笑他说,别的人都在搞革命,而我们的父亲在起草章程。

这对民权人士也大有帮助。政治实践经验,操纵集会的各种手段,只有坐在另一边的同志们掌握。他们相信,这些被他们蔑视地称为“业余政客”,不谙个中门道的家伙根本不是对手。但是很快发现,自己错了。之后便也只好遵守游戏规则,虽说坚持他们的路线,但和大家一样,本着务实、理智的精神。否则他

们无法实现大家共同的、最重要的目标：非暴力。按照民权人士的意见，一个新的东德虽然不大，但它应该“主张和平，重视生态，拥有从未有过的民主和天堂般的公正，成为欧洲中心一个小小的上帝之国”，德梅齐埃不无善意嘲讽地这样描述着他们的理想，当然，这一切都没有实现。

波恩的职业政治家们这时正在世界的大舞台上演绎另一部戏，统一大戏。11月28日，联邦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在联邦议院出其不意地提出了“战胜德国与欧洲分裂”的十点纲领，对这一大获成功的举动，事先只有他极为信任、相信他们绝不会传出去的少数几个人知道。通往统一的行动计划是他在位于奥格斯海姆的家里向妻子汉娜罗拉口授，由妻子在打字机上为他打好的。三周以后，科尔到德累斯顿访问，当“我们是人民”的口号变为“我们是一个民族”的声音响起时，再看看身旁面无表情地站着的汉斯·莫德罗，科尔知道，他得迅速行动了。这已不再是要自由和开放边界的问题了，而是要完完全全自由之中的德国统一，并且，不是几年以后，而是今天，现在。于是，他向着目标出发了。1990年7月，与戈尔巴乔夫在高加索会晤时，他到达了目的地。10月3日，德国实现了统一。埃贡·巴尔说：“统一一词在西部引发了心理迷茫，现在不是已经统一了吗，这些东边人还想要什么？”

1981年，罗伯特·哈维曼曾接受过西德广播电台的一次采访，当被问到是否赞成德国统一，如果赞成，对统一的设想是什么时，这位当时东德最著名的异见人士回答说，一个统一的德国，他既无法想象是现在联邦德国的样子，也无法接受是东德的状况，因为两个德国都有他极不喜欢的地方。在他的国度里，

“面对国家专制个人完全没有自由”让他义愤填膺,但他仍然认为他的国家是比较好的德国,“因为那里没有大康采恩和巨大的工厂、矿山和土地私有财产”。因此也就没有西德存在的那种集团,“虽然没人选举他们,但是他们有权有势,不受任何监督和约束”。

这话他也可以用来形容把他害得生不如死的那个团伙:未经选举,不受监督,贪污腐败。

圆桌会议的代表们追寻的是另一个目标,他们想改革自己那个衰败的国家,使之能够在富有的大姐姐身旁继续生存下去,然后再平等地来谈判统一的问题。他们想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找到第三条道路。这条路应该怎么铺,谁也不完全清楚,【120】但他们很有想法。当他们经过激烈辩论准备将这些思想写进一份共同宣言的时候,德国统一的列车已经驶离车站出发了,行使的方向由别人决定,他们被丢在了站台上。他们希望建立一个德国共同委员会作为“德国邦联机构”的要求湮没在了街上要求尽快统一的呼声里。两个德国间先建立一个货币同盟这点虽然没有争议,但是,当会场里还在要求就具体方式广泛听取社会各方的意见时,外面,东德的老百姓早已清楚无误地宣布:如果西马克不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就到它那里去(今天我们知道,这在西部引起的不都是欢呼)!于是,列车加快了速度。

这一切,里面的人都还不太知道。他们按照自己的节奏,自己的速度,追寻着自己的梦想。教会理事马丁·齐格勒在开幕讲话中提到被纳粹杀害的基督徒迪特里希-邦赫费尔,“他对暴力统治的反抗赋予我们同样的义务”。这一点大家当然都同意。齐格勒面前放着洛塔·德梅齐埃起草、打印整齐的圆桌会

议规则,逐条逐点排列得清清楚楚,大家都得遵守:

1. 程序性提案优先于事务性提案处理。2. 程序性提案包括:确认日程,限定发言时间,确定发言人数,会议结束时间,有关表决方式的提案。提案获得简单多数即被认为通过,允许少数表决;等等。

每一次会议上,发言时间总是被突破,无论主持人如何提醒都无济于事。当日程进行到第五项“东德的国家安全”,埃贡·克伦茨被叫来问话时,干脆取消了发言时间的限制。大家想从他那里了解清楚一切,不管需要多长时间都行。真正的现场直播历史。曾几何时还是位高权重,现在已成了前国务委员会主席和前统一社会党中央总书记的这个人,把当天的直播收视率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圆桌会议的与会者和外面全国的老百姓都屏息聆听了他的介绍,无不目瞪口呆。沃尔夫冈·乌尔曼这个好人,接受了克伦茨首先提出的请求,向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为东德出现的局面表示道歉。乌尔曼说,他虽然不能代表人权受到伤害的反对派,但是,“我想,克伦茨先生,您在这里提出了道歉,我作为一个公民和基督徒,以个人的名义接受你的道歉。”【121】

而克伦茨讲述的,并不是原本应该列举的错误、罪责和责任,而是带着哭腔的一通辩解,他为什么那样做,为了阻止最坏情况的发生他是怎么做的。也许他真是这么想的。至于斯塔西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对人民做了什么,他一无所知,因为他们的行动是每周一次政治局例会后昂纳克和米尔克两人单独面谈

决定的。根据“今天掌握的情况,我要强调,从今天掌握的情况看,”他清楚地知道,“国家安全部发展成了国中之国”,“甚至调查党员,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发展,……选举产生的党的领导人、书记处和政治局,没有任何一级领导了解和研究过他们的行动以及动用武装部门的事情”,尤其是他,一无所知。他毕竟积极推动了昂纳克的下台,为此,他本该收获表扬、感谢和认可才是。

【122】 左翼联合党的克莱恩问道,是谁驱逐了沃尔夫·比尔曼,软禁了罗伯特·哈维曼和赶走了鲁道夫·巴罗? 1989年5月7日地方选举中的舞弊到底是怎么回事?

克伦茨承认,三个事件中他都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但是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还只是共青团的第一书记,没什么说话的份儿。关于选举中作假,他先是做了些辩解,什么凭良心只是宣布了227个县的选举委员会报给中央的结果,此外他没有看到其他的数字。接着说了一句话,比之前的任何一句都更能说明这个人的思想:“如果我们要追究事情的本质,我告诉在座各位的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对我来说这是近几个月才认识到的,在过去40年里我国从没有过自由选举,只是走个过场。”

埃贡同志,你可是一直全力以赴在干的。

两边当然都没有人再说这事,他们不是被淹没在德国统一的汪洋大海之中,就是像沃尔夫冈·乌尔曼那样作为英雄进入了集体记忆,或者像三位主持人那样仅出头露面几个星期,或者至今对东、西部仍然重要,或者像“和平与人权动议”的玛丽亚娜·贝斯勒,“民主崛起”的安吉拉·默克尔那样从配角变成了主角。

当时不起眼,如今很重要的人物当中有一个民主农民党

的年轻人,乌尔里希·容汉斯(Ulrich Junghanns)。他坐在旧势力一边,他也确属那一边。他不光是个追随者,而且是统治集团的志愿吹鼓手。1989年夏,连克伦茨、米尔克和米塔格都开始怀疑社会主义是不是真的是势不可挡的时候,他还在党报《农民之声》上大肆宣扬自己的正确立场:“为社会主义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对绝大部分合作社农民和园艺农的党性、正直和行动积极性的考验,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和和平斗争事业的自豪感以及党员的积极表态应得到进一步加强。这里我还想补充的是,柏林墙,我们不应否认它的防护功效,原因很简单,因为它确实保护了我们,否则,看看墙那边褐色灾害的蔓延吧。”【123】

不少前东德的遗老遗少如今都在左翼党那里找到了归宿。但是像容汉斯这样的同志,即便是左翼党,大概也会要求他另觅出路。假如对手那边有这么一位在政界官居要职,基民盟一定会天天吹号开战。然而乌尔里希·容汉斯不用惧怕基民盟,1990年基民盟接收了农民党,容汉斯当了两任基民盟联邦议员。在统一后的第17个年头,他被选为勃兰登堡州基民盟主席,甚至还获得社民党的认可,在普拉采克的大联合政府中担任经济部长。德国制造出的正常情景:当年社会主义农民战线上的死硬派、如今的头头是当年绿色联盟的民权人士马蒂亚斯·普拉采克。

圆桌会议代表中第一个大胆从政的是洛塔·德梅齐埃。专制制度被推翻后,他作为宗教部长和莫德罗的副手在他“谁有时间愿意一起干”的号召下建立起的政府内阁里干了两个半月,积累了些许经验。这是1990年他被推选为基民盟总理候选

【124】 人时所具备的唯一从政经历。当时西德人还不能来东边参选，像后来库尔特·比登科普夫(Kurt Biedenkopf)和伯恩哈德·福格尔(Bernhard Vogel)所作的那样，因为当时还存在着两个德意志国家。

由基民盟、“民主崛起”和德国社会联盟共同组成的德国同盟在3月18日以40.8%的得票率成为最强大的政治力量，而之前的民调全部显示社民党会胜出。40年来第一次能够自由选举的东德人充分运用了这一自由，参选率确实高达93.4%，不像以往是个捏造的数字。选民们再也不愿选任何与“社”字沾边的党，无论是“社会民主”还是“统一社会”。洛塔·德梅齐埃作为选举的胜利者成了总理，但他知道，他的任职时间有限。他还知道，在通向统一的道路上，他需要尽可能广泛的支持。这位务实的人早已认清统一是唯一可行之路。他与社民党组成了大联合政府。社民党因选举失利正举棋不定，和不久前“民主崛起”所经历的沃尔夫冈·施诺尔事件一样，社民党的英雄人物伊普拉希姆·波梅在选举之后的一周里被曝出是斯塔西恶棍。

如今被贬义地称为“东部业余政治爱好者”的政治家们既不业余，更不懒惰。德梅齐埃说了：“我是没有经验，可当时，我们东部这些人谁不是这样呢？”德梅齐埃任职期间，从1990年4月12日人民议院选他为总理始，至10月3日，德国成功、幸福、隆重地实现统一，他的内阁共签署了759份文件，或者用时兴的话说叫作启动了这么多项目。“我们总不能光废除旧的，不建立新的，”他简练地说。他的朋友理查德·施罗德开玩笑地把东德的功勋章送给他以表彰他为这个国家在其历史行将终结时

真正成为德意志的、民主的共和国^①所作的贡献,直至它成为统一德国的一部分。

如今,洛塔·德梅齐埃知道,“他和他的部长们只是在西边人过来全部接收前被利用一下”,但当时他并不这么认为。说他也是斯塔西的指控从未得到过证实。统一后,基民盟不再需要他以后,便开始出现这类谣传,绝非偶然。他虽然在死党科尔政府里仍然担任了一年的特殊任务部长,但之后不等被辞便自动请辞,回到了自己的事务所。如今,德梅齐埃仍为此自豪,先于当年的总理,第一个识别和提携了那位天才的东部妇女。是他把政府副发言人的差使给了这位物理学家,那时她参加的政党“民主崛起”正因施诺尔丑闻在选举后一蹶不振。她的名字叫安吉拉·默克尔。【125】

圆桌会议还有一位外行在德梅齐埃的领导下开始了政治家的生涯,莱因纳·艾波曼,1990年4月起任裁军与国防部长。裁军,放在艾波曼头上还可说,他毕竟是个和平主义者;但是国防?管当兵的,管军官?检阅立正列队的哨兵?从他的经历看难以想象。艾波曼上任四周后召开的人民军指挥官大会上,坐在他面前的军官们也在这样想。然而,他的第一次讲话便让他们明白了,今后指挥他们的人是谁,他们需要习惯些什么。“你们现在有了一位文职的最高长官,先生们,我是你们的最高指挥官,同时也是这个国家第一个裁军部长。”

掷地有声,都记住了。

艾波曼向后靠到座椅背上,椅背几乎碰上了墙,他沉浸在回

① 东德的正式国名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26】 忆的享受中。当年那个长篇讲话中他最得意的句子在第35页，仅就因此也值得宣誓担任这个职务。“我们在有关民役立法方面所做的工作，引起了国际关注。很高兴看到最近的征兵审查结果消除了以下顾虑，即对服民役的宽松规定会导致服兵役志愿的大幅下滑。”当年曾为信仰拒服兵役而入狱的艾波曼在讲话最后要求军官们打消顾虑，畅所欲言，大厅内先是一片沉默，过了一會兒，全体起立为这位另类的部长鼓起掌来。

他在圆桌会议上的那些朋友们要是知道也一定会为此高兴的。选举前六天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开得波澜不惊，没有开场祝辞，没有告别演讲，也没有最后声明。民主预习班就这样不发证书让学生们毕业离校了。未来已不再需要他们。有些代表在东德的第一届议会里再次相遇，因分属不同的议会党团成了竞争者。另一些永远离开了政治舞台。东德电视台在3月12日18点中断了对圆桌会议的现场直播，恢复了正常时段的正常节目，比如“小沙人”的冒险旅行。统一后东部的孩子们至今一直喜爱这个节目，就像当年东德的孩子爱东德一样，每天晚上18点50分，中部德国广播电台都会把“小沙人”节目送到千家万户。

三位主持人也回到了他们的正常生活之中，各回各自的地方。后来在上帝的名义下又共同出场过一次，是在格特泽玛尼教堂举行的纪念活动上。1989年秋的动荡日子里，那里每晚都【127】 聚集着民权人士，相互鼓励、加油，挺直腰板上街战斗。他们三人在那里为人民议院的议员主持成立大会前的礼拜。挤得密密麻麻的座位上有不少圆桌会议的代表，无神论者汉斯·莫德罗和格雷戈尔·居西也来了。马丁·朗格负责仪式开始部分，卡

尔-海因茨·杜克负责祈福,马丁·齐格勒布道。他在布道中传递的最重要信息是《圣经》诗篇第43篇中的段落:“慈悲高于正义。正义可以建立秩序,慈悲可以医治伤痛,它解救我们脱离困扰和罪责。在上帝那里,正义与慈悲同在。”

对国家现状仍然适用的这条信息,德梅齐埃牢牢地记住了。他提出的请求得到了实现:在迪特里希-邦赫费尔大楼钉一块牌子,纪念被遗忘的圆桌会议的英雄们。当年妇女们在那里高声喧闹的大楼,如今是一个饭店。很多游客都可以读到牌子上写的话:“在这座教会大楼里,以非暴力形式强制启动的东德圆桌会议是和平结束德国分裂的开始,其宗旨是消除专制,建立民主,1989年12月7日—22日。”

第四章 平庸的邪恶

【128】 假如，西部的德国人在盖世太保档案中不仅排查褐色专制罪恶的行刑者，而且排查告密者、暗探，结果会怎样呢？假如联邦情报局和联邦刑侦局对每一位应聘者都审查其纳粹背景；假如为清算黑暗历史而专门建立一个机构，就像东德政府被推翻后柏林所做的那样；假如当时严格审查每一个西德人的经历，就像剧变后对每一个东德人的审查那样，结果又会怎样呢？

假如那样做了，纳粹党卫队员保尔·迪克普夫（Paul Dickopf）和罗尔夫·霍勒（Rolf Holle）就不会被委以建立联邦刑侦局的重任，直至1959年，在那里工作的47个部门领导中，只有两人没有第三帝国时期的历史污点。假如那样做了，前纳粹将军莱因霍尔德·格伦（Reinhold Gehlen）绝不会成为联邦情报局的头头。假如那样做了，卡尔·卡斯滕斯（Karl Carstens）当不上总统；汉斯·格罗普克（Hans Globke）当不上阿登纳总理府主任；特奥多尔·奥伯兰德（Theodor Oberlaender）当不上部长；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Kurt Georg Kiesinger）当不上总理。凭他们档案中记载的历史问题，很多大学教授只能去当个补习教员；很多医生只能去病理科当个助手；而那些曾以元首的名义

活动的经济领袖人物最多只配去流水线干点儿粗活或者卖卖吸尘器。

假如用今天处理第二次专制时期干部们的办法也曾处理过【129】德国第一次专制时期的干部们,对于西德人是否拥有审查东德人历史的道德权就不会有争议了。

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很多文职罪犯在西部一直逍遥法外,有些杀人犯也逃脱了惩罚。路德维希堡的“清算纳粹罪行中心”在纳粹统治结束 13 年后才开始查阅档案的工作。

所以,只要涉及对德国现代历史中的问题进行法律制裁,那些被淘汰的斯塔西暗探和原先的党政官僚们就会提出什么胜者司法和双重标准,因为这直接涉及清算他们自己的历史。他们从政治上滥用了“胜者司法”的概念,因为他们不仅失去了政权,而且其中某些人还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受到了起诉。但是东德并不是被联邦德国战胜的,而是那里的德国人 1989 年秋在没有外来帮助的情况下自我解放的,他们不像当年全体德国人,需要被人从纳粹统治下解放出来。于是,被夺了权的开始编造历史,目的在于逃避加害者的罪名,竭力把自己净化成受害者。当他们从革命的休克性惊恐中苏醒过来,又敢把曾被堵住的嘴张开时,当他们发现暂时还不会马上遭到判决时,便迅速行动起来,销毁罪证。

国家安全部的档案详细记录了他们巩固政权的种种行径,这方面,斯塔西倒和另一个专制的官僚很相像。成百万的卡片、卷宗、录音带和照片在那里静静地证明着监视、检查、专制与恐怖,曾经发生过的一切是对一个政权本质的最佳诠释。

德国的两次专制都很可怕,但其罪行的规模不可比。把纳【130】

粹政权与统一社会党政权相提并论不仅过来人反感,这样类比确实不合适,从历史角度看也是错误的。纳粹国家罪在侵略战争、大屠杀、集中营和毒气室。东德也是专制国家,但统治者不是好战的刽子手。洛塔·德梅齐埃这位法学家认为东德是非良政国家的说法太笼统,他对东德的定义是“非法治国家”,理由是:“毁坏国民经济、全体人民的精神和社会风气,毒害两至三代年轻人,这是我对统一社会党的指责,这是法律手段制裁不了的。”

对斯塔西法律上和道德上的审判涉及的主要不是近 10 万名专职工作人员,因为他们可以找到这样的借口,每个国家为了保护自已免遭敌人攻击都需要秘密警察。但从人口比例看,苏联也没有东德那么多国家暗探。虽然他们打击的首先是内部的敌人,对异见人士实施监控,伪造证据,制造车祸,但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是以国家的名义并为能够成为党的盾牌和利剑而自豪。斯塔西不是国中之国,它是国家的奴仆,是统治党维护手中权力最重要的工具。人们虽然惧怕他们,但知道他们是谁,待在哪座高墙后面,开什么车,甚至穿什么样的风衣,所以,他们是在明处的、看得见的恐怖。

人们学会了在日常生活中与他们巧妙周旋。人人都知道,隔墙有耳,会放低嗓音,关上窗户,只有确定没人偷听的时候,才讲恶毒的笑话。不肯就范的人们习惯了轻声说话,说半句留半句,相互都听得明白。剧变后一开始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是因为西边的叫声太响了。

另一部分非专职的斯塔西部队,人数达 17.4 万之多,像看不见的乌云,即使晴空万里,也始终飘浮在人们头顶上。历史学

家和民权人士斯特凡·沃勒(Stefan Wolle)1990年1月参加了占领柏林利希滕贝尔格斯塔西总部的行动,如今,他领导着柏林自由大学统一社会党专制研究会的一个项目。在他看来,斯塔西非专职工作人员才是统一后遗留的真正历史问题:“在隐秘住宅中与接头的上级军官秘密会面,向国家安全机关提供口头或书面报告,这时,人的道德顾虑全被打掉了。有不少很极端的案例:弟弟揭发哥哥,丈夫举报妻子,老师告学生或学生告老师,告密者也常常相互举报。”

这一条也许好笑,但所有这一切决不是好笑的事情。告密者不仅举报别的告密者,在材料不足时他们便伪造数字、见面次数、线人的信息等,用以讨好上级军官。这无疑加重了今天要弄清真相的难度。一旦又揭露出一个斯塔西,档案材料一清二楚,而当事人会愤怒地反驳说是伪造的,这可以是通常的战术,先否认了一切再说,但说不定是事实。要想分辨清楚真相与谎言,非得是熟悉档案的专家不可。

这类专家中有一些本人就是原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他们认识了自己的过去,证明不是前政权潜伏下来操纵档案的,也不包庇以往的同志,只想帮助弄清真相。后来的联邦情报局长【132】汉斯约格·盖格尔(HansJoerg Geiger)1990年10月被派往柏林负责组建斯塔西档案馆,他永远也不会忘记第一次站在那些架子前面时的情景,档案袋上写满了数字与各种缩写字母,让来自波恩的他一头雾水。如果没有熟悉档案的当地人,他根本就不知道到哪里找什么,在哪里能找到。

以曼弗雷德·施托尔佩(Manfired Stolpe)为例,革命前他是基督教会主席,统一后多年担任勃兰登堡州长,作为东部充满自

信的代言人而受到拥护和爱戴,在施罗德第二届政府任交通、建筑、住房和东部建设部长。他对于说他以“秘书”的化名为斯塔西效力的指责,给予了激烈而坚决的反驳。在位于波茨坦的州议会调查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教会的八名证人证实知道施托尔佩为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必要对话而与斯塔西有公开接触,但八人当中七人本身是斯塔西兼职工作人员或所谓预备人员。1978年,施托尔佩获东德国家功勋章,是由米尔克提议和安排的,理由是“表彰其努力投入地出色完成维护和平,防止敌人袭击社会主义祖国的复杂任务”。他的上级军官克劳斯·罗斯贝格(Klaus Rossberg)1986年的记录中写着,施托尔佩50岁生日时,送了一本价值3000马克的1599年版的《圣经》作为寿礼。他没有窃为己有,而是转给了教会。

调查委员会的结论报告解除了对施托尔佩的指控。他不是斯塔西兼职工作人员,对以“秘书”的化名被登记在册于1989【133】年才知道,在以往与当局的工作接触中始终致力于呼吁“当权者保持冷静和以另一种方式对待当事人”。2005年,联邦宪法法院裁定,不能把施托尔佩称为斯塔西人员,这样做属于侵犯他的人格权,不属于言论自由的权利范围。

再来看洛塔·德梅齐埃,1989年11月17日成为莫德罗政府成员后第二天,他便要求查阅自己的斯塔西档案。“结果告诉我说,找不到,很可能已被销毁”,一年后出现的谣传,说他曾化名“斯车尔尼(Czerni)”为斯塔西效力,但一直没什么证据。还说“斯车尔尼”的名字是他自己选的,因为他是音乐家,知道同名的作曲家,他的上级军官是不可能知道这个名字的,但是也可以反过来,从有利于他的角度发问,假如真是如此,这位学识

渊博的人文主义者在承担合作义务时,会不坚持要求把名字 Czerny 拼写正确吗?

教会监事会主席曼弗雷德·施托尔佩 1990 年 3 月 30 日亲笔写给选举获胜者的证明信中说:“尊敬的德梅齐埃先生,应您的请求,我于今天下午 17 时,在检察官霍夫曼、解散协调员施罗特尔、公民委员会代表托普夫、律师居西以及两位档案管理员共同在场的情况下,在原国家全部大楼查阅了 16 号档案,没有发现编号 020340430237 洛塔·德梅齐埃的卡片,谨慎起见,也查找了有可能出现拼写错误的卡片。根据负责解散安全部工作的人员和检察官提供的信息,原国家全部不存在关于您参与的记录。曼弗雷德·施托尔佩。”

居西在施托尔佩出报告当天也写信给德梅齐埃证实了审阅档案一事,他是东德为数甚少的自由律师之一,说自由是指“可以自由选择当事人”。因此,他也代理异见人士和申请去国者。【134】他必须与国家代表,无论是统一社会党还是国家全部的代表见面,这样做是“为了我的当事人的利益,并且是在他们知情之下”。对于他以“公证员”为化名与斯塔西联络,提供情报,帮助镇压反对派的说法,他以民主社会主义党议员的身份在联邦议会豁免委员会面前给予坚决驳斥:“我从未与国家全部有过非正式合作。”同年,汉堡地方法院裁定,因为没有可靠证据(尽管有一份由高克局^①撰写、长达 400 页、因表述严谨受到德国某

^① 原东德国家全部档案管理局的简称,全称太长,其负责人是高克,因而被称为“高克局”。高克的继任是贝斯勒女士,这个机构即被称为“贝斯勒局”。

高级行政法院称赞的评审报告)不能把居西称为斯塔西奸细或化名“公证员”的斯塔西兼职工作人员。

居西代理的当事人纷纷发表书面声明对他表示支持。异见人士鲁道夫·巴罗,1978年在保岑被判八年监禁,一年后因国际上的抗议而被驱逐去西方。他说:“居西对我有所伤害的推断有失偏颇。相反,他在法庭上要求无条件释放我,判决后也尽了最大努力,缩短我的关押时间,包括改善关押条件。”

异见人士罗伯特·哈维曼的所有子女,无论是弗罗里安、乌尔里希,还是弗朗克、希比勒,都强调,他们的父亲虽然没有把“居西博士视为政治上的志同道合者,也只是把他认为可以告诉他的事情讲给他听,这完全符合他对付斯塔西的战略,需要说明的是,父亲的房子里始终装有斯塔西的窃听器,他本人对此非常清楚,但是他对居西的工作和为人都从未失望过,直至去世一直享用着格雷戈尔·居西律师的服务。”

【135】 1968年8月被逮捕,后来移居西德的女歌手贝蒂娜·魏格纳(Bettina Wegner)知道,“谣言是能够毁掉一个人的”。在她本人的受害者档案里发现有两份“公证员”提供的报告,但不能证明是居西。她说:“就我能回忆起的数次谈话和内容来说,没有在档案中发现相关报告。”

2008年5月,贝斯勒局重新指控居西曾为斯塔西工作,又被他驳回:“我与党中央直接接触,所谈内容事先都征得过当事人的同意。我始终是个律师,当然我也是党员,同党中央的人也进行政治谈话,所谓同志间的谈话。但我从未伤害过我的当事人的利益。”

一个民族的未来也包括它的历史。这是众所周知的真理。

不把历史当回事的,早晚会受到历史的惩罚。不当回事可以表现为对专制顽固不化地否认,也可以表现在貌似可笑的细节末梢。2007年,奥得河畔的某个小地方决定,把一条用建设东部资金新建的道路以东德前总统威廉·皮克的名字命名,地方议会表决时无一票反对。而皮克是个坚定不移的斯大林主义分子。

如今,对那些难以言说的事情保持沉默或避而不谈(不仅/但也),可以从东德以往的社会政策中找到答案,柏林墙建立以前,已有2100万东德人,大多数是这个工农国家不喜欢的资产阶级精英,自主逃往西方。没有他们,建设东部公民社会的进程还会更加漫长。在德累斯顿、莱比锡、魏玛等地,尤其是波茨坦,公民社会已经成长起来。而缺少公民社会的地方,比如波茨坦两旁勃兰登堡州的其他地方,政治园地不是枯萎,就是被红色或褐色的肥料所滋养。

档案中不仅记录着过去那个制度健忘的肯定者,也记录着【136】难忘的否定者。革命成功后,东德民权人士的第二个历史性胜利是阻止了系统销毁档案的行为,恢复了被取消的一条法律。当时已有数以万计的材料被丢进了碎纸机。新论坛向第一届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议院提交了一份清理国家全部档案的法律提案。这时,两德的政治家们对此都已不感兴趣,他们实现了货币联盟,完成了统一谈判。他们打算封存所有档案,放进联邦档案馆,——闭上眼睛,合上档案,而不是睁大眼睛,翻开档案——,等到某次大赦时全部销毁。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数据保护和保障必要的人格权。

实际上,他们有着另外的动机。西部的政治家们担心斯塔

西及他们安插在西边的间谍多年监听到的谈话被公布,那里面记录着他们以不恭的口吻说出的对党内同人的真实看法,记录着他们如何玩弄阴谋整垮对手。据说共计 25 000 名西德的政治家、企业高管、记者和政府官员在东德存在的 40 年间被监听。

其中也包括本人,卷宗编号为 VSH,HA II AKG。要想看到其中的内容,我得先破译这套缩写。VSH 的意思是缩小查找范围、查找、提示,HA 的意思是主管部门,AKG 是评价和审查小组。HA II 是东德的反间谍部门,13 处负责西方记者。在 A/06041/14103184 编号下,对我在 1986 年任总编以前在《明星》杂志的专业工作作了评价。在玫瑰木卷宗里,我又在人员名录【137】卡 F 16/HVA 中,记录编号为 XV/362/75 之中看到了自己,这个编号提示着另一个项目。HVA 的 X 处专门负责制造“有关联邦德国重要媒体和有影响力记者的假情报,用假材料推波助澜和使用有影响的间谍”。

东德的政治家们,无论属于哪个党派,当年为什么都反对公开斯塔西档案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担忧,一旦人人都有权利查阅档案,看过之后知道了是谁、在什么时候监视和举报过自己,非出人命不可。受害者要向毁了他们一生的人复仇的心思固然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容许。民权人士坚决反对捂盖子的做法,统一前四周,他们再一次象征性地占领了原国家安全部,直至有关条款被写进统一条约,1990 年 10 月 3 日起成为法律。高克局是和平革命的成果。联邦议会副议长沃尔夫冈·蒂尔泽用形象的语言描述说:“世界史上从未有一个专制制度被如此迅速而彻底地研究过。”

如今,这个局归玛丽亚娜·贝斯勒领导,她既是民权人士,

又在施托尔佩的州政府担任过教育部长。她从放在面前的水果盘子里挑了三块吃,一块苹果,一块橙子,一块猕猴桃,香蕉,不要,边吃边笑着。玛丽亚娜·贝斯勒说:“西边人当然不希望有我领导着的这么一个机构,他们也想捂盖子、贴封条。但我们的要求在人民议院成功通过了,当然是借助了外部的压力。那是一个少有的、人民与人民代表真正一致的时刻。联邦议员就不是都认可这个斯塔西档案管理法及管理机构了,有些人认为这更多是对民权人士所作的一个妥协。”在一次班级聚会上,她遇到一个曾为斯塔西工作过的同学,她说:“见面时怪怪的,平时我跟那个圈子还真没有任何接触。”【138】

2000年以来贝斯勒领导着这个管理局。她和她的前任高克都是这个不受欢迎、但至今非常必要的职位的最佳人选:东德人,思想自由,善于思考,立场坚定。高克是来自罗斯托克的牧师,人民议院中新论坛的议员,接任这项工作时,得到了一个有点复杂的头衔:“原东德国家全部档案管理联邦专员”,负责监管斯塔西用书架排列起来长达180公里的档案。从中开始寻找专制的沉渣,那些告密者。

被他们告发的是他们不喜欢的人,是“东德人民中较可爱的那部分,不肯就范,反驳过、抵抗过,或者巧妙地逃脱了斯塔西的招募”(贝斯勒语)。恰恰是斯塔西档案,证明了德国人不全都是告密者、叛徒和暗探。想到这一点,每当她对斯塔西残酷而系统地摧毁反抗者的事实感到震惊与无助时,便能汲取到力量。

加害者们很想早早就把这段历史掩埋掉。国家安全办最后一任主任,中将沃尔夫冈·施瓦尼茨(Wolfgang Schwanitz)1989年11月就已经提出过一个解决办法,几年后在查阅莫德罗政府

文件和记录时才被发现。“关于销毁材料,同志们,尤其是在县级机构,一定要做得机智和不易发觉。我们正受到严格的监视,……一定要机智地按照指示来做。携带一大堆对我们现在和将来都没用的材料是毫无意义的。特别要注意,所有工作人员对销毁和转移行动记录和档案一定要严格保密。”

政治局官僚之间,把这一行动称为“碎纸机(狼)政策”。在恶狼^①的踪迹被发现之前,他们已经把上百卡车的档案材料投进碎纸机磨成碎末了。位于诺曼大街的斯塔西总部那儿还得加上手工操作,夜以继日地干,直到安装在那里的碎纸机不胜负担才被迫停工。

美国中央情报局搞到了 13 000 项行动记录、卷宗和信息材料。和其他 50 万份一样,它们是打开几百万份档案的索引。他们至今为此感到自豪,“这是我们迄今为止最大的成功”。美国人从未透露过是怎么搞到这些东西的,是直接通过斯塔西的某个工作人员,让他大赚一笔从此可以颐养天年,还是通过克格勃间谍,出于同样的原因把材料出卖给了过去的敌人。代号“玫瑰木”^②并不具有神秘味道、童话色彩,它只是三个以 R 开头的卷宗名称中的一个,联邦宪法保卫局的某位工作人员大概恰好喜欢这个词。玫瑰木索引现存于贝斯勒局。美国人根据他们的需要分析评判过后,完璧归赵,还给了德国人,那一共是:HVA 卷宗 29 万份,行动卷宗 57 000 份,其中包括行动记录及登记号

① 这里是一个文字游戏,具有双重含义,德文的碎纸机 Reisswolf 是个复合词,其中包括“狼”这个词。

② 玫瑰木档案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搞去的斯塔西档案的名称。

码,用那个登记号码可以查到真名实姓。涉及的人达 279 327。

政治局倒台后不久即开始的国家销毁档案秘密行动并没有能保守秘密。起来告发的正是行动部队自身,他们不想再充当老百姓怒气的出气筒,拒绝执行碎纸命令。装备精良、负责东德所有国家安全部门警卫工作的精锐部队捷尔任斯基团(1.1 万人,以莫斯科秘密警察契卡的创建者捷尔任斯基命名)的官兵们以“我们也是人民”为口号抗议秘密销毁档案的命令。他们说:“我们曾被人民的敌人滥用,曾经的誓言和行动都是以这些罪犯的名义进行的,我们再也不干了,我们害怕,为那些我们并没有做的事情被送上断头台。”【140】

按照上方的命令,“契卡们”原本要对人民做什么,也同样被记录下来。25 年以来,远在 1989 年以前,在 15 个专区都有建造关押所的计划。及时更新的斯塔西卷宗中,“预警体系”条目下可以找到 86 000 个东德公民的名字,一旦“出现紧急情况或防卫状态”,这些人将被逮捕和关押。所有记录在案的“敌对因素”都必须根据指示始终处于斯塔西兼职工作人员的监视之下,所有工作必须当日完成。遇有紧急情况,也为外国人和过境者准备了看守所,可以容纳 25 000 人,其中包括在柏林的 855 名外交官和记者。进看守所的是外来的敌人和危险分子,关押所是为自己人民中的反抗者准备的。

这类行事方法是每个专制制度的典型做法。德国的第二个专制制度只是把它更加完善和细化了。4. I. 1 至 4. I. 5 标号下是“附件 6 的细化精准措施”。“为保证项目的全面可靠实施,必须预先储备必要的建设材料(水泥柱/杆)。至 1990 年,储备要达到计划要求的总量。上级给抓捕小组发放了一张注意事【141】

项,上面注明被关押人需要携带的物品:目前及将要到来的季节所需要的外衣和鞋子、内衣(至少3套)、3双袜子/长袜/裤袜;只对女性:1条长裤、2条围裙、睡衣、工作服、卫生用品、2条被子、1天的餐食。”

当上街示威的群众已成气候的时候,斯塔西负责人米尔克1989年10月8号还在通过传真给所有部队下达命令,立即随身佩带武器,列出:“所有根据现有材料有反社会主义或其他敌对行为或有可能有敌对行为的人员名单,确定恰当措施,以便必要时能立即抓捕和关押这些人。”命令被扔进了废纸篓,米尔克和他的部门几天后也成了历史。

米尔克的忠实战友们事后提供的解释可以与1945年后德意志民族大家庭成员^①提供的相媲美:预警工作组长,少将埃里希·吕姆勒(Erich Ruummler),在萨克森议会调查委员会面前声称,他在剧变后(他使用的词汇当然是“转折”),才从统一社会党报《新德意志报》的一篇文章中知道曾经计划把多少东德公民收押进去。

1990年时,民权人士对官僚恶势力的了解还不充分,他们只是感觉,斯塔西在高墙后面正疯狂地想方设法销毁罪证。当他们明白了档案的守护者们更害怕他们时,便发起进攻占领了【142】斯塔西在全国各地的机构。比如圆桌会议的“安全工作小组”,1月17日就做了一件实至名归的事情,占领了柏林诺曼大街斯塔西总部,扣押了存放在那里的档案,为后世保留住了过去。但档案业已不完整,5800麻袋堆在铜锅大厅,里面满是工作人员

^① 纳粹用语,专指具有雅利安血统的纯种德国人。

用手费力地撕成碎片的关于斯塔西的证据，碎纸机已经因为超负荷运转而失灵了。

那个场景真是让人永生难忘，确实，德国基督教会负责国家宗教、欧洲、社会和税务方面法律问题的教会理事大卫·吉尔（David Gill）边说边给我们倒上咖啡，把桌上的点心推到我们面前，接着关上了窗户，因为不时会有外面宪兵广场上旅游者的嘈杂声传进来。其实占领柏林斯塔西总部时他并不在现场，而是第二天，听说那儿的朋友需要增援才过去的。“当时我才 23 岁，没有任何政治经验。我是个在农村长大的、牧师的孩子，在海尔胡特教区的自由空间里比较早就学会了有话直说，这对我很有好处。”

吉尔既没有当过少先队员，也没有参加过共青团，10 岁以后，他不得不辍学离校，这是当年东德所有信仰更高一级审判者——上帝——的年轻人的共同命运。吉尔去当了水暖工学徒，后来在教会经营的三所高中之一补习完成了高中毕业考试，学习神学，准备当牧师。“假如统一的奇迹不发生我也就成了牧师。”柏林墙倒塌后的那个星期天早上，他去了西柏林，在诺伊科恩区和许多信徒一起来到海尔胡特教区所属的教堂，为发生的奇迹感谢上帝的恩典。

斯塔西总部的占领者们需要他。各项行动需要协调，工作小组需要建立，讨论需要组织和引导。吉尔坐在那参与着，也得与对手交谈。他说：“我们的对手是有教养的人，不是米尔克那类的。我们也需要他们，因为我们不了解这里的档案体系。里面是很可怕的地方，但我已不觉得害怕了，也许是没有时间害怕？我们不是要揭露一个秘密的机构，我们已大概知道他们干

了些什么。我们要打开机关,把真实的历史还给公民。”因为他能言善辩,所以,当公民委员会需要一个发言人时,担子自然就落到了他肩上。大卫,你行,你来干吧!于是他就帮着干,一直干到1990年4月,他想回学校去继续学业了。因为他觉得,已经有了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议会外的监督机制就没必要存在了。

但他还是被需要,尤其是有一个人需要他,约阿希姆·高克。在他作为公民委员会代表和知情者参加的一次会议结束时,即将上任的联邦专员问他,是否有兴趣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不去课堂听理论而亲历政治实践。吉尔答应了。跟着高克进了他的机构,以24岁的年纪成为一个处长,后来又担任了发言人。在那儿干到1992年,开始学习法学,因为他已对政治着了迷。在美国读完了硕士。由于具有两个专业的经验,法学和神学,到基督教会担任联邦与欧洲政策联络员,正好把他的兴奋点,国家和教会以最完美的形式结合起来。“我们知道有的人从前给斯塔西干过,但是为了了解那个体系,我们需要他们。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那都是一个紧张有趣的年代。那时我年轻,无负担,无顾虑,也许有一点天真,了解东部的日常生活情况。”

这个日常生活是被精心组织安排的,有民兵战斗队、干部
【144】 物业管理员、生产队等。对统一社会党来说,除了建设社会主义,监视人民也是最高目标。1989年8月,米尔克指示建立东德数据库,以供安全全部需要时使用。这意味着更严格、更进一步的监视和随时调阅医院、图书馆、银行、保险公司的数据材料。指示邮局用四周时间将所有电报储存下来,此外还要列出谁订阅何种报纸或杂志的单子。两个月后,这个命令也成了一张

废纸。

通过施诺尔、波梅或科努特·沃伦贝尔格(Knud Wollenberger)这样的情报员,拥有众多耳目的斯塔西总能准确地了解到反对派的动向,他们在哪里见面,有些什么计划。当沃伦贝尔格的夫人维拉从档案中得知,监视自己的正是丈夫时,彻底崩溃了。但是,当反对派战胜了恐惧,克服了无奈,走上街头彰显力量的时候,斯塔西官员们掌握的全部材料都变得毫无意义了。斯塔西以往向其汇报情况和请求指令的党内高层自己也已经不再相信事情还会有利于他们的转机了。

据说专管意识形态的库尔特·哈格在政治局引用过列宁语录,也不知是否属实。是很适用的一段,适用得难以置信:“大多数情况下,仅下层人民不愿意像过去那样生活还不足以引发一场革命,还必须加上上层已不能像过去那样经营和统治才行。”这话有道理,属于国家的那些任务,像基础设施、城市建设、物资供应等,在东德已被忽略到无人掌管的地步。

直至今日,这一切仍举目可见。

亚历山大广场边的那些建筑,虽说被鉴定为可以供人居住,但看上去好像明早就要被拆除似的。但是,东边的事情常常不是像第一眼看上去的那样。铁锈色的栅栏突然中断,紧挨着便开始了另一番天地。几乎是隐蔽的,毫无过渡的,就在栅栏包围的预制板房旁边有一个建筑,外表虽然也是同样丑陋与不宜居,但里面却书写或改写着历史。【145】

入口处的牌子和我祖母的手包差不多大小,祖母的那个包包里放着她去朝觐时必备的一切:赞美诗歌本、玫瑰经环、8字面包圈、纸巾。四方的铜制牌子上刻着主人的身份:“原德意志

民主共和国国家全部档案管理联邦专员”，上面刻有联邦鹰徽。

这里管理着东德的历史。1990年，这里的档案揭示出“民主崛起”的施诺尔和社民党的波梅都为斯塔西工作，让以前的人民英雄一夜之间现出原形成了人民的叛徒。我来造访时，这个机构里散发臭味的不是陈腐的过去，而是陈旧落后的厕所。详细记录着暗探报告的档案存放在诺曼大街的前斯塔西总部，剧变后20年来，记录中有很多人早已失色，不少早已被揭露，其中不乏伪君子。档案中是否还有定时炸弹的钟摆在走动，是否还有重要的兼职工作人员隐藏着没有被发现，肯定无人知晓。

电话中，他告诉我，我一个人肯定找不到去他办公室的路，最好还是等在楼下。电梯间前，穿着胶底鞋和褪色牛仔裤的人们行色匆匆地走过饭厅来打卡，打卡机自动记录下他们一天的工时。接着奔亚历山大广场方向而去，那里似乎还是没有消失的东占区，出门时对门卫说声“吃了么”，其实吃饭时间也早过了。

【146】 “问讯与申请”处长来接我，我们一同穿过长长的过道，一会儿左拐，一会儿右拐，我不禁想到了卡夫卡。我的陪同点点头，似乎猜到了我的心思。我们经过男厕所时，看到门上贴着一张手写的要求：“气味刺鼻，请关好门。”“是妇女们贴的，”克劳斯·里希特(Klaus Richter)解释道，一边大声苦笑着。能有所改变的希望，不是仅仅改善一下厕所恶劣的通风条件，几年前他就放弃了。半年后联邦房产局划拨给他们部门一处新址，2008年他们就能搬进那栋漂亮的楼房里去，好多人觉得像是做梦。新址的街名对他们来说也不是问题：卡尔·李卜克内西大街

31—33号。

理查德的女秘书每天早上6点就上班,所以下午已经回家了。她是否也跟他一样是东边人这点无须再问。另一边的德国人以前也一直就是早起的。上国营商场买东西,谁到得晚了,就会受到生活实际的惩罚,东西就卖光了,比如黄瓜什么的。为了生计所形成的节奏早已成了习惯,并保持了下来,虽然现在并没有这个必要了。这么说可能有点无赖,但克劳斯·里希特知道,西边人就是这样。现在,一天当中任何时候都买得到香蕉。

里希特以前也在斯塔西工作。但是只干了两年。有的人,虽然在化名“秘书”之下的所作所为有争议,但仍在政治上飞黄腾达。里希特的政治前途却在统一后因此受阻。他曾在人民议院担任90联盟的党团主席,1990年12月议会党团迁往波恩联邦议院之前,他的历史问题被揭露了。1971—1973年克劳斯·里希特曾为斯塔西非专职工作人员,甚至接受过侦察员培训,之后便洗手不干了,但也并没有对那个制度不忠。他说:“主要是共产党的反法西斯主义教育感动了我。”1989年12月他才退党。里希特在议会党团面前为自己辩护说,他从未隐瞒过自己历史上的这段经历,也没有谎称过作为东柏林科学院的科研人员从事过秘密的抵抗活动。但是他承担了后果,结束了刚刚开始的政治生涯。【147】

在与约希姆·高克、汉斯约格·盖格尔以及大卫·吉尔进行了面谈之后,里希特给联邦专员写了一封求职信,信中说明了一切,时间是他的事情被公开揭露前四周。“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聘用他,”高克强调说。玛丽娜·贝斯勒也这么看。开始时以她的上司高克,现在以她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这个机构的

第八份工作报告中提到了里希特的情况,只是没有指名道姓。她在报告中说:“在曾为斯塔西工作过的两个人中有一个在1971—1973年间被确认为兼职工作人员并接受过培训,在投入使用前他脱离了斯塔西,因而没有从事过相关工作。他与斯塔西的这点关联本人已在各种场合多次予以说明,在本机构任职前也作了公开说明。”

柏林-霍恩朔豪森纪念馆馆长胡贝尔图斯·克纳博在其《加害者就在我们中间》一书中说里希特是化名“哲学家”的斯塔西,对此,里希特写信给克纳博愤怒地反驳说:“我从未用过这个名字,斯塔西也没有给过我这个名字。”克纳博答应在他的畅销书再版时予以更正。

【148】 2007年夏鼓噪一时的对贝斯勒局的不满也与里希特有关。这个清算斯塔西过往罪行的机构,年预算1亿欧元,其中7 773 200欧元用于支付2 000名工作人员的工资,自成立以来已处理申请550万份,每年要求阅读档案的申请仍有10万份,偏偏这样一个机构竟雇佣了51名前斯塔西人员!于是贝斯勒局公布了这些人的情况,被雇佣的不是斯塔西暗探,以便让他们偷偷伪造档案,把加害者变为受害者,而是32名保安,1名维修工,1名门房,2名司机,1名电脑维护员,3名办公室秘书和1名通信员。当真相大白于天下时,人们的怒气也一下子云消雾散了。高克非常看重里希特,他说,没有里希特这样了解那个党和国家机器的内行,在初期那复杂困难的条件下根本无法开展工作。

从前的牧师高克是个思想型的革命先锋。他说:“我那些左派朋友对变革,对一党专制的批评都非常赞同,他们是革命运

动的一部分,但到了大多数人要求统一的时候,他们开始怀疑了。我是个现实主义者。德国历史上所有的起义和我们所进行的相比都微不足道。它将是德国自由史上一个闪光的日期。”独立自主地应对身边的政治环境,作出反抗,东德人从没有过这方面的训练。尽管如此,当他们1989年秋坚决地起来抗争时,也做到了。柏林墙倒塌时,高克并没有被兴奋冲昏头脑。一开始他以为那是个错误的消息。当时他在他的家乡罗斯托克市政府前刚发表完一个讲话,上来了两个警察,告诉他说他们刚从广播里听到的,边界已经开放了,问他对此有何看法。“我说,一定是搞错了。回到家,打开电视,才知道这是真的。当时的感觉是介乎于幸福和茫然的空白之间。”

曾经警醒的梦想家始终是个现实主义者。他1999年写成【149】的杂文集与1989—1990年在很多东边人头脑中发生的一切已相距10年。“我们梦想得到一个人间天堂,醒过来却置身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①这一点,至今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东边人始终觉得,在统一中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他们的身份认同?

不,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从人的心理方面可能更容易解释吧,大家毕竟渴望自由与正义渴望了几十年,它们始终闪烁在遥远的地平线上,但人们需要渴望的感觉。“当渴望突然被满足的时候,人们会觉得缺少了那种美妙的感觉,有点像初恋,得到了心仪已久的伴侣,占有了长久期盼的。但是婚姻中,曾长久

^① 西德一个联邦州的名称,当时是西德首都波恩所在的州,这里的意思是指西德。

渴望的那个人的过人之处渐渐缩小得像常人一样了,有的人承受不了这点,他需要渴望。”

我说,我从理查德·施罗德那儿听到过类似的说法,但高克的分析还没完:很多人忍受不了渴望与现实的这种断裂。对西方与自由的崇拜在两者均似乎无法企及的时候达到了登峰造极。北莱茵-威斯特法伦的生活不是很好吗?但是,当东边人来到这里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突然与一个从不知渴望为何物的人到一起了,因为西德人的所有渴望都是能实现的,这让很多东边人觉得伤心、失落,这不是说要回到东德去。老天,不是这意思。这是与现实的一种距离,他们不知该如何面对的现实。于是自由成了一种威胁。

可是,他们的自由不是曾被斯塔西剥夺了几十年吗?一旦他们想走向自由,就会被关起来。为什么这么多东德人,各个政【150】党的都有,不仅仅是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的人,要求结束开放档案呢?

高克不赞成原谅罪犯的罪行。他说:“做基督徒也不意味着不加任何评论地原谅罪恶。”他始终坚信,清算斯塔西罪行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假如必需,也是痛苦的。回忆是一种治疗过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从中学习。

“人真的能从历史中学习吗?”他问我。这是个反问句,回答他已经有了:“知情有助,学习有益。必须从两次专制吸取教训,了解两次专制的情况,记住两次的罪行。”在西部,你们那儿,他这么说,是把我看作典型的西边人,跟西边人虽然也可以在柏林市中心区喝咖啡聊天儿,但其实更应该实话实说,好让人明白,我一开始所做的“假如那样又会怎么样”的比喻错在哪

儿？高克说：“1945年以后你们那儿的人认为纳粹本身并不是坏事，只是管理得不好，这和我们这里现在对东德的民调结果很像。但接着你们就有了经济奇迹，每个人，包括流离失所的人，都有了一部自己的成功史。这激励人奋发向上。我们这儿有1/3的人没有成功史，这让人心灰意冷。战后你们那儿不是很多人都认为不是一切都不好吗，领袖^①还建了高速公路，全民就业，没有犯罪，那只是12年的专制！东德存在了40年呢！”

他说出的惊叹号，悬在我俩之间充满了烟雾的空气中。回忆本来就不是纯受理智支配的。高克已去世的父亲本来是厌恶共产党的，可是90年代初突然开始说统一社会党国家好的方面，就业岗位啊，团结互助啊，安全保障啊。这来源于希望的破灭，原以为剧变后一切就都自动变好了，和西部一样了。莱因纳·艾波曼也说到过这种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夸大的希望。他说：“这种失望可以解释我们今天的某些行为。我们不应该这样，应该更自信，为我们所做的感到自豪。你们那儿，有25 000人失业就要造反了，我们这儿，现在有600万人从事着与他们在剧变前不一样的职业。”

艾波曼曾被斯塔西跟踪。化名“托斯滕”的得力干将，罗斯托克的律师沃尔夫冈·施诺尔早在1983年就被国家安全部XX/4司司长、上校约阿希姆·维格安德(Joachim Wiegand)赋予特殊任务：“对东德境内负面或敌对势力进行积极工作，尤其要注意艾波曼牧师的动向。”在斯塔西看来，坚定的基督徒艾波曼与共产党的无神论者和异见分子哈维曼之间的联系尤为可

① 这是当年德国人对希特勒的称呼。

疑,他们一同发表了著名的柏林呼吁书:“不要武器,创造和平。”

有一件事,让不喜抱怨的乐天派至今也还笑不出来,与沃尔夫冈·施诺尔有关。那是他和沃尔夫冈一同从柏林出发去莱比锡。斯塔西一刻不停地在跟踪他,艾波曼是知道的。几个月前,他开了哈维曼的车去德累斯顿,跟踪的人开着拉达车大摇大摆跟在后面,根本不在乎他是否发现他们。艾波曼说:“我请沃尔夫冈回头看一下,这次斯塔西是否又跟来了。他转过去看了一下,摇头说没有,后面没人。我没想到,那天斯塔西之所以不跟踪我,是因为他们已化身为施诺尔坐在我身旁呢。”四年前,他与施诺尔偶遇过一次。施诺尔向他伸出手,艾波曼说:“在我把手伸给你之前,还得发生很多事情才行。”至今什么都没发生。

这位信奉基督的反抗者,以上帝的名义鼓励抵抗教堂外那
【152】伙人,他是“民主崛起”的创建者,圆桌会议斗士,东德裁军与国防部长,1990年后联邦议会基民盟议员,2005年以来任清算统一社会党专制基金会主席(没有比他更适合担任这一职务的人选了)。他不认为自己是英雄,过去所做的反抗也不是什么英雄史诗,因为:“我不知道,假如我事先知道,斯塔西确实在考虑,神不知鬼不晓地把我干掉,我还会不会做那些我做过的事情。”

当他有一次突然发现特拉比小汽车的方向盘松动时,还认为只是偶然的,谢天谢地总算没出大事。这里不光得谢老天,还得谢社会主义的汽车工业,其产品只是由纸板与塑料构成,最高时速有限。贝尔格霍夫也相信,斯塔西的行动计划中,直至最后都包括暗杀。他说:“12月柏林特别党代会期间,一次关于统一

社会党责任的激烈辩论之后,斯塔西的一个上校对我说,你就这么干吧,有一天你会被车撞死。这时我才明白,我得立即离开那里了。”后来他在自家信箱里发现了恫吓信,说你这个工人阶级的叛徒,我们会吊死你,不过他没太当回事。

洛塔·德梅齐埃认为,历史能够清算的想法是一个“德国式的幻想”。对东德人来说亦如此。他的朋友理查德·施罗德告诉我,以往的战友,如今别人讲起讽刺东德的笑话会生气。他的这位战友说:“那个国家制度不是我们自己选的,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如今在时过境迁之后还要对它认同,不喜欢听对它不恭的言论。但是你们说,我们有那样的制度是自找的、应得的,这我们也不爱听。”这位战友还说:“我们凭自己个人的经验来评判西德人,而西德人如何评判我们,则要先查斯塔西档案。”这到底对不对,他不无怀疑。出生在东部的西边人埃贡·巴尔说得更绝对:“是我们造成了这样的认识,西德人眼里的东德简化成了斯塔西,连统一社会党都算不上。”【153】

东部比西部更德国的原因不仅是东德特有的怀旧情绪,与之相关的还有对自由无能为力的担忧。过去,国家虽然监视了他们,但也负责提供一切,保护人免遭自由带来的种种危险。

具有辩证思维习惯的格雷戈尔·居西认为,自由当然是一种收获。可怎么没人提联邦情报局的档案呢?他讲起建墙后第一次去西方,去自由的国度旅行的经历:“那是1988年,我到巴黎的东德文化中心去作一个报告,题目是东德实现人权之状况。这当然不是我很愿意谈的题目。但是,即使是让我去讲瓢虫我也会去的,关键是,我能去巴黎。”德国统一首先是对和平的贡献,这是最根本的。无论有什么困难和冲突,那边的美化也好、

这边的无知也好，居西有一个现实的梦想，可以实现梦想：“我们必须更多地相互感兴趣，这样我们就能做好一切。”

这一看法，保守的左派高克也同意，其他地方他与社会主义左派居西没有很多共同点。高克吸着烟。以前，如果问他，对政治的梦想是什么，他大概会回答，认清和塑造正确的、好的，如今，政治对他来说是塑造“不太坏的”。

我要去看看不太坏的是什么样，也许离好的已近在咫尺。

第五章 德国制造

城际快车还没完全驶出喧嚣的大都市,年深日久、寂静无声【154】的小乡镇便开始出现了。它们的名称可以是林达、木村或沃纳。柏林的空气中还残留着一丝秋老虎的气息,而这里似乎早已成了雾霭中深秋的天下。左右两边不断地闪过终点小站,门窗钉死的车站小屋,荒芜的侧轨,生锈的车厢,电视屏幕的蓝光闪烁在傍晚的昏暗中。被流行的偏见遮住双眼的西德人的想象中,现实存在的东部就是这副样子的。

我下车的那一站,已经没有站长了,也没有候车室,没有售票窗口,只在1号站台上孤零零地竖着一部自动售票机。在那毫无生气的小楼里,好歹还得住着个人吧,他得靠吕迪格·格鲁贝(Ruediger Grube)^①付钱给他维持生计,道岔和信号得有人管。火车停靠这个外表看上去还是个车站的地方,是因为每天到150公里以外的首都去打工的人要在这里下车回家,第二天火车再把他们带到柏林去上班,行使时间一个半小时。从这里往东去莱比锡需要的时间也是这么多。赫尔茨贝尔格正好在两

^① 德国联邦铁路总裁。

个兴旺发达的城市中间,所谓兴旺实际上也只限于市内。

这些都是检票员告诉我的,他好奇地问我为什么一定要去
【155】 赫尔茨贝尔格,说他之前从没见过我,他认识经常在这条线上下车的每个人,都不需要查他们的票。火车已经停下,我没时间回答他的问题了。

引我到这里来的,是“柏林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的一份调查报告,报告中说小镇赫尔茨贝尔格是东部繁荣的大城市,如德累斯顿、莱比锡、柏林旁衰落的边缘区域的典型代表,失业率高达18%,这是勃兰登堡州的平均水平。有经验的男性技术工人和受过良好培训的青年女子都搬到有工作可找的西边去了,这里只剩下老者和没有希望的人。我在报告中读到,赫尔茨贝尔格的居民中,社会底层的人数和18—30岁之间缺少的妇女人数一样多。因而作者给他们的这份调查报告起了一个形象的名称:“男人的缺失。”

来车站接我的这个人,由于职务原因参与了对赫尔茨贝尔格的分析。米歇尔·约克尼克(Michael Oecknigk),身材魁梧,天性乐观,1990年以来领导着易北-埃爾斯特专区的这个县级城市。这位如今48岁,面包师出身的基民盟政治家在剧变时期(这里的变革也是在人民的压力下发生的)使用的坦诚语言给人留下了深刻而久远的印象,以致在第一次未经作假的地方选举中得票最高,从那以后,他一再被选为市长。

他喜欢开门见山,用不断地说服和富有感染力的激情克服阻力,紧追不等地跟在投资者后面,直到他们精疲力竭地放弃或听他的介绍,给赫尔茨贝尔格优惠的报价。对他来说没有不行这一说。

可以说,他正是西部托管人员在东德国有经济改造和私有化过程中缺少的那类东边人,比尔吉特·布罗伊尔对我提到过这样的人,可惜没法造出这样的人来,也不知道哪儿能找到他们,来完成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必要转型。“第三条道路是【156】没有的,绝对没有。”资金不缺,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应该“更多加强自身资本市场,财产积累,尤其是给予面对种种困难和问题的人们更多的安全感和自信心”。沃尔夫冈·贝尔格霍夫也持同样观点。剧变后反复提到的人民财产,其实是没有的。倒真是应该建立人民的财产,把该修缮的预制板楼优惠地卖给里面的住户。

坐在那镶着木墙裙的办公室里,市长先生好像很想在谈话中间跳起来去处理亟待办的事情。办公桌上方挂着一个十字架,它显示着这位天主教徒对他心目中的最高权威不可动摇的信任。每当约克尼克的乡亲们失去对现实的信任,对未来的希望,开始陷入东部怀旧之中时,他总是提醒他们想想1989年秋在更艰难的情形下表现出的勇气。“那时,在圣玛利亚教堂聚集了3000人,外面站着斯塔西,但胆怯的是他们,我们有勇气。”

他领导的县现在是11000人。剧变前,比现在多1400人。700人进了附近的墓地,其余很多去了遥远的西部,他们也不会再回来了。约克尼克知道这点,他不美化现实,他直面危机,但不低眉顺目,并勇敢地应对它。东德时期,为了不引起斯塔西的注意,只能默默地锻炼这种坚韧不拔的态度。新时期,他用这种态度来生存。1990年被选为市长后,他开着特拉比车去了【157】西边,为他的城市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寻找出路。

在黑森林地区他找到了生产品牌水龙头 Grohe 的企业高管,向他们介绍赫尔茨贝尔格专业技工的水平,他们掌握水龙头、淋浴器的精密加工制造技术,因为在那个已消亡的物资匮乏的国家他们就生产过这玩意儿。技术是小菜一碟,这是约克尼克的说话方式,三代都干这个,有传统的。缺的只是现代化的机器设备。脚踏实地的施瓦本人^①认真听了他的话,又实地考察了工厂,与工人交谈之后说,好,你们合适,我们来自离着不太远的东边。

如今,积累了苦涩经验的米歇尔·约克尼克变聪明了,对听到的承诺,不会再全都相信了。Grohe 的高管倒是真的来了,按照托管局制定的优惠条件接收了从前的国企水龙头厂,成了小城最主要的雇主,老厂房里有了 300 个工作岗位。这差不多正是赫尔茨贝尔格人对新时代的想象,面向西方,从废墟中重生,立即在“德国制造”的标签下完成经济上的统一。

令东边人始料不及的是,这个标签不久就贴到不在德国生产的产品上去了,它们产自世界的另一边——中国,或者产自离赫尔茨贝尔格不到 3 小时车程的地方,西德的公司罗马尼亚、匈牙利或捷克设了分厂,德国制造的费用在那里更划算。这一切超出了东边人的想象能力。他们还没完全适应市场经济和硬通货,刚精疲力竭地躺在床上,想从用期盼已久的西马克肆意消费的狂喜中恢复一下,就已经得应对下一个情人——欧元了。

【158】 随着欧元产生,欧洲开始了一场没有边界的游戏。现在上场的这位全球化先生,西德人也觉得陌生,因而对它表示怀疑。

^① 生活在黑森林地区的人是施瓦本人。

但东边人连怀疑都不知道,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它是干什么的。即使明白,在全球化的棋盘上,它们的未来也逃脱不了农民的命运。全球运作者在全世界寻找最廉价的生产地,把资金投到收益最大的地方。之后的事他们就不管了。他们留下的,不是马上就消退的洪水,而是遭到灭顶之灾的人,人们发现,水位标不再往下走了。把自己与工作认同起来的,一旦失去工作,也就失去了自我。在失去边界的劳动市场上,一旦不被需要,就会觉得自己毫无价值。在全球化先生的规划和资产表上,人这个因素,人道是没有位置的。他们只对资本这个因素感兴趣。

德国东部不少地方多年以来像赫尔茨贝尔格一样,失业率一直是两位数,这种情况在西部也早已存在。但是东部的失望更大,这一失望带来了深刻的政治后果。他们把现实情景与统一后政府所作的承诺相比较,比如会出现繁荣景象之类,而不是与之前的制度下那毫无出路的情况去比。这样一来就不是像西部那样,问题只是具体出在无能或贪婪的企业高管身上,如波鸿的诺基亚,狼堡的大众,坎普林德福特的西门子或汉堡的铝厂,而是马上对整个社会市场经济体系表示怀疑。于是,因为什么都不繁荣,“过去”便繁荣起来了。在这片泥沼中德国的蛆虫开始活跃。

它们滋养了左翼和右翼的机会主义分子。左翼的美化社会主义之过去,右翼的美化国家社会主义^①之过去,那时的国家给全民就业。两者在意识形态上虽毫不相干,但在其边缘极端分子可以合二为一。每一个公开破产的德国企业都是他们的养

① 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

料。每一个揭露出的丑闻都反映在州议会选举的得票率上。

德国经济研究所 2008 年春提交的一份调查显示,每四个德国人中就有一个属于“受贫困威胁的阶层”,几十年里一直支撑着联邦德国的中产阶级正在日益瓦解。其原因不在统一带来的费用和改革,而在于全球化。中产阶级被不断消耗,边缘阶层在扩大。国家的社会形态失衡,未来也难以有所改变。

有真才实学的,借着全球化在哪里都找得到工作,没有特殊技能的,今后只能在低工资层面运动。如果只需要简单劳动的岗位减少,未来无法再安排工作的长期失业者人数就会增多。原来他们掌握的那一点点技能,现在已不再需要了。更严重的是,经济学家认为,新千年开始以来,德国中产阶级的健康核心部分已从 64% 下降到 56%,趋势是继续下滑。

对德国东部的人来说,问题主要不在于他们自己有什么或人均住房面积少一些,据统计,西部人均 44.1 平方米,东部是 38.6 平方米,那么多预制板楼都空着,要解决住房面积倒不是【160】什么难事。他们攀比的是西边的德国人大批失业和工厂倒闭后还拥有什么。西德人有 40 年时间可以储蓄、积累自己的财产,为可能出现的危机做好储备。事实是,尽管统一后这些年里,东部的失业率一直比西部高一倍,但每户平均收入已接近西部的水平,达到西部的 90%。当然,有钱的德国人、富人,95% 以上还是在西部。

柏林的政治学者克劳斯·施罗德一直长期跟踪统一后共和国的变化并作分析,比如东、西部学生的历史知识,国家的社会状况等,他认为不满的根源在于嫉妒。第三帝国时期的纳粹党和东德的统一社会党都曾利用这个因素达到自己的目的。

“纳粹就是把老百姓煽动起来反对所谓富有的犹太人和富裕的资本家。”如今,让一部分人嫉妒另一部分人也是各个民主政党喜欢玩的把戏。

赫尔茨贝尔格是一个典型的统一病人,在它身上,既可以看到普遍的、符合德国疾病的所有症状,也可以看到治疗后的效果,就像有的医生,不听天由命而用特殊的东部方案予以治疗,注射自身的血液加强免疫系统,提高抵抗力,建立自信。赫尔茨贝尔格的家庭医生就是米歇尔·约克尼克:“我们的支柱虽然只有这个水龙头厂,但是高档龙头的销路很好,Grohe 每年交给市里的税款可达 50 万欧元,所以我们对未来并不担心。”在《赫尔茨贝尔格龙头百年,1900—2000》纪念册中,赫然记录着乐观的心情:“勃兰登堡州 Grohe 品牌项目的集中生产保证了赫尔茨贝尔格厂的未来。”

读起来着实让人放心。但是未来在 5 年后的当前就死去【161】了。蝗虫在地里可以造成怎样的灾害,赫尔茨贝尔格人在电视里见过,在《圣经》里读过,但是,蝗虫不仅在自然界有,不仅主要在遥远的非洲,经济界也有,社会上也有,而且就在欧洲,这点,市长和市民们是后来才知道的。虽然还没飞到他们身边,但是读到的有关消息已让他们心惊:世界市场卫生间龙头领先企业,年销售额 9 亿欧元,4 500 个劳动岗位,自主资本 50%,储备丰厚,可以说公司就是自家的银行。2002 年,这个家族企业被业主以不到 10 亿欧元的价格卖给了外国投资者。从此开始了蝗虫灾难,首先受害的是位于黑森林拉尔的总厂。

新业主不是用自己的钱来投资的。像通常此类交易一样,他们抽走了公司全部自主资本,用贷款支付大部分费用,由此产

生的 7.6 亿欧元债务全部落在本来健康的 Grohe 集团身上。慢慢地它不堪重负开始往下倒。三年后,收益虽一直不错,但大部分仍然要用于支付银行的利息。之后,损人利己,急于赚钱的这伙人马上以 8.25 亿欧元的价格又把 Grohe 卖给了下一群蝗虫,一下子赚了相当于实际投入数额 8 倍的钱。接着上来的这群人便把病人治死了。

2005 年,强盗们到了赫尔茨贝尔格。由于同时买下了巧妙制造的债务,他们想尽快提高赢利,好让自己手中的财产升值。【162】因此,决定把龙头的生产转移到泰国和中国去,那里不在乎劳动力,人力,人在资产表上所占费用不多。勃兰登堡州的这个厂就立刻被关闭了。工人和家属们一下子见到了以前共产党给他们描述过的资本主义的丑恶嘴脸,原来他们还根本不信。现在,他们的抗议碰上的只是些办事人员,这些人不动声色地照样完成他们的任务。真正的幕后操纵者远在开曼群岛,只是把执行者派到赫尔茨贝尔格来了。

就这样,就这么糟。

像赫尔茨贝尔格这样被骗去了未来的穷人的故事,在德国比比皆是,无论在东部还是在西部。比如 2005 年底,得克萨斯罗纳之星(Lone Star)集团的蝗虫飞到了图林根,吃掉了当地的两家自行车厂,新克尔西的萨克森双轮和北豪森的百克自行车厂。一年后,新克尔西的企业关门,半年后,有 125 个工人的北豪森厂也遭同样命运。理由很简单:缺少订单,活不下去。一派胡言!男女工人在百克车厂前反驳,占领了工厂,开始 Strick Bike,不光生产自行车,连全世界的销售也自己管了。两周后他们已经拿到了 1800 件订货,大部分都预付款。

但是这不够。被罢工的断了罢工的粮草,等着他们投降。2007年10月底,时候到了。破产管理人换了工厂的锁,车间里的机器被运往匈牙利,那里的工资低,利润高。自行车工人们虽败犹荣是不假,他们也算书写了历史,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们坚强而自豪地这样宣称,但北豪森的英雄们也不能靠传奇的名声吃饭。

蝗虫不是都来自遥远的国度,有的就在离德国边界几公里【163】的地方,他们也对可持续收成感兴趣。拥有437艘轮船和在多个欧洲国家有港口、船厂和运输公司的波兰金融投资人福杜茨·米斯特拉尔和奥德拉特兰斯买下了“德国内河船厂”,从前东德的国有垄断企业,剧变前有3000名工人,之后西德的中等企业仅以1200万马克从托管局手中买下,2007年转到波兰投资人手中。仅存的200个工作岗位主要用于管理已成为欧洲最大的内河船队。

以赫尔斯贝尔格为例,还可以讲另外一个故事,地方英雄米歇尔·约克尼克的故事。他跟他的市民们一起示威、抗议:“这时候,上面的政治家没一个人来,不管哪个党的,小市长只能一个人面对。”当他发现,示威抗议都于事无补,他的病人要陷入忧郁症时,立即决定采用有效的民间秘方,给病人下一剂猛药,这就是:总有可走的路,只有死路是白给的。

第一个药方是开发柔性旅游,在市网页上大力宣传赫尔斯贝尔格的魅力:“城市周围森林覆盖的平原上有缓缓起伏的丘陵穿过,上有各种针叶和阔叶树木,林中生长着丰富多样的蘑菇。如画的平原、湿地、湖泊、小溪以及无数古建筑,修整一新的花园、植物园以及自然保护区都盛情邀您来此散步、出游、骑车、

【164】骑马。”此外,还有一个小动物园,小天文馆和图书馆可供使用,一位热情的西边人帮助重新维修了一所宫殿,目前也已经可以参观和举办活动了。

约克尼克的网上宣传固然是个好主意,但不是所有季节都适合,11月至4月之间少有游客会愿意来林间和湿地散步。于是他马上回到日常生活中:“我们考虑,已关闭的 Grohe 厂址在市区,可以做些什么呢?不是废墟,设备齐全、状态良好。通过关系和媒体大量诸如‘蝗虫突袭赫尔茨贝尔格’之类的报道,我们找到了两家公司,答应先来看看,后来搬了进来并雇用了这里的人。从那里开始,逐步地卖给新的业主,创造了70个新的就业岗位。Grohe 厂已是历史,这一页翻过去了。”他对各种经理们的怀疑已大大增加,“只有钱到了桌子上,承诺才算兑现”。

市财政缺少税收,市长就采取一家之长的办法,因为“我只能花我有的钱”。他出售市里的地皮,暗自希望西部来的投资者在建筑计划中能建一个电影院,因为这样至少可以留住些年轻人。但最后中标的是超市,市议会里大多数在犹豫不决时没选娱乐而选了 ALDI^①,他也只能接受,民主嘛,就是这规矩。他从很多小事入手,攒在一起办大事:夜间路灯少开6小时,有人抗议。“好像我们这儿还有夜生活似的,我告诉他们说,要是夜里点灯,就得关游泳池,没人吭声了。”

最近他把年度宅用土地税提高了60欧元,又有抗议的。于
【165】是他给房产主们算了一笔账,摊到每月是多少钱,连一包香烟的钱都不到。市里的工作人员从300减到了100,他没有裁员,而

① 德国低价连锁超市的名字。

是通过签订退休合同和转岗的办法,现在一个人干从前三四个人的活。组织各种活动,让市民们感觉到,我们大家是一个整体,这个活动哪怕叫“酒馆之夜”呢,也没关系,有活动就行。

约克尼克到处去兜售他的城市,不辞劳苦,长途跋涉,利用一切机会和他建立的各种关系,当他们的邻居,勃兰登堡人2002年遭洪水灾难时,赫尔茨贝尔格人去帮助他们。市议员们本来也都站在他一边。事关生死存亡时,也就没有什么党派界限了,在小小的赫尔茨贝尔格,东部母亲的儿女们相互称你^①,直呼其名,和大柏林的莱因纳和汉斯,洛塔和理查德,格雷戈尔和沃尔夫冈一样。

赫尔茨贝尔格这个病人还远没有痊愈,这里的失业率始终还是比州府波茨坦高出两倍,18%,是全州的平均值。但是它不再是濒临死亡的病人了,已从重症监护室转到了普通病房。有时它被推到阳台上,可以呼吸新鲜空气了。“哪怕只有三个人在奔驰公司工作,”约克尼克说,“工业园里就有一颗星在闪亮。”这里毕竟还是没有多少闪亮的星,除了夜晚的苍穹,上面的星星普照全德,东部当然也不例外。

市长急着要走,还有要紧的事情。去养老院参加一个生日会,这类和他的市民们有关的活动他从不缺席。他送我到火车站。

回到未来。

悠闲舒适的普鲁士城市波茨坦离世界大都市柏林不远,本身也是个世界性的城市了。火车站里已经嗅得到有钱的味道【166】

^① 德语中有尊称您和你之区别,称你表示关系亲密。

了,但我知道,这是假象。只要一离开旅游者走的路,马上就坑坑洼洼。被当地人蔑视地叫作俄国军营的地方,看上去仍然是俄国军营的样子。勃兰登堡州长办公的宫殿,从火车站过去只需两分钟,这里通行的原则当然是重实质而不看表面,这里是执政的地方。

马蒂亚斯·普拉采克脱下外衣,挂到椅子背上,对于秘书在我们谈话时起劲地记录什么,他和我一样毫不在意。为了说清现在的情况,他给我从过去讲起,都是他亲身经历的。“1989年10月4日我们在韦伯广场的弗里德里希教堂组织了一场集会,估计参加的人会有三四百。开始前一小时,韦伯广场满了,教堂里也挤满了,集会不得不变成每小时重复一次。旁边的足球场里站满了随时准备出动的警察,但是,他们决定,外面人太多,不过去掺和了。那天晚上,我们也为东德监狱里关押的政治犯搞了募捐,收到的差不多都是纸币。这时候我们意识到,和这些人一起能成事。他们决不会后退半步,他们都知道,有录像把他们拍下来了,但根本不在乎。四个星期以后,上街的波茨坦人到了5万,当然不能与柏林的百万人相比,但按这里12万居民的人口计算已经非常多了。”

勃兰登堡州是他的家乡。革命到来前,他在这里度过了35年。革命前的经历塑造了他。和很多东边人一样,从社会交往来说,他觉得与社会主义的兄弟姐妹,尤其是匈牙利,也包括波兰或苏联更亲近。“和你们西边人说话先得解释概念,虽然我们讲的都是德语。是统一了,但还得再长长,才能长到一起【167】去。”某些政治家估计大约需要15年,“太短了”,但这是现在才知道的。真正实现德国统一,确实需要一代人,因为,到那时大

多数德国人,无论来自东部还是西部,才会有“共同的历史”。

剧变后有一段时间,普拉采克说,人都不敢说自己是东边人,好像会给新家带进传染病来似的。这一点现在改善了,因为西边也发现了,东边人并不比西边差。“东部的褐煤工人比西边的硬煤工人要辛苦。尤其是冬天,为了能供得上货,除了风雪还得担心物资的短缺和过时的技术。我们不仅应该为我们的革命感到自豪,也应该为自己之前的生活感到自豪。东德的绝大多数人是正直的。慢慢地人们也开始反思他们以往的成绩和自己的能力,连你们也明白了,除了绿灯小人^①以外,我们这边还有别的不错的东西,比如全天幼儿园,不能因为从前我们有它就成为了要受惩罚的罪行。”

女总理以其特有的简约方式证实着普拉采克的话。东德的冬天一样冷,夏天一样热,圣诞节的圣诞树会歪。安吉拉·默克尔讲起过去的时光时,既不忘记西边人的弱点,也不放过东边人的。她以可以想象到的不足——东边人,女性,新教,竟能成为基民盟这个男人集团的主席和全体德国人的总理,但她从不给自豪任何空间。她对自豪的概念,和其他大话一样,始终持有怀疑。她甚至不拔高勇敢的革命英雄们。没有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改革开放他们不可能成功地解救自己。同样,假如没有科尔的献金丑闻她也没有这般升迁,这么说,不是贬低自身的努力,而是事实如此。【168】

当年的生活之所以能够忍受下去,是因为多数人都尽可能把物质匮乏,新闻检查,国家对人的监督之类的事情排除在日常

① 人行道的绿灯标志,全德国后来都采用了东德原来使用的标志。

生活以外,就像今天有意忘掉过去一样,那时是有意忘掉眼前。“不活动的人也就感觉不到锁链”是玛丽阿娜·贝斯勒的解释。满足老百姓的基本生存要求,有工作,有住房,有饭吃,统一社会党还能做到。当他们进一步承诺进步、幸福和更高的生活水平时,就出问题了。因为现实中,人们经历的正相反,只有退步。于是不满便与日益觉醒的对自由的向往结伴了。同时,苏联正热火朝天地改革开放,加在一起就有了爆发之势。

从孩提时代开始,玛丽阿娜·贝斯勒就认识了迷人的自由之声。每个星期天,东柏林可以收到的 RIAS 广播电台都会传出朔恩贝尔格市府大楼^①自由之钟的钟声,之后便响起一个“庄严的声音”,总是这段民主的祷文:“我坚信每个人的尊严不可侵犯。我相信,上帝赋予每个人同样的享有自由的权利。我保证,对所有侵犯自由的行为和任何形式的独裁进行抵抗,无论它们出现在哪里。”当那些人开始要找她麻烦时,这声音给予她力量。如今,她掌管着那些人的档案。

曾在科学院工作的物理学家安吉拉·默克尔以一个女人特有的方式巧妙地摆脱了斯塔西要她入伙的企图,她告诉他们,很遗憾,不行,她天性话多。他们从此没有再来烦她。女总理说着笑了。权力的痕迹,作为职务的副作用在她脸上留下的沟壑似乎瞬间被抹去了,我对面坐着的是个开心的年轻姑娘。

【169】 我从和女总理的谈话中得知,东部的某些妇女比西部的更自信自觉,这是因为在那种制度下,她们承担的任务比西部重。东德时期,妇女们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也确实了不起,流水线旁集

① 当时西柏林的市政府所在地。

体劳动中的男女平等不等于下班后自家大男人也能这么做。当时那边和这里 30 个最大的德国上市公司一样,高层领导中没有一个妇女,老化的政治局里没有一个女委员。但在常见的婚姻冲突中,东边的妇女不像西边的这么容易受到养活她们的男人的威胁。据统计,东部家庭收入的 40% 来自妇女,西部只占 18%。单从数据上看,尽管东部失业率猛增,这个比例至今没有变化。

妇女必须受过良好的教育,此外还得学会耐心地等待正确的时机,打出自己的王牌。女总理以自己显然不可改变的弱势,女人,来自东部,掩藏了真实的意图和打算,长时间成功地蒙蔽了那些自信的西部男人,直到他们不再把她视为应当重视的竞争者。然后,到了正确的时刻,她便以早年锻炼出来的强势大胆,冷静地把他们甩了。可以去问科尔或梅尔茨,朔伊普勒或施托伊伯,但他们永远不会承认被一个女人打败,所以也就不多问了。

女总理的同胞普拉采克令人信服地一一列举着东德人在 1989 年秋的大转折中的成就,他们理智地行动,不受挑衅,以非暴力的方式击败了貌似不可战胜的强权。当时群众队伍中有不少熟读《圣经》的神学家和牧师,他们令人信服地说服了渴望采取行动的人们使用和平策略。从那以后,教会再没有过那么大的影响力。在描述一场重大觉醒的时候会回忆起一个个微小的胜利。环保卫生专家出身的绿党民权人士普拉采克是一步一步走向政坛的:先以业余选手身份参加圆桌会议,之后成了人民议院 90 联盟/绿党的议会党团主席,接着进入莫德罗政府,没有分管部门,后来当了选举产生的施托尔佩政府的环保部长,奥得河

第一次水灾时,他因不知疲倦的救灾工作赢得了“大坝伯爵”的称号,之后去波茨坦当了市长。最后,接前辈曼弗雷德·施托尔佩的班,2002年搬进了我们现在坐着的这间办公室。

普拉采克虽然在政治上平步青云,但始终保持本色不变。他不是那种在首都附近的政治舞台上为赢得头面人物的掌声而玩弄辞藻说空话的人。除了体力疲惫以外,渴望脚踏实地,渴望故土肯定是他毫不遗憾地辞去才担任几个月的社民党主席,回到家乡的原因。联邦政坛上这一次被认为是失败的经验,使他谦卑,也让他坚强。他自己想得很明白,脚踏实地,不用每句话都思前想后,考虑广泛影响。州长每一天都在享受生活。

他的快乐具有感染力,比如说起那个人民警察,11月9日晚上,在格里尼克大桥^①挡住他和当时的女朋友的去路并勇敢地说,即便所有通道都开放了,这条特殊通道对你们也是关闭的,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第二天,他和许许多多想往同一方向去的人们一起过了桥,警察早已不见踪影。

他没有走很远,自己也不知道走了多远,总之没到选帝侯大街,本来他是准备带着三个女儿去那儿的。“我们进了一家人家,大门敞开着,谁都可以进,大家在里面喝酒庆祝,完全陌生的人不断地相互拥抱着。有人给我的孩子们吃西边的巧克力,这我还记得。我从没见过我们这么尽兴。”第二天,他想再去一次,结果,出了院门都到不了垃圾罐那儿,所有的地方,街上,人行道上,全都停满了汽车。“只见一片汽车顶,可以从那上面一

^① 柏林的一座桥,冷战时期东西方在这里交换间谍,德国分裂时是东西柏林间的一个通道,平时始终是关闭的。

直走到西边去。真是不可想象。”

柏林墙倒塌后,安吉拉·默克尔想到那边去看看的时候,经历了类似的情况。不知是谁给她手里塞了一罐能喝的东西,想跟她为德国之夜干一杯。啤酒,除了瓶装的以外,还有罐装的,这也是西边不同于东边的地方。干杯!她虽说知道,但还从没喝过罐装的。她和母亲约好,假如柏林墙倒了,就去西柏林的凯宾斯基饭店吃生蚝,当时这只不过是一个玩笑,在那种僵硬不化的现实面前,这种想法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无党派物理学家默克尔,其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密介质中的双分子基本反应对反应速率的空间联合反应》。1989年,在那个德国的11月之夜,墙倒成为现实时,她正在住处,东柏林朔恩豪森大街的家里洗桑拿。开始她也觉得不太可能,但还是对母亲说,是该把西马克收罗收罗的时候了。她自己收拾起洗浴用品,撇下在桑拿房里继续出汗的女伴们,朝博霍姆大街过境口出发,想去看看现实存在的西柏林,在东德地图上,那块地方是一个空白点。

普拉采克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大地的本质。这甚至能确定一个准确的位置,那就是他在气候适宜时,每天在晨练路上停一停的地方,深呼吸,穿过水面看去,薄雾正冉冉升起,举目四望,无限辽阔。“对我来说,这不受任何阻碍的远眺,是很特别的,它的魅力从开始的那一天起持续至今,丝毫未减。”普拉采克是在那里长大的,至今还住在那儿。能享受到这无边的自由,他和这边那边几乎所有的人都曾觉得是根本不可能的,现在,这自由已是家常便饭。“1989年9月到1990年9月之间的那些日子,是我一生中最令人激动的时光,每个新的一天都比前一天

更让人激动,而这一天已经给人无法超越的感觉了。根本不想睡觉,就是激动得不行。”

我把他拉回到现状中来。

为什么不定一天,每年庆祝一下和平革命呢?比如10月9日,或者11月9日,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天,来取代10月3日,官方完成德国统一的那个日期。现在,西边的很多人都坚信,这一天是他们的日子,统一从根本上说是他们的功劳,就因为他们为建设东部付了钱?

是啊,普拉采克说,他有时也问自己,为什么东边的人不自信一点儿呢?“也许我们还需要几年?我默默地怀着这样的希望,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将是我们的庆典,2009年与当时的距离应该够远了,到那时我们的自豪感应该发展起来了,这自豪将把我们带入未来。”

要做到这点,那些应为历史负责的人得反思和消化好历史才行。比如京特·沙博夫斯基,曾经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就能对自己东德时期的所作所为进行自我批评,他蹲了监狱,接受判决,从没有说过这是胜者司法。他原来的同志们为此蔑视他。而他对自己毫不留情的开明态度赢得了很多人的尊重,包括女总理。不仅是 有罪的,无罪的也得无情地反思自己的生平,因为他们都被这生平打上了烙印。

有时,某些挥之不去的情感,像二等公民的感觉,原因其实很简单。比如以往的休假体验。在被允许去的黑海海边,由于是东德人,没有硬通货,连便宜的酒馆也进不去,而那些西边来的没文化的旅游者,他们的钱大概也就刚够来趟保加利亚,家里还不定怎么乱七八糟呢,就因为 有硬通货——西马克而备受宠

爱。这个二等德国人的经验他们至今到处带着走。虽然早就可以随便去意大利,去法国或世界上别的任何地方了,但很多人还是不敢去,似乎在那里还会被当作二等德国人对待。理查德·施罗德说:“东德人带着不被承认的感觉进了统一的大门”,其行为表现也是照这感觉来的。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西部的冒险家开始时在东部屡屡得手。他们一上来就摆出一副皇帝的样子,直到被骗者发觉,原来他们只是穿着皇帝的新衣。这以后,那里的人才开始反思和意识自己的能力。

比如在科特布斯附近,那是普拉采克的社民党和基民盟联合执政的州,有想象力的东边人为德国制造开发出一个特别的未来,与全球运作的能源巨头 Vattenfall 合作,复制冰川时期。作为获得褐煤露天开采权的回报,能源公司必须把开采后的地方无偿留给自然保护学者。勃兰登堡州科特布斯工业大学的 40 位学者因此得到了这块 6 公顷大的被掏空的土地,在上面以极为特别的方式进行气候研究。褐煤开采过程中,一万多年前【174】冰川时代结束时留下的沙子被翻到了上面。冰川下来时,把所有生长物都剃光了,只留下了鹅卵石,褐煤开采后的荒芜景象可与之攀比。生态体系中,后来出现的新生命没有人工辅助。渗下去的雨水积存在泥土中,形成了地下贮存水。继而出现了细菌、植物、树木、灌木和动物。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从死去的地方重新焕发生命耗费了多少岁月,如今,这些都可以在现代技术的帮助下复原出来。黄泥在下面密封住了土地,以便雨水得以积存,上面是被大机器翻出来的沙子。12 年时间,让大自然自由发挥,想长什么长什么。

在那片之前只见沙子和鹅卵石的地方,各个学科的科学家人可以描绘出将出现的青草、树木,甚至一个直径 50 米的湖。但他们还希望有更多的收获。他们需要今后有实用价值的东西和对普遍存在的问题的答案。如何应对劳齐茨干燥夏季的旱灾?如何解决阿尔卑斯山融化的积雪,总而言之,如何对未来的气候变化做好准备? Vattenfall 公司饶有兴趣地关注着科学家们特别的试验。能源公司的现任经理在为后天的接班人开发新的商业领域。

在死去的地方可以重新唤起生命,这在比特费尔德和沃尔芬已依稀可见。那个臭名昭著的化学三角,东德时期,那里晾在外面的衣服会变色,住在里面的人有气管炎,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是煤矿、电影厂和化工厂。即便在一个衰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环保被视为阶级敌人动摇东德制度的伎俩,这个地方也脏得无以复加了。就算法国北部,或比利时,或英国有强大的竞争者,比特菲尔德市在最丑陋城市的比赛中任何时候都准得第一。剧变后,真实情况大白于天下,大家义愤填膺,一切都已无可救药,只有彻底改造。

改造成功了。从前的工业区现在名叫“戈伊茨舍度假区”,清水常流,欢迎旅游。改造获得了充足的资金,各个补贴渠道共筹集了 5 000 万欧元。比特菲尔德市原有的 32 000 人口中,流失了 6 000 人,而沃尔芬的人口从 44 000 减少到了 24 000,两个被瘦身的城市患难之中立盟联姻。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典型的理智婚姻,但双方的确互利共赢。

灌满了水的褐煤露天矿大坑变成了有游船码头的湖水风景区,沿岸是沙滩、饭店,甚至还有一个露天环形剧场。在如今常

有的晴天,登上 28 米高的灯塔,可以望见 30 公里外的莱比锡。这里的成就还可以接着往下数:新建了一座市府大楼和一个游泳馆,资金来自 2002 年洪灾后获得的援助款。400 家清洁的小化工企业组成了新的化学工业园。东德遗留的有毒垃圾污染物靠全德纳税人的钱由国家负责清除,新来的企业不用管。在清洁的土地上建起了一座太阳能硅片厂,创造了近 1 500 个劳动岗位。去年一夏天来了 5 万旅游者,无不惊叹这里翻天覆地的变化。预计明年会更美好,大概会有两位数的增长。

其他城市和景区有的运气好的运气差。有些问题出在管理【176】人员的无能。比如曾被誉为东部标志性项目的奥德河畔法兰克福市的一个芯片工厂就是经营不善的典型。这里本该出产最先进的半导体,但始终就没有投产。从高速公路上望得见的废墟成了一景,死寂的大厂房和一座天桥,按照规划,每天该有 1 300 名工人走过天桥去上班。毛坯厂房静静地矗立在那里,这是打了水漂的 3 亿资本,到 2003 年底破产时已投入的资金,其中一半来自税收。只剩下为驱赶盗贼聘用的保安在较长时期内还有事可干。

遥远西部坎普-林福特明基手机制造厂的保安和他们东部的同事一样保持着高度警惕。从前职工上班时停满汽车的大停车场上,石缝间已长满了荒草。跨国公司西门子 2007 年 1 月底停止了这里的生产。结算结果:负债 12 亿欧元,债权人 4 393 位,1 700 名工人美其名曰获得自由,这是那些该对破产负责的人使用的术语。他们自己呢,即使因为管理失误被解职,也还能获得几百万的补偿金。被弃于原地的人只有自谋出路,大多数都因找不到别的工作只能领取失业救济。破产管理人马丁·普

拉格(Martin Prager)在曾经日产 60 000 部手机(可惜这些手机都没能卖出去)的厂房内,费力地把所有设备一一肢解,分别拍卖,从变电箱到标签印刷机,从桌椅到吸尘器、显微镜。

【177】 一年前,台湾手机制造商明基购买了西门子的手机部门,西门子慕尼黑总部资助了几百万。那时,令人尴尬、令公司声誉受损的行贿丑闻尚未公开,西门子是德国诚信商人,德国制造品牌的代表。当我和卡尔-海因茨·辛德勒(Karl-Heinz Schindler)一起穿过停车场往护栏方向走去时,这一切都已成为历史。辛德勒从 1997 年开始,在明基前任西门子手机部就是电工。他想让我从近处看看他以前工作过的地方。不到两分钟,就有保安问我们,有什么可以帮我们的。没有,没有他能帮的。这里谁也帮不了。

辛德勒住在一小栋双户房子里,这是 20 世纪 20 年代为矿工建的。到西门子以前,他在西部矿场每天下到 1 200 米深的地下上工,干了 18 年。矿场和西门子是北威州这个 4 万人口小城的两大保人,保证有工作和小康的生活。辛德勒给两家都卖过苦力,积累了经验。

但这也没能帮了他。51 岁的他,一夜之间就失业了。虽然他被一家转让公司聘用,拿原工资的 80%。只要是往东边转让,怎么个“转让”法儿在西边就没人再追问了。辛德勒只有自己四处发应聘信,在 80 封信泥牛入海之后,他又开始上网查询,什么地方用得着他呢?

在网上,他遇到了在康涅狄格州的一家公司,为建造一个运输中心需要专业技术人员。当我们一起在这个阴雨绵绵的 11 月下午坐在一家几乎无人的咖啡馆里时,我还没问他,他说有话

要先问我。他问我是否知道有个叫哈特福特的地方,那里除了【178】工作是否也能生活。可以,我告诉他,是个比较大的小城市,有漂亮的公园,议会大厦和著名的马克·吐温故居,作家在那里写下了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有自己的飞机场,坎普-林福特最多只有个长途汽车站。哈特福特周围的风景也很美丽,离纽约不远,很多很多年以前我去过一次,因为被处死的原子弹间谍罗森贝尔格的几个儿子改名换姓居住在那儿。

辛德勒这才告诉我,他上了一个英语班,参加了每一个提供的培训课程。尽管和班上其他年轻学员比起来,他觉得自己这老头来错了地方,但他通过了考试,大胆地准备去美国重新开始。他想把那个小房子卖了,带着夫人一起过去。儿子和女儿都已完成了教育,他们本来也马上要搬出去住了。他是个深思熟虑的人,目光警觉,用词斟酌。“我得过忧郁症,觉得自己大概没有机会了。但我从没放弃过。”

四个月以后我给他打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动身,他笑了,听起来比上次开心。他留在德国不走了,在附近找到了一个好工作,尽管他本来已不抱什么希望。这一来他可以在熟悉的环境中继续生活下去,但哈特福特一定要去一次看看,等他和夫人一起去纽约的时候吧。女儿在杜塞尔多夫的一家航空公司工作,家属可以享受便宜的机票。那个他差点要移居的城市,他还是想去看看的。

在另一个地方,同样是不指望会有奇迹发生的地方,实干家们坐在市政府没有暖气的大厅里,喝着咖啡、果汁或水,个个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这个西部来客,这家伙上巴特·施密德贝尔格来干吗?我想从他们那儿了解,包括市长,劳动局的男女官【179】

员,萨克森-安哈特地区署的专家,州经济部的代表,他们是如何做到,恰恰在这个世界尽头的东部,一年之内,把失业率从15.6%降到7.8%,而且是在没有新增企业的情况下。

很简单,他们违法操作。他们的做法是违反法律的:把国家划拨的失业救济款、住房补贴和就业促进费混到一起,然后再一起使用。但这是他们那个项目——公众工作的前提条件。主意来自自由的极端分子,基民盟萨克森-安哈特州的经济部长,莱因纳·哈泽洛夫(Reiner Haseloff)和他的女主席一样是学物理出身,所以总愿意做实验,以便获得新的认识。他和他的“拳击训练伙伴”莱因纳·博姆巴(Reiner Bomba),一个不忧愁、实干的西边人,当时是萨克森-安哈特和图林根两州职业介绍部门的最高长官,现任巴伐利亚州劳动局长,一起想出了这个办法。这个办法从理论上听起来不错:为长期失业者寻找公益劳动,每月支付他们800欧元,让一个地方协会雇佣他们,来自三个不同渠道的资金汇集在协会那里。工作虽是有期限的,但必须上社会保险。

这个乌托邦思想,如何实际操作呢?

哈泽洛夫把面前的报纸随手一推,从头讲起。这个故事他早已倒背如流,即使半夜3点叫醒他,把他拖上讲台,所有的数字他也都说得出来。

我聚精会神地听他讲。

1992—2002年,他是维滕贝格市的劳动局长。“那些当年和我一起在市场广场上心惊胆战地反抗斯塔西的人,全都成了【180】上我这儿来要工作的人。我发现,在这10年里,他们变得越来越老,头发渐渐花白,表情日益呆滞,原因就是没有工作。我们

这里没有产业结构造成的失业问题,而是制度转型决定的。这些人自己没有做错什么,却成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牺牲品。”所以,他要为他们寻找另一种解决办法。“我们觉得像是在蹬仓鼠轮,无所谓啦,不管用什么、用多少手段,我们得给人一个出路。”

他们想为工作出资而不是为失业埋单。他和博姆巴在巴特施密德贝格要干的事,要由欧盟社会基金出资,配有科学指导,这简直是异想天开。因为有一条是从一开始就明确的——没钱,除非在现有的预算内重新分配。虽然这是不允许的,用官员们的术语叫作“政策规定”不允许,但只要想干就行,哈泽洛夫想干。

在这方面,他与女总理也很一致。市长和市政府委员们对官僚主义的内容学习得越透彻,就越不愿意冒风险。管理规定第几条第几条,什么可以做,什么按照良好的德国原则不能做。“从没有这样做过啊,(要是为你破了例)谁都可以来这样要求啦。”^①从前颇为有效的借口,说是因为不了解有关规定而这么做了,在统一的官僚主义德国行不通。

任何章节条款中都没有的是人的因素。施特凡·达姆海恩(Stefan Dammhayn),巴特施密德贝格基民盟名誉市长,和给我讲述这个模式所有细节的专家们一起坐在方桌旁,一直静静地听着别人讲,其实他讲得更生动。他的正式职业是教师。“我们试验的积极成果从我教的孩子身上都能看得出来。如果父

【181】

^① 这句话是德国官员在应付老百姓时最常说的,是官员不想办事时的口头禅。

母早上起来去上班,而不是因为出去无事可做,没人等着他们,在床上翻个身接着睡,孩子们也就找回了以往那个让人安心的小世界的感觉:上班,回家,全家一起吃饭,坐在一起聊天,计划周末的活动,也许又可以省下点钱一起去度假,又可以好好过日子了。”

跟市府大楼外边的人们交谈时,几乎人人都和我谈到重又成为社会一员、终于又被需要的感觉。对他们来说,钱数的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这 800 欧元是自己的劳动所得,而不是(他们完全有资格领取的)国家的施舍。也不是从虽然有问,但还是比东边富的西边转让来的,因此必须对他们感恩戴德。西边的大多数人至少是期待东边的感激之情的,他们到底年复一年地转让了几十亿资金过来呢。然而,只要东边人处于必须感恩戴德的状态,德国大家庭中困难的姐妹关系就无法改善。

面对西部指责东部贪得无厌的不休抱怨,连基督徒理查德·施罗德都玩世不恭起来。他有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解决办法:“要是明天大地开裂,把整个东部连人带鼠一下吞进去,每年就能省 1200 亿欧元,连维护墓碑的费用都省了。”经济问题比心理问题容易解决吗?后者当然无法在转让中测量。这个问题历史学家弗里茨·施坦恩 1993 年在德美理事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问过统一总理科尔。科尔琐赘冗长的回答最后,说了一句让施坦恩吃惊的话,所以他逐字把它记了下来:“我们这儿什么都对,他们那儿什么都错的想法是愚蠢的。”这是科尔的原话。施坦恩补充说,弄清这点实在太需要了,这话科尔只公开讲过一次,只有一次。

“永远前进,从不后退”的东部口号又一次帮助人们走出牢

骚的低谷,直面现实。比尔吉特·布罗伊尔说,当年,她和其他托管局人员不得不洗耳恭听的那些愤怒的抗议,政治家们肯定都受不了,是啊,他们是所有错误的替罪羊。“但我始终觉得这也没什么。批评我也顶住了,我知道,对外他们让我们单独在大风大浪中搏击,在内部当然是支持我们的。”

那就继续前进!面对毫无出路的就业前景,图林根州长迪特·阿尔特豪斯(Dieter Althaus)要求从制度上改变税收和社会政策,绝不是偶然的。他提出实施 800 欧元的“互助公民费”,和邻州萨克森-安哈特的改革家们所做的如出一辙。阿尔特豪斯的模式要扣除 200 欧元的医保费。最后算下来和失业救济的标准持平,终身可以领取,不管个人在生活中是否另有收入。

阿尔特豪斯也主张把国家的所有转让资金集中使用,对他来说,转让是全德的,尽管始终是国内国民生产总值的 4%—5% 从西部流向东部。他对制度改革的说教也是面向全体德国人的。按他的设想,取消国家失业救济金、微型岗位、组合工资、贷学金、住房补贴,一欧元工作和交通包干补贴的支出,用这些钱为全体公民提供无附加条件的基本收入保障,不管他们自己挣多少钱,挣得多自然多上税。

这个模式改革了以往的子女费划拨,每个孩子 18 岁前每月都享有 300 欧元子女费,基本收入保障超过 67 岁后照样领取直到去世。作为养老保障就叫公民养老金。按照目前德国的人口【183】计算,需要的总费用每年约 5 830 亿欧元,可以用取消现有补贴产生的资金支付。阿尔特豪斯对税务专家,金融专家和所有市场经济学家们的反对呼声一概听而不闻。他反驳道,劳动成本会比现在降低,因为基本收入保障这部分无论对雇主还是雇员

都没有工资附加费用。此外,有关最低工资标准的辩论根本就是多余的,最低工资标准只会减少就业,而互助公民费则能创造岗位,“我们需要进行社会政策革命的勇气”。预料之中的是,政治中心柏林决定,先成立一个工作小组,研究一下东部人士的主意。

这时间可就长了去了。

巴特施密德贝格的人不想等那个自上而下的革命。他们从下面开始。试验前先做了一个调查,劳动局的一个团队把他们掌管的长期失业人员的档案仔细翻阅了一遍。那些人他们都认识,凭经验知道,谁已经认命了,看不到希望也不想看了。在那里登记的330名失业人员中,有60人,大概发现可能真要有工作了,便撤销了登记。这一来还附带着发现了懒汉。打黑工在东部不仅很普遍,而且被视为正常,原国家银行副行长,剧变后德意志银行行长埃德加·穆斯特(Edgar Most)对此最清楚。东德时期,上班的8小时里休息,下班后去打黑工,“干这他们是有训练的”。不觉得有什么不对,毕竟他们很多人1990年后无辜地成了失业者。

【184】 最后有106名候选人参加巴特施密德贝格的试点。给每人发了一份书面通知,告知有工作要给他们做。但是没有详细解释是什么样的工作。

这样做本身也是测试,收信人有没有足够的好奇心,会不会来报名呢?只要是工作,他们都愿意干吗?还是更担心又是一欧元工作,不过是为了给他们找点事做,其实他们做的事根本不需要。维腾堡专区300个岗位的应聘者达1万人之多。

好奇心还是占了上风。当他们知道会有800欧元的收入,

做的是有意义的工作,而且还可能有机会进入一级劳动市场,便一扫早已习惯的沮丧振作起来。两名妇女被安排在养老院工作,不负责护理,而是灵魂关怀,与老人聊天,给他们组织活动,或者就是倾听他们诉说。两名妇女中的一个1999年以来一直失业,另一个只是断断续续做些创造就业岗位措施提供的工作,比如敲敲马路砖什么的。后来马路也都修完了。现在已有12名妇女在养老院干活,其他人有的维护城市绿地或在残疾人工厂帮着干活,有的维护消防队的灭火器或从事城市物业管理。

项目发起者无疑得找出些至今没人想到过的工作。来此地做泥浴的疗养者会不会对这里的教堂感兴趣,如果有个人给他们开开门,并给他们讲讲这座上帝之家的历史,他们也许会很感激?果不其然。一位一直失业的女秘书当了教堂解说员。除了了解情况的当地人,谁能告诉游客,牛眼形玻璃后面是从前巴特施密德贝格市政府要员的包厢,那里有暖器,做礼拜时他们坐在那,现在成了当地摇滚乐队的排练室。失业在家的女图书馆员终于也有了用武之地,为教堂和城市制作编年表。这里的教会有千名信徒,但只有圣诞节才见得到这么多人,平时的星期天也就来个50人,这时牧师要是还站在高高的布道龛上对下面讲经布道会觉得怪怪的,于是他改为站在下面,与听众平视。【185】

原则上讲,让他们做的工作都得是“远离劳动市场的”。周工作时间为30小时,外加8小时培训。参加试验的人当中为数不多的几个挺直腰杆离开了,因为在私有企业找到了固定工作。负责组织和跟踪试验项目的管理员此前本身也是失业者,现在他们也看到了前途。这个项目不是什么大奇迹,只是个小小的,对,它改善不了40岁以上这代人贫困的晚年,由于中断了就业,

缴付的养老保险不足,只能依靠国家救助。对年轻人来说,也不是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他们或者早已迁徙他处,或者必须找到正式工作,不能出校门就进失业救济,在那里待上一辈子。

对现在参与项目的这些人来说却非常重要,他们终于又像个人样儿了。他们被需要,被投入使用,他们有事做了。当他们在当地报纸上看到,萨克森-安哈特工商会主席对巴特施密德贝格实施的公共就业表示拒绝,说它“只是一粒心理安慰剂,没有【186】长期疗效”时,只觉得好笑。对他们来说,那不是心理安慰剂,而是至少短时间内的一种治疗。至于是否有长期疗效,看吧,谁也不知道。

您为什么单单选中了巴特施密德贝格呢?这个问题部长早有准备,在我之前,刚开始试验时,有别人问过他了。第一,他最了解那里的情况,任劳动局长时,那个地区是他的管辖范围;第二,他希望稳妥,不能试验阶段就失败,回头来个说事儿的,嚷嚷国家饥不可耐抢了私企的订单。因此,巴特施密德贝格糟糕的财政状况正是试验的理想之地,因为,人均负债 2600 欧元,看不到任何隧道尽头曙光的地方,谁都知道,旧的一套做法没用了。

没有订单的地方,也就无所谓抢走订单,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哈泽洛夫说:“我们没有进行无休止的讨论,按照‘试试看,错了再说’的原则行事。”部里专家们的反对理由,从财政法上说,国家主动资助和被动资助不能混到一起,试验领导者用一个提问就反驳了:“为什么不能?”说干就干。社会政策的任务不就是关心人的疾苦吗,至少给人在想尽办法关心他们的感觉,基民盟政治家哈泽洛夫这样强调。只要想做,能做的肯定很多。如今一个失业救济领取者的收入换算一下比“我们东德时期的

工资还高,当时的工资大约只是它的83%”。尽管如此,失业者仍然把自己视为统一的输家。右翼更是利用这种情绪获得选票。

试验就在巴特施密德贝格策划,像是制定决战战略。的确是场决战,针对的是东部的绝望。的确很难取胜,因为之前失败的次数太多了。策划者们第一先通知当地企业,并同他们商量,哪些形式的工作不会影响到他们。市长施特凡·达姆海恩说,重要的是,发挥想象力,找到私有企业不允许做或不提供的工作,让“每个小协会都激动不已地想用国家的钱建个新的运动员之家之类的”。

他们做到了。劳动局终于有了一次不是管理失业的机会,局内专家们的干劲鼓舞了队伍的斗志。到目前为止,可衡量的成绩是他们自身的业绩,这成绩使他们比以往坚强,让他们,因为危机带来失业而不会失业的人,不致陷入忧郁。

巴特施密德贝格的小奇迹应该能鼓舞政治家们,在其他地方进行类似的试验。这种微型的“建设东部”只能因地制宜,只有那个地方才知道需要什么,什么最有意义。柏林有个专门负责建设东部的部长,为各新联邦州制定的宏图伟略大部分都消耗在某个不明朗的项目中了。“我们需要更多的支持,”谈到这,哈泽洛夫一反常态地提高了嗓音,最后的成绩算到哪个党头上无所谓,算到他自己的党头上也行,但是“我们最不能要的是官僚主义,跟我们说,这不行那不行,法律不允许”。

萨克森-安哈特还有六个试验在进行中,和巴特施密德贝格一样成功。不是感动世界的事情,但当地世界活动起来了。依着哈泽洛夫,公民工作最好一直干到退休。难道他不怕那些不

喜欢他这个模式的官员们会把它取消吗？联邦政府已就组合工资公布了具体设想，地方区县财政都得承担一部分呢。

【188】 哈泽洛夫一脸的厌恶。不是对我，而是他头脑中出现了某个有名有姓的熟悉人物。他不怕他们。但是他很怀疑，他讲的理由，让已经负债累累的区县再出资，否则就不能参与美妙的组合工资是毫无道理的，那些人是否能明白。有太多的条款，太多的规定都禁止。巴特施密德贝格的公民工作者想得很简单，政治家应该说，看，那儿干得很好嘛，继续干下去，不仅在东部，西部也可以，可是，政治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一切都得有序，虽然这里只剩停滞的秩序了。

谁都可以来这样要求了，我们从没这样做过。

州长沃尔夫冈·波梅尔知道，快速统一时的错误之一是把西部的官僚主义，法律法规一股脑全都照搬给了东部的兄弟姐妹。但问题是，不搬这些搬什么？没有别的。他亲身经历过在德国出台个法律需要多久，因而确信：“除了迅速行动，当时别无选择，要不永远也完成不了。”

1991年以前，波梅尔在离巴特施密德贝格三刻钟车程的维腾堡的保尔-格哈特教会医院当妇科大夫，2002年后他领导的萨克森-安哈特州里，有不少他亲手接生的孩子。这个性格内向的医生，对其西部同事的某些表现，例如自己是不可替代的那种感觉，感到很陌生，他只想尽一个基督教政治家应尽的义务。从前他帮助人到这个世界上来，现在他要帮助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他不是每天站在镜子前面问自己感觉如何的那种人。他

【189】 说：“这不是我的性格。”1989年，波梅尔是站在正义一边的，这对他来说也不值一提。他说：“我们当中没有人从运动一开始

就是为了摧毁国家,我们没有那个胆量,也没有人相信会成功。东德已是无可救药,我们也不知道。”

他是不知道。他有别的担忧,和他的职业有关。七个月前提出去西德的出差申请批准了,路上,他在汉诺威附近的一个教会机构过夜。晚餐后修女们都早早回房间了,他还不觉疲倦,坐在活动室里“看着一部无聊的电视片”,突然,电视屏幕下方闪出一行字,柏林墙打开了,接着便开始实况直播。“太震撼了,”现在他也只是简短地这样评论一句,那确实震撼了他,能震撼他的东西不多。

当政治家的想法他从来没有过,后来当了,也愿意当。现在他年事已高,如果退休,极有创意思想的莱因纳·哈泽洛夫是他的首选接班人。和默克尔一样,即使单人谈话,波梅尔也始终礼貌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距离能扩展视角,使人看到比表面更多的东西。

比如曾反复出现在报纸头版的杀婴案件,波梅尔认为是东德政策的后续后果,人工流产问题在那里从未有过像联邦德国那样激烈的公开辩论。1972年以后,人流是计划生育,甚至是【190】休假计划的工具。接着便听到指责他以此诬蔑了所有东德妇女,要求他辞职等,而这个维滕堡人,坚持自己的立场不变。他否认了把事情简单泛化的企图,以在东德当妇科医生的具体经验做说明。理查德·施罗德认为他是正确的,因为国家也把人工流产当作“提高可控劳动力消除妊娠干扰”的工具。而这种事情是不摆到桌面上来谈的,所以这种习惯,东德的秉性,一直持续至今。当然现在的杀婴案与此无关了。波梅尔在州议会的一个公开声明中澄清了这一点。

原则来说,州长先生不怕宣布不愉快的事情。至于是不是人人爱听,包括他自己党内的人,他不太在乎。虽然没人想回到东德去,但人人有事情要抱怨。“很多人根本不要再听什么原来的制度多么无效率,跟过去比,尽管有很多困难还是进步了多少之类的话。我们东边的人心太重,从这点上说我们比西德人更德国人。”他不认为这是东边人独有的问题,而是人类心理的基本结构。生活越艰难,人们越团结。

可以以香蕉为例解释东边的情形,听到香蕉一词我已经撇嘴在笑,这点没能逃过他的注意,因为在西边人眼里,香蕉和东边人总是在同一幅图画里。“假如一个厂里传开说某某地方 11 点到 12 点之间卖香蕉,有一半工人到时会去那里买,另一半帮【191】着把他们的活干了,去买香蕉的也给干活的工人带回香蕉来。这就形成了凝聚力。由于共同经历了匮乏,东德社会有一种贮藏习惯。假如瑞士或西德的人也在那样的条件下生活,也会出现同样的症状。所以说不是我们独有的。”

失业都由东德的企业关起门来自行消化。如果因材料短缺没活干了,工人们就扫三遍院子,或被任命为“社会主义侦察兵”,去寻找需要修理的机器所需的零部件。私人间常见的交易,你给我黄瓜,我给你煤砖,在国营企业经理间被称为“以货易货”,规则是一样的。当然他们交换的不是黄瓜和煤砖,而是铁轨换 W50 卡车轮胎。这种卡车至今行驶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虽然已停产快 20 年了。

不管怎么说,每个人都有工作,有房住,虽然有时有点漏,但房租极低,挣的钱一样少,但够吃饭,因为粮食是国家补贴的。直到国民经济被掏空而崩溃。剧变后至今发生的一切,走过来

的路，“不管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还是做到了很多，虽然不是奇迹，但毕竟是我没想到，我们、你们和更不用说我自己能做到的。”

波梅尔突然笑起来。他想起了和一个总喜欢以不屑的口吻刻薄评论东部的西部州长的一次相遇，那个州要是没有国家资助早破产了。他私下向我透露了一件逸事，不让我写出来。但是我俩一起嘲笑了逸事的主角、那个牛皮大王，因为我俩一样都看不上他。波梅尔当场给他算了一笔账，为了挽救那行将崩溃的州财政，他从互助捐里拿到了多少钱，而东部的纳税人也是一样缴互助捐的。那人当时就无语了。【192】

西部另外一些人用经得起推敲的数字抱怨。根据位于哈雷的经济研究所计算，迄今为止已有 1.4 万亿欧元转让到东部去了，但仍然还不够。原汉堡市长、统一后投入爱国行动在托管局任职的克劳斯·冯·多纳尼(Klaus von Dohnanyi)这样回顾托管局的工作：“每一个西德人(包括小孩和失业者)1990 年以后几乎有九个月的工作全部捐给建设东部了。”他这样说不是抱怨，只是确定事实。慕尼黑的经济学家汉斯-维尔纳·西恩(Hans-Werner Sinn)则认为，应该把“德国东部叫作第二个意大利南部”。东边该停止没完没了地再要钱了，他们想一直要到和西部的生活水平一样。是个美妙的，值得追求的目标，但不可能实现。罗马的中央政府 50 年以来一直在往南部运钱，但是南部同富裕的北部之间的差距丝毫不见缩小。

换句话说，就是接受事实、承认差别无法改变。否则只会怂恿本来已经存在的秉性，像从前一样，国家有义务全包。

很多抱怨是有道理的。对于一个生活在原边界地区的西部

市长来说,当地的企业为了拿到建设东部补贴,不顾这里损失几百个就业岗位和纳税人,把厂子搬到 100 公里外的新联邦州去

【193】这种事,实在荒谬,而他,按照持续至 2019 年、包括 1590 亿欧元的互助一揽子计划 II,还得为转移资金缴费。减少了东部的失业,却增加了西部的。

流向东部的几十亿互助捐当中的一半进入互助账户。然而,刚统一时西部公民认为不言而喻的互助,现在他们连听都不要听这个词了,因为他们自己已两手空空。再读到除了萨克森以外其他新联邦州这些年共把 150 亿欧元的互助捐偷偷用于还债而非建设时,西部公民愤怒了。

东部不是养老金高,房租低,学校班级小,铁路公路设施新吗?是这样,所以像格利茨这样的城市现在住满了从西部迁到这里来的退休者。拿 1000 欧元的养老金,在这里可以生活得更好,最佳地段新装修好的大户型住宅租金也不超过 500 欧元。如果开个几公里越过边界到波兰那边去购物,所有食品比当地已十分便宜的价格还要再低 20%。《明镜》周刊将格利茨的情况形象地比喻为“钱袋的伟哥”。在东部,这个退休者的新天堂,按照地区劳资合约,工资虽然只是西部的 75%,但人们并不在意,因为用这些钱,想要什么都能达到了。

有技术有能力的专业人员都到西部去找工作,为那里的经

【194】济发展作贡献是客观事实,同样客观的真相是,统一后最初几年里,东部新消费者的大量需求带来了西部经济热,热度退去后的西部经济与东部一样没有为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做好准备。迫于必须行动的压力,东部在某些方面甚至比西部做得还好些。与西部旷日持久的工业园区建设相比,东部的规划审批程序进行

得非常迅速。东部金属和电子工业在 10 年时间里创造了近 10 万个新岗位,这两个行业的就业人数从 30 万上升到 40 万。

西部政治家克劳斯·冯·多纳尼和东部银行家埃德加·穆斯特领导的联邦政府东部工作小组在一份详细的分析中提出了未来几年直至 2019 年互助一揽子计划 II 结束,国家资金如何使用的优化方案,他们要求修正现行政策。

到目前为止,基础设施建设已基本完成,情况良好无须再作改善,资金应投向新兴产业及相关的科研。专家提出不再采取总体地区补贴的方式而改为重点资助经济增长的核心。对中小企业,只要赢利留在内部,可以实行免税 10 年的办法。为了实施这一方案,“联邦政府必须找到更好的组织形式,改善各联邦部之间的协调和决议的执行情况。比较可行的方式是,联邦政府任命一位专员,专门负责此项任务的协调。一个由了解情况的实干家组成的委员会辅助他的工作。”

2004 年 6 月他们把这份报告交给了当时的联邦总理施罗德。有一张合影和不少褒奖之词。至于这份报告最后遗失在哪个官员的哪个抽屉里,作者们不得而知。他们的印象是,很多人都同意这印象,至少现任东部建设部长从不知有此事或没读过其内容。【195】

真有什么值得惊异的地方,一枝独秀的地方,大多是没有政治介入的地方,是企业自己的勇敢行为。东部最东北边的小城托格罗的铸铁厂经历了三次倒闭,最后终于来了一位,决心把它搞好而不是仅为个人大捞一把的人。来的是个奥地利人。2003 到 2007 年,销售额从区区 500 万提高到 9 000 万,原来仅有 50 人的小厂现在有了 600 名员工。附近的罗斯托克港也报来两位

数的增长,这可是在最贫困的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啊。这个州的平均年收入是2.5万欧元,几乎是全德排名的最末,但是在最受德国人欢迎的度假地排名表上,梅-前州已取代了巴伐利亚。他们的经济年增长是4%,为此非常自豪。脚踏实地、正直诚恳但不好打交道的州长哈拉尔特·林斯托弗(Harald Ringstorff)没有忘记说明,他们州对全德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只占1.4%。

另外还有一些东边人,勇敢地跑到西边,去证明自己比当地的竞争对手强。从前的德累斯顿 Konsum 商业集团在法兰克地区的埃尔兰根落了脚,抱着“Konsum 走向西部”的宗旨开始建功立业。成功了!这是第一条总部在东边而发展到西边去的商业链。东德时期有20个商业合作社,经营几千家商场、食品店和餐馆。当年它们的共同之处是,顾客想要的东西总是没有。因此,这样一座建在沙滩上的大厦统一后不久就倒塌了。而德

【196】累斯顿商业集团的员工们反对破产,转换了经营模式。不再供应便宜货(据说东部的商店不卖便宜货生存不下去),提高商品档次,谦虚地先从 Konsum 鲜鱼市场起步,取得成绩后,再从只在纸上存在的几千家小分店中挑出了42家,把它们挽救进了21世纪。

现在他们在东部已消灭了赤字,觉得有足够的力量进军西部了,领头的是位略带口音的萨克森人。这位企业家的生平不能算典型,因为他在东德变革前已被批准出境,在西部世界辗转多地,增强练就了自信之后又回到从前的、现已自由的家乡,开始创业。

工作是抵抗某些煽动者那散发着臭气的口号的最佳武器。政治也可以就这么简单。这么简单?沃尔夫冈·波梅尔点点

头,说:“如果我们能减少失业,提高生活水平,极端分子就无机可乘了。我们不是一个政治化的社会,而是一个注重自身幸福的社会。如果大家的日子都过得好了,右翼的日子就越来越难过了。”他的同事,另一个目前还是大党——社民党的州长普拉采克补充说,虽然不是一个人有了工作就自动不会成为纳粹了,但是,“假如父母有工作,家庭的发展状况就不一样”。这样,纳粹就失去了滋生的基础。

他们俩都知道,要到达这个目的地,前面的路还很长。顽固不化者不仅存在于萨克森-安哈特和勃兰登堡州,同样存在于萨克森和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这是东部很现实的一个危险。

我登上了火车。往后,回到过去,向前,进入新纳粹群落。

第六章 右边下车：邻家的纳粹小伙儿

【197】 不流血的革命发生后，新老纳粹们也高唱着战歌纷纷涌向统一后的辽阔原野，他们的指挥是训练有素的战术家，让这些头脑简单的人预先已联合起来作了准备，现在一起上路了。在最底层，本该属于一体的德国西部的蠢货和德国东部的蠢货已经融为一体了。维利·勃兰特要是地下有知，非从墓里伸出拳来不可：柏林墙倒塌那天，他激情四射地宣布的民族融合的愿景，首先由极右分子实现了。勃兰特的这个讲话已成为德国政治家演讲中的一个经典。偏偏是这位社民党左派与之战斗了一生的那些人，偏偏是民族的反动派先做到了，他们的纳粹祖先曾把这位流亡者和坚定的爱国者作为民族叛徒加以仇视和迫害。

现在徒子徒孙们登场了：光头、年轻、男性居多，摇旗呐喊，随时准备动武。他们不会削弱民主，反倒可能促进呢，因为普通老百姓见了这种暴力群体害怕，不想跟他们有任何瓜葛，就是找上门来按铃，也不会给开门。在与右翼作战的战场上，可以称之为一朵小小的希望之花的是这条消息：民调显示，拒绝任何形式的武力和暴力的人数第一次超过了50%。这么说来，大多数德国人还是天性和平的。

年轻人当中的暴力倾向始终不减,东部占 34%,西部占 19%。行暴方式也越来越残酷。与 2006 年相比,2007 年右翼暴力受害人数增加了 25%,达到 500 多人。国外对统一后新联邦州内新纳粹找到家园并进入州议会的担忧一直在增加,但是,欧洲其他国家不也都存在极右分子滋生的土壤吗?意大利的、法国的、比利时的或英国的纳粹和自家门里的同样令人厌恶,同样残暴,但无论对那里还是这里的民主制度都没有什么危险。

事实果真如此吗?

仅光头和系带长靴已不是识别新纳粹的标记了。受害者咨询中心的专家们认为,具有右翼极端倾向的年轻人所穿服装的牌子更具典型意义,比如 Pit Bull, Thor Steinar, Lonsdale, Consdaple。另外,88 这个数字是青年纳粹用来表达信仰的暗号,88 的意思是重复字母表中排第八的字母,即 HH,是“*Heil Hitler*(希特勒万岁)”的缩写。无论是 2007 年海利根达姆反对 G8 峰会的示威,还是 2008 年汉堡的 5 月骚乱,褐衫党对外都伪装成黑色集团的模样,黑衣黑帽,黑色太阳镜。由于反法西斯组织对新法西斯进行了系统侦查而随时掌握他们的动态,黑色集团常在同伙袭击左翼青年时迅速赶到并大打出手,因此被称为反一反法西斯派。他们自称是 NSBB,这是德文和英文混合起来的一个名称:“国家社会主义黑色集团(*national sozialistischer black block*)。”

了解历史上法西斯,尤其是德国法西斯罪行的人,应该对法西斯病毒的侵袭具有免疫力才是。知识应该使人头脑清醒。就是说问题可以通过说明真相来解决,按照这个公式,那么,人民受教育程度越高,仇外说教者的机会就越少?或者说右翼政党

在新联邦州有这么多响应者是因为东部的选民比西部的愚钝？他们恰恰在反法西斯教育在学校进行了 40 年的地方赢得成千上万张选票，是因为了解真相的人早已大批离开了这个工农的国家（柏林墙建立前离开的人就有 200 多万），使得那里失去了建立文明社会的土壤？难道智商越低就越容易赞成新纳粹？

表面看来似乎有理。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赞成如下这类说法的就越少：什么不时有个强权领袖对一个国家有好处啊，什么在某种情况下专制制度更好啊，什么纳粹统治下也不是一切都坏啊，甚至于，假如不是杀害了 600 万犹太人，希特勒可以算作一个有影响的政治家，等等。

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受教育并不能保护人不受纳粹影响。百分之几的极右分子左右不了一个强大的民主制度。只是他们提出的强势国家，权威领导人，“德国属于德国人”、“外国人滚出去”等愚蠢口号在某些自视为民族精英的人那里也同样找到了知音。

莱比锡大学媒体科学研究所兼职教授迈克尔·弗里德利希·福格特 (Michael Friedrich Vogt)，在学生们揭露了他的真实【200】信仰后才被解职。学生们在欧洲议会一个极右党团的同情者网站上发现了他的名字。在那里，人们把他和德意志人民同盟 (DVU) 主席格哈特·弗莱 (Gerhard Frey) 以及德意志国家民主党 (NPD)^① 主席乌多·福伊格特 (Udo Voigt) 并列在一起。名称为“认同、传统与主权”的这个欧洲议会中的极右党团 2007 年 11 月以前一直非常活跃，后因意见分歧才在争吵中分崩离析。

^① NPD 和 DVU 是德国两个最大的极右政党。

在社会的极右边缘，福格特很有人缘。最受新纳粹欢迎的是他拍的纪录片《赫斯^①秘密档案》，他的合伙人是臭名昭著的萨克森国家民主党议会党团顾问。福格特在莱比锡教书近 10 年。任教期间显然没人发现他到底是什么人，他的上司也同样。在这个右翼分子被揭露和解职时，研究所领导发表的一份颇为尴尬的声明中说，对福格特的指责仅限于他“大学以外的行为”。

纳粹思想垃圾只在不会思考的人那里有市场纯属无稽之谈。有关右翼极端主义题目的民调显示，9% 的人，有东部的也有西部的，有受教育多的也有少的，不反对生活在一个专制制度下。东部在这方面的秘密比例数字高于西部，可能是因为那里整整一代人一辈子没有经历过别的制度，无论什么颜色的，褐色的或红色的，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必须适应那个制度并与其合作。

东部的德国人更容易接受极右口号、随时愿意对信念不同或相貌不同的人动武的说法也得到很多数据的支持。这种失衡的状况不仅与年龄有关，更多是来自这样一种感觉，不少既得利益者大发统一财，而更多的人却没能从统一中获益。东边很多人日子过得不好的说法是有争议的，但说人人都比 1990 年以前过得好也同样有争议。还有，西边也不是人人都过得好，很多人比统一前还差了。全国人口的 1/5，东部登记在册的 1 670 万德国人中有一半赞同极右暴力分子。【201】

理查德·施罗德言辞激烈地反驳说，这不是 1990 年后的巨大变化所带来的特殊后果，不能仅因为“那里的暴力倾向已经

^① 全名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纳粹副元首，是战后被关押时间最长的纳粹战犯(42 年)，因而成为新纳粹的偶像。

和祖父时代相差无几,具有强烈的德国民族主义色彩”就把东部妖魔化。东德时期就存在右翼暴徒组织,在格特泽玛内教堂发生过光头党袭击朋克音乐会听众的事件,也有人民军军官庆祝希特勒生日的。贝斯勒局记录着 1 067 名引起注意后被判刑的极右分子的名字。施罗德认为,德国最根本的鼠疫是“纳粹思想,霍乱是年轻人的残暴,包括发生在他们相互之间的。这方面东部确实比西部广泛和严重。因为西部的正义感和文明程度还是比较高吧”。因而,每三个西德人中有一个坚信民主的力量(已经够糟了),而东部每两个人中有一个怀疑它,就不是偶然的了。

民调中,东、西部愿意选极右政党的人数比例没有什么区别。十年前,萨克森-安哈特州和巴-符滕堡州同为 11%,巴伐利亚和图林根都是 9%。但是一进了投票室真要表态就开始分道扬镳了。最近举行的几次选举中,在老联邦各州,极右政党只在不来梅进入了州议会,因为德意志人民同盟在传统的民族主义情绪严重的不来梅港超过了 5%,可以出一名代表进入议会。其实从全市(州)^①看,不来梅港算在里面,他们只得到略高于【202】2%的选票。西部其他联邦州过去曾有过共和党或国家民主党州议员的地方,现在新纳粹都已被荡涤殆尽。但在区县层面还没有完全被清除。200 名极右议员中 3/4 是在西部当选的。

寻找工作的人大批离开东部地区,褐色政党在荒芜的土地上大肆扩张。国家民主党和德意志人民同盟在勃兰登堡,梅克

^① 不来梅既是一个城市也是一个联邦州,首都柏林和汉堡也属这种情况。

伦堡-前波莫瑞,尤其是在萨克森州大举挺进,最近竟达 9.2% 的得票率,绝对数字为 19 万张选票,仅落后于社民党 0.6%。2008 年初夏,萨克森县级选举中国家民主党的得票率与上次选举相比增加了四倍,达到 5.1%,进入了所有县级议会。

由于明显的无能,这些人很快便失去了魔力,其他政党,从基民盟到民主社会主义党,从正直的保守派到诚实的左派,都在德累斯顿的州议会里孤立他们,拒绝同他们合作,让他们受到了应有的对待。这些虽是事实,但仍然没有理由放松警惕。新纳粹从来也没有打算在议会中做什么,他们是想利用由此得到的资金来扩大在东部的组织。这样他们可以在各个小地方的政府办公室装扮成和蔼可亲的邻居,不是去骚扰袭击,而是通过关心帮助赢得新的支持者。

这种双重手段正是他们的策略。一方面嘴上说反对暴力以赢得平庸、普通的德国人的支持,这些德国人虽然想的和他们一样,但是不愿意和右翼暴徒有关系。另一方面通过威胁和暴力行动推行所谓民族解放区,这使那些郁闷沮丧就想打架的年轻人着迷,对他们有魔法般的吸引力。以建立右翼人民战线为目标的党建工作领导干部都是西边培训出来的。东部新纳粹组织网 12 个幕后操纵者中的 9 个来自西部老联邦州,其中不乏多次因煽动民众和严重伤害罪被判刑者。暴力行动、斗殴、袭击、追打之类的事情都交给东边的当地人去干,出了事可以跟肇事者划清界限,洗净脏手重获清白。但共同的目标始终存在。2004 年,乌多·福伊格特在右翼中央刊物《青年自由》上宣称:“要像 15 年前东德人民解决东德一样解决掉西德。”

新联邦州内具有右翼背景的暴力行为比西部多出 3 倍,现

在,它几乎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在马格德堡附近的小村波莫尔特的汽车站上,5个年轻人逼迫一个12岁的孩子舔他们的系带皮靴,之后他们又把他毒打了一顿,只是因为黝黑的肤色他就成了种族主义分子施暴的对象。另一个男孩在回家的路上遭新纳粹痛殴,但他父母因害怕报复不敢报警。她母亲虽然找了一个流动咨询队寻求帮助,这类咨询队在东部到处都有,但年复一年要能够在第一线开展工作争取资金。这位母亲对暴徒们的恐惧大于对发生在儿子身上的事情的气愤。

在泽尔布斯特的一个民间节日上,一个16岁的男孩因为穿了一件印有“反对纳粹”字样的T恤被打瞎了一只眼睛。当地警察一开始把事情判为年轻人之间的争斗,直到受害者的朋友【204】们公开抗议这种大事化小的做法,国家机器才不情愿地真正介入,抓获凶手,判了8年。这类例子不一而足:一位35岁的男子在东海海滩因抱怨新纳粹令人作呕的嚎歌被他们毒打;一个大学生在新纳粹聚会点前遭袭,袭击他的人当中就有国家民主党州议会党团的工作人员;开姆尼茨一家商场内,一位带着孩子的阿富汗年轻母亲先是被辱骂,叫她滚回老家去,接着被推下了楼梯;一个意大利人在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的小城吕伯特恩的一家酒馆被3名联邦军士兵谩骂和毒打。这些都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们的反应常常是麻木不仁。

上了头版,以大标题报道过的只有这样一件事:一个犯罪团伙,在萨克森的米格尔老城节后追打印度商贩,两个警察不但没能阻止,反而和被追打者一起被困在一家比萨饼店的地下室里,外面的乌合之众试图破门,里面的心惊胆战地坚持,直到凌晨两点,警察队长安德烈亚斯·莱因哈德(Andreas Reihard)调来的

增援赶到才驱散了那帮坏蛋。

在哈尔贝尔城,14个年轻人,其中包括当地剧院的演员,遭纳粹暴徒的突然袭击,其中一部分受了重伤。接到报警赶来的警察首先登记受害者的名字和住址而根本不管在一旁狞笑着看热闹的施害者。后来总算也询问了他们,但问完马上就放他们走了。警察队长根本没来现场,向围观行人提问时,个个都说什么也没看见。

“一点也不奇怪,这就是这个城市的现状。”几天后,“哈尔贝尔城非暴力公民联盟”在市政府碰头时,剧院经理如是说。【205】第一,这个小城市之前就比其他地方因右翼暴行多而出名;第二,必须承认,市内不少地方,夜间是不安全的,比如加油站、火车站以及新纳粹喜欢集结的地方。受到跨地区报刊和电视报道提醒的司法机关在2007年6月突袭发生后几天宣布抓获了四名嫌疑人。其中一个承认了一切,另外三个,身穿Lonsdale毛衫和军服,在10月份开始的法庭审判中一言不发。2008年5月底法庭宣布了判决,因证据不足,三名保持沉默的被告无罪释放,这完全是警方在突袭事件发生后调查不利造成的。认罪的那名因有前科被判两年。可以这么说,在萨克森-安哈特州,如果遭遇右翼分子袭击,施害者大部分都能逍遥法外。

然而每一个犯罪学家都知道,在与暴力犯罪所作的斗争中,最重要的是尽可能在第一时间进行审判,在法律许可的框架内施予足够威慑力的惩罚。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都不需要更严格的法律,只需要更敏锐的意识。

前政府发言人乌维-卡斯滕·海尔(Uwe-Karsten Heye)担任了反对排外协会的主席,口号为“表态!向世界开放德国行

动”，主张文明社会的抵抗，因为纳粹不是一夜之间从天而降的，而是生长在社会当中，学校、家庭、工作岗位，精神与道德上长时间的失控和不作为给予民主的敌人可乘之机，他们用尽一切办法破坏民主制度，哪怕只是点点滴滴的得手，比如审判极右【206】暴力分子的法庭上，读到证人的名字和地址时，坐在听众席上的光头会把这些记录下来作为下一次袭击的对象。全德都有积极行动着的协会，其资金完全依靠捐款和会员的会费，他们在学校举办专题活动周，在电影和电视里放宣传片，书写大字标语牌。政界、经济界、媒体和文化界的很多名人都参与进来了，表明自己的态度，比如迈布丽特·伊尔纳（Maybritt Illner）^①说：“反对右翼必须表明态度，面对不宽容绝不能宽容。”公共媒体如《时代》周报、《明镜》周刊和德国电视二台一起与德国消防协会、德甲联赛和德国足协等伙伴联手建立了合作网络，用实际行动与极右分子作斗争，而不是仅满足于说几句表示气愤、震惊的空话。在足协的低等级联赛中，不仅有新纳粹混迹其中，而且经常动武斗殴。

不时有这样的情形发生：某个地方举行城市或乡村节，突然就来了40、50、60个狂呼乱叫的新纳粹，一下就占领了其他人出于恐惧让出的地方，而邻桌的乡绅名流们只管默不作声、尴尬地继续喝酒，不对这些无赖作任何抵抗，也不拨打免费的110报警。

警察也不是总能及时赶到现场，他们对付极右分子的积极性也不那么高，不像勃兰登堡州我非常欣赏的那个流动支队，给我介绍情况的警官告诉我，在警察内部，他们被同事们称为“恐

^① 著名电视主持人。

惧与威慑处”，在外面，由于他们强有力的斗争，纳粹流氓们确实受到威慑，被制服了。一年后勃兰登堡州的暴力事件减少了一半。

萨克森-安哈特是青年新纳粹暴力行为最猖獗的州，这个不可否认的问题在那里也得到了“解决”。根据记录，在一次工作会议上，某领导要求，今后只有明确的极右犯罪才进入刑事案件统计。内政部发言人称，喊“胜利万岁”的口号、举“卐”字旗和播放霍斯特-魏塞尔(Horst Wessel)之歌等政治上都不能算作明确的极右。直至这一人为操纵的事实曝光，2007年的统计数字中犯罪行为突然减少了一半。原来这不是全国开展“睁大眼睛注意看”行动的结果，这个行动号召全体公民勇敢地同右翼作斗争，而是来自内部指示的“视而不见”。【207】

那些不那么耸人听闻的袭击事件，只在不同的公民倡议组织“民主、人道与宽容”的报告中还能读到一些。比如年轻姑娘蕾贝卡，据她讲，因为保护一个5岁的小女孩，3名新纳粹要把一个“卐”字刺到她皮肤上，围观的路人没有一个站出来说话，受害者也上不了跨地区大报的头版。对犯罪行为的每一丝怀疑，都被新纳粹利用起来把自己装扮成受迫害的无辜羔羊。上面的事件中即是如此，18岁的蕾贝卡反而因涉嫌谎报而受到调查。

记者们能把无法想象的事情很快就当作可以想象的接受下来这点，在萨克森小城塞卜尼茨得到了证实。据说1997年夏有50个新纳粹在市露天游泳场淹死了一个孩子，在场的很多游泳者都看到了，但没有一人想到出来帮助或至少报个警。事件就被算作孩子溺水身亡的意外事故不了了之了。3年后，这件当地人人都想隐瞒的事件上了头版头条，但是，没有一句是真话，

【208】 整个令人愤慨的故事全是捏造的。原因是记者没有遵守他们的职业规则——什么也不能立刻相信,但一切皆有可能,因为记者在真正开始他们的调查前没有寻找为什么这种事情不太可能发生的证据。即使找不到证据,他们也会把这个所谓的丑闻作为黑暗东部的典型事件加以描写和发表。

“但随时都有可能发生”,《Taz》报上紧接着出现的这幅标题不说切中要害,也至少是说出了西部大部分读者对他们新加入的德国兄弟们的精神状态的看法。

东部的暴力倾向确实比西部高。1990年以来至少有100人被极右分子杀害。第一个被害者是安哥拉人阿玛德·安托尼奥(Amadeu Antonio),1990年11月在艾波斯瓦尔德被新纳粹殴打致死。施害者最高被判了四年,有的监外执行,因为最后无法确认他们当中是谁打了致命的几拳。一个以受害者命名的基金会从那以后一直在为“加强社会文明”而斗争。

谁的肤色与其德国邻居不同的话,在阴暗德国的某些地方,天黑时最好待在家里别出门。有色人种开车上路,最好在西边把油加满,避开新纳粹喜欢的聚集点——东边那些加油站。

宪法保卫局极右暴力行为的列表上,萨克森-安哈特和勃兰登堡仍然名列前茅,尽管勃兰登堡州在这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在前九名中,柏林和另外五个新联邦州悉数在列。虽然统计数字证明,按新联邦州的总人口计算,那里明显具有极右背景的暴力犯罪比西部高三倍;虽然令人诧异,偏偏是从前很少有外国人居住、现在也只有2%外国人的东德地区,被询问的人当中43%都排外,西部是35%;更多的东部德国人认为德国在国际舞台上应该表现得更加自信才是。

但是，如果涉及历史上的纳粹罪行，老联邦州调查结果中令人震惊的种种说法的百分比一下就上去了，高得让民主派惊得透不过气来。无论是不是高中毕业文化程度的，都有人认为如今犹太人势力和影响还是太大，犹太人比其他人更多地使用狡诈手段达到目的。赞同这类反犹看法的人在西部比在东部多两倍。对纳粹的轻描淡写正符合西部潜在的反犹主义。2002年柏林自由大学和莱比锡大学附属医院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系共同开展的一项调查中，分别询问了东部的1001人和西部的1050人，结果显示出人意外的差别。“假如不杀害犹太人，希特勒可以被视为一个伟大的领导人”这句话，在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东部德国人中也只有9%表示同意，而在西部同等教育程度的兄弟姐妹们当中竟高达21%。高中毕业的人当中，西部同意这种看法的比东部高出三倍。

高学历并不意味着自动具有人文主义思想，能按照道德标准生活和不受纳粹诱惑，这早已不是什么新认识。有关第三帝国的支柱，文职凶手和集中营指挥官们的材料曝光后，人们就已经明白了，这些自视为精神精英的人，其实和那些没教养的同党一样，也是以元首名义进行大屠杀的自愿执行者。1945年解放【210】后，他们也没有刻意回避自己的罪行，因为大部分根本没有负罪感，所以能做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好像他们手上没有沾过鲜血，就这么回到了文明社会的正常生活中，积极参与联邦德国的建设，像数年前积极参与建立奥斯维辛和特雷西城^①一样。

^① 这两个都是臭名昭著的纳粹集中营，曾有无数犹太人、抵抗战士和其他人在那里惨遭杀害。

看来西部和东部的土壤同样肥沃。一边是反犹主义和把纳粹罪行缩小化；另一边则是排外和崇尚强权。新联邦州内受敌视情绪驱使的袭击事件更引人注目。按照统计，那里平均每天有三起袭击外国人的事件发生，从辱骂到追打，乌克马柯的滕普林教堂里或德累斯顿足球赛场上“（纳粹）胜利万岁”的口号声；埃尔森胡腾市发生的把“卐”字刻到犹太人墓碑上以及在普雷岑（又是萨克森-安哈特）民间节日上焚烧“异类”，包括美国国旗和《安妮日记》。当过东德人民军军官的普雷岑市长当时还是左翼党党员（此后左翼党把他开除了）和其他 80 名市民一起坐视不管，直到一名勇敢的妇女站出来干涉才结束了新纳粹的这场闹剧。这些都是亵渎民主与正义已成家常便饭的反映。

新纳粹在东部之所以能扩张，是不是因为他们对邻居们内心的秘密支持很有把握？知道爷爷们站在路边，看着他们列队大步走过会赞同地鼓掌；而在西部，新纳粹很少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跑出来活动，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受到不会保持沉默的大多数民众蔑视的。当索林根和莫尔恩的外国人被新纳粹施暴时，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团结一致，在慕尼黑，在汉堡组成烛光链，抗议极右暴行。这些德国人因此比另外的德国人好吗？

由于藏身于互联网中，不再那么引人注目，他们已建立了几百个煽动性的极右网页，趋势在继续上升，宪法保卫局很难找到这些投毒者，鼓吹暴力的网站存在国外的服务器上，不在德国司法部门的管辖内。

找一位称职的法律专家谈谈这个问题一定对我颇有裨益。

东部就有这么一位。

勃兰登堡州检察长在公开场合露面时总是戴着领结。在他

的法律同行中,他不仅在外表上,更以从不美化事实的仗义执言而与众不同。在我去找他的这个夏日,他的衬衫领口敞开着,没有戴领结,长发,嘴上的胡子乱蓬蓬的。艾拉多·克里斯托夫罗·劳滕贝尔格出生在阿根廷,他那悦耳的名字可以显示这点,在德国西部长大和接受教育,大学读了法律。1992年,尽管在优美的卡尔斯鲁厄市联邦最高法院任职的他正前程似锦,但他毅然从西部巴登来到了未经开发的东部勃兰登堡。新生事物——统一带来的冒险吸引着他。这位崇拜 E. T. A. 霍夫曼^①的浪漫派人物到诺伊鲁平当了检察官,1996年以来,时年43岁的他成为州最高公诉人。

20世纪90年代西部许多公务员来东部“新大陆”任职,被人称颂为统一之初的爱国者。劳滕贝尔格比大多数官员高一个等级,那些人只是为了在东部建立一个有效的管理体系。效仿经济界不好的榜样,国家机关的头头们不是总把最好的人派过去,公共广播电视台也是这样,借此机会处理那些大家都恨不得他们快点调走的人。被派到穷亲戚那儿去的可以得到1400马克的额外免税补贴,被他们玩世不恭地称为“荒野补贴”。可以想象那边听了这话会怎么想,因为“荒野”指的是东德,所以生活在那里的人都成了“野人”。平庸的法官,可疑的冒险家到那儿成了高人一等的德国人,在某个比萨饼店,某个妓院跟他们本该调查的对象结成了同盟。

新纳粹也从这股由高傲、自以为是、腐败和无能组成的浊气中吸取佐料烹制褐色高汤分发给人民。由于执政者的失职,缺

^① 德国著名作家(1776—1822年),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人物。

乏政治榜样的地方，旁门左道便成功登场了。

劳滕贝尔格对此最清楚。尽管如此，这个有着优美的、非德国式名字的法学家还是坚信民主之力量。他的工作需要这样的信念。否则他早听天由命，拿上一本书，首选 E. T. A. 霍夫曼或特奥多尔·冯塔纳^①，隐居乡间了。由于职务关系，他从秘密渠道知道，在勃兰登堡州，问题不在于仅仅是国家机器要给予光头暴徒及时、持续有效的打击，而在于需要认识到，新纳粹已经从

【213】右翼边缘进入和到达了东部社会的中间阶层。这样他们的危险性就更大，因为外表上他们不像年轻的新纳粹那么令人反感。他的同事、勃兰登堡州宪法保卫局局长温弗里德·施莱伯（Winfried Schreiber）提醒道，下次选举中，不要被极右候选人那温文尔雅的表现所迷惑，因为他们一眼看去不像是极右分子。豺狼已经开始藏起利爪，披上羊皮了。

全德 12 个联邦州里的 5 个，涉及整个东部地区，都有魏玛共和国时期^②的味道，因为和当年一样，现在这里也缺少有战斗力的民主派，这样说，我这个来自汉堡的人觉得未免夸张。汉堡有着成熟、健全的文明社会，不存在纳粹组织结构。但我马上意识到没有理由骄傲。就在几年以前，在自由的汉萨城市超过 19% 的选民把他们的选票投给了罗兰特·席尔（Roland Schill）的右翼党，导致这个可恶的地方法院法官（据他自己说，他把黑人被告总是判得比纯种的案犯重）成为基民盟和自民党联合执

① 德国著名作家（1810—1898 年），生活和创作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勃兰登堡州。

② 魏玛共和国时期（1919—1933 年），德国历史上希特勒上台前的一段时期。

政中的内政委员和第二副市长。这事令正直的汉萨人至今汗颜。后来，他企图以同性恋取向来要挟市长欧勒·冯·博伊斯特(Ole von Beust)，被解职后移居到巴西去了。1945年，另一代纳粹就有逃到那儿去的，在那里觉得安全吧。

仗义执言需要培养和锻炼。1989年秋，东部德国人证明过，它也可以一夜之间突然出现，那是在反抗成为最后出路的情况下，之后的情形不会比现实存在的更糟。但不久，在新联邦州便显现出，柏林墙造成的缺乏开放，二等公民的感觉造成的缺乏自信，压制甚至惩罚个性的国家绝对权威造成的心灵扭曲在决定和支配着很多东部德国人的言行。解放以前的时代越消逝，自由之风越猛烈，他们便越美化过去的集体所提供的那股温暖的浊气，视其为舒适的微风，再掺和上纳粹口号。【214】

极右分子给被冷酷的资本主义整得不知所措的人们布置所期盼的温暖小巢，把木板钉在他们眼前，挡住外面来的视线，所谓统一的输家便躲进这个封闭的空间。新纳粹将社会主义小市民的浊气和他们的民族主义口号结合起来，仇外、排外和种族主义高居他们德意志价值观的榜首，完全符合他们丑陋的世界观。

选举中，不仅右翼从中获益。只要能利用适合的概念，左翼也能把盛行的气候变为选票。来自西部的政治家波多·拉梅洛(Bodo Ramelow)知道：“为数不少的选民把他们的第一票投给民社党，第二票给新纳粹国家民主党。”社民党前主席奥斯卡·拉封丹(Oskar Lafontaine)这个聪明人当然知道，几年前的选战中，他为左翼党将客籍工人的概念换成“外国工人”，要迎合的是何种偏见。凡是沾外字的，陌生的东西都具危险性，当年纳粹就已认识到这点并充分利用人们的恐惧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与

西部左翼结有友谊的东部左翼格雷戈尔·居西曾公开批评过拉封丹,后来又改口道歉了。

居西毫不否认,东部以排外为动机的刑事犯罪高于西部两【215】倍。他冷静地分析形势后指出了原因:“东部德国人觉得自己是二等公民,于是很多人想找出三等公民来,这样他们就觉得自己是上等人了。极右分子便无偿提供这种错误的自信,告诉这些人,从出生你就比其他几十亿人都高贵,因为你是德国人。”

新纳粹把事情简单化得可怕,更可怕的是就有那么多人上他们的当。利用对过去集体主义的怀念,组成战友会之类,有一个头头指挥一切,这种形式很受欢迎。居西认为:“有些地区,其他政党,包括我们,都不存在了,右翼便跑进去,他们很可怕。与1933年不同的是,没有经济大亨与新纳粹结盟的情况,因为以民族主义为理念的德国公司在世界上会受到抵制。虽说我原则上是反对政党禁令的,但对新纳粹国家民主党例外,他们实在太嚣张了。”

褐色政党之所以这么嚣张,是因为他们觉得,身穿制服的国家机器代表们内心中也是默默站在他们一边而不是帮助受害者的,如果他们再次袭击一个外国人,警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如得上法庭,法官也不会重判,会给他们监外执行,不把这些冷酷的年轻暴徒看作罪犯而只当作青春期的—时糊涂。

在乌克马柯的小村波茨罗就发生过这样的事。2002年7【216】月中,16岁的中学生马利努斯·朔波林(Marinus Schoeberlin)不见了。接着他被宣布为失踪。四个月之后,在被废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院子里发现了他的尸体。如果不是凶手之一在同党面前吹嘘他知道失踪者在哪儿,给20欧元就说出藏匿点,人们大

概永远也发现不了。事情这才暴露出来。他和另外两个帮凶在检察官面前供认了作案细节。

马利努斯成为受害者纯属偶然。本来他们是约好一起去喝酒的,后来才决定要揍他。因为染过的头发的颜色,马利努斯被他们当作犹太人先遭到谩骂,在那些人的局限意识里,染过的头发就是典型的犹太标志,接着在所有在场者的赞同之下开始殴打他。他们朝他身上小便,强迫他吃自己的呕吐物,并且用新纳粹最喜欢使用的“马路沿踏”折磨他,就是先让受迫害者把头枕在马路沿上,之后施害者用力踩踏他。这时马利努斯已失去知觉,三个施害者,两个17岁,一个23岁,把他拖到生产合作社院子里,打死后把尸体扔进了沷肥坑。之后其中的兄弟俩就回到父母家睡下了。

2003年10月24日,经过24次庭审后,位于诺伊鲁平的州法院青年法庭对被告进行了宣判:马可·S.因犯有前科,以谋杀和其他犯罪行为多刑共判15年;他弟弟因谋杀和其他犯罪共判8年6个月;塞巴斯蒂安·F.以伤害和胁迫罪判2年。

2002年夏,当警察在村里为找失踪者到处询问,谁在哪儿最后见到过他的时候,没有直接参与行动的另外五个人始终保持沉默。波茨罗的人知道真相后,都觉得很震惊。马利努斯被害前五年,波茨罗有过一个45岁的社会工作者被东部的新纳粹用棒球棍打死一事,大概是个偶然的巧合。还有一个巧合是:在前面提到过的,毗邻的滕普林教堂里呼喊“胜利万岁”口号后被警察逮捕的人当中就有刑满出狱、时年已22岁的塞巴斯蒂安·F.,他是青年极右20人小组的成员,身上带着武器。【217】

检察长劳滕贝尔格认为,这些暴力行为的原因不仅仅来自

已灭亡的那个总是上面发令、下面执行的红色独裁体系,而且“来自西部老联邦州有组织的极右分子利用了转折时期和民族情绪承载的德国统一,在新联邦州宣传他们的思想”。对于右翼这么快融合的原因,他还解释说,以前两德都排斥了本该继承的黑—红—金三色旗下的民主爱国主义传统,在东德,甚至因国歌中有“德国,统一的祖国”之词句而只奏不唱。

劳滕贝尔格办公室所在的勃兰登堡市地处风景宜人的哈维尔湖区,冯·里贝克先生的园子里曾种着香梨树^①,这个地方,不仅是回归民族文化遗产,阅读特奥多尔·冯塔讷之地,也是反思两次不同的德国专制的理想之地。今天,年轻纳粹的祖父辈曾在这里建立了第一座种族灭绝毒气炉,用于杀害那些他们认为无价值的生命,9 600 人丧命其中。在这儿的监狱里有 2 700 名希特勒的反对者惨遭杀害。后来,这里成了东德最大的监狱,政府在这里关押他们的政治犯。

【218】 勃兰登堡州这片土地,近在咫尺的柏林的新纳粹在帮着耕种。德意志人民同盟在州议会占有 6.1% 的席位,这是 71 054 个德国人投票赞成他们的结果。他们从民主社会主义党两位数的选举成果中学习经验,借鉴策略,加强了对老年人、病人、失业者的照顾,再顺便宣传一下他们的主张。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和萨克森两州的新纳粹主要是来自西部的人在领导,而活跃在勃兰登堡州的极右分子在剧变前是另一边的忠实战士。

这就出现了原来的老相识在当地又见面的情况。当年反抗

^① 出自特奥多尔·冯塔讷的著名侦探小说《梨树下》(Unterm Birnbaum)。

国家强权、如今鼓励新国家和公民反对新纳粹的民权人士代表遇到了从前的国家卫士、现在反国家的煽动者。下面故事中的两位主人公名叫沃尔弗拉姆·胡尔泽曼(Wolfram Huelsemann)和德特勒夫·阿佩尔(Detlef Appel)。

至2008年4月,沃尔弗拉姆·胡尔泽曼一直是“宽容勃兰登堡——移动咨询队”的队长,后来这个组织被复杂地更名为“勃兰登堡州公共事务咨询所”,这倒让人对它到底是干什么的摸不着头脑了。这个行动组织干的其实就是政治家们始终在要求的事情:实施预防措施,不让新纳粹有机会到社区插足。勃兰登堡是第一个由州政府出资、为社区提供专业咨询服务的州。德特勒夫·阿佩尔是上哈维尔县国家民主党县委主席,从前他是东德人民军军官,统一后毫不费力地从效忠一个元首的体制换到了另一个。

这个特别的见风使舵者与基督教神学家胡尔泽曼德相遇在一个集市广场上。阿佩尔和其他一些小伙子正在那儿静坐示威,支持什么还是反对什么,胡尔泽曼已经想不起来了,总之是德意志民族主义的。从阿佩尔面前经过的几乎没人注意他。胡尔泽曼天不怕地不怕,和这个东德老乡聊了起来,虽然周围站着虎视眈眈的小伙儿,他还是大胆抨击阿佩尔的世界观。【219】

他从不回避这类争论。“民主政党必须搞清新纳粹所谓的价值观是什么,不能考虑人民希望和谐而放弃这类争论。我们东边这儿还没有建立起必要的争论文化,不像你们西边经过两代人的努力已有长足的发展。继续教育可以使头脑清醒,增强对褐色病毒的抵抗力。事情就这么简单。”阿佩尔的头头乌多·福伊格特曾否认大屠杀“不可能是600万,奥斯维辛最多

死了34万”。根据《刑法》第130条,这已构成煽动罪。当阿佩尔在集市的争论中理屈词穷时,他便含混不清地狡辩说,从长远看他们右翼一定能成功。

思想极其狭隘的极端分子是怎么钻入社会各个角落的?胡尔泽曼认为:“我们在一部分人当中可以观察到相当的暴力倾向,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年轻人当中。像席尔这样的人在西部的选举中一获胜,马上就会引起极大的震惊,邪恶大多不久就能被阻止。而在我们这儿,它就能生存下去,因为一个有明确意识的文明社会在东部还不够强大,对民主的信任还相对薄弱。”

【220】德国新极右派用刚刚灭亡的那个制度的遗产服务于自己的目的,利用人民中潜在的民族主义。东部正直的政治家们,包括诚实的保守派和民主的左派,开始时都不知所措地试图将愈演愈烈的暴力行为弱化为偶然发生的事,隐瞒住其制造恐怖的策略,之后虽然认清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但仍止于认清真相和公开论争。新纳粹群体中更多的早已不是失业者,失业工人摇摆不定更有可能选左翼党,而是那些担心自身社会地位不断下滑的中产阶级。蛊惑人心者似乎能为他们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遮风挡雨。

劳滕贝尔格也持同样观点。仅靠警察和司法机关,没有公民社会的大力支持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调查右翼刑事犯罪,给暴徒判刑如今都不是主要问题了,以前是,那时人们觉得司法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引起他忧虑、让他联想到魏玛共和国时期那危险状况的是这个已无法否认的事实:宪法的敌人已经在社会中安了家。“他们关心所谓平民百姓的疾苦,这是他们从民主社会主义党

那儿学来的。他们带领追随者占领国家关闭的场所,尤其是在乡间,比如为节省开支关闭的青年活动中心,没有教堂、没有警察的村庄,没有酒馆,从前可以在那儿相互诉诉苦的地方没有了。”

2006年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选后,有五个村子被列为全德范围内的新纳粹群落,五个都在前波莫瑞东部,波茨罗占38.6%,巴吉朔占31.6%,贝雷泽维茨占32.2%,新科泽诺占31.1%,新吉尔西占30.1%。西部一片哗然,而州里的民主派几乎不觉意外,因为从帕泽瓦尔克到乌泽多姆度假岛,在这片东部和西部德国人夏季一起晒太阳的海滩上,在从前的皇家浴场重新繁荣的地方,新纳粹异常积极和活跃。他们成立一些名字听起来很无辜的协会,比如“保护家乡和保护习俗协会”、“鼓励前波莫瑞家乡协会”,让民间舞蹈团上台演出,把当地人对难民收容所和避难者的不满以引人注目的公民倡议形式汇集起来。一切都在双重战略下展开:一方面以优雅的正人君子面孔说服犹豫摇摆者;另一方面用暴力纵火者恐吓政治对手。【221】

当地人在前来采访的记者问他们为什么选国家民主党时,回答得很干脆:其他政党都不管他们,右派的口号说得一点都没错。难道不是吗,学校关了门,孩子们上学得乘好几个小时车才能到另一个大点的地方;商店、邮局也都关了门,不再是每个社区有牧师,而是一个牧师管好几个社区,去安克拉姆的汽车每天在这儿也只停一次了。

国家民主党用这些普遍存在的不满滋养他们的褐色土壤,听老人叨叨,还年轻人一个修缮一新的聚会场所,在大道两旁的树木和房子院墙上贴上通俗易懂的口号:“要前途不要劳动

局”，绝非偶然地画上两个金发的德国孩子，到选举日便收获满仓。前波莫瑞被新纳粹在全欧树为榜样，树为模式，树为典型，成为标杆。

在毫无希望的酒鬼们的木板房旁，已无法从光头和皮靴上识别出新纳粹了，这给警察出了难题。他们身着西装，打着领带，发型整洁，举止文明。他们打扫烈士陵园和墓地，颇受老人们欢迎。帮助单亲妈妈，帮人填表办申请失业救济的手续。【222】“勃兰登堡州的学校大部分已清除了纳粹，加强了师资力量，让教师们了解情况。”劳滕贝尔格说，“但是当年的中学生现在已经上了大学，他们是未来的精英，他们在那里散布纳粹思想。”

这里我想起和高克的一次谈话，他给我解释了，为什么尽管经历了1989年的解放东部仍然不看好自由。他们比西部的德国人还德国人。无论年轻的年老的，都有民族主义的乡愿，唱唱战斗歌曲、举举火炬，都不可怕，危险的是很多年轻人认为“右翼能给予他们其他政党给不了的东西”。这比那些一眼就能看清、国家可以阻止的暴徒令人担忧，同样令人担忧的还有大众的麻木不仁和袖手旁观。

普拉采克的副手，勃兰登堡州内政部长约克·朔恩波姆（Joerg Schoenbohm）的主意已经得到了有效贯彻，刑事案件的绝对数字在减少。前面提到过的那支警察移动行动队就是他建立起来的，训练有素的人员，一流的装备，新纳粹一旦出动，在最短的时间内就赶到现场驱散光头党的队伍。下次再想打外国人的时候，那些家伙就得再三考虑一下了，“恐惧和威慑队”也许已经等在那儿了。

嗜血的恶狼现在披上了羊皮这点普拉采克也知道，他说：

“我们州政府举办每年一次的公民开放日那天，新纳粹马上通过电邮通知同伙，穿戴整齐到场出席，然后高声宣传他们自己。”结果被我们阻止了。

伪装成正人君子的纵火犯试图在业余活动俱乐部，在家长委员会，在志愿救火队和猎手协会等地方赢得影响力，巩固他们的基础。他们出资办儿童节，组织足球赛或幼儿看护，以便争取更多的妇女，在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实践他们的“发声战略”，让人们觉得似乎他们是唯一关心大众疾苦、与人们贴心，所谓亲民的。【223】

10年前，民主派一致同意闭口不谈右翼策略，是为了不想到如饥似渴盼望工作的地区来投资的人吓跑。现实击败了這個策略，报上充满了极右暴力事件的大字标题，配上满脸仇恨的新纳粹的照片，令人想起当年属于希特勒行刑队的那帮家伙。州里的政治家那时还抱怨《柏林日报》对勃兰登堡的褐色行径报道得太多了，不帮着为保护这个地区保持沉默。

当时的州长曼弗雷德·施托尔佩承认，太长时间闭眼不看事实，一直以为暴力事件的高发是转折造成的不安全感，无可依靠引起的，而不是在社会中深深扎根的东西。“我一直怀着这样的想象，东德学校中学习过的反法西斯主义和对其他国家人民的团结互助思想总该在年轻人当中保留下一些吧。”

显然所指的年轻人在家里听到的是另一套。不一定是从父亲那儿，他大概更愿意忙着找到个工作，好带着全家进入新时代。更多的大概是从经历了两个德国专制的祖父那儿，他们从不知民主不会制造工人阶级的乐园，而需要每日重新为之奋斗和维护。而且需要坚信它，正如1947年丘吉尔在英国下院所作【224】

的著名演讲中定义的那样：“民主是所有政府形式中最差的，但其他的都被时间检验掉了。”

要加强民主，必须有正确的思路，需要双重战略。一方面需要朔恩波姆那样的威慑行动队；另一方面需要移动咨询队，只要听说狼要来，就去出谋划策。普拉采克认为预防措施是对右翼的正确应对：“纳粹进学校宣传之前，我们应该先于他们到达。”或在学校前站岗，阻止新纳粹团伙中的商人贩卖纳粹音乐碟片。等着对付褐色兔子的民主刺猬理论上不应是在西部的业余大学培养出来的（胡尔泽曼），而应该就来自东部，和他们的工作对象操同样的语言，说得上话。

所有这些措施虽然仍都非常必要，但检察长劳滕贝尔格怀疑，长远来看是否有用。制作精美的小册子，大声疾呼的号召，都很好，但这些只能到达未被洗脑的那些人那儿，因为他们本来就属于正直的一类。更重要的应该是取得民主力量的共识，他把很多左翼党人都算在里面，甚至左翼党里的一些老人，应该建立一个广泛的反纳粹同盟，从坚定的保守派到左翼自治派，共同把新纳粹占领的民族解放区夺回来，立上民主的灯塔。资金也不能全国平均分配，而应重点帮助新纳粹猖獗的地区。

【225】并不是说到目前为止什么都没做，相反，正直人们的反抗反映在4500个公民倡议活动和项目里，甚至包括一个帮助脱离新纳粹的项目。2007年一年，联邦政府为预防措施和受害者赔偿就支付了1800万欧元。主要资助那些受到危害地区的市长们，让他们能在当地打击敌人。但他们自己必须迈出第一步，承认在他们那儿存在极右势力，这让不少市长觉得为难，因为这对他们的形象没有帮助。

本来需要建设东部,而这里是要削弱东部,削弱国家民主党和德意志人民同盟,捣毁他们的小窝,关闭他们的据点,建立正当的,比如青年活动中心,由专职的、吃皇粮、信奉民主的国家工作人员负责,比如乡镇政府,真正关心百姓疾苦,当然一定要与相应的警力结合。劳滕贝尔格说:“我不主张增加开支,而是要把现有资金更加有效地使用,这是另一类,真正的建设东部,因为,东部新联邦州所缺乏的,是西部那种经过几十年发展而达到如今那样强大的民主意识。”

首要任务是要提高警惕。越来越常见的情形是,国家民主党或德意志人民同盟或他们的追随者以引人好感的家乡、祖国协会的名义企图购置未开发的地产。国家民主党依靠这种策略,通过一个中间人在菲斯滕瓦尔德购得了一块面积60万平方米的土地,从当时84岁、生活在养老院的业主手中购得了上面的辅楼。当国家有关部门得到有关这笔买卖的消息时,所有合约都已经签完字了。在约翰内斯贝格的一块地上,国家民主党【226】要为“具有民族主义信念的家庭”建一所乡间寄宿学校。但因为没能及时进行土地登记,这次他们没得手。对未来的新邻居心怀恐惧的百姓们提出了抗议,原业主撤销了合同,他原来不知情,不知道把地卖给新纳粹了。后来,年逾70的女牙医罗泽玛丽·阿伦斯特德(Rosemarie Arenstedt)跟和她同岁的小叔子一起花21万欧元买下了这块地,还在考虑作什么用。最主要的是,褐色分子被挡在门外了。

为了让社区能有效地同邻家温和的纳粹小伙作斗争,德国城市和社区联合会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方法全部以法制条款为基础,以便需要时随时可以上法庭。梅克伦堡-前波莫瑞的内政

部长洛伦茨·卡费尔(Lorenz Caffier)告诉州府委员和市长们,在阻止反民主反人类的势力时手中的权限和可以运用的方法。这位对右翼毫不留情的基民盟政治家不厌其烦地详详细细解释了尽管有平等的基本原则,但仍然可以“按照民主的精神,以合法的方式”拒绝新纳粹进入公共设施和购置房地产。在联邦宪法法院没有禁止国家民主党和德意志人民同盟以前,虽然无法阻止他们和其他政党一样在搞活动时租用社区的场地,但仍然有一些合法的技巧。比如在举办一场看起来无碍的歌曲晚会前,让主办方提供出场者名单,然后让联邦审查部门审查其歌曲内容。那里有所有违法歌曲及演唱者的记录。最方便的路径是双击 liste@bundespruefstelle.de。

【227】 房地产交易中马上看清真实目的的难度大一些,因为“买主一般以私人身份”出现,并将个人作为业主登记入册。在西部,他们常能通过某些伎俩欺骗和伤害国家^①,比如假装对一个长时间卖不出去的项目表示购买兴趣,马上引发出公开抗议,这么一来,乡政府就被迫使用优先购买权。在莱法州的基尔希海姆,国家民主党说要买“莱宁格老伯爵磨坊”。其实是伪交易。市政府一放弃优先购买权,“国家民主党和卖主间的合同也撤回了”。

如果买卖成交后才弄清新主人是何许人也,德国建筑规定上也有很多办法让极右分子干不成。比如,防火规定,严格的建筑附加要求,建筑失误,噪音鉴定,缺少逃生路线,停车位不足,

^① 这里所说使用伎俩欺骗和损害国家及公众利益是指强迫国家使用优先购买权高价收购或被迫放弃优先购买权。

等等。维斯玛的“狼窟”虽然一直为新纳粹所有,但他们无法用其搞原计划的极右歌曲演唱会,因为有关部门已将其定为危房而禁止继续使用。在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最近一次州选后,拨给移动行动队的费用增加了10倍,每年可达200万。

有很多可以做的事,已经做的还太少。胡尔泽曼相信,勃兰登堡州比别的新联邦州做得多些,因为州里的政治家现在看到有新纳粹的问题,不再像前些年那样宁愿隐瞒而不敢求助。“据我分析,图林根或萨克森的政治家们还做不到这样。我们有一个成功的策略,我们不责怪城市和乡村的居民们,而是鼓励他们,支持他们,相信他们能够理智地行动。”这不是一时一事能解决的,而需要长期培育,才能使当地文明社会的幼苗逐步成长。【228】

急能生智,有些主意正常情况下不一定想得到。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建立的“正义者的反抗”里面现在已经包括了很多团体、协会和机关。勃兰登堡和萨克森-安哈特的饭店餐饮业公开宣布国家民主党的党魁为不受欢迎的人。饭店和餐馆老板们这样做,不仅是出于正直的信念,也是认识到,外来旅游和排外是不相容的,在极右分子广泛宣传其主张的地方,游客就不来了,这样他们的销售额也随之没有了。

约翰内斯·洛迈尔(Johannes Lohmeyer)是“不给纳粹提供床位”勇敢行动的带头人。这位德累斯顿假日酒店的老总写信给萨克森国家民主党议会党团主席、来自西部的霍尔格·阿普菲尔(Holger Apfel),说在客房预订者名单上发现了他的名字,饭店这里正式通知取消他的预定。他说:“如果因为合同之故行不通,我可以告诉您,您在我们饭店的所有消费我都会捐献给

德累斯顿的犹太教堂。您可以把它当作是您早期的同党加害那个教堂和那里的人们的一点小小的赔偿。”为此，洛迈尔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邮件，对他表示支持和赞赏。

马库斯·乌尔比西(Markus Ulbig)是位于萨克森小瑞士风景区的皮尔纳市市长,他那个秀丽的小城以暴力青年多而闻名,【229】选举中国家民主党能获两位数的得票率,市长从不弱化小城存在的问题。这位基民盟政治家安排了一个打击极右的协调人,给予他足够的资金,支持“社会正义行动”,加强对民众的教育,抵制愚弄人民。看来有效。几年来,以排外为背景的暴力事件一直在减少。乌尔比西不逃避,他直面民主的敌人,有时用法律的武器,有时用论证的力量。他用数字说话。皮尔纳生活着38 755个德国人,602个外国人。如果国家民主党在这里胡扯什么外国人过剩,他们的脑子肯定有问题。听他这么说,人们虽然也点头称是,但持续不了多久。2008年地方选举中,虽然国家民主党候选人来自离这里非常遥远的西部,这里几乎无人认识他,但他在乌尔比西的小城还是获得了7.7%的选票。

至少,皮尔纳对前人的罪行表示了明确的态度。在太阳石宫殿区,第三帝国时期所谓无价值的生命被害的地方,从易北河岸到岸边高山树立了14 751个十字架,用以纪念被纳粹在种族灭绝计划中在这里杀害的14 751个人。在莱比锡,也有一个不好同皮尔纳相比的专制制度的标记,第二个。在安特大街48号,我将从那里开始寻访另一些顽固不化的怀旧者的痕迹。

仍清晰可见的共产党人的痕迹。

第七章 左边下车：顽固不化的老头子

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意的，似乎就是德国最普通的地方：城市、街道、咖啡馆、儿童乐园、房子、大门。门前地砖的缝隙间探出稀稀落落的青草。这是个标记，“标记”这个词在这里非常适合，表明这个入口已很少使用了。否则细细的草茎会被走过的脚步踩倒。一只肥硕的大蜘蛛在深绿色双开大门上方的栅栏上用细线织起了一张网，正一动不动地等待着飞过的战利品。只要走进这个大门，就得放弃任何希望了。这个突然袭来的念头实在太压抑，我尽力想把它赶跑。【230】

确实，很多人，当他们被运到这座方块石建起的大楼里来的时候，已经不存任何希望了；他们知道，在大门的另一边，八到十个小时之后，他们的生命就将终结。安特大街 48 号是他们的最后一个地址，是他们的终点站。这里，地处莱比锡市的南郊，是东德的中央行刑地。

戴着手铐的死刑犯被送到监狱后门。他们的抵达永远是一个模式的。先停下一辆白色的 Barkas 1000 型小面包车，这种车很常见，行驶在东德大街上不会引起注意，正因为如此才用来运送囚犯。而这种 Barkas 与其他出厂的车内部装置完全不同，【231】

它们被改建成了移动的囚室。

身穿警服的人先下车,观察了周围环境之后把将被行刑的人拽下来,一左一右两边架着,从街边几步走过当时还未长草的砖地,来到已悄无声息的开好的大门前,此地为这一行人的到来已做好了准备。

每次运送都必须提前几天通知,以便这里的监狱长同志有足够的时间,在监狱内外为顺利接收做好准备。这在适用于全东德的死刑执行规定中写得很清楚:“监狱司须将认证过的判决书复印件发给死刑执行处,并确定死刑执行日期。”

只有天黑以后,死亡使者才运送他们的牺牲品。冬天是在下午,夏天是在晚上。这些细节也都有规定。目的是要避免一切可能引起骚动的情况。例如路人或附近的住户,不能让他们从窗户后观察到感觉可疑的情景,从中得出什么结论。

每次运送结束,大门重又被小心翼翼地关上。这时将被行刑的人和看守一起,在一个没有窗户、灯光昏暗的闸门间等待下一道门打开,这道门也是朝内开的。再走几步,再等,然后来到一个前院,面前和身后的大门都是锁住的,直到右边有一扇不起眼的小门打开,那后面到1960年一直住着监狱的管理人员。犯人【232】被带到一个被改建为囚室的房间,除掉手铐,记下他对最后一餐的愿望,但花费最多不能超过10马克。可以选择:1. 一种特殊的食物;2. 一种特殊的饮料,比如黑啤酒,现磨咖啡,茶,等等;3. 香烟。行刑者这时也已抵达,在另外的房间里等着,直到被呼唤。

这一切都已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行刑者也早已去世多年。但是,在我的新德国之旅路途上,我得在这里停一站,因为这里

的过去也属于现在。仔细观察一下过去的东德,就会发现不是一切都已是很久以前的事,没有什么已去世多年。有些被认为已解决、已埋葬、已处理完的事情,会突然死灰复燃。不是垂死挣扎,比如被认为已灭亡的斯塔西这个怪物又活动起来了。它们当然吃不了人了,因为现在不仅有了思想自由,人们不用再害怕它们,而且因为它们手中已没有了政权。可以击它的眼睛甚至头颅,斯塔西确实已经死了。但是,它们那黏黏糊糊的触角和吸盘在变为人形的那些家伙身上如今和当年一样可以从烫得笔直的裤线上,从理得像当兵的一样的短发上辨认出来,它们张开大嘴,似乎又有了说话的份儿。大家只闻到一阵令人反感的恶臭。是的,从那些过时的老家伙们口中呼出来的也就是这种气味。

在德国的另一个秋季,柏林墙倒塌至今才 20 年;距离东德处死最后一个人也还不到 30 年。从前那个专制制度的遗留物还比比皆是。某些像莱比锡的这个死亡之地一样令人压抑,另一些显得像柏林霍恩朔恩豪森斯塔西监狱的“审讯者宿舍”那样不足为道,在东柏林的地图上,这个地方是找不到的,但是周围的人都知道,隐身在铁门和哨塔后的是什么是什么人。

正是在那些挂着花色丑陋的粗纺窗帘、椅子没有靠背,桌上【233】铺着漆布的房间里,从第一次审讯便开始了对被斯塔西盯上的那些人的心理摧毁。这样的人很多,不少受害者至今仍不能完全摆脱当年的折磨所留下的阴影。1989 年以后,施害者被打倒了,受害者能够公开谈论过去发生的事情,以这种方式解放自己了,但对很多人来说,这远远不够。没有足够的治疗师来医治他们心灵的创伤。

柏林济慈医院组织的一次以“东德时期的政治迫害及其心理后果”为专题的研讨会上,人们估计,从1945—1989年,先是在苏占区,之后是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出于政治原因被监禁的有30万人。不少施害者对这个数字表示怀疑,甚至恬不知耻地抗议在参观当年监狱(比如现已关闭的臭名昭著的保岑监狱和已作纪念馆用的柏林霍恩朔恩豪森斯塔西监狱)的讲解中,让当时的囚犯讲述自己的感受。比如柏林监狱的最后一任监狱长,原来是个水暖工,后来上了国家安全部的函授政法大学,之后被委以重任,他就说“他们这些所谓的博物馆讲解员总是把自己当作受害者来介绍”,而宣称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是施害者。

对专制制度以及抵抗运动的结构大部分已作了研究。虽然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一本当年斯塔西的兼职工作人员写的书,来具体描写为了摧毁别人的生活,他自己和他的同伴们都干过些什么;但在不计其数的书中都可以读到经历了心理恐怖活下来和革命后自己研究两德历史的人所写的回忆。

【234】 在波恩和东柏林所做的政治决定下,德国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至1988年年底,东柏林的决策必须听命于莫斯科的党中央;而联邦政府的决定也得和华盛顿的伙伴通气才行,剧变是怎么来的,之后发生了什么,对于无论东部还是西部的后来者来说,不仅读得到,而且看得见、摸得着,可以亲身经历。活生生的历史存在于无数个纪念馆里,其中很多纪念馆不是国家投资的,而是由从前的受害者出资建立的。活生生的历史存在于图片、电影、录音、资料、照片和专题活动中,比如莱比锡当代历史论坛布置在楼内、加起来1公里长的“分裂、统一、专制与抵

抗”常年展，在那儿可以看到：

基民盟的宣传画，上面画着社会主义的条条大道都进了红色怪物莫斯科的血盆大口；或统一社会党的宣传画，上面写着“劳动妇女们，看你们的了，参与进来吧，今天就加入自由德国工会！”和东德的每个群众组织一样，没有一个是自由的；还有看着那么慈祥的德国东部民族的老爷爷威廉·皮克的半身塑像，他的办公室和桌子，50年代政治局就在那张桌子旁开会；西德某个难民收容所的家具；真的特拉比小汽车和统一社会党的各种旗子和口号；还有一架涂得能以假乱真般像苏联军用机的轻型飞机，西柏林的兄弟俩曾驾驶这架飞机越过柏林墙把他们在东柏林的弟弟接上，安全降落在西边国会大厦的废墟前；铁丝网、坦克阻拦器，“反法西斯护卫墙”的旧墙砖或斯塔西收集反对派人士气味的密封瓶，必要时可以让猎狗凭气味辨认出他们。

还有蜡烛，民主想象力永不褪色的美丽证明，旧制度先是动摇，不久便不战而亡。它曾做好了一切准备，独独没有想到非暴力的、以蜡烛和祈祷进行的抵抗；人民示威时举着的那些即兴写在纸板和头巾上的小诗，抨击统治者的高傲，鼓舞底层人的士气。我最喜欢的之一是：“现在要民主，科特布斯油加足！”几周前，我在记录了分裂、1990年后重新统一历史的德国历史博物馆待了整整一天。【235】

现在，我站在安特大街的这扇大门外，离莱比锡市内熙熙攘攘的游人和当代历史展览仅10分钟的车程。我知道等待着我的将是什么，因此，在跨进那扇大门前，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至2002年，这里的屋檐下一直是德国的司法机关和监狱，囚犯在院子里放风。监狱总是吓人的，但两个德国都需要它。

普通的刑事犯,被抓、被判、被关,每个国家、任何制度都是这样做的。但是,当年不是径直走过院子而是从右边小门被带进来的人,就只剩几个小时的活头了。这是法制与专制之区别。

至1981年,在东德这个中央行刑地,以人民的名义共执行过64次死刑,而人民对此一无所知。1960年时使用断头台,1968年后采用“突然对后脑近距离射击”。验尸后尸体立即被运往莱比锡南城墓地进行火化,骨灰有的被撒在周围的建筑垃圾里,大部分被当作无名的解剖用遗体埋葬。

他们的家属拿不到骨灰,因而不可能把他们埋葬到想去的
【236】安息地。根据部长或警察高层领导的指示,所有一切必须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死亡证明是在施滕达耳市开具的,死亡原因大部分是心肌梗塞。这种蒙蔽受害者家属的拙劣做法不是当时的新发明。纳粹文职罪犯们就是这么做的,无论是在集中营,还是以“安乐死”冠名掩饰的国家谋杀计划。

在同伙之间,东德领导人毫不隐讳地直陈其动机:“我们的世界观和我们党的领导地位决定了我们是一个强大的集体,它可以正确地评判每一个错误,帮助和教育每一个同志,完成好在与我们共和国敌人的斗争中那些复杂艰巨的任务。但是对和平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徒也决不手软。每一个叛徒,无论他身在何处,都不能逃脱应得的惩罚。”这是埃里希·米尔克部长在357/60号命令中给下属发出的指示;还有,他让把刚刚被执行死刑的一个原边防军上尉的情况通报安全部所有人员,注意,是所有人员。这位边防军上尉在柏林墙建立前夕带着家人逃到了西部,偷偷又回来时遭逮捕,被判了死刑。据说,回来是为了“组织反东德的犯罪活动”。

无论叛徒身在何处,人们知道,斯塔西也能把他们的爪牙送过边界。但是特遣小分队真持有暗杀的命令吗?东德足球冠军鲁茨·埃根多夫(Lutz Eigendorf)是享有特权、因米尔克最喜欢而遭东德其他球迷痛恨的柏林 FC Dynamo 队的球星,在一次与西德凯泽斯劳滕队的友谊赛后离队留在了西边。先在因着红色【237】球衣被称为“红鬼”的凯泽斯劳滕队踢球,这个红与他逃离的那个红当然完全不同,后来转到布劳恩施维克队。1983年3月5日,他驾驶着 Alfa 车在雨中撞到一棵树上,两天后因伤重身亡。没有什么能证明此事有斯塔西插手,只是有迹象表明,有可能是他们干的。因为一个在西边以朋友面目出现监视埃根多夫的斯塔西兼职工作人员和他的上级军官在球员去世当天分别获得了 500 马克和 1 000 马克的奖金。

为什么我还要写早已家喻户晓的莱比锡行刑地,当年的死刑与国家今天的状况、与统一有什么关系,民主国家,像美国,不是也对杀害儿童的凶手、强奸犯和叛国者判处和执行死刑吗?美国中央情报局难道不参与暗杀和袭击行动吗?这些都是当年的一个领导干部向我提出的问题并带有指责地告诉我说,他们 1981 年以后已停止执行死刑,1987 年最终废除了死刑。

他显然还期待我为此表扬他呢。

说因为我出身的那个德国、联邦德国在 1949 年成立时宪法之父们就已废除死刑,目的是与已灭亡的纳粹暴政彻底划清界线,这样回答未免失之简单。宪法之父当中也并不都是正直的反纳粹抵抗战士,有人指出,宪法委员会中有两名法学家是为了保护他们的纳粹同伴免被处死才投赞成票的。

在东德的各个地方,后来只在莱比锡,共有 211 人被执行了【238】

死刑,其中 89 名纳粹罪犯,70 名严重刑事犯,52 名所谓政治犯。其中有一例是个扳道工,因扳错道岔货车出事故给国民经济造成了重大损失。

无论任何地方,从根本上反对死刑不是个道德态度问题。事关从前当政者的罪责,假如他们能对所做的事情表示忏悔,也许还可以原谅。是的,在联邦德国,没有一名纳粹法官被判刑,没有一个纳粹检察官以人民的名义被起诉,但这一耻辱并不能为东德在法律名义下所犯的罪行开脱。是的,不能把德国的两次专制相提并论。但是,要避免西部的把事情简单化和东部的把事情美化,强调多少次都不过分。一个专制建了奥斯维辛,另一个建了柏林墙;纳粹不需要秘密的兼职工作人员,因为 90% 甚至 95% 的人本来就支持他们和希特勒,专制制度特有的告密机制自动就找出了持不同政见者和制度批评者。东德那些高龄的统治者需要一支国家供奉的专职和兼职大军,来控制人民,西德的电视,让人民始终见证着另一个德国——联邦德国,另一种生活。

1989 年革命后收拾残局时,德国土地上第二次专制的施害者们和 1945 年第一次专制解放后一样,没受到什么惩罚。1990 年后,对东德帮凶打手的起诉有 2 万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国家里,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最后只剩下近 1 000 件,有判决的不到 300 件,蹲监狱的不到 50 件。

【239】 在东德,很多以所谓经济间谍或模糊的“反国家罪”被判处死刑的案件其实是国家实施的惩罚性谋杀。许多案子的起诉都是做了手脚的,快速审讯后就判了死刑,而这一判决其实在诉讼开始前就已经决定了。判处死刑,按照规定必须通知国家主席,

得到他的同意。比如由与其父,社会民主党人、帝国总统同名的政治局委员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呈来的文中写道:“尊敬的昂纳克同志,我向您报告并请您给予回复,检察院准备在将要进行的诉讼中建议实行最高量刑(死刑)。致以社会主义的问候!艾伯特”昂纳克划去了“建议”两字,亲笔改为“申请”,然后在边上签了“同意,昂纳克”。

1997年,统一后第七年,东德某位军事检察长因教唆杀人被起诉,在其当庭所作的辩护发言中,用无可救药的阶级斗争语言宣布,西德“无权审判东德的司法”。真是无可救药,但不是个别例外,他说出了与他信念相同的那些司法人员的观点。像他这样的人现在仍随处可见。因此,我要认真仔细地看一看东部这张红网中的老头子们,米尔克从前的属下,武警成员,一有机会,他们还在为这扇黑暗大门背后的血腥历史辩护和美化自己阴暗的过去。

里查德·施罗德认为,ISOR和GRH之类的斯塔西协会只是过去制度的化石,是失去了利齿的豺狼,大部分成员都已年逾70,没有意识形态上的继承人。他说:“看看公众对他们的反应,根本就毫无反应,他们应该不会有受鼓舞的感觉。”但是,他们大声地控诉和要求所谓应有的权利,把施害者伪造成受害者,所以他们和东部、西部从右边挑衅的那些顽固不化者一样,属于统一现状的组成部分。【240】

为我打开那扇不常打开、通往那个可怕房间之门的是托比阿斯·霍利泽(Tobias Hollitzer),东德时期他就已经是一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了。他是基督教青年会的成员并从中汲取力量。这个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在每个城市、每个专区都是逐步形

成的抵抗力量的细胞。霍利泽既不加入共青团,也拒绝参加民兵训练。和其他采取这种行动的人一样,他被迫在高中毕业前离校。20岁时他开始学细木匠,后来成了木工并以此为生。

出于信仰和家庭教育之故,他是个“消极的不追随者”。他参加“第三世界小组”的活动,1989年春帮助组织了莱比锡的Pleiße之路朝觐。朝觐者和平地沿Pleiße行进,以此替代被禁止的环境日示威。警察对朝觐者照样进行了检查,对那些以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为依据拒绝出示证件者处以拘留。霍利泽也在其中,300马克的罚款他全当不知,也没能把他怎么样。

使莱比锡获得英雄城市之名的1989年秋季示威中他当然是一分子。剧变后他在高克局分部工作,如今是经营“圆角”纪念馆的公民委员会兼职主席。“圆角”纪念馆以往40年中是以前国家安全部莱比锡专区分部的所在地,那里甚至有一个专供密探们享用的电影院。1989年12月4日的星期一示威中,这里被冲入的人民所占领。斯塔西们都躲回家去了,他们害怕会有更大的积怨和民愤爆发,因为他们自己知道这么多年对人民干了什么。爪牙打手们怕见阳光,白天暂时不敢出来了。

但是霍利泽记得,不久他们就又露头了,以自己的方式满足人民“斯塔西加入生产”的要求。1990年3月就向“来自西部的三流人员出租一流房产,斯塔西的办公大楼。西边过来经商所需要的家具和功能齐全的电话,只有从前的斯塔西具备。这一来他们就赚了大笔的西马克,转手又用东马克以极其便宜的价格继续购买房地产,哪里是最佳地段自然也是他们最了解。货币同盟以后他们又开始做蔬菜批发和渔业生意。现在他们又成了新社会的支柱了”。

他们更多地是那个没有名誉不讲诚信的社会的支柱,这不是霍利泽一个人的观点,2007年初曝光过“莱比锡的泥潭”。柏林刑侦局曾是调查政府及统一犯罪中心的主要力量,那里有组织犯罪及经济犯罪司退休司长乌维·施密特(Uwe Schmidt),非常了解那个由柏林墙倒塌后的老“红袜子”^①和年轻的新占领者组成的黑社会,他们共同的目标是,无论给别人带来什么样的损失,不管合法还是不合法,自己获取最高利润。他估计,在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的巨大变革带来的混乱中,通过投机和作假交易至少被贪污掉上百亿欧元。其中他也提到统一社会党的党产。他也在等着我去拜访呢。【242】

在炎热7月的某个下午,我和霍利泽一起站在从前监狱管理员住所的前厅,这里有五扇木门,其中一扇的后面放着断头台。潮湿肮脏、墙皮剥落的浅沙色墙上,现在挂着一个十字架。这是1989年年底监狱牧师让挂的。当年在这里杀人和死人的时候,没有十字架,没有牧师,也没有祷告。被行刑者的头被蒙上一块黑布。规定中还有:“行刑室内的刑具要遮蔽,不能在此放置棺材,……行刑处负责人向犯人作如下交代:你被判处死刑,判决有效,执行官,请执行。”

原来放断头台(东德的术语叫“落剑机”)的位置上,生了锈的固定点仍清晰可见。对面的一个角落里,从墙上伸出一个已焊住的水管。行刑的年月里,那儿接上一根软管,把行刑后流到地上的血迹冲洗到地漏里。有十个小眼、中间一个大孔的地漏盖是陶瓷的,永远不会生锈。所有细节都是精心设计的,一切都

① 德国对共产党人的俗称。

经过深思熟虑。看来,那个时候,在死刑上德国也是数一数二的——米尔克原话:“什么不能杀头、取消死刑,全是扯淡,同志们,只要需要,没有判决照样砍头。”在刑场这种可怕的地方,德国人诸如忠于职守、准时、清洁、有序之类的美德样样彰显有效。【243】1968年以后,下一个在旁边房间食用最后晚餐的受害者被带进来以前,不再需要清除前一个的痕迹了,从那时起采用了枪毙。

东德的最后一个刽子手名叫赫尔曼·罗伦茨(Hermann Lorenz),最后一个被行刑者叫维尔纳·特斯克(Werner Teske)。1981年6月10日8点30分开始对他起诉,一天后的15点30分判决就下来了。每次行刑,罗伦茨可以有500马克的额外收入。像每次一样,6月26日这天10点10分,他带着装了消音器的Walther P38型手枪,站在门后的阴影里,门是朝里打开的。特斯克听到的命令是进到下一个房间,他一进来,罗伦茨便举枪按规定近距离地射向他的后脑。东德传奇间谍头子马库斯·沃尔夫的下属,间谍局上尉特斯克立即身亡。

接下来射向心脏的那一枪其实根本没必要了,但规定中明确要求这样做。之后在场的检察官才确认死亡。刽子手的两名助手将尸体放进旁边准备好的棺材,接着便送到墓地火化,到了那儿不再开棺。

因叛国罪被判死刑的维尔纳·特斯克的死亡证书上,死亡地点和以往一样仍是斯藤达尔,死亡原因是心脏坏死。他的遗孀被迫改回姓原来的娘家姓,他的孩子也用母亲的姓氏上学。不让被枪决的“叛徒”留下任何痕迹,实际上他并没有变节叛变。直至剧变到来,斯塔西一直监视着他的妻子,而她始终怀着希望,认为丈夫大概被关在什么地方,也许还活在世上,直到

1990年才知道真相。而刽子手对他沾满鲜血的过去却丝毫无动于衷。当他1999年用墨镜和假胡须伪装着出现在电视访谈节目中时,对主持人罗格·维勒穆森(Roger Willemsen)说,他只是做了必须做的事情。经验丰富的主持人维勒穆森被惊呆了,【244】事后他说,从没有面对过这么冷血的家伙。罗伦茨自己现在也已经死了。

即使按照东德法律,枪毙维尔纳·特斯克也是一次法律谋杀。马库斯·沃尔夫在其回忆录中作了证实,他曾是东德国外间谍的头子,米尔克的副手,1987年退役,1989年有一段时间里被炒作成改革派。特斯克虽然收集了秘密文件,但逃亡西方的计划他早就放弃了。

顽固不化者之一,从前的斯塔西上尉(这里要是说出他的名字实在是太恭维他了),现在是红网里活跃的律师,竟然把这个案子和刺杀希特勒的抵抗战士施陶芬贝尔格伯爵相提并论:“叛变者,得自杀,不自杀的,被枪毙。”这个可怕的律师,以这种信念在纳粹统治下一定也成绩斐然,他这话正好无意之中证实了那种说法:斯塔西和盖世太保是多么相似,统一中被撤职的那些老干部们始终将此指责为诬蔑。两者的所作所为不可比,但他们都可以被用作专制制度的帮凶。判处特斯克死刑的法官和申请死刑的检察官各在1998年被判4年徒刑。两人都将判决视为胜者司法的又一佐证而提出上诉。与其同类一样,他们没有任何负罪感,这样他们就 and 纳粹的思想之父同流合污了。

自愿执行法西斯或专制政党的上司赋予的义务,在文明社会会遭拒绝,却是专制制度下的典型性格。因此施害者或以不得不执行的命令为理由,一旦不执行将威胁自身生命;或以当时

【245】必需执行的法律为借口。这一个和另一个专制制度的代表都反问过,要是你处在那个黑暗时期,能保证不那样做,有胆识,表现好?当然没人能给予肯定的回答。面对事实,“要是怎么样,会怎么样”的假设毫无意义。

只是做了必须做的事情而并没有因此负罪的意识也决定着理发师出身的海因茨·盖尔(Heinz Geyer)的世界观。20岁的时候他就不再给人做头发,而在1949年去当了人民警察。不久就因忠于党的路线得到上级的赏识。一年后国家安全部便吸收他进了他们的大家庭,从此开始飞黄腾达。1990年被抛入自由市场经济后的几年里他主要在一些保安公司任职,干过好几种工作直至退休。他在东德的最后一个职务是间谍局参谋长,是沃尔夫之下级别最高的情报军官。可以想象,特斯克一案最迟在他被枪决后盖尔肯定是知情的,很可能审判时就已经知道。

现在盖尔和其他许多从前的东德人一样已经退休,无足轻重了,但在斯塔西和统一社会党的两个坚定组织 ISOR 和 GRH 里,他因从前的少将军衔而仍然受到尊敬,除了那儿再没有别人这样尊敬他了。

2008年,盖尔在莱比锡书展介绍自己的回忆录,在场的四五十个老伙伴中突然有一位正直的人站起来发表自己的意见说,在东欧集团中,大概除了罗马尼亚,没有一个国家的秘密警察像东德的斯塔西那样对人民压迫控制得那么严重。一听这话,旁边的人差点把他痛打一顿。盖尔的回答被湮没在这些昔日位高权重、今日无可奈何之人的高声责骂之中。实际他也没有说出什么重要的话,等重新安静下来以后,他只是说,国家安全部门嘛,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存在。

针对所有心怀不满但又说不出犯了什么法的公民，国家安全全部有必要采取“摧毁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反和平分子措施”，其中精确地描述了以何种方式通过系统的心理恐怖有效地破坏他们的生活：“经检验可以运用的有效摧毁方式：系统地制造职业上及社会生活中的失败以毁坏一个人的自信心，写匿名或假名信，发电报，打电话，搞对其不利的照片，比如进行过的接头或假接头……以上方式和方法需根据每次行动的具体情况有创造性地区别使用，并进一步发展完善。”

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秘密警察滥用精神病院也属于经过检验的有效方法，苏联曾多年这样做过。位于波茨坦的国家安全全部大学有“行动心理系”教授。果真像在莫斯科那样，斯塔西机构曾给持不同政见者下一个假诊断便把他送进精神病院，用药物让他安静下来？有过开颅手术、放射阉割吗？太可怕了！但是，东德有那么多听起来匪夷所思的事，比如斯塔西档案中竟然还有保存某个民权人士气味的密封罐。东德那些被训练得毫无个人意志可言的傀儡们能干出这样的事也不是离谱的想象。

霍尔格·施坦因贝格(Holger Steinberg)博士是医学史学家，在莱比锡大学附属医院精神病院历史档案馆工作。在与他的交谈中，我们主要探讨的就是东德时期是否存在把不受欢迎的制度批评者以假诊断关进精神病院的情形。我知道原萨克森州内政部长海因茨·艾格特(Heinz Eggert)的事。很长一段时期里，他被看好为人称“库尔特王”的州长比登科普夫的接班人。1990年，艾格特从自己的斯塔西档案中了解到，自1982年始，对他这个不安分守己、批评现行制度的大学生牧师采取了“摧毁性的行动措施”。说得明白一点就是，斯塔西决定通过心

理恐怖整垮他和他一家。

仔细调查研究之后发现,事情和所怀疑的有所不同。斯塔西是派了人监视艾格特,但他被送进精神病院并不是出于政治原因而是由于严重的忧郁症。给他治疗的医生也不是受雇于斯塔西的,大夫本人也因“与国家敌对的行为”甚至蹲过18个月监狱。院长虽然承认,很多年用“曼弗雷德”的化名为斯塔西工作过,但让他监视在格罗斯施维德尼茨男性精神病院住院的艾格特牧师的要求,被他拒绝了。艾格特本人也承认,结论下得过早了,“黑衣英雄和白衣魔鬼”的故事并不属实。

施坦因伯格证实,很多医生,不仅是在精神病院工作的那些,都没有遵守保守秘密的义务,向斯塔西出卖了他们的病人。联邦医生协会和签约医生联邦协会委托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研究所做过一个调查,估计3%—5%的医生曾有过秘密【248】的兼职活动,他们当中很多人在统一后的德国仍在继续行医。但是,医院被用作维护制度和迫害人民的方法和工具,使用这一方法害人不是个别情形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与罗马尼亚和苏联不同,东德不存在国家控制的滥用医疗设施。这是曾任“民主现在”发言人,现为柏林一家诊所心理医师的索亚·聚斯(Sonja Suess)在分析了大量斯塔西档案后得出的结论。

事实是,个别情况也不少。新联邦州各个负责调查精神病院与斯塔西关系的委员会都这样认为。萨克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说:“在所调查的89件个案中,61件当中没有发现滥用精神病院和违法情况”,但是有一件极其严重的滥用。一个没病的人硬被斯塔西当成精神病人送进医院,目的是为了不受干扰地没收他的巨额财产,其中有一个以白大褂作伪装为斯塔西工

作的大夫参与。

我发现了一封信，是东德最高检察长 1989 年 4 月 13 日写给莱比锡专区检察长的，“五一”前不到三星期，提醒他注意：“鉴于即将到来的节日，对‘在押犯人’中有对公共秩序和安全造成潜在危险的，加强使用需入院治疗的司法精神鉴定，附件中是可提供帮助的鉴定人名单。”有事实证明，在某些节日前夕，包括莱比锡博览会期间，不受欢迎的就被“临时收监”了。

有一个特殊的例子是，一个斯塔西兼职工作人员想从一个女病人那里了解“歌德协会和索尔默俱乐部”后面的领头人物是谁。1810 年去世的作家约翰·哥特弗里德·索尔默 (Johann Gottfried Seume) 因《叙拉库斯的漫游》而成名，其晚年在格利玛附近的一个小地方当校对。让他流芳百世的是下面这首诗：

有歌唱的地方，可以成为家乡，
不必心慌，因为人们相信，
有歌唱的地方，不会被抢，
邪恶的人没有歌唱。

东部和西部德国人的集体记忆中都记熟的是这两句：“有歌唱的地方，可以成为家乡，邪恶的人没有歌唱。”

我要去离格利玛只有几公里远、位于查德拉斯的那个精神病院看一下。在充满尿臊味的桥洞下，墙上倒都是纳粹滚出去的喷画，这减轻了不少我的失落感。小火车站经长年风吹雨淋已很破旧，写着潭村站名的牌子几乎已无法辨认。潭村离莱比锡只有 48 分钟的车程，但它已像是世界尽头。几个星期前，就

为我这个外人的到来订好了出租车。到达后,首先听到的是这个女出租车司机给我讲她给西边人打工的经历。那个雇用她的人用居高临下的威胁口吻强迫她带着骨折的脚伤干到下班,在她打了石膏休息期间还扣发本来就不多的工钱。那时她不知道有权要求发工资,没人告诉她,老板当然更不会说。吃一堑长一智,现在,全德同为一家后 18 年,她已经能分辨这种和那种不同的西边人。当我们到达查德拉斯的时候,我知道她喜欢的东边人当中也有黑手。下车时,我俩一致认为:这个世界需要改变。

【250】 查德拉斯是位于格利玛和瓦尔德海姆市之间的一个村庄。瓦尔德海姆市因 20 世纪 50 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行径“瓦尔德海姆审判”而闻名。查德拉斯这里有与保岑齐名的东德最臭名昭著的监狱,纳粹时代有将近 3 000 病人在这里被杀害。如今这里是教会医疗救助机构,除了心理治疗所以外还有一个癌症中心和一个肺病治疗中心。为了正视过去那段黑暗的历史,人们建立了一个小博物馆,介绍这里曾发生过的事情。我想寻找的是另一段黑暗的去,寻找痕迹和证据,前面引用到的斯塔西指令,“创造性地、有区别地利用心理恐怖的方式方法,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恰恰在这种偏远的地方会得到贯彻执行。然而我什么也没有找到。数据保护,文明社会的一大成就,在查德拉斯让我的好奇心就此止步。

那时对心理恐怖的指令不加追问的斯塔西执行者们现今为最后一战,没有人民参加的“人民怒潮”,集结在 ISOR 和 GRH 协会里。前一个是“保护前东德海关及武装组织成员社会权益动议协会”的缩写,武装组织囊括了海关、警察、军队、民兵和斯塔西。GRH 这三个字母表示的是“权益和人道支持动议协会”,

其主要成员是从前国家安全部的高级军官,包括安全部解体前的最后一任部长,沃尔夫冈·施瓦尼茨同志。

ISOR 主要关心社会权益,GRH 管的是“政治司法的受害者”。有关税务当局承认过时人物们的这个组织是公益性的,因此向其提供的捐助可以免税。ISOR 也得到德共的支持,它的成员估计有 26 000 人,以斯塔西高官为主的 GRH 的人数大概在 1 500 名左右。理查德·施罗德认为:“这是一直还在舔伤口的那些人的组织。打算禁止它的人,是不相信民主。那样他们就赢了,我们就输了。只要不违法,在一个民主的法制国家内任何蠢事都得允许。让我觉得可气的是,居西和莫德罗也去他们那帮家伙那儿演讲,这不够意思。”【251】

ISOR 和 GRH 没有什么危险,沃尔夫冈·波梅尔补充道:“他们只是利用了民主的各种可能性,这得容忍。”掌管斯塔西成员姓名、职务和行为档案的最高领导玛丽亚娜·贝斯勒也认为没有必要让宪法保护部门监视这些过去的监视者。这些组织虽然坚决地淡化过去的不公,竭力地美化以往的一切,并由此洗清自己那份责任和罪孽,但是我们只需保持警惕,政治上予以监视就够了。ISOR 和 GRH 还有很多默默的支持者,其准确数字无法调查,他们虽对东德有保留,但仍愿意强调,从前也的确不是什么都不好。

这类不诚实的男性成员组织中的第三个是“和平侦察员动议小组”,简称 IKF,也是注册协会。动听名称是个假象,曾被米尔克赞誉为“秘密斗争战线上的激情爱国者和英雄”的斯塔西工作人员和人民军的军事侦察员其实就是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有的间谍和暗探。如今他们最主要的斗争是反对统一造成的不

公，“向受到刑法制裁的侦察员提供支援”。

- 【252】 “东部德国协会管委会”对自身定义的复杂说明是致力于“战胜统一进程中出现的歧视、缺陷和不足的动议和协会的联合体”，上面提到的三个组织都在其中。无可救药的东德人的这个联合体得到左翼党，前身是民社党的支持，常有党的积极分子作为嘉宾在这些组织的集会上发言，因为他们知道，在这个顽固不化的群体中，聚集着他们最忠实的选民。所有其他政党都被这些人骂为“西化”，所以左翼党在东部是现代的抗议党，成了那里的大众党，在很多民调中都排在社民党和基民盟之前。他们的口号“过去我是什么样，今后仍是什么样”虽不是所有人都赞同，不少人都对自己的过去做了反思，有时会改换一下投左翼党的票，但还是有不少和 ISOR、GRH 那伙人想的一样。

虽然这些组织的核心在瓦解，成员数量在持续减少，斯塔西帮凶们周围只有数千积极分子在活动，其他人只是在投票室为他们画个圈，但是积极活动的这些家伙大声疾呼着要为他们热爱的东德平反。东德的时候，他们不仅有权有势，而且可以滥用权力不受惩罚；不像现在，虽义愤填膺、但仍然得无可奈何地靠深恶痛绝的阶级敌人每月划拨的养老金过活。

- 提供假信息曾是他们所受训练的一部分，现在领导他们的又是像东德副检察长汉斯·鲍尔(Hans Bauer)(GRH 主席)这样的法学家，他们懂得为我所需地充分利用自由德国保障的权利，言论自由的权利。他们矢口否认过去的所作所为，用粉红颜色美化过去的工农乐园。他们这样做不用冒任何风险。对于被他们毁了一生的人来说，那是人间地狱。他们可以继续用所习惯的敌我思维考虑问题，即使得承认过去不是一切都好，那也是
- 【253】

罪在统一社会党。国家安全部只不过是党的利剑和盾牌，持剑拿牌的是别人。

从意识形态来说，不应把这些人 与臭名昭著的“前纳粹武装党卫军队员互助会”，简称 HIAG，相提并论。那是战后 5 年在西部成立的，以希特勒贴身警卫队最后一任指挥为首，聚集了褐色专制的残渣余孽。党卫军罪犯从身体上消灭人，另一些罪犯只从心理上摧毁。HIAG 的目的是要求把党卫军视同军队，它的成员一度达到过 4 万人，1992 年时因成员过少而解散。GRH 和 ISOR 现在要求的东 西，本质上来说与 HIAG 如出一辙。

有时，这两个极端派会在一个最低点上相遇。极右分子认为奥斯卡·拉封丹在“外交政策上绝对是纯而又纯的国家民主党立场”，这大概不会让他觉得受了恭维。另外一些反动的极端分子也欣赏他，德国共产党有保留：“继承威利·勃兰特传统的人，不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为方向。”这话他大概爱听，因为他视己为勃兰特的真正继承人。后来他意识到了与德共太近的危险，拒绝再与他们亲密接触并要求他的党在选举时注意，不能在左翼党名单上出现共产党员。左翼党联邦委员会主席迪特马尔·巴尔奇(Dietmar Bartsch)则与右翼划清了界线：“新纳粹和左翼是水火不相容的。”

老纳粹在东德有时是可容纳的。东德最高法院的第一任院长库尔特·舒曼就曾是纳粹德国军队的军官，1937 年加入了纳粹党。东德的结盟党国家民主主义党主席海因里希·霍曼(Heinrich Homann)一直到 1989 年始终是东德国务委员会委员，1933 年他就已经是忠实的纳粹党员了。弗里德里希·保卢斯(Friedrich Paulus)元帅曾是希特勒的忠诚下属，1943 年斯大

【254】

林格勒战役后被俘进入苏联战俘营,在那里成为自由德国联盟的成员,也称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是被俘德国军官和流亡的德国共产党人在苏联的组织。保卢斯是后来东德人民军军规的起草人之一。东德解体前,人民军和边防部队总计 377 名将军和海军将军中有 54 人在希特勒的军队中担任过高级军官,一人甚至当过将军。

斯塔西用多年时间建立了一个“纳粹档案”,里面有 80 万张卡片,其目的虽然是为了尽可能彻底和有效地将在联邦德国未受惩罚却重新获得职务和尊严的纳粹分子揭露出来,显示东德是反法西斯的、有更高道义的德意志国家,但同时也将纳粹分子为己所用。集中营的刽子手和屠杀犹太人、游击队的指挥官被起诉被审判,另一些生活在东德全面监视之下很容易被找到的纳粹,被要挟成为国内的暗探或作为间谍被派往西方。东德剧变后,这种双重标准的典型事例才大白于天下。

如今这些档案都保存在联邦档案馆。多年来,纳粹不可能仅仅存在于西部的推测,在这里得到证实、有案可查。历史事实驳斥了反法西斯、道义更高德意志国家的神话。“统一社会党始终没有勇气承认东德社会留有第三帝国遗产,这里和西部一样也生活着纳粹的追随者和帮凶”,这是亨利·赖德在其所作【255】“纳粹凶犯与斯塔西”的调查中得出的大胆结论。赖德是贝斯勒局的工作人员,负责系统研究东德的秘密历史政策。他说有事实证明:“国家安全部系统地、有意识地在东部和西部征用纳粹分子,甚至包括杀人犯作为线人和间谍,同时让他们免受调查和独立法院的公正审判。”这么说有些过分,和联邦刑侦局、情报局和外交部不同,斯塔西在人员上和纳粹时期确实没有连续性。

除了把西方骂为帝国主义、战争狂和无可救药的纳粹之外，东德并没有进行过对纳粹和德国历史的公开反思，因而“几百万东德人都可以逃离历史责任而自愿服从于一个新的专制体系，从以往斯大林主义的经历和方法中他们知道，只要全身心投入新制度就得到了救赎和赦免”。东部历史学家奥拉夫·格罗乐(Olaf Groehler)在其对东德的批判性回顾中补充道：“不问你和纳粹及其思想意识的距离有多远，只看你对新制度的效忠，拿出实际行动的效忠。”

联邦德国的民主是在战后由盟国直接引进的，对褐色历史的真正反思在20世纪60年代才逐步展开，是解放20年后的事情。从那时才开始成长起西部的文明社会，当时，警察对《明镜》周刊采取的一次秘密突袭是个直接导火线。1962年的那次行动让人想到纳粹手段，出版人鲁道夫·奥格施坦(Rudolf Augstein)遭拘捕。在觉醒民众的游行示威和有关部长弗朗茨·约塞夫·施特劳斯(Franz Josef Strauss)辞职后，一步一步，但无可阻止地跌入所谓《明镜》开启的“卖国深渊”的，是过时的国家政权，富有战斗精神的民主取代了阿登纳式的民主官僚。【256】

到1968年西德大学生示威、新一代脱离父辈之前，东德对纳粹罪行的做法始终被视为榜样。有一本褐皮书详细记录着联邦德国领导中不少人的纳粹党员号以及在党卫军中的级别，把这些细节提供给西德媒体的做法一直很成功。其背后自有企图。每在联邦德国揭出一个丑闻，东德的形象就提升一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国内的批评者最好也能用这种办法解决掉，但不是每次都能成功。在曾经的招牌科学家罗伯特·哈维曼身上，他们也想找出纳粹时期的蛛丝马迹，以便从道

德上击败他,但什么也没找到。

1980年2月13日,安全部第九司的迪特里希·穆雷格(Dietrich Muregger)少校在波茨坦政法大学完成了题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真相不仅指结果,而且包括过程。调查真相本身必须真实》的毕业论文,内容主要涉及法西斯违反国际法的种种罪行,所作分析以安全部纳粹档案中的材料为依据。调查真相本身就应该真实。

是啊,马克思。

拉他做大旗的,把谎言当作真理重复无数遍,直到它符合固【257】定的模式。比如1953年6月17日起义,工人在柏林和其他地方走上街头,底层的人们起来抗上。起义在苏联坦克的帮助下被血腥镇压,死了很多人,很多人遭逮捕,被公开审判,被判重刑。这种事谁都可能遇上。当时的司法部长马科斯·费希纳(Max Fechner)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不对所谓肇事者头目,实际是罢工委员会领袖,提起诉讼,结果他即刻被解职,被拘捕,进而被判了8年刑。

虽然真相是人民起义,但这个真相不能正式存在。按照安全部的方式寻找出的真相是:“1953年6月17日发生的事情表明,这一次图谋政变的肇事者头目及积极参与者大部分是以前的法西斯分子和纳粹政权的追随者。”

从那以后开始把散落在各个专区有关纳粹党卫军、盖世太保、纳粹党员和干部,帝国司法部和人民法院的有关材料收集到柏林霍恩朔豪森集中管理、分析和使用,目的是为了更准确地揭露有法西斯历史的人,但只是在西德和西柏林的政党、经济和军事机构中工作的那些。在东德国土上活动的视需要另派用场。

早已不是少校的迪特里希·穆雷格在位于达尔维茨-霍普

加滕的联邦档案局工作，统一后，纳粹档案全部存放在那里了。在递交了毕业论文 20 年之后，他摘下意识形态的眼镜，以事实为基础，重新阅读了那些资料。材料他都很熟。作为九司的领导，检察院起诉纳粹罪犯的材料都是他和他的同事们准备的。【258】至 1989 年，东德共有 165 人因战争和反人类罪经国家安全部调查机构调查后被起诉和判刑，因证据确凿，无须做什么手脚。

穆雷格曾因工作出色被授予“战友勋章”。他掌握的安全部现有资料列表上名目很多，例如：外交部档案管理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党卫军骷髅营的处分记录，那里的刽子手保尔·萨克夫斯基(Paul Sakowski)的日记，德国共产党间谍名单，安全部有关联邦议员的材料，等等。有关统一社会党档案的标识只出现了一次，很多专家都认为那是一颗过去留下、埋藏至今的定时炸弹。

这个由大批密探和一个完全听命于它的司法陪伴的党在 1953 年起义后毫不留情地控制着整个国家的稳定。大多数人都以沉默表示了赞同。曾活跃在被他们称为社会温暖的这股污流中的国家干部如今都钻进了 GRH 和 ISOR 这两个组织。除了向别人施压他们没学过干别的。因此，当 1989 年人民把他们推翻的时候，他们一下子傻眼了。

现在，他们又大喊大叫着要求赔偿，要求平反。1989 年成立的东德第一家独立出版社出版了“东德历史研究”系列丛书，其创始人克利斯托夫·林克斯(Christoph Links)提出不对这些年迈的极端分子实施职业禁止^①，宪法保护局不对他们进行监

^① 原文 Radikalenerlass 是 1972 年联邦德国公布的一项法律，内容是参加敌视宪法组织的人不能成为国家公务员，老百姓称之为职业禁止令。

视,因为那样反而抬举他们,给予他们本不具有的重要性。他让更有力的证据来说话。比如安全部从没支持过恐怖分子的说法,就很容易被驳倒。没有斯塔西的帮助,红军旅的恐怖分子不可能在东德开始新生活。又是谁把炸药带到西柏林交给“卡洛斯”——恐怖分子,炸毁了法国文化中心?

后悔和认识错误对这些同志来说和当年褐色同志一样陌生。将军、大校、上尉、士兵都认同和团结在从前的团队精神下。对过去发生的、他们都积极参与、坚信不疑的事情闭口不谈,是他们的一种荣誉。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维尔纳·格罗斯曼(Werner Grossmann)说:“真正知道的人,什么都不会说,现在不说,今后也不会说。这是他们的荣誉所要求的。”

没人知道,该不该拿这些老头子当真,他们多年织起的这张网是只给他们自己在感觉不安的民主环境中以支撑呢,还是他们的观点,“东德是个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的国家,只不过被一道墙包围着、由一个党领导”,在人民中也能获得反响? 1989年秋,人民已把自己从这些带给他们“幸福”的人手中解放了出来。这些老头子们的手表不光走得和别人不一样,还倒着走。比如《新德意志报》刊登的为其功勋成员埃贡·克伦茨举办的题为“东德——非良政国家? 西德——法制国家?”活动的公告中明明写着19点开始,可又被叫作日场活动。莱因纳·艾波曼说,这些人,其实只是可以忽略的历史沉渣。

令人感到安慰的是,他们已是一个濒危物种,这一点,ISOR本身也在告诉人们。他们的协会杂志上,编委要祝贺75岁到95岁生日的忠实会员可以列出好几页。他们的前途已经成为过去,因此不再对当今构成威胁,问题会依自然规律自动解决。

年老的战友们聚会时，不仅在一起抱怨自身的境遇，也一起自娱自乐，吕可夫-达能贝格区柯伦泽消防队乐队的 16 名成员会为他们的舞会伴奏三个小时。【260】

他们认为自己身受其害的最主要的是所谓“退休金惩罚”问题，凭从前的奉献和工作应该得到比厌恶的联邦德国目前所支付的更高的养老金。凶恶的胜利者对斯塔西专职工作人员的退休金制定了封顶的标准。章程写明这个“不谋私利”的协会之任务和目的是在前东德人民军和安全部工作人员因“以前的工作而社会权益受损”时提供支持，要求“承认以前在东德获得的合法养老金权益”。

在一个法治国家，为此而斗争是他们享有的权利。但是，受害者把施害者的这些要求视为无耻和嚣张更是可以理解的。全德的纳税人每年要拿出 15 亿欧元支付从前东德武装组织成员的附加养老金，而统一社会党的受害者们需要等待 17 年，在第三个有关“清除统一社会党之不公正”的法律中，才规定他们每月可以得到 250 欧元作为“曾遭监禁的特殊补贴”，但得提供确有需要的证明，并且必须是出于政治原因在东德至少坐过半年牢。社民党建设东部部长沃尔夫冈·蒂芬泽（Wolfgang Thiefensee）称这个由大联合政府作出的决定是个“非常好的谅解”。2008 年 3 月提出了 45 000 份申请，得到批准的只有 20 000 份。

读一读恰恰在每年统一日发表的“抗议性决议”，就不得不对 ISOR 表面高尚、符合社会惯例的目的表示怀疑了。决议中这样写道：

【261】 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司法,资本主义被全面照搬到了民主德国的土地上,……在社会福利削减,教育水平低劣,大部分人民的贫困化和小部分上层肆无忌惮的敛财这些残酷的资本主义现实面前,幻想全部破灭了。伦理道德价值成了贪婪追逐利润的牺牲品。民主德国积极的和平政策为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所替代,……对不同政见和行为的迫害在加剧,……民主德国被诬蔑为专制,……几十年里积累起来的国家和人民财产被有意廉价卖给西德和外国企业甚至被毁,……

我真想问问学识渊博的格雷戈尔·居西,读到这样的文字,难道不会想到马科斯·李伯曼(Max Liebermann)面对纳粹冲锋队时说的那句名言:“我吃不了那么多,我想吐!”我知道不能这么问,于是我问他,为什么到 ISOR 在柏林特莱普托和科佩尼克举行的年会上去讲话,都讲些什么。“我在 ISOR 那儿谈养老金问题,他们只关心这个。如果讲历史,我就对他们说,假如你们不学会对自己的历史作自我批评,那你们就不要奇怪,别人来为你们作。斯塔西没有把国家变得更稳固,更多的是正相反,毁了它了。”但是另一方面,个人历史上有错也不能导致削减养老金呐,“就是对杀人犯的判决中,你读到过养老金要减半的吗?”

报纸上写的和实际情况当然不同,什么新左翼和老顽固不搞团结互助,不是这么回事。居西说,他从来都直言不讳,对左翼党的拥护者也同样。他告诉他们不要再喋喋不休四处抱怨了,应该为已经经历和活着经历的一切感到自豪才是:纳粹专制,【262】 四国占领,东德,德国统一。一般来说这需要五代人,现在你

们一辈子就都做到了。在一次基层会议上,有一个人站起来说,格雷戈尔,你一直对柏林墙持批评态度,我今天要为柏林墙说句话,我住的那个地方,原来有10个医生,后来只剩6个了,假如不是建了墙,我们的医疗体系不是要崩溃了吗?你说呢,格雷戈尔?

居西先生,你是怎么回答的?

“是啊,我对那人说,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相信我们有很多个生命呢,还是只有一生?当然只有一生。于是我说,如果有五个生命,我可以理解,你对一个大夫说,你得用一个待在东德,另外四个随便去哪儿。但只有一生,你怎么能规定他就得留在你的城市里呢?作为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你的出发点就错了,你应该好好想一想,怎么做才能留住医生。你开始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你已经失去道义了。”居西建议他不妨学学格雷戈尔同志:“1990年1月我是站在天主教会一边的,它经历了宗教审判以及后来的一切,耶稣的山间布道存在两千多年了,70年的专制和公正社会的思想比起来算得了什么呢?”

GRH老战士们活动不止于战友聚会,会上他们相互鼓励,认定从前是多么美好。他们高声叫喊,他们肆无忌惮,甚至恐吓威胁。他们的主席汉斯·保尔骂别人篡改历史,称那是“不会经过重复变为真理”的谎言。他指的是在柏林霍恩朔豪森从前斯塔西的军事禁区树立的纪念碑,标明那里曾是东德国安全部的据点和监狱,这是他们企图否认的一段黑暗历史:“东德的40多年中,这里曾关押过4万多人。”党的忠实法学家【263】鲍尔说:“德国共产党在西德遭到禁止50年,我要问一问,为阿登纳司法的政治牺牲者竖立的纪念碑在哪里?”

1990年以后,斯塔西监狱改为纪念馆,任馆长的胡贝尔图斯·克纳博对东德持过分尖锐的批评态度。他把共产党与纳粹相提并论的观点也遭到严肃批评家的质疑。东德的老干部和怀旧者们对他自然更是深恶痛绝。“米尔克驯养的这些家伙(《每日镜报》于尔根·施莱伯语)”利用在那里举行的一次讨论,大发淫威。他们不时高喊着打断别人的发言,辱骂阶级敌人,嘲弄受害者。从前的受害者们不知所措地站在一角,昔日的恐惧又重新爬了上来。这些人在那里满嘴喷粪,但是这也受言论自由之基本权的保护。不光是他们喷吐出来的东西令人作呕,坐在台上一声不吭、无动于衷的那些人也同样,其中就有柏林市政府民社党文化委员托马斯·福里尔(Thomas Flierl)。

在霍恩朔豪森、保岑和莱比锡南郊都可以亲历东德历史,对此无论是后来人还是过来人都有兴趣。克纳博说,很多参观者在参观了这些作案现场之后才真正明白什么是专制。他没有忘记说明,每年20万的参观者中绝大多数来自老联邦州,2007年,原东德地区有2万人来看了他们及他们的父母所逃离的时代。

这也是统一德国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有些人因为曾许诺给他们的美好未来在当前看不到而美化过去,说现在感觉比那时候还坏,这么说那时候应该只有坏了。他们忘了,这么一来就和

【264】过去的压迫者搞到一起去了,那些蛊惑人心者正是利用了人们的失望和沮丧,为自己作宣传。另一些人从死不悔改者身上感觉他们的偏见得到了证实,跟不老实闭嘴、又疯狂叫嚣的斯塔西无赖是无法建设民主国家的。

有一次,前斯塔西官员和人民军军官说是要作为时代的证

人到丹麦奥登赛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于是便以免税购物之旅的方式组织大家前往，来回路费共 50 欧元，分乘两辆大轿车。他们在车上讨论好了策略，到了大学礼堂便开始实施。自我批评是没有的。原本脸色灰白的家伙们面红耳赤地站在麦克风前义愤填膺，口口声声说过去怎么好。其中甚至来了两名从前的高级间谍，他俩和其他聚集在这里的专职工作人员一样，都说自己那时只有一个想法，为和平而战斗。为什么没人想到给他们颁发诺贝尔和平奖呢？真该提出这个问题，不过克纳博的挖苦更妙：“让这帮妖魔鬼怪作时代证人出场，就好比邀请本·拉登和他的同伙出席有关恐怖主义的会议。”

正直的人们对美化历史，死不悔改地否认罪责的行为进行了反抗。汉斯·约亨·福格尔建立、约阿希姆·高克领导的“坚持民主、反对遗忘”协会和莱因纳·艾波曼为主席的“清算专制联邦基金会”是他们的代表。这两位能言善辩的东边人很有影响力，老干部们不愿再提起的种种行径，他们俩都一清二楚，而且毫不犹豫地予以公开。他们不给这些人任何机会为过去的罪行开脱。高克说：“纳粹的种种罪行——屠杀欧洲的犹太人、吉普赛人，迫害和屠杀持不同政见者和社会边缘群体以及发动侵略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在我们的人民中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专制制度的不公正和迫害政策，毁灭民主意志，排挤个人自由，依靠强大的国家机器监视和压制大部分人民，对东德社会几十年的思想和行为同样有深刻影响。”

反对遗忘就要建立有战斗力的民主。无论在与法西斯主义还是统一社会党专制有关的纪念场馆，除了不要忘记，还得号召公民牢记，在保障权利的同时不能忘记自己的义务，“对于反民

主的专制主义及时、坚定地作出反对”。

艾波曼领导的这个成立于1998的基金会图书馆里，藏有34 000册有关东德和全世界各种形式的专制制度镇压迫害情况的书籍。他们工作的重点是举办各种展览和会议。基金会的人不怕跟东德的老干部接触，相反他们主动寻找交锋。他们把能言善辩的艾波曼派到台上去，他的针锋相对是出了名的，任何时候都有事实和数据准备着。

基金会每年450万欧元的预算来自统一社会党被收缴的价值7 700万欧元党产的利息，艾波曼很乐意提到这点，一边说一边冷笑着看着那些人的脸。他们明白他是什么意思。过去为现在出资的事情毕竟少见，清算过去的罪责和偿还遗留债务也很少能结合得这么巧妙。

【266】 顽固不化者们“我们又成为重要人物了”的喊叫声因其空洞无物而随风飘散了。他们热切盼望的，是执政的阶级敌人作出大声反驳，那将意味着，在熟悉的预制板楼^①里流亡近20年之后人们又把他们当回事了。但他们的希望大多落空了。他们既没有看到人民有什么反应，也没有收获执政者的反击。听到的只是自己喊声的回音，撞散在挡在他们头脑前的板子上滚了回来。

因为不肯正视历史，所以没有前途，他们是真正的失败者。ISOR和GRH的基层战友聚会时，他们相互证实，过去从未怀有恶意，一心只想做好事，这能给予他们现在的日子一点意义。人们没有理由为此不安。即使他们再次大集会，也不是像以往的五月游行那样，表示坚信社会主义的很快胜利，而只是为了显示

① 预制板楼是典型的东德时期建的住房。

至死不渝的团结互助。

如此看来,2006年11月马库斯·沃尔夫的葬礼是一次大集会。很多男人和为数不多的妇女在吊唁册和死者的黑白遗像前一边悼念一边庆祝他们的重逢。这实在是个绝好的由头。为向老领导告别,他的弟子们作了一番精心打扮,当年人们一眼便能辨认出他们来的黑皮衣和灰风衣这次都被留在衣柜里了,保留不变的是那充满怀疑地扫过周围的目光,看看是否在某个树丛或某棵大树后面隐藏着监视他们的阶级敌人,就像当年他们监视对方一样。假如我说,依我看,这伙退休的帮凶那肌肉下垂【267】的脸正是他们的招牌,未免过于苛刻,而且也的确是个侮辱了。

一身白装,在小教堂前点燃带来的蜡烛并肃穆站立的那个人,在当年可能会被警察带走羁押。他在脖子上挂了一个牌子,仅凭这点就很可疑,那上面有可能写着反动言论。现在这个牌子上仅仅写着:“感谢你,朋友加同志,马库斯·沃尔夫,安息吧!”这是俄罗斯大使,之前我在柏林某次高级招待会上见过他。那是在可以望见勃兰登堡门的一个楼顶,大使手持香槟,美丽的红发夫人陪伴一旁。在11月的这天,大使说,逝者的离去使德国失去了一个最优秀的儿子,俄国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朋友。他是著名反法西斯战士弗里德里希·沃尔夫(Friedrich Wolf)的儿子。父亲为躲避希特勒暴政带全家逃到了莫斯科,儿子从此为反法西斯和反战贡献了一生。

对此,可以像俄国大使弗拉迪米尔·科特纳夫(Wladimir Kotenev)说的这么看,但也可以不这么看。密密麻麻站在弗里德里希斯菲尔德中央公墓墓地间的这大约1500多人,都表示赞同地点着头。小教堂里面已挤得水泄不通,科特纳夫的讲话

外面也能听清并接受,不仅仅是扩音器的作用。之后左翼党主席洛塔·比斯基在马库斯·沃尔夫墓前发表讲话赞扬他说,1989年时,沃尔夫和汉斯·莫德罗一样,同属当时东德的希望之星,莫德罗听到这话时毫无表情,其他吊唁者只有站在前五六排的才听得到。他们当中不少人始终不能原谅“米夏”——马库斯·沃尔夫,1956—1986年东德国外间谍局局长对马恩列三【268】圣高尚信仰的背叛。其实他只是同三圣在地上的后人,比如米尔克、昂纳克和斯多夫之流拉开了距离。

比沃尔夫晚一年半去世的前斯塔西将军格哈德·奈伊伯就是一个冷气逼人、信仰坚定的施害者。沃尔夫的接班人维尔纳·格罗斯曼让我更加坚信,年迈不能成为某些罪行消灭时效的理由。他俩都视沃尔夫为叛徒。他以惊人的开放态度写回忆录,同意在胜者的电视访谈节目中为自己的书作宣传而不美化过去,为其应负的罪责被判刑(监外执行),在他们眼里,沃尔夫早就叛变到敌人那边去了。

这些来送他最后一程的人,当年曾满怀激情地跟随沃尔夫,那时他们都是很吓人的,现在,看着这伙黏黏糊糊的退休者真很难想象。在西方对手眼里,他们也是一支非常专业的队伍,称得上国际间谍活动中的佼佼者。他们的活儿干得很漂亮。

假如他们不是这么精干的话,剧变后他们也不可能那么快重新构建起联系网以及让绝大部分党产消失在古巴和瑞士之间。这是乌维·施密特在葬礼几天后告诉我的,他一直关注着他们。寻找遗失宝藏的猎手不拒绝向他们表示钦佩,但不意味着他会放弃追踪。他在过去20年间收集起来的案件虽然都陈旧了,但他的愤怒依旧新鲜:“街边的窃贼被抓、被拘、被判刑,

高档的经济罪犯请得来最好的律师，这些律师一露面，检察官就没兴趣起诉了，他知道准输。”

乌维·施密特虽然最讨厌阶级斗争的说法，但还是把这种【269】事叫作阶级司法。他见识过很多水平二流、甚至三流的检察官，但他认为，在对高层腐败所作的斗争中这并不是问题所在，主要是他们缺乏打破政治、经济界那张网的勇气。

他非常了解从前那些人的这张网。1997年以后，其中最严重的案件都已超过诉讼时效，国家从中得不到什么了，所以也比较容易讨论。其他那些在柏林以外的地方引起轰动的事件还在调查之中，比如莱比锡，那些事施密特不谈。他知道在法治国家应该怎么做：无罪推定。

所谓“莱比锡泥潭”事件涉及的是司法人员、政客、房地产商和妓院老板构成的一张腐败网，州宪法保护局为此做了长达15 600页的记录，绝非偶然地使用了“越位”作为标记。记录中充满了诸如滥用职权、儿童卖淫、裙带关系、走私、贩毒以及雇凶杀人和敲诈勒索等字眼，同时也记录了俄罗斯和意大利黑手党的行径，有高官出席的在市政厅举行的召妓聚会。

也可能只是几小块湿地，但说不定就是没膝深的沼泽；也许是恶毒的谣传，但有可能真是令人作呕的臭气。也许是政治迫害，某些记者很快就愿意相信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凡是不符合阴谋论的内容都筛出去。但也很可能真是涉及在统一的德国被揭露的无数形形色色案件中前所未有的大案，可与狼堡泥潭^①

^① 狼堡 Wolfsburg 是德国大众汽车公司总部，此处指2005年7月被揭露的大众公司大型贿赂案，其中涉及多个高管。

相媲美。

从未得到彻底澄清的统一社会党党产案自然属于其中之一。东德国家安全部的行家们素来就有制造虚假信息本事，要发现他们的踪迹有多难，托管局 1994 年登在报纸上的一则广告便是证明，上面用黑色粗体字写着：“通缉东德党产，提供有效藏匿地点信息者将给予 500 万马克酬金。”总的估计是，统一社会党和其他群众组织几十亿的资产中，还有多个百万逃脱了法律的追究，藏在某些户头和公司里。贪污者的手法可谓极端狡猾而高明。

手法确实高明。虽然 2000 年年底“政府及集团犯罪侦破中心”解散时，整体上对工作做了积极评价。来自联邦和各州的 500 名官员在 1991—2000 年间，共处理了 20 327 件个案，其中政府犯罪案 16 323 件，收缴了价值 25 亿马克的财产。但它与遗失不明的部分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这不是乌维·施密特一个人的观点。

1996 年，侦破中心给自己提出过雄心勃勃的任务，“侦缉民主社会主义党和其他群众组织，例如青年团、工会财产的贪污问题；调查前身为国营企业，现为责任有限公司的财产价值；调查将财产转移至奥地利和瑞士共产党企业的情况；侦缉前国家全部财产贪污问题；调查人为操纵房地产、实施货币同盟政策中的欺诈行为”，应以“协调合作”的方式进行的工作涉及可追回金额 200 亿马克，与之相比，实际追回的只是 1/10 多一点。

整个调查是 1990 年开始的，当时针对统一社会党及后续党民主社会主义党 62 亿（东）马克的流动资金，根据调查方的了解，其分配情况如下：基金会参股 4.37 亿，党的工作人员一次性

补偿 3.8 亿,党员养老保险 7.5 亿,民社党各县委(包括用于成立公司)4.56 亿,党员建立公司借贷资金 4.9 亿。货币联盟后换成 2.06 亿西马克的剩余部分被用于新联邦州的建设。【271】

1991 年 4 月 1 日被暗杀的托管局局长德特勒夫·卡斯滕·罗威德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尽快私有，彻底改造，谨慎关停。”他们的总结报告对 4 067 个在各党和群众组织手中的房地产和企业有详细的介绍。在统一社会党，后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党名下有 901 处房地产，德国自由工会名下 1 428 处，农民互助联合会名下 1 435 处。但是，那些看起来无懈可击的责任有限公司的新老板中有多少实际上是原来业主的傀儡或纯粹就是洗钱机构，托管局的人就不了解了。

比如当年由东柏林 NOVUM 贸易公司存在瑞士账户中的(换算下来)2.37 亿欧元，按照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当属德国国家资产，国家很想把这笔钱用于东部建设，但是 NOVUM 的股东鲁道尔芬妮·施坦特林(Rudolfine Steindling)要在瑞士再次起诉，一来这需要很久，二来因为没钱，她也不准备付迄今为止已发生的 500 万的诉讼费。从 1990 年开始，在不同的法庭和各个级别的法院传问了几百名证人，包括东德最大的外汇创收人亚历山大·沙尔克-格罗德科夫斯基，当年他统领的商业协调局下属 67 个东德企业和 108 个在西欧各国的企业，所有企业都有正当的名称。

NOVUM 亦如此吗？

被同伴称为“红色芬妮”的施坦特林女士顽固地宣称，那几百万欧元不是巧妙伪装的东德资产，而是奥地利公司在与东德做生意时付给 NOVUM 的佣金，始终是奥地利共产党的财产。【272】

东德外贸部长格哈德·拜尔也曾是芬妮的顾问之一。

听了这话施密特先生哑然失笑。

典型的东部问题,不是吗?

还真不是,西部公关专家,大众公司前发言人克劳斯·科克司(Klaus Kocks)博士认为,以司法部门所掌握的狼堡腐败案为例,也是相互认识,相互帮忙,织起一张网,与东部的老干部们相比,找不出什么大的区别。

另一件丑闻案亦如此。事关 8.2 万块土地和国家的任意处置。勃兰登堡州的州长普拉采克显然很震惊,甚至公开为此道了歉,承认他的州得到了非法收入。背景是,战后,共产党按照自己的思想意识没收了大地主的财产,把它们分给了被驱逐到这里的人和新农民。1990 年以后,按照法治国家的法律规定,业主都得进行土地登记,而只有仍然从事农业的新农民后代才有资格这样做。这条规定一直实施到 2000 年。

还有 1 万块地找不到主人,于是财政部就把勃兰登堡州作为业主登记上了。被剥夺了财产权的继承人给联邦最高法院打电话,法院说这是违规的,不符合法治国家的形象,“令人回想起东德时期决定财产管理人的做法”。在老干部们的红网里,这件事被当作证明从前在他们那里合法的东西不可能错的例子。

【273】 在那个夏日的午后,在莱比锡南郊,虽然脑海中依然留有死刑刑场的画面,但我还是跳出过去的历史,来到街对面的一所房子前按响了门铃,先是底层的一家,后来又按了楼上一家的。我问他们,住在这里的人以前是否注意过对面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当然在他们的追问下我也解释了为什么对此感兴趣,手指

着那扇黑色的大门,我想知道门背后曾发生过什么。他们的反应是大为吃惊,伴随着激烈的抗议,告诉我说,如今来提这种问题的人,应该从哪儿来滚回哪儿去,老老实实在那儿待着。这让我想起另一些德国人来,在听到对西部现状的批评意见时气愤地建议提意见者回到东边去,不喜欢这里就别待在这儿。在这点上,看来原本就是一样的。

离开这儿,我只想快点离开这儿。

第八章 能言善辩的无权者

【274】 极端诱人的书名引起了我的好奇,《世界之巢》。指的是莱比锡,那里从前每年至少举行一次的书展是语言文字的天下,在那儿总会发出一些前所未有的声音,令斯塔西的监听者们跟不上趟,更甭说逐字逐句记录下来。尽管如此,斯塔西总部钉放情报员报告的夹子里还是得到了足够的材料。因为,无论是台上朗读的诗人当中,还是烟雾缭绕、酒气熏天的聚会上都有他们的兼职工作人员,不是伪装成职业作家,就是文学爱好者,有男有女,把他们听到的一一写下来。此外,所有有外国人住的饭店里还有窃听器等在那里,不是装在夜里常进行更深入谈话的床上,而在电源插座里。

《世界之巢》书中的很多照片上,可以看到1970—1990年间莱比锡的文学活动中那些渴望书籍的东德人,心怀感激地在干部们把书抢光前拿走西德的出版商们已为他们摆放在随手可取之处的图书。有很多抓拍的镜头,上面有不用词语只玩韵律的,有直观的变语言戏法的,有巧舌如簧的,也有强奸词义的,东边人、西边人都有,都是在两德近距离接触时摄下的。被引用到的作家们还能回忆起与热心读者的愉快见面,或许是与愉快女

读者的热心见面,充满蔑视地讽刺了毫无幽默感的东德边防人员【275】,百般刁难地检查返乡的西德作家,好像能翻出卷在他们脏衣服堆里的瘦小东德同行。

用以前的照片,配上今天写的文字,文章分别出自作家彼得·赫尔特林(Peter Härtling)、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米歇尔·克吕格(Michael Krüger)、福尔克尔·布劳恩(Volker Braun)、弗里茨·鲁道夫·福里斯(Fritz Rudolf Fries)和埃里希·洛斯特(Erich Loest)。光看照片不知底细的人,会以为莱比锡那时真的是一个面向世界的开放城市。埃里希·洛斯特对此最了解,那时,他亲身经历了不按规矩说话的人会遭遇什么。因为发表了自由见解,他在臭名昭著的保岑监狱坐了7年牢,从此与写作同行,只要是党员的,关系都很糟。尤其是那些在莱比锡书展上被推崇的。“在经过筛选的听众面前,举办导演好的文学活动,制造开放效果。那边,是可恶的奸细福里斯,这边,库尔特·哈格伸着手指头说,马克思主义是最高权威,因为,当时我正跟霍卜克因出境和退出作家协会闹意见,舒尔茨这个蠢货出卖了我。我在70年代还不是这样。”

东德艺术科学院院长、中央委员、导演曼弗雷德·魏克维尔特(Manfred Wekwerth)至1989年始终是忠于党的文化人,在国家安全部兼职工作人员名单上记录的就是“曼弗雷德”。1990年7月,艺术科学院理事会举行第一次民主选举时,他承认,东德大多数艺术家都被党利用过,并不需要施加太大压力,很多人便就范了。他说:“我们确实需要思考和扪心自问,哪些名人和批评意见没有被利用作国家的招牌,对外起美化作用。”

埃里希·洛斯特从没想过报复毁了他生命中那么多年的

【276】人。复仇对他来说是一种陌生的感觉。但他也不轻易原谅。从前那些背地里干坏事的、自由思想的蔑视者,如今又蠢蠢欲动地跑出来,混迹于他们的牺牲者之中。这时,洛斯特会把他们指名道姓地揭出来。比如情报员萨沙·安德森(Sascha Anderson),“他的两面派行径一旦暴露,他还不得上吊或移民澳大利亚或新西兰,到那儿放羊或看小铁路赎罪。”“年迈的文字游戏者”赫尔曼·康德(Hermann Kant),他总是话说一半,通过省略来说谎。东德当年的文化部副部长克劳斯·霍卜克(Klaus Hoepcke)是“我们同他斗争而获得的自由的受惠者和享用者”。弗里茨·鲁道夫·福里斯,“我一直把他当朋友,他却把我出卖给了斯塔西”。

他知道,莱比锡书展期间的朗读会是斯塔西关注的重头戏,大多数东德作家是忠于党的路线的,也都习惯于各种特权。“假如政治家们把斯塔西档案成功销毁,我们就不可能知道福里斯、康德、安德森这些告密者的行径了。包括蒂尔泽,躲在他的避风港里度过了东德时期,在档案问题上最好少插嘴。”

化名“弗里茨·穆勒”的斯塔西兼职工作人员(斯塔西对此的正式称谓是“对被怀疑有敌对行为的人进行监控的非专职工作人员”)萨沙·安德森,被沃尔夫·比尔曼在1991年获毕希纳图书奖时的致辞中称为无赖。如今,他生活在西部的法兰克福,为银行办展览,用笔名为出版社制作图书封面,经过治疗后又重新开始了写作。他毫无保留地承认自己的罪责,承认出卖了同行,但被出卖者不买他的账。1984年离开东德以后生活在西柏林的女画家科内利亚·施莱默(Cornelia Schleime)曾是安

【277】德森的朋友,2008年她出版了小说《远离》,书中有个人物,简直

就是安德森的化身。当女主角(和作者本人一样)在剧变后才从档案中得知当年出卖自己的是何许人也时,几乎崩溃了。

其他告密者,比如历史学家卡尔海因茨·沙德利希(Karlheinz Schädlich),向斯塔西报告过京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和自己的兄弟汉斯·约阿希姆·沙德利希(Hans Joachim Schädlich),其双重身份被揭露后,亲自向受害者表示道歉。但对某些人来说,显然已经太迟了。有一个诗人出于恐惧发了疯:让大夫把他的牙齿全部拔掉,因为他坚信,某个牙医曾按照斯塔西的指令在他的补牙充填物里安装了微型麦克风。

卡尔海因茨·沙德利希自己2007年12月也开枪自杀了。

坚忍不拔的好事者洛斯特在其小说《尼古拉教堂》中为英雄城市莱比锡和它的“89公民”以及和平祈祷发起者、正直坚强的牧师克里斯蒂安·付勒(Christian Fuehrer)树碑立传,但就是不原谅情报员们几十年来“对人灵魂的摧残”——作家于尔根·福克斯(Juergen Fuchs)语。他知道,米尔克手下的行动队信不过那些能言善辩的人,即使是乖乖地跟着统一社会党调子唱歌的也信不过。因此,至东德解体,共有1500名斯塔西兼职工作人员耕种文化这块地。就连摄影师的作品也都要一一检查,看“我们的人”是否出现在不希望看到的地方。比如摄影家哈拉尔特·豪斯瓦尔特(Harald Hauswald)的作品就属于不希望看到的,他被斯塔西以“骑车人”的假名进行监视。豪斯瓦尔特拍了不少站在破旧房子前的东德人,这被认为是对社会主义住房建设的诽谤。情报员们知道他们自己在做什么,他们也清楚,为什么对运用文字的需要比对画家、音乐家看得更紧。文学和戏剧是最后的反抗之地,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可以公开表达的

能性了。

托马斯·朗霍夫(Thomas Langhoff)是1991—2001年间柏林德国剧院的院长。他给我讲了在办公室阅读斯塔西档案的那些长夜,为的是了解剧团里斯塔西人员的情况。他觉得这是一个正直的人对那些曾被监视者的义务。他跟每一个被查出的斯塔西情报员都亲自谈了话,之后才做必要的决定。

因抗议驱逐沃尔夫·比尔曼而在1976年被开除党籍的京特·库耐特1979年去了西德,后来自誉为能言善辩的文化特别观察员。他说:“那个来找我谈诗的年轻诗人其实是蒂森多夫少校派来的斯塔西,据说他自豪地声称我跟他谈了5个多小时。东德出版社我的编辑报告过我的情况、我的计划、我的感受、我的政治见解、我夫人的情况。同行里也有积极努力打探我的,东德作家协会前主席也不例外,在与斯塔西军官的一次谈话中也对我发表了意见。不过,他写书时所缺乏的想象力再次困扰了他,他报告说:库耐特两口子,因为要离开东德,哭了一天,……这个赫尔曼·康德,真会搞笑。”

和库耐特一样,洛斯特也一再表明他对告密者的蔑视,尤其是当他觉得有人想把过去的罪责淡化,把负罪者的罪行洗清的时候。拥有达达主义式幽默的阿道夫·恩德勒(Adolf Endler)

【279】对两德的制度都不愿顺从,因为他既憎恨法西斯分子,也憎恨伪善的反法西斯分子。1979年,他和约莱克·贝克(Jurek Becker)、克劳斯·波赫(Klaus Poche)、克劳斯·施莱辛格(Klaus Schlesinger)、库尔特·巴尔奇(Kurt Bartsch),还有前面说到的埃里希·洛斯特一起,因为给昂纳克写了一封抗议信被开除出东德作家协会。他根本就不参与《世界之巢》,认为那是

兜售“官方的文学史”，是被文化部“作了手脚”的。他对《时代》报说，这书也可以让当年东德的文化部副部长克劳斯·霍卜克当出版人来自吹自擂。他在自己那本名为《帮凶》的书中表示，从根本上说，东德是一个骗子当道的社会，存在着一张巨大的行贿和非法交易关系网。以日记片断和日常记录形式写成的这本书是病人膏肓的东德最后发出的声音。

假如我按这个说法，把莱比锡市议会左翼党议会党团主席福尔克尔·库洛(Volker Kuelow)称为骗子的话，可能得为此承担法律责任。我还是不这么说了。统一社会党员库洛不仅曾当过东德的国外间谍，而且在“贝尔瑙”和“奥斯塔普”的化名下出卖过莱比锡大学1989年1月散发传单的学生。传单提醒当权者，被他们奉为偶像的罗莎·卢森堡始终主张给予人持不同意见的自由。一个如今在莱比锡行医的女外科医生是当年被他出卖给斯塔西的大学生之一。这段历史曝光后，库洛道了歉，说从今天的角度看，他以前的某些行为确实越过了“人的道德界线”，但是他拒绝为此辞职。女医生对此丝毫不觉意外。她说：“像库洛这种根本不该当议员过优裕生活而应该去卖烤肠的家伙，任何制度中都存在。”

像他这样的确实有成千上万，而我单单把他拎出来，可能是【280】因为他称自己的职业是“自由记者”吧，这号人让每一个自由的记者痛心。此外，他还是萨克森州议会科学、教育、文化和媒体委员会委员，那里的左翼党虽然了解他的斯塔西历史，但仍需要他任文化政策发言人。随时能追随和适应时代潮流的家伙西部也有，他们和东部的同类一样令人厌恶。洛斯特从来就认为，讨论两边的德国人在本质上有什么根本区别在统一的德国是“吃

饱了撑的”。

但我还是知道一个根本的区别。这是我一再发现的一个问题。在谈到某一个年份的时候,两边就分道扬镳了。1968,这个数字能分出东、西。一边回忆起的是西德大学生的抗议运动,如果是那个年龄段的人,会说自己参与过;另一边想到的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性化的社会主义,短暂的布拉格之春以及它是怎样被苏联的坦克碾碎的。说得干脆一点:告诉我你回忆起的是什么,我就知道你是哪里人。作家、哲学家克里斯多夫·海因证实道:“东部和西部在这点上确实存在一条分界线。”他是东部人,比我了解得清楚。

当年,西德的大学生们视己为世界先进思想的代表,靠语言的力量和强大的口号走上街头,在大学、中学发动了一场反对统治者的运动。40年后,这一切虽然都已成为老生常谈的历史,但在2008年这个40周年的纪念年份里,还是发表了大量回忆录。其中有令人尴尬的,像晚熟的神秘主义者莱因纳·朗汉斯【281】(Rainer Langhans),也有富有挑衅的,如戈茨·阿吕(Götz Aly),他认为1968年的造反派是20世纪30年代具有自恋倾向的青年团体的再生。海因称这种说法实在荒诞,因为,正是通过1968运动,“在联邦德国开始了对纳粹时代的大反思”,这对全社会是一次大解放。

所谓的“68年代人”,把长久以来遗留的浊气一扫而光,清除了从未真正被打倒的纳粹父辈,尖锐地追问他们的过去,这一切在东德都没有发生过。专制不允许有反对的声音,国家只容忍自己安排的追究调查,只调查别人,不追究自己。因此,1968年对东德来说和西部不一样,不是一个爆发和觉醒的象征,不意

味着一场席卷全球的青年嬉皮士和造反派运动。造反派们不顾社会现存标准,通过抗议、通过音乐、通过时装、通过性以及——“要做爱不要战争”的口号,通过想象力,要求对个人生活的自决权。对东德来说,1968年是一场失败的自由运动的象征,是被窒息在热血中的布拉格之春。

在东部的家庭中,也没有西部那样对父辈的纳粹罪行进行过辩论和反思。“因为国家领导人都参加过抵抗运动,再来一场像西部那样的公开反思和讨论似乎成了多余。”以《明镜》周刊事件作为导火线,西部的大辩论以激烈的甚至暴力的形式展开,发生过巷战,烧过汽车,有死者,有伤员。柏林是这样,巴黎亦如此,1968年5月,那里甚至建起了街垒,工人声援学生,威胁戴高乐政权。今天受人尊敬的欧洲绿党议员,能言善辩,当时被称为红色丹尼的丹尼尔·康-本迪特(Daniel Cohn-Bendit)是那场最终失败了了的革命的英雄。东德在1945年以后与联邦德国不同,在政府机关和公务员中确实做到了非纳粹化,清除了所有纳粹,换上了自己的精英。国有化之后的计划经济中没有纳粹,大学里更没有。就是说,联邦德国是6000万艾希曼,东德则是1600万台尔曼。^① [282]

因此,剧变后东部的新的纳粹比在反思过的西部容易滋生。只需将解放后只是蒙尘生蛙、并没有被埋葬过的历史按照他们的意愿重新激活便是了。过了50年,家里从没说起过,爷爷在

^① 这里是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文字游戏,艾希曼是被以色列情报部门在阿根廷抓获、在以色列受审和被处死的纳粹分子,台尔曼是德国共产党领袖,被纳粹杀害。曼(Mann)恰巧是这两个名字的后半部,在德文中是男人的意思。

第三帝国时期到底干了些什么,国家布置的反法西斯是被关在家门外的。对1949—1989年错误的清算,不应由西部强加,而应由东部自主进行。然而这没有发生。马茨认为:“我们正是缺少西部1968年的经历,缺少年轻一代与承载东德那一代人之间的争辩和斗争。这是我们需要,是第二次解放”。

马茨把有心理问题的病人来看病时,给他们个人提的治疗建议也提给全体人民。这建议总结起来可以归纳为:在内心解放自己,从教师、家长和干部们的说教中解放出来,只有这样才能有真正自由的生活空间,但是这一切必须来自内在的动力而绝不能从外部安排。“我们必须自己来做才行,我们自己单独做到。”其实马茨已经灰心丧气了,因为看不到做这种解放性治疗的意愿。与他相反,高克还保持着乐观,相信“68进程”只是延迟而已,还会到来。

【283】 里查德·施罗德一向对西德的“68运动”无好感,“没觉得少了它是个缺憾”。这与1968年时西德和东德的大多数人观点一致。那时,东德人迷惘地看着电视里播放的西德大学生示威游行,内心暗自庆幸这种事没有发生在自己国家,当然也不允许发生。且不说这样的年轻人不符合东德人的政治世界观,看他们蓬头垢面,身着破旧牛仔裤和带帽外套的样子,这外表就和身边那些年轻人完全不同,看上去那么放肆无礼,不像德国人。政治局的庸人们也是这样认为。一开始,东德统一指挥下的媒体在头版道出了他们私下的欢欣鼓舞,等着警察动手殴打学生,这样就有了抨击帝国主义分子的材料。老干部们那时还坚信自己的理念和思想,希望在阶级敌人那里终于发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预言过的革命。

后来发现,这场运动并不是他们所希望的那种,受宠的无产者工人不愿放弃所谓的锁链,不和学生联合,相反,西柏林的筑工人甚至帮助警察打这些脏兮兮的长发鬼;还发现,自由思想的病毒,披着摇滚乐和性的外衣,在自家门里也传开了;想到将给社会带来的所有无法预知的后果,便下令媒体包括广播和电视改变报道方向。

安格拉·默克尔在《南德意志报》副刊的一次采访中回忆起1968年夏(当时她14岁),笼罩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令人兴奋的觉醒气氛,她的父母到伏尔塔瓦河畔去了两天,回来时激动异常:【284】“他们从布拉格回来十分兴奋,看到了希望,社会主义能够从内部打开突破口。至少东德的教会圈子里有这样的讨论:不要复制西德,走自己的路。期待捷克发生的事情也能在东德发生。”

那时的发展是一场“影响整个世界的运动”,这点,她在后来才认识到。一方想要发展社会主义,使之更加人性化,但不反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另一方来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拼命赞扬社会主义。本来这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但在某些方面有共同之处”。当年36岁的作家罗尔夫·施奈德(Rolf Schneider)在回忆中精炼地总结道:“对我们来说,1968意味着布拉格而非鲁迪·杜什克(Rudi Dutschke)。”^①柏林墙建立前移居西柏林的杜什克出生在东德,在那儿长大成人,所以联邦德国那些反对他的人要叫他滚回老家去。但东边的人肯定不会重新接收他,他们和西边人一样质疑他。1968年复活节期间在西柏林发生的对杜什克的

^① 1968年西德大学生运动领袖人物之一,1968年在西柏林遭枪击,康复后流亡丹麦,1976年去世。

刺杀(后引发了激烈的巷战)在东部倒是引起高度关注的,因为他们可以借此机会指责东德的死敌——阿克瑟·施普林格发行的煽动性报刊对枪声负有罪责。

西部大学生读马克思《资本论》和挥《毛主席语录》的激情施罗德从来就很难理解,因为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毛泽东,都属于他想摆脱的人。1953年以后,社会主义僵硬的面孔上终于第一次有了一点微笑的萌芽,让人对自己国家内也能有所解冻萌生了一丝希望。“1968首先是坦克碾碎布拉格之春的年份”,如今,对西方的“68年代人”他也有了两点积极的看法。1968年【285】之后他们开始艰难地登堂入室,至少他们其中的一个,当年法兰克福造反派的领军人物约什卡·菲舍尔(Joschka Fischer)登上了国家最高领导之一的宝座。“抵制任何形式的暴力,掌握自己的命运,至1989年,我们始终在艰难地争取。关键是个人对自身历史的反思,不是公开进行的罪在何人的辩论,当然这种讨论也有,但不是决定性的。”

1968年在共产党兄弟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虽然不是革命,但是一次言论起义,以言抗争。知识分子和作家,受到政治家变革性决定的鼓舞,以一篇《2000字宣言》^①歌颂春天。西方民主下的“68运动”与布拉格的“68运动”不可同日而语,布拉格的要勇敢得多。在西方做这些事不需要多少勇气;实践一下受到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自由发表见解,上街游行,批评政府,谴责美国轰炸越南,以及把一个并不纯粹的民主主义者,北越领

^① 《2000字宣言》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重要文件,6月27日发表,由知识分子起草,号召工农起来参与改革。

领导人胡志明当作自由英雄捧上天。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被叛逆的后代搞懵了,出手管教他们,把他们赶回原路,不让他们搞新闻自由和当反对派,更不用说议会外的反对派了。但这不是一个即将到来的专制制度的开始,而是对一个已过时制度的最后反抗。

东欧集团的情况不同。那里显出了裂痕,其根源不在于迅速觉醒的年轻一代的世界精神,它越过一切边界四处泛滥。裂痕出现在集团内部,威胁着稳定。对阶级敌人,天然对手,统治者倒不怎么害怕,害怕的是自己国家内部的动摇者和教唆者。这是东部专制制度的典型特征。自己生的孩子更危险,因为他们要当真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让人幸福生活的理论,以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来反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286】

先是在华沙,从国家话剧院开始。所有专制国家中的剧院常常是自由唯一的栖身之处,因为灯光暗下来之后,不仅可以窃窃私语,而且可以在黑暗的保护下欢呼和鼓掌。1938年纳粹专政时期在柏林上演了席勒的话剧《唐·卡洛斯》,当剧中人波萨侯爵说出那句名言“请您给思想以自由”时,爆发了长达几分钟的掌声。1968年1月的华沙,此景发生在一位演员大声控诉的地方:“一百年来,莫斯科总是把最糟糕的恶棍派到波兰来”。首演时针对这一场景爆发的雷鸣般掌声弄得演员们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这狂热的掌声不是送给他们,而是送给由他们朗读的波兰诗人亚当·米吉维茨(Adam Mickiewicz)的台词的,演出的是诗人19世纪创作的《葬礼》,一首为自由而唱的战歌。

恶棍们一旦明白过来,这是在说他们,《葬礼》便从演出剧目中消失了。大学生们抗议这一精神专制,但不久,他们所要求的就不仅是思想自由,而是自由本身。科学家和作家都挺身支

持学生,警察和安全人员则殴打学生,以判重刑和严厉的新闻检查来修补裂痕。

1968年,当布拉格的小兄弟爱上具有不可抗拒魅力的人性化民主社会主义时,之前刚让波兰平静下来的莫斯科老大哥亲自出面来管教了,用的是坦克和机枪。被短暂的幸运所诱惑的受到了惩罚,引诱者失去了自由。苏联对伏尔塔瓦河畔觉醒的、欢欣鼓舞的春天所作的反应很像土耳其大男子主义的兄长,当场抓住了妹妹正与一个非真主信徒调情,于是,要么把她关起来,要么送回老家,在捷克就是送进监狱,或者就打死,美其名曰保护家庭荣誉。

家庭成员之一的东德从一开始就对捷共新主席亚历山大·杜布契克(Alexander Dubcek)的政策持有怀疑,他不搞清洗搞改革,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言论自由。很多东德公民在捷克度假时亲身经历了那里的政治之春,兴冲冲地回家说给人听。受到波兰事件警示的乌布利希一伙嗅出了危险,催促莫斯科尽快解决祸患。

1968年8月21日华沙条约国军队开进布拉格时,东德当局是很想积极参与的,但莫斯科军方的最高指挥不让其东德盟友插手,因为当年另一支德国军队入侵的情景还让人记忆犹新。他们想的有道理。苏联坦克所到之处,碾碎了挡在前面的一切,坦克身上不时被画上血染的“卍”字。乌布利希虽然觉得受了伤害,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形下,他仍旧尽全力欺骗他的人民,他让发表人民军战士的文章,读起来给人的印象,似乎勇敢的东德士兵进入了邻国敌人的腹地。

在边境,他们是真的帮忙:所有从布拉格来的火车上乘坐的

年轻人都遭到警察的彻底搜身,谁敢抗议便遭毒打,随身携带的资料——唱片、报纸、传单,全部没收,人被关进拘留所。西部游行队伍举着作为自由象征的红旗,边境另一边自由被扼杀。没有红旗飘扬,只有热血洒地。逃离的捷克知识分子嘲讽说,苏联为著名的2000字中的每一个字都预备了一辆坦克,可见他们的言辞力量够强。向莫斯科老大哥挑战的《2000字宣言》像是要把东欧集团炸飞的地雷,因此来了24万排雷兵,其中2.6万波兰人,不是2000辆坦克,华沙条约国派出了4200辆,逮捕、驱逐布雷者,抵抗者格杀勿论。之后这里也同波兰一样,只剩下了死一般的寂静。【288】

东德呢?时值盛夏,烈日炎炎,大多数人都到浴场去了。当院墙上开始出现声援勇敢邻国的标语,当传单被投入信箱或分发至各家各户,当情报员们报告说,尤其是享有特权的统一社会党高官子女赞扬杜布契克,批评自己的政府时,当局开始了惯用的武力镇压。

“东德促进和保护社会主义文化,这一文化是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和平、人道和发展服务的。”东德宪法第一章第18条第1段如是说。但是,要的不是自由言论中的发展,而是集体的,最好是听起来像一个模子刻出的口号,比如罗斯托克海王造船厂的钳工们提出的,“今年我们要把90%的同事争取为读者”,或者我在始终陪伴我旅行的那本《东德历史文献》中发现的例子,这可是本货真价实的快乐读物,全书言辞贫乏地描述着德意志民族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日常生活。【289】“和我们的丈夫一起,我们将去人民剧场观看有意思的演出,……我们集体中有10个同事订了话剧套票。”

当年轻人着迷于自由思想之芬芳,想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同

龄人一起和平地共同行动时,立即被身穿警服的驱散了。由于西德媒体,从左派到保守派,对布拉格之春表现出一边倒的巨大同情和对反抗过程中流血事件的无奈悲伤,东德就更不能容忍国内的人效仿了。安全部记录了1968年8月21日至9月4日之间,东德境内共发生抗议行为1075起,468名年轻人被抓。作家弗兰茨·福曼(Franz Fuehmann)在捷克驻东柏林大使馆的吊唁册中以个人名义对在布拉格发生的平民的伤亡表示愤慨并让这一信息在诗人和思想家中广为流传,而他在艺术科学院的大多数同事都情愿默不作声或应声附和政府当局。

但是米尔克还是不放心想这些才思敏捷的胆小鬼,决定加强监控,在第10总司新建立一个名为HA XX/7的机构,专门负责“文化界和公共传媒”。这些监控措施也是东部“1968记忆”的一部分。为了使艺术家们在阶级斗争中能够永远站在唯一正确的一边,所有偏离规定路线的都能及时报告上来,斯塔西领导人在8月25日就向下属所有部门发出通知:“四天之内将所有【290】(!)编辑、记者、评论员、播音员、电台技师、主持人、导演、剧作家、市及企业广播台编辑、作家、图像设计师、画家、雕塑家、演员和歌唱家的情况报告上来。”贝斯勒说:“东德抗议的人不多,敢于这样做的,马上感觉到了斯塔西伸长的手臂。”

以其他方式巧妙地表达想要说的话也不行。甚至引用布莱希特^①和列宁,这两位无论政治上还是文化上都可以排除任何

^① 德国著名反法西斯作家、戏剧家(1898—1956年),二战期间曾流亡,战后生活在东德。信仰马克思主义,同情共产党。著名作品有《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四川好人》和《三毛钱歌剧》等。

反革命疑问的共产党人,也不能免受惩罚。有个年轻人在哈雷散发写着列宁语录的传单:如果用暴力来对待一个民族想要自主决定其命运的愿望,剥夺他们这个权利,就是征服和强奸。

列宁这段话出自1917年。散发这段话的在1968年被判了三年刑,一天也没少,被关了三年。一个17岁的青年学生在一次私人文学晚会上读了布莱希特的这首诗:“伏尔塔瓦河底游走着石头,布拉格埋葬着三位帝王。大的并不伟大,小的也不渺小。黑夜有十二个小时,白天就要来临。时代、计划都将改变。强权最终止步,像滴血的公鸡。时代终将改变,暴力无济于事。”听众里坐着—个斯塔西,报告了听到的内容。学生被判了27个月,减刑8个月。

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霍斯特·布拉施(Horst Brasch)之子托马斯·布拉施(Thomas Brasch)年方22,电影学院的大学生,刚刚做了父亲,因其尖锐的发言引人注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7月初,在向他父亲通报了他的不轨行为后,斯塔西开始专门关注他。忠于党的父亲对迷途的儿子已失去任何影响力。托马斯以布莱希特《三毛钱歌剧》为题作的年度学业报告因修正主义倾向遭到拒绝,学校让他补考,他也拒绝。从此他的信件被检查、被复印存档。【291】

托马斯和他的朋友们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们,捷克被入侵前他们已经发声了,从没有想过放弃自由表达的权利,最喜欢大声诅咒着在洪堡大学旁的“Espresso”聚会,根本不搞什么秘密讨论。托马斯和女同学桑达·魏格尔(Sanda Weigl)同居后,虽然离开了他儿子的母亲贝蒂娜·魏格纳,但他还是照样关

心她和儿子。朋友圈子里有被洪堡大学撤去教职的化学教授罗伯特·哈维曼的两个儿子——弗朗克和弗洛里安,一个18岁,一个16岁;著名雕塑家英格伯格·洪钦格(Ingeborg Hunzinger)的女儿罗西塔和埃利卡·贝托尔特(Erika Berthold),她父亲是党中央马列局局长洛塔·贝托尔特。两个姑娘都刚满18岁,到了刑责年龄。其中只有同样18岁的汉斯-约尔根·乌茨柯莱特(Hans-Juergen Uszkoreit)已经从学校毕业,在东柏林的一家企业工作了。

布拉格之春的结束他们是从东德的广播中得知的,那里散布的自然不是官方的话语,即布拉格正直的共产党人请求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兄弟们来帮助打击国内的反革命。这样迫切的请求是无法拒绝的。他们当然一个字也不信。就在1968年8月22日,他们一起制作了500份传单,全部是手写的,因为如果拿出来印刷,肯定会被告发。传单上有比尔曼的歌曲《布拉格的巴黎公社》,有通俗易懂的对比:“希特勒的1938,华约的1968”,以及“红色布拉格万岁!”等口号。有的上面仅仅写着被捕、被【292】押往莫斯科的希望代言人——杜布契克的名字。抗议内容被喷绘在东柏林房屋的外墙上,几乎还未被人看到,已经被急速赶来的斯塔西清洁队抹去或覆盖了。托马斯·布拉施和他的朋友们便把手写纸条塞进各家信箱或放在电话亭里。他们很快就被逮捕了。不顾所有警告,坚持把剩下的传单全部散发到人民中间的贝蒂娜·魏格纳,21岁,也遭同样命运。

然而人民对所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后来到了西部并出了名的戏剧、歌剧导演阿道夫·德雷森(Adolf Dresen)也是一个桀骜不驯的雄辩家。当时他为同龄朋友托马斯写下了这样一首

诗：“干预者侵入布拉格的时候，布拉施在普伦茨劳山^①向人们散发传单：你们准备容忍这一切吗？糟糕的不是三天后他的被捕，糟糕的是，三天后他发现，是的，他们准备容忍这一切。”

其实托马斯及他的朋友们并没有违法，只不过运用他们的正当权利，积极参与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发展。他们因言而获罪，判决如下：托马斯·布拉施和罗西塔·洪钦格各判2年3个月，桑达·魏格尔两年，埃利卡·贝托尔特1年10个月，弗朗克·哈维曼1年6个月，汉斯-约尔根·乌茨柯莱特1年3个月，弗洛里安·哈维曼因未成年被送进了青年教养所。贝蒂娜·魏格纳被捕8天后获释，但被剥夺学籍，官方用语：送工厂劳动锻炼。

其他人的刑罚不久也都改为缓期执行了，原因一方面可能是西方对高干子女事件的大量报道，另一方面大概跟他们父母仍具有的影响力有关。托马斯在请求父亲霍斯特帮助时，父亲亲自向斯塔西告发了儿子，尽管如此他本人还是被撤销了一切职务。

当变革希望的最后一根嫩芽被践踏，当秋冬入侵，布拉格之春已消逝得无影无踪时，当权者操着他们的语言站到了麦克风前，他们的言辞谈吐与褐色当权者何其相似。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京特·扬(Guenther Jahn)1969年8月13日在共青团高校会议闭幕式讲话中说：“依我之见，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文泽尔广场上把反革命一下子全烧光，可他们不会这样做，所以我们还得批判修正主义思想。”

① 柏林的一个地名，年轻人、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集中居住和活动的地方。

东德的“68一代”后来怎么样呢？

桑达·魏格尔成了摇滚乐队“4小队”的歌手，参加流行歌曲大赛。1976年，她和其他艺术家一起签名反对驱逐比尔曼，结果自己也被驱逐了。她到西德后演艺生涯大发展，在慕尼黑、苏黎世和汉堡的塔利阿剧院登台演出，如今住在纽约，丈夫是作家、话剧演员克劳斯·波尔(Klaus Pohl)，她定期和她的爵士乐队一起回到已自由的德国巡演。贝蒂娜·魏格纳1979年与作家克劳斯·施莱辛格结婚，从事诗歌和歌词创作，以“一双小手”在歌曲界出名，后被迫移居西德，2007年结束了创作生涯。乌茨柯莱特在萨尔布吕肯任人工智能教授，罗西塔·洪钦格在柏林当精神科医生，埃利卡·贝托尔特是教育家和作家，弗朗克·哈维曼选择的也是学术道路。

极具魅力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托马斯·布拉施先是在布莱希特档案馆工作，他一边工作一边写剧本，他写的剧本在审查机关那儿当然通不过。但他丝毫不屈服。1976年，沃尔夫·比尔曼在一次经过批准的西方演出后被禁止回到东德，施特凡·赫尔姆林撰写了一封抗议信，签名的有克丽丝塔·沃尔夫、萨拉·基尔施(Sarah Kirsch)、福尔克尔·布劳恩、罗尔夫·施奈德、弗兰茨·福曼、施特凡·海姆(Stefan Heym)、京特·库耐特、海奈尔·穆勒、格哈德·沃尔夫、约莱克·贝克尔、埃里希·阿伦特。信在西德发表，因为东德党报《新德意志报》拒绝刊登。信中写道：“沃尔夫·比尔曼以前和现在都是一个爱惹麻烦的诗人，在这点上，他和历史上的很多诗人一样。根据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政变》，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需要不断进行自我批评，与那些过时的社会制度相反，这个国

家应该能够泰然自若地对待这些麻烦并认真思考才是。”

布拉施,还有阿明·穆勒-施塔尔、曼弗雷德·克鲁格(Manfred Krug)、尼娜·哈根(Nina Hagen)、夏娃-玛丽亚·哈根(Eva-Maria Hagen)、尤塔·霍夫曼(Jutta Hoffmann)、卡特琳娜·塔尔巴赫(Katharina Thalbach)、乌尔利希·普伦茨多夫(Ulrich Plenzdorf)都纷纷声援签名的作家。当局作出的反应是开除出党,禁唱禁演或逮捕。想移民的立刻走人,不愿走的,想方设法折磨你,直到你不得不走,于尔根·福克斯和格鲁夫·潘纳赫(Gerulf Pannach)在关押8个月后被直接送到了西德。

埃贡·克伦茨向最高领导昂纳克报告了波茨坦电影学院某些固执己见的大学生的情况,说他们虽然还在提一些批评性的问题,比如是否可以容忍比尔曼,但总的来说“拥护政府所做的决定。大多数学生不认识比尔曼,因而很想知道他是谁,写了些什么,为什么禁止他演出,如何才能识别我们当中的敌人?”

布拉施的新伴侣是卡特琳娜·塔尔巴赫,他的散文集《儿子死于父亲之前》在西德大受欢迎,他写剧本,拍电影,有几年销声匿迹,过几年又东山再起。2001年因心肌梗塞去世,年仅56岁。能言善辩的他回到了故园东柏林,葬在多罗苔名人墓,就是我的德国之行开始时,洛塔·德梅齐埃从他事务所窗口指给我看的那个。

弗洛里安·哈维曼1971年逃到了西德,他父亲的朋友比尔曼写了一首歌,唱他是背叛了社会主义的孩子。弗洛里安写过一些不太成功的剧本,比如关于罗莎·卢森堡的,为了养家糊口,甚至去干清洁工。1999年民主社会主义党派他作为法律外行进入勃兰登堡州宪法法院,2007年,以1100页之厚的纪实

【295】

小说《哈维曼》轰动一时。书中写到他的父亲、祖父、他们一家，也写到他的朋友和敌人，更多的是谈自己。他向比尔曼开战，说他和玛戈特·昂纳克有染，1968年因害怕被抓刮掉了出名的小胡子跑到朋友家藏身。弗洛里安这么说就和共产党的御用歌手唱一个调了，如今这些人可以不受惩罚地谩骂那些当年他们就迫害过的人了。

哈维曼本人也不否认，书中有太多杜撰的情节，他说，讲的都是他记忆中的东西，大家应该把他这本回忆录当作小说来读，但书中涉及的很多人因觉得侵犯了自己的人格权而提出起诉，致使苏尔坎普出版社不得不撤回出版计划。到2008年4月，这个作品，有人称之为劣质品，才以大幅删减后的版本面市。

位于法兰克福的这家著名出版社^①还计划出版另一本德国的故事，但有的段落和字句必须涂黑隐去。这就是电影《窃听风暴》^②的原著。这部好莱坞获奖影片中反映的爱情与欺骗，强权与无奈，勇气与背叛，死亡与悲剧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确有其事。这就是演员杰尼·格罗尔曼(Jenny Gröllmann)和乌尔利希·穆尔(Ulrich Mühe)的故事，两个人都在东德长大，1984—1990年是夫妻。杰尼2006年患癌症去世，乌尔利希晚9个月，死于2007年8月。

【296】 他们两人的故事却比他们本人活得长。

书中的乌尔利希·穆尔，就是电影里饰演斯塔西军官格尔德·魏斯勒的那个演员，在知道了前妻可能是斯塔西兼职工作

① 现已搬到柏林。

② 书和电影德文原名直译是《别人的生活》。

人员后,同导演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克(Florian Henckel von Donnersmark)谈起自己的感受。杰尼·格罗尔曼当时已身患重病。她的律师(居西律师事务所的)起诉了出版社,法院作了不利于出版社的判决,乌尔利希·穆尔也同样不准再公开谈论此事,其实他本来也无此打算。说杰尼确实主动为斯塔西工作而不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利用,斯塔西档案中的“Jeanne”就是她(这是她前面一次婚姻生的女儿的名字),并没有完全肯定的证明。档案中,和她联系的斯塔西军官所记录的21次会面虽说是有力的证明,但不能作为最终的证据,因为也有可能是斯塔西军官编造的。但贝斯勒局过去多年调查研究的数万份档案材料中,发现作假的不足两打。

病人膏肓的杰尼和已患癌症的乌尔利希间的冲突得到所有报纸、杂志和电视访谈节目的关注。穆尔在斯塔西档案中被称为“问题演员和旅行干部”^①,始终拒绝斯塔西的征用企图,不想同他们有任何牵连。所以当得知前妻有可能是斯塔西时,分外受伤,想通过诉说得到解脱。其实也就说过一次,而且只谈到与他自己有关的和个人的感受。

两个人都去世以后,本来一切都可以归于平静了。但直至【297】今日,蔑视乌尔利希·穆尔之行为的(不管他指责的是真是假)和无条件捍卫这个朴实无华影视演员的,丝毫没有和解,也不准备和解地超越了死亡界限继续对立着。双方都为了别人的

^① Reisekader,指东德时期被允许去西方旅行的干部、运动员、艺术家等这些人被视为政治可靠人员,斯塔西要求他们写报告,如果始终拒绝,可以被取消旅行资格。

荣誉。

在贝斯勒看来,“格罗尔曼一案的档案记录是无可置疑的”,负责研究那份档案的约亨·施塔德(Jochen Staadt)也认为是一清二楚的。事实是:在国家安全部 XV 2087/79 的编号下有 325 页记录,姓名:杰尼·格罗尔曼,前夫姓坎,现任丈夫姓穆尔,父亲是个正直的共产党人,西班牙战争期间曾加入国际纵队参战。杰尼没有入过党。领导她的军官名叫赫尔穆特·门戈(Helmut Menge)。他所属的部门负责监视所有在东德的常驻记者,并不负责像杰尼和乌尔利希这样的演员,但《南德意志报》和《明星》周刊记者彼德·普拉加尔(Peter Pragal)(斯塔西对其监控行动的代号是“施坦因贝尔格”)自然是属于他管的,杰尼认识普拉加尔。和穆尔结婚的几年中,杰尼没有和斯塔西发生过任何接触,没有书面合约。从 1984 年 2 月 15 日和穆尔结婚到 1989 年 12 月 19 日因拒绝继续合作而封存归档,其间没有过一次杰尼与斯塔西接触的记录,1980—1984 年共有 16 次见面的记录。除了 1980 年 9 月 11 日得到过一束价值 10 马克的鲜花外,杰尼从没因其所谓的合作收到过任何报酬。她的鳏夫后补的起诉得到了法院的支持:怀疑可以谈,但说杰尼就是斯塔西“Jeanne”是不允许的。这一事件的真相大概永远也不会大白于天下了,柏林的一位法官如是说。

要求人们忠于党的路线的东德社会制度,无论是舞台上还是生活中,都有办法告发和处理不肯就范者和惹麻烦者。文学界同样充满了虚荣、冲突、怨恨和恶毒的中伤。与西德不同的是,图书和作家在这种情况下都受到了损害。负责作家的是“图书与出版管理局”。鉴定审查手稿被视为“国家担负文化教

育职责最重要的具体实施形式之一”。文化干部们甚至自吹说,他们的国家不仅是劳动人民的天堂,也是读者的天堂,国内80家出版社每年出版的图书达6000种。他们隐瞒没说的是,所有文学作品都必须经过审查才能获得或不能获得印刷许可。

作家们当然都知道这个规定,于是就有了预先的自我审查。他们宁可自己先打磨掉棱角,也比让御用文人宰了强。变革前一年召开的东德第二十届作家大会上,克利斯朵夫·海因称审查制度为:“过时、无用、自相矛盾、敌视人、敌视人民、违法和应受到惩罚。”

审查者使用的拙劣手法是拖延时间,他们认为自己有的是时间。约亨·拉普斯(Joochen Laabs)的寓意小说《被影子追赶的人》就是如此,没文化的文化官员们拿去逐字逐句审查了两年才同意。对于作家来说,时过境迁,太晚了。虽然故事仍然是个好故事,但历史已经走到前面去了。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在社会主义日常生活中因遭遇各种限制而受到伤害的人,回到乡间孤独隐居,想潜心写作。然而过去的阴影不肯放过他,表面上宁静的田园让他透不过气来,几乎要在绝望中窒息。徒劳地等待长久未曾见面的女儿到来,等他觉得见到女儿的时候,那只不过是【299】是个鬼魂,是他错乱的精神中出现的假象。“只要这个国家总是制造出我这样的人,关键时刻,想的什么不敢实说,这样的人它在源源不断地制造,社会主义就无法前进。”

这样的句子那个时候审查者是不会给他通过的,他逃离了那个时代。1999年,他的《谬误的小说》顺利出版时,这种隐藏在字里行间的真相已失去了市场。新时代下,什么都可以说,想多大声说就多大声说,悄声细语不需要了,它失去了进攻性和市

场价值。

我和约亨·拉普斯和他夫人达尼埃拉·丹(Daniela Dahn)一起坐在他们那座茅草顶的房子前喝着咖啡,吃着黄油点心,一边驱赶着叮在上面的黄蜂。梅克伦堡-前波莫瑞的这处房子,是他们花1万马克买下的,当时手头正好有这点钱。满头白发的老人放下杯子,凝视着远方说,他属于东德在统一后失去精神家园的那一代作家。2007年,拉普斯获得著名的乌韦·强森(Uwe Johnson)文学奖,这是以那位出生于梅克伦堡-前波莫瑞的无家可归者命名的奖项,他是《对雅科布的推测》和《纪念日》等不朽小说的作者。拉普斯学的专业是工程师,对有轨电车在城里的每一个拐弯,每一条直线上该怎么走知道得一清二楚,后来从德累斯顿搬到柏林,开始写作生涯。剧变前他可以靠写诗著书生活,1990年以后,他落伍了。

1983年写《被影子追赶的人》是个开始。拉普斯说:“我是想试一试,看自己能不能写,发表不发表无所谓。”之前所写的东西虽然也尝试着超出通行的标准,但没有走得太远。他不是【300】统一社会党的追随者,但也不属于明显唱对台戏的。他能迂回过关,日子能过得去,很长时间以为,苏联是最大的教条主义榆木疙瘩,黏在身上甩不掉,看不到希望,到最后才知道东德才是榆木疙瘩。拉普斯说:“我感觉到,有什么东西要变了,心里暗自决定,不再扭曲自己,只写自己想写的。”

作家要生产意识形态,作为全社会产品的一部分,最终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大家庭。但只唱颂歌的垃圾没人愿意看。东德时期国家电视台的节目几乎无人问津,书籍和广播有些自由空间。写作初期拉普斯很向往作家协会,以为他们和他一样,是搞

文学创作的。结果是巨大的失望。他发现,一到了关键时刻,总是意识形态占上风。但东德也不是与好书完全隔绝的。他说:“有时能在书店意外淘得好书,我在科特布斯买到了约翰·施坦因贝克的《愤怒的果实》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铁皮鼓》是在发表10年后读到的。只要留心,能搞到可以当作榜样的文学作品。”

拉普斯回忆起20世纪70年代末在作家协会的一次辩论,一位年轻作家问,为什么格拉斯的作品在东德不能发表。霍卜克的回答是:只要格拉斯保持现行的政治态度,他的东西在我们这儿就不出。拉普斯说:“尽管如此,文学对我来说仍是唯一不放弃个人观点的可能。新闻业想保持个性我简直无法想象,新闻界没有任何空间。东德时期我不是个受人注意的人物,也许是因为我的低调。大浪来时,只要可能我常潜入水底。东德有很多让人心灰意冷的时刻,但另一方面也有带孔的小巢,信心可以渗入。”【301】

没有小巢,每个字、每句话都被怀疑地紧盯着的是记者。新闻自由是没有的,新闻得按照政治局规定的路线走,负责检查规定执行情况的是新闻局。坐在那儿的那些咬文嚼字、断章取义的人,不光管整体落实,这倒不难,像黑色频道谩骂专家卡尔-爱德华·冯·施尼茨勒^①(Karl-Eduard von Schnitzler)这样的家伙,文职罪犯每个编辑部都有。此外新闻局还管文化和事件发生前的报道倾向。

^① 黑色频道是东德专门评论和批判西德的一个电视节目,施尼茨勒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

下面这份新闻局于1984年发的指示足以说明：“4月27日弗里德利希剧院开张。此前不准发布任何消息，禁止谈到剧场的现代技术。”另外还有：“评论德意志剧院的话剧《AHQ的真实故事》和高尔基剧院正上演的《乔治山》时需格外小心，这里要再次强调报社主编审核内容的特殊职责。”当年东德大概拥有最庞大的文化版主编队伍。

拉普斯突然笑了起来。他为什么笑？

他想起了一个故事。在他的小说《草房》里有这样一个场景：打扫食堂的女工对关了门还不想离开的学生说，她受够了，她要到乌布利希分子那里去告状。是，她就是这么说的，乌布利希分子。拉普斯说：“除了其他这样那样的指责外，出版社审核人认为有关乌布利希的说法纯属多余，必须去掉。好吧，为了保
【302】住更重要的，我同意了。一年以后书出来了，一般都需要这么久，出书的路就是这么长，一看，女清洁工那句话又在里面了，怎么回事？很简单，这期间乌布利希下台了。真是上了一课。”

剧变后，东德笔会内也开始清理斯塔西，需要重新选理事会。拉普斯是干净的，于是他当选为东德笔会的秘书长，这远远超过了他希求的，德累斯顿联合大会后，他甚至成为全德笔会的副主席。他说：“但不久我就发现，我不是干这个的料。”2001年他重新开始写作，施泰德尔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作《迟来的旅行》。主人公是东德的一个工程师，在美国任教，四处旅行，那也都是拉普斯教过书的地方。

他对统一现状怎么看？是呀，这个过去和现在都捕捉影子的人认为，东部和西部始终还是被分得很清楚，年轻一代那里没有这个问题了。拉普斯说：“对年纪大的人总是有保留，认为我

们是顽固不化的东边人,文学上和文化上也都没有统一。我女儿在巴黎上大学,对她的法国朋友来说,她就是德国人,至于她来自东部还是西部,他们根本不感兴趣。”

当我向洛塔·德梅齐埃提出同样的问题时,这位精通《圣经》的基督徒马上举出了《圣经》中摩西说的话,他对人们说,需要40年,你们才能到达那个值得赞美的国度,20年后,有一半的人会折返,但你们要坚持走下去,很多人都能够走到那里。知道东部和西部的生活水平什么时候才能差不多有什么用呢?德梅齐埃说:“如果全德各地的教授不以东部、西部,而只以聪明、愚钝来区分他们的学生,我就满意了。”

第九章 废墟上的建筑师

虽然我完全能够想象,老一辈当中的某一位,在康拉德·阿登纳大楼^①的某次战略会议后说过:“你们听着,也许是,朋友们,听着(但决不会是同志们),我们需要年轻人。”但这事做起来不容易。基民盟指定马里奥·查加(Mario Czaja)进入负责分析柏林墙倒塌20周年后德国统一现状的委员会是有一番考虑的。这个以其政治天分早就引起注意的年轻人被分到第八和第九工作组,负责制定新的“东部政策”,主要针对的是不安分的统一社会党精英们越来越亢奋的叫嚣以及如何有效应对他们美化历史。

通过说服教育,没错,从年轻人做起,也没错。老一代已经不重要了。他们当中,有的根本不会再听统一社会党大佬的鬼话了,东德40年的生活经验让他们彻底聪明了。但是,也有至今仍然听从召唤,不顾事实,忠实地跟他们走的。

然而,目标人群的习惯是,一旦觉得又有可疑的政治家来向

^① 德国执政党基民盟(CDU)总部大楼,以联邦德国首位总理康拉德·阿登纳的名字命名。

他们宣传什么自由和见义勇为，马上就封闭起来拒绝接受。因此，委员会主席，曾为基民盟联邦总统东部候选人的达格玛·施潘斯基(Dagmar Schipanski)就找了一个既讲他们的语言也能和年轻人说上话的人。东部基民盟里这种又酷又爽的年轻人不多。马里奥·查加是符合要求的最理想人选，33岁，东柏林出生，没有受到那里仍然存在或重新活跃起来的历史阴影的影响，在众多红色左派包围中，作为黑色保守派坚信，没有基民盟德国统一不会如此顺利。【304】

另一个真相是，1990年第一次全德自由选举时，之所以能轻松战胜对统一持怀疑态度的以拉封丹为首的社民党，是因为基民盟在革命后期的混乱中已经把东部结盟党、同名的基民盟吸收过来了。再加上赫尔穆特·科尔凭准确的直觉知道，受到打击的东德人最喜欢听什么：如果新来的兄弟姐妹中超过18岁的大多数选他和他的党，保证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

亲爱的女同胞和男同胞们，几个星期前我们一起庆祝了德国统一日，现在，我们要共同塑造我们祖国的美好未来，……在我们民主法治的国家中决不能允许自由的敌人再来统治……不久，五个新联邦州也将是一片繁荣……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得到全世界的认可，稳定的养老金和有利于家庭的进一步改革措施只是几个证明。……感谢好政策，我们的年轻一代现在比以往任何一代有更多的机会，可以终身生活在和平、富裕和社会保障之中。……12月2日是决定命运的选举，去投你的一票吧，把票投给基民盟……

我可以用东边人称呼马里奥·查加,他会开心地笑笑,他是【305】柏林市基民盟议员,他的选区叫考尔斯多夫-马尔斯多夫。开始我觉得这名字很陌生,后来想起来,为什么马尔斯多夫好像有点熟,是因为那个名叫夏绿蒂·冯·马尔斯多夫(Charlotte von Mahlsdorf)的女收藏家,她用洛塔的名字在马尔斯多夫出生,10年、15年前上过西部所有访谈节目,以女人出名,作为男人被安葬。

考尔斯多夫-马尔斯多夫位于柏林郊外最东边。过了那儿大都市便隐身不见,德国东部的荒原开始显现。当地居民的眼光不同,对他们来说,乘40分钟轻轨就能到的柏林西部比起他们临近的东部马灿区、赫勒斯多夫区、特雷普托区和科佩尼克区几乎是遥不可及的地方。基民盟在这里早已不是什么大众党了,而是濒临灭亡的少数派,这儿的情形很容易接受红色左翼。显然是在统一德国的边缘,在投降与认命之间,基民盟的得票率大约在11%—13%之间。

这就是查加的家乡。

正因为他不是典型的基民盟政治家,所以才在1999年,并从那以后始终在这里获胜。这个地方,只要竖把笤帚,把它叫作居西,民主社会主义党或多或少就能取胜了。从第一次参选开始,查加就接过了民社党的政治策略并大获成功。他不是等着选民到见面时间来找他,而是像推销员那样上门推销政治,像民社党之前所做过的那样,倾听人们的抱怨,答应关注他们的问题。这样的承诺选举前各党都作,但查加说话算话,不仅有诺言,而且有行动。

在进行艰辛探访的过程中,他发现柏林市政府建筑委员决

定要新修一条路是人们怒气的集中点,而建筑委员所属的党,也正是查加要代表的。既坚信自己,也相信反对修新路有理,东部的“大卫”开始了与西部“歌利亚”的战斗。查加说:“我搞了一次有关修新路的公民大会,请大家参加,自己做了充分准备,提出了一个比现行方案有利的模式,原来那个方案会给有房屋和园地的居民带来高额费用。这么一来,就连民社党的选民也被争取到我这边来了。在这件事上,我的意见和我的党是背道而驰的,因此本身就具有了说服力。”【306】

他真的成功地推翻了原来的方案。

这当然带来了回报:第一票选人,基民盟这位特殊候选人的得票率达37.4%,第二票选党,基民盟仅得到13.1%。他挨门挨户做家访时,人们说一定投他的票,尽管他的党是基民盟。他兑现了承诺,取消了那个修路计划,选民们也同样遵守承诺,把票投给了这位年轻人。基民盟议会党团在柏林市政府大楼内召开的成立大会上(当时的基民盟议员有75人,可以说是既强大又腐败),当时的议会党团主席克劳斯-吕迪格·兰多夫斯基(Klaus-Ruediger Landowski)与州立银行的密谋串联尚未爆料,他让这个来自他不熟悉的柏林东部的年轻人站起来,让其他为数不多的几个东部议员以这位刚满24岁的年轻人榜样。他的行动告诉了我们应该怎么做,尤其是在看起来毫无希望的地方。其他东部基民盟议员以前不喜欢查加的做法。

可是他不在意,坚持在近距离作战中运用民社党访贫问苦的办法,当然目标是另外的。因为对基民盟来说,每一票都是必须争取的。东柏林共有选民100万,2006年选举中,基民盟受到重挫,只有6万人投他们的票。其中和1999年与2001年一【307】

样,7 000 张选的是查加。东柏林共分成 34 个选区,从其他 33 个选区基民盟一共得到了 53 000 张票。

他完全可以为自己感到自豪,他也确实自豪。查加属于统一的受益者。在他这一代年轻的德国人当中,统一早已胜利了。但东部年轻人也有相当一部分认同东部老年人的价值观,两代人中不少人都同意这个说法,西德人没有也不想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

被蔑视的感觉将 60% 以上的东德人,无论年轻年长,联合起来反对西德人。虽然剧变后他们的经历出现了断裂,虽然在不熟悉的新制度下生存遇到了种种困难,但他们多少还是做到了挺起腰杆做人。之前,他们在东德的经历当然更谈不上被认可了,常常像稀有昆虫似的,被放到显微镜下观察、审查和筛检:是不是斯塔西,是不是统一社会党,是受害者还是施害者。

一句话,西边人对我们没有真正的兴趣。

说得在理,但没有恶意,因为西边人之间相互几乎也不感兴趣。因此查加有意强调自己的经历,就是为了与不关心东边人的西部同党伙伴划清界限。西边那些人给人的印象是“从前东德人的成就很少,甚至一文不值”,这在选举中是有相应后果的。

【308】 但是这个评价并不影响他的信念:基民盟是推动德国统一的决定性力量。那时,事关整个国家,科尔所说东部很快会繁荣的承诺,对生活在几近枯萎地区的居民来说自然如久旱逢甘露般受欢迎。1999 年,查加第一次代表基民盟在柏林参选时(之前他在青年基民盟和区、县从政),东部繁荣之梦早已破灭。他得想出另外的、简单明了的主意。简单明了的意思是贴近民众。

这一招他是从民社党那里学来的。在东部，他们最贴近民众，从未离开过，置身于人民心中，向人们提供他们感觉越来越缺少的东西，污浊的温暖、安全感和安慰。他们向选民许诺，会像过去祖国父亲那样关心他们，只是这回保证没有斯塔西母亲，首先关注过去没有过的失业担忧，帮人们跑官府衙门，帮人们作决定。出于感激，他们就选民社党，如今叫左翼党了。

马里奥·查加自身的经历，而不是基民盟的纲领使他大获成功。他是在自己土生土长的地方竞选，虽然表面上已看不出他来自西边还是东边，比起匈牙利酸辣汤和烤童子鸡，他更喜欢吃意大利面、奶油蘑菇培根面和提拉米苏甜点，穿着入时，像一个经理人那样使用“黑莓”手机而不是只会引用些套话。如果有人在国外问他从那儿来，他的回答不言而喻：德国。

但是他能讲得出，也能听得懂只有东边人经历过的故事，东部的选民当然欢迎他。他们曾一起同甘共苦，在相同的条件下生活，而且都是平民百姓，马里奥的父亲是电工，母亲是护士，全家住在祖母的房子里，认识每一个邻居。

他的履历：柏林墙倒塌时，马里奥·查加 15 岁，在天主教堂【309】做弥撒执事，信仰坚定，远离当时那个制度下其他同龄人的组织和义务。他既不是少先队员，也不参加成人礼。查加说：“因为出身于一个天主教家庭，所以我准备去学神学，学神学是东德为数不多的避风港之一。”

东德这座大厦整个倒塌下来时，他不再需要避风港，开始拼命在现实中学习。最先是浏览西方的橱窗。德国人的幸福之夜，1989 年 11 月 11 日之后，他和父母、兄弟姐妹一起经太阳路到了西柏林、选帝侯大街，把鼻子贴平在商店的大玻璃橱窗上，

对琳琅满目的商品惊叹不已。这不是决定性的,但是难忘的经历。查加说:“星期六我们本来是得上学的,但那个星期六没人去上学。星期一大家都拿着家长写的假条来了,请假原因通通是突然发烧、嗓子痛和感冒。”老师们没有追究,因为他们自己也同样,那个周六来上班的老师也没几个。

马里奥·查加不久就转了学,他不想学俄语,想学一门在新时代有用的语言。他说:“开始时,东边的老师比早先更严格了,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生存,认为只有通过给学生增加压力使其成绩好自己才能被继续留用。英语和法语课的老师是从西边来的,有一个老师是双姓的,我永远也忘不了,双姓,东边没有这个。”中学毕业后他学了保险销售,参加了基民盟青年团,在党【310】内迅速升迁。因为在东部,没人愿意为基民盟积极活动,1999年,他成了议员。

考尔斯多夫-马尔斯多夫选区当时有选举权的选民是32 517人,其中71%参加了投票,查加获得了37.4%的选票。选举日前几天,修新路的计划泡了汤,选民们用选票上画的叉来感谢身边这位年轻人。他们作这个决定时,大概那份自豪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是一个东边人,他们其中的一个,把那个傲慢的、基民盟建筑委员为代表的西边人教训了一下。人民代表真正代表了人民。他的胜利同时也象征着底层战胜了上层。绝对数字是,查加第一名,得到8 576票,比民社党多329票。

两年后,阿富汗战争和柏林的银行丑闻是头版头条,影响了整个气氛。加上基民盟候选人弗朗克·施特菲尔(Frank Steffel)的个人形象也降低了取胜机会,他属于1990年初来乍到时东边人天真地信任过的西边人,从那以后不再信了。查加的第一名转

给了居西,居西以4 000票领先胜出,但查加仍然进入了议会。

政治温度的高低始终是德国统一现状的最佳读数。比如柏林或更精确一点的考尔斯多夫-马尔斯多夫区,这个任何政治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弹丸之地,2006年的参选率下降到了64.4%。1/3以上的居民宁愿待在家里,因为他们已经放弃了还能有所改变的希望。这一倾向在后来的州选中,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都持续存在着。现在,不参加投票的选民在统一的德国已然成了最大的大众派,在五个新联邦州,由厌恶政治生出了厌恶民主【311】
主,否则德国民族的右翼也不会像在萨克森那样大获成功。

查加邀请早已在联邦政治中成为超级明星的居西参加一次活动,内容只涉及当地,不关战争与和平或金融危机之类的事。查加说:“他拿着卡片,上面是我写的我们这里的种种问题,说(大意是这样),基民盟的拥护者们,通过直选名单把这个年轻人选到议会去吧,他知道这里需要什么。从此我和居西之间建立了正常公平的关系。”还有一个原因是,——他没提,这只是我的解释——居西和查加一样都是东边人,尽管年龄不同,但共同的社会化经历显然强于任何党派。

这一点,在我的旅途上,已经一再经历。

议会介绍手册上,查加名下写着的经济学硕士引起了怀疑和追问,年轻的飞黄腾达者很快感觉到了成功带来的另一面,嫉妒、坠落。有个错,大多能混过去,可如果被现场抓获,就得挨罚了。这也不是所有情况,如果真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西门子贿赂案发时,早应该对海因里希·冯·皮尔^①(Heinrich von

^① 西门子公司原总裁。

Pierer) 这类所谓德国社会值得尊敬的典型代表提出起诉才是；莱比锡案的调查中，检察官也应该传讯某些高级政治家和法学家后再结案。

假如、如果、要是……然而生活不是虚拟假设的，是个建筑工地。

马里奥·查加这个选举魔术师想出了一个办法，能让自己看起来更有身份——圣·加仑大学的经济学硕士。专家们对这【312】所大学非常怀疑，据说那里的文凭不仅可以通过学习成绩获得，也可以通过秘密汇款的方式获得。

这个东边人被逮了个正着。不仅其他党里的政治对手对此窃喜，自己党内也有人给他挖墙脚，因为他曾被捧为光辉的榜样。如今，马里奥已明白了这一切，当时，曾使他很苦恼。他不得不公开道歉，承认“在疯狂的年轻时代没有取得高中毕业文凭再离校”，表述得这么复杂，说得干脆一点，就是当时没兴趣上学了，更乐意享受自由生活之快乐。查加说：“从广告上注意到瑞士陶尔芬自由大学，报名参加了函授，2002—2005 年学习，以一篇论文毕业，论文完全是自己写的。”然而，改变不了的事实是，这张文凭德国是不承认的。

他的选民们倒不计较他这件事。他们不在乎什么经济学硕士，他们在乎的是谁来关心他们的经济问题，而他正是这样做的。按照民主的规则，他也不断地歌颂自由，但从未忘记，与这个陌生的恋人打交道有多辛苦，对他的同胞来说，要与她合二为一有多困难。他坚持自己的长处——脚踏实地。2006 年的选举基民盟大败，而他却能逆潮流而上。

在东部，人们心中东德尚存的大气候下，地方事务中，查加

必须与左翼党合作,这与他们党和我们党的纲领无关。务实政策是东部政治家的家常便饭。“统一”在各地靠各个党派的实干家们尽一切可能努力践行着。失业的人,要的是一份工作,而不是左派或偏左的乌托邦,这些都不能替他付房租和缴暖气费。【313】一个人民代表如果忘了这一点,他也可以忘了下次选举了,不管他为哪个党竞选,都没用。现实要求的不是党的纲领里写的那些回答,所以下边的人在与其他党的接触中也没有大人物常有的那些顾虑。

查加很早就明白了这点,那时他还不到19岁。他说:“如果我去问基民盟里年纪大些的人,是不是应该去参加我们区里这样那样青年协会的活动,争取政治合作,他们会说,甭去,那儿全是共产党。可是在地方委员会中,我发现他们都是朋友,和以往一样相互直呼其名。对外,民社党是政治对手,在当地实际工作中大家是一伙的。”

他认为,不在镜头前互相攻击而脚踏实地地工作是最要紧的。查加说:“我们那儿,左翼党就是最强的政治力量,没有他们参与行不通。”他的党在最近的那次选举中只有他再次当选,以10%的领先把民社党甩在后面。他成了希望的灯塔,被任命为议会党团长。他说:“在柏林市议会里我们是红—红政府^①的反对派,我们的议会党团只有35个成员。我是唯一一个来自拥有26万人口地区的基民盟代表。”

他的弟弟塞巴斯蒂安(Sebastian Czaja)也已经开始了自己的政坛长征。他为之努力的是另一个少数党,自由民主党。在

^① 指社民党和左翼党联合执政的政府,这两者的政治代表色均为红色。

民社党重镇赫勒斯多夫-玛灿他获得了 3.9% 的选票,也进入了市议会。与哥哥比,他还得从点点滴滴小事做起,当然主要是在当地。在他的网页上,他自豪地宣布:他和自民党提出的“自然保护区禁止滑水运动”这个题目显然触及了当地居民的神经,每天都可以收到 2—4 封来信,支持他们的要求。当然是有道理的,东部失业救济领取者有多少会去滑水呢。

在柏林最东边的郊外,在玛灿-赫勒斯多夫区,每到一处都让我感觉到是个外人。我说的虽是当地语言,当然,不完全一样,但我听得懂他们说的,他们也听得懂我说的。可几个小时以后我就不安起来,想回到我熟悉的西部,至少是回到柏林中心区。我承认这是很狭隘的。恰恰是在人们想象不到的地方,可以挖掘到从废墟中起身,抖落从前建废墟的人留下的尘埃而前行的那些人的故事,所以我没回柏林中心区,而继续留在了柏林东部。

在我的德国之旅中,一个屡见不鲜的事实是:被失败击伤后,稍事镇定便重新开始的人,东部比西部多。因此,新联邦州更能说明德国现状。虽说在老联邦州,发生在诺基亚、西门子、明基、马克斯须特和德国电信等公司的由于所谓“企业经营所必需的裁员”,从数字上看与 20 世纪 90 年代托管局在东部实施私有化时期已相差无几,但实际情况仍然不可同日而语。

富有、懒惰、厌倦的德国西部,长时间以来日子一直过得太好了。看起来快要不行的时候,总还会有一丝光亮到来的想法在这里根深蒂固。在德国东部,人们早就不得不习惯于不行的状况,而且只能自己想办法点灯找光明。德国的病症是什么,在这里可以早期诊断。也可能是因为,对东部年深日久的痼疾采

取了更极端的治疗措施,所以尽管有挫败,目前,东部德国人还是比西部的进步一些。

杰瑞·李·刘易斯(Jerry Lee Lewis)成为经典的那句“Topthat, Nigger”,这里所说的黑人显然是西边人,但我不能这么说,这么说未免不严肃。严肃的是东部的两位部长,萨克森-安哈特的延斯·布勒扬(Jens Bullerjahn)和梅克伦堡-前波莫瑞的埃尔温·赛勒林(Erwin Sellering)提出的预测,最迟到2025年,东部受贫困威胁的退休者人数将急速上升,原因在于,很多东部德国人由于失业和低收入所积累的保险不够,到老年只能享有所谓基本保障,拿到失业救济养老金。

谁都知道太阳从东边升起,统一前就是如此。那时候,理查德·赫尔曼(Richard Herrmann)是人民军军官,每天都站在阳光下。他的军衔很有影响力。他说,和其他人比起来,那时他过得不错,但是“如今更好”。一个属于过去制度领导层,也绝不是什么反对者、批评者的人说出这样的话着实让人吃惊。这个英俊的男人,1987年被任命为经济、科技副部长助理时还不满42岁,显然还有上升的空间。据他自己说,隆重的任命仪式使他被荣誉与自豪冲昏了头脑。

如今那时的自豪早已离他远去。他有了另一身份:赫尔曼同志已然变成了赫尔曼经理,所以他如今过得更好。过去几年【316】里,他建起了自己的企业并获得了成功。他很享受这一切,但很低调,不像西边那样张榜公布、大吹大擂:我的别墅,我的游艇,我的跑车,我的老婆。①

① 这曾是西德一个著名电视广告里的广告词。

在任何领域,我都发现了统一获益者在成功面前表现出的谦逊与低调。电视主持人迈布丽特·伊尔纳不觉得自己是大腕,她对地位、自我和成就等问题的回答听起来像是更喜欢尽量缩小一点。位于萨勒河畔弗莱伊堡的东部香槟品牌小红帽的董事长贡特·海泽(Gunter Heise)决不会在访谈节目中像西边的那位同行(用猩猩做广告,所有T恤都在德国生产)喜欢做的那样给别人提什么建议。关于萨勒河,东德时期有一则颇受欢迎的笑话,说可以把鱼放到那条脏河里去接受化学专业工人的培训。东部银行家爱德加·莫斯特(Edgar Most)很会运作资本,为统一做了不少贡献,自己也赚了不少钱,但从未忘记其他人的困境。他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以及许多朋友1990年以后都失业了。

我和里查德·赫尔曼一起坐在他位于赫勒斯多夫的小办公室里,他的狗温顺地在我脚边打着鼾。墙上挂着一张画,画面上显然是一个人民军战士,从那典型的头盔上看得出来,站在勃兰登堡门前。肯定是剧变前的艺术作品。坐在我对面的这个刚60多岁的魁梧男人,让过去通过打开的窗户飘进来。

它来了,停下来,讲起来。

很久以前,……

太多德国童话都是这样开头的。我首先想知道的是,他在【317】这荒郊野外的赫勒斯多夫到底干什么。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在柏林火车总站出租司机听我说出目的地时那么兴高采烈,他还从未向东纵深过这么远。这一趟,赶上他一天挣的钱了。“回去你坐轻轨好了,”他简短地告诉我,“只花不到两欧元。”

赫尔曼在这儿到底干什么呢?

他在这里经营“驾驶学校,公交线路汽车和其他旅行车”:三所驾校,七个分校,全欧境内为老年人和协会、家庭、企业提供大巴旅行,当然是用里查德·赫尔曼集团自己的车辆,车身上印着他的名字。为老年人准备的大巴有相应的设施,为保龄球爱好者提供的旅行车带啤酒吧台。前将军领导的这支民役部队承担了柏林公交公司的市内交通运输,为轻轨和铁路提供补充和替代性运输。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由于不少铁路线都将停运,所以,尽管油价不断上涨,汽车运输在平原地区仍大有前途。此外再加上校车、专线往返运送车及机场线,一家加盟的出租车公司以及正好有需要就做的大卡车、大轿车保养。1990年,赫尔曼是以吱嘎作响的轮胎起家进入市场经济的,那时只想尽快下海,所以也早于别人到达目的地。他从统一社会党的废墟中站立起来,在从前的阶级敌人那里成了百万富翁。

从前,东德的时候他又是干什么的呢?

他是个职业军官。对他来说,这意味着“以士兵的美德为生命准则,以价值观为导向来生活”。幸好,他补充说,他是在和平时期来实践这些原则。升迁也不是因为他在某个军营表现出了非凡的领导才能,而是由于他出色的专业技术,农业机械和【318】拖拉机机修工,驾驶教练和工程师。他当然是党员。他说:“每个职业军官都必须是党员,到三年级的时候军官学员中没有不是党员的了。”从1987年到东德解体,他受建筑和建设计划部委托领导一个特种建筑企业。这任务既是激励,也令人担忧。那是为国防服务的,兴建和维护军事建筑,比如火箭阵地、军营、地堡等,东德称之为防御建筑,还有改造和新建飞机场。

一个今天看来很荒谬的任务是改造位于魏森费尔茨苏联西

部集团军亟待修建的军营。可是,改建期间战士们住到哪儿去呢?一旦发生战争,其模式是我方出击,占领西部,在库克斯哈芬搞庆功会,在某次军演中还真演练过。这样的想法真是匪夷所思,但我已经不再把它当作低劣的笑话来听了。很多开始时我认为是编造出来的事情,在旅途上都见到了。在历史的百宝箱中藏着荒谬、意外,惊骇——从秘密印刷的军用钞票到密封罐中采集的异见分子的气味,从政治局元老身上从西方采购的巴宝莉上衣到国事访问前夕匆忙粉刷的建筑外墙。

赫尔曼建议,在4月到10月之间彻底改建军营,这期间战士们住到帐篷或其他地方去。他说:“设想不错,但在现实面前失败了。除了磨石和烧红的钢铁,我们的苏联兄弟部队把所有【319】的东西都拆走了。这么一来,我们的计划无论是时间还是费用上都无法实现了。”

如果民事有需要,赫尔曼的队伍也作为后备派到国民经济中打增援。宗旨是:“我们成立生产队,干活有部队。”这类任务包括抢修水泥厂的运送线和满足忠于党的著名歌唱家们的特殊愿望,他们都愿意让赫尔曼和他的士兵以优惠价格修建别墅,同时不错过任何向上抱怨不足的机会。毕竟他们也属于国防系统,他们忠实地歌颂这个处于敌人包围之中的国家嘛。赫尔曼的部队为多个艺术家建过带录音棚的别墅,每座耗资750万马克,艺术家个人只支付66万。

有时候,任务就是在林中铺水泥路。这样做的必要性是什么,他和他的战士谁也搞不明白。但从部里得到的回答不容置疑:几个星期后,如果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到朔夫海尔德找昂纳克打猎,必须让他看到,东德在森林中都铺得起水泥路。

不用说,斯塔西当然也监视他,斯塔西谁都监视。在监视体系中,每个军官都被监视,就连本人是探子的也不例外。赫尔曼的哥哥是他的监视者之一,忠于党的哥哥对赫尔曼有过负面报告。他至今不能理解,他为之服务的意识形态曾多么伤人,包括自己的弟弟在内。简言之,“那时候,我们那儿什么都是秘密的,大概整个国家就是秘密的。”

柏林墙倒塌时,赫尔曼没敢马上到西边去看。几周前,他刚【320】签了字,不开过、不飞过、不踏上资本主义经济地区,这个禁令深深地印在了脑子里。虽然电视里看到了一切,但也可能都是假的,是为了骗人。11月11日,他和家人第一次去了西边,亲眼见到,就像电视里说的那样,确实什么都有,琳琅满目的橱窗,整箱整箱堆满街边的橙子。赫尔曼说:“在那以前我一直相信,在电视里看到的一切(1987年以后人民军军官也允许看西方电视了),是他们特地为拍摄摆放的,只是为了让我们着迷。”

在剧变的新时代,赫尔曼做好了被解职的准备,果不其然。44岁的将军衔军官面临提前退休、听天由命或自己重新尝试的选择。赫尔曼说:“东德的解体使我陷入了进退两难,40年,它是我的家乡、我的世界,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我从没想过要别的。”但挽救它是不可能的,这一点这个曾长期坚信不疑者也感觉到了。也许比其他人更早一点,因为像他这样的工程兵对衰败经济的现状不会视而不见。他们像是“救火队,无论是建筑项目,煤炭工业还是化学工业,没有我们,有些部门崩溃得更早”。

他先以自己的技术背景发了一些求职信,当然没有隐瞒军队履历,按他的军衔也不可能隐瞒。根据以往积累的经验,他很

希望能领导一个建筑企业,这个行业现在正大有事情可干。但他很快发现,在这个动荡的时代,没有人会接收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历史让别人胜利了,他不想依赖他们的怜悯过活。他们无权决定,“谁是错误制度的罪恶奴仆,从此该为自己的过去感到羞耻并接受落魄生活的现实”。这是他在回忆中带着情绪说的话。

1990年,他开始了行动。用久已习惯的战士的语言:“经过定位我撤回到自己的位置,集中精力设计自己的前途。”他像战场指挥官那样先了解面对的敌人,至少之前他一直是这么做的,那时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现在他面对的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对此他一窍不通。赫尔曼看出来它比自己强大,因而考虑着如何与它周旋。“假如你不能战胜它,就同它结盟”,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美国的战略家们如是说,和战争一样,无法击败的强手就同他们联合。

他的第一个想法就很正确,显示出战略和企业管理的天才。东德时期,订购一辆汽车得等10—12年才能拿到。所以有些东边人拿到他们订的特拉比^①汽车时,大众高尔夫二手车已唾手可得,而且货币同盟^②实施后东边人也买得起。由于缺少驾校,在东德,想考驾照最多的时候得等7年。他想到自己受过驾驶教练培训,买了一辆开了10年的Shiguli,这是一辆装有菲亚特124马达的拉达车,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了改装便干起来了。

① 东德生产的小汽车,塑料外壳。

② 货币同盟是两德统一的第一步,1990年7月1日开始实施,东马克不再流通,全部使用西马克。

他在赫勒斯多夫的小房子几乎被挤破了门,市场经济规则,客户的需求大得不得了。不久他不得不聘用另一个教练,接着又聘第二个。驾校的车也不仅仅是拉达了。赫尔曼的业务不断扩【322】展,买了一辆二手旅行大巴,开始他自己开,为同胞们提供低价旅游,带他们去未知的西部。这个生意同样好得不得了。

从那时到现在,18年过去了。里查德·赫尔曼不再指挥部队,但他雇用的职员有300人。其中60%是他从前就认识的,有些是过去的高级军官,比如一名上校。以前他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现在他宣讲资本主义,并且证明,这行得通。政治上他倾向于基民盟,但没有加入任何党派。他当然认识马里奥·查加。几年前,赫尔曼获得“中小企业大奖”时查加在场。他和其他东部废墟上的建筑师们现在也可以算作统一的赢家了。另一个制度的爱国者已然成了这个制度灭亡后的获益者。

距赫尔曼的企业14公里,31分钟车程,柏林东部的深处,阿德勒斯霍夫,德国最大的科学技术园正在扩建中。140家企业已经在那片不毛之地上落了脚。“不毛之地”的说法实在是一个错误的概念,西部像这样的工业园区看上去同样不那么吸引人。去那儿的路上,车子经过已改为现代办公楼的军营,但给我的感觉,似乎斯塔西的阴魂还在里面游荡。

因为这里也曾是他们的老巢。

“充满历史”一词很适合阿德勒斯霍夫这地方。1909年,德国第一个机动飞机场在这里投入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里是空军基地;20世纪20年代,在闲置的飞机库里,后来叫作“工作室”了,拍摄过无数的电影。纳粹在这里进行过秘密军事研【323】究。他们的千年帝国在12年后灭亡时,胜利的俄国人接管了这

里。在他们的庇护下,斯塔西也在这里建了办公楼。

1952年,德国电视台在这儿建了演播室,开始播放经过严格审查的节目。儿童节目“小沙人”是从这里起步的,现在成了德国中部电台的保留节目,始终是东部小朋友最爱看的。共产党贵族施尼茨勒也是从这里通过“黑色频道”进行宣传,东德新闻节目“每日镜头”总是把事实整理到符合国家新闻局的要求才播放,东部大部分观众便切换频道,到西德电视台去获取信息。德国电视台更名为“东德电视台”后播出的当然和竞争对手同样是彩色电视,但这并不能改变他们非黑即白的简单化报道方式,这边是劳动人民的天堂,那边是水深火热的地狱。

只有唯一的一次,在无政府的那一年,1989年11月到1990年11月,阿德勒斯霍夫真的播出了好电视,收视率达90%。这是东德电视台从以往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还没有被接收前的12个月。

以柏林墙倒塌的现场直播为开始。当时,手下领导着4500人的电视台技术总监汉斯-彼得·乌尔班(Hans-Peter Urban)坐在他的大办公室里,在场的还有他的女秘书和两个助理,他们冷静地说,现在墙开了,老百姓都会涌到西边去的。乌尔班说:“这【324】一天夜里发生的事情,是我一生所见过的最美好的电视画面。”不用说,他的工作人员全都在现场,抓拍镜头,传送图像。

四天前,乌尔班和西柏林的同行见面时,他们问他,发生了这么多游行示威和出逃,东德下一步怎么办,柏林墙会倒吗?乌尔班内心在担忧会发生流血冲突,但表面丝毫没有流露出来,只是开了一个玩笑:“柏林墙可以卖给美国人,他们什么都买。”当他把这些讲给我听时,开怀大笑起来。柏林墙后来真的一块一

块出售了,是他当时没想到的。

乌尔班看上去很精神,随时准备行动似的。这主要不是因为如今65岁的他年轻时曾是几乎打进奥运会的百米短跑运动员,一直很注意锻炼,而更多是由于他坚强的性格,随时愿意开始新的尝试。不屈服、不退让是他的性格特征。

夫人面前例外。那一天的夜里3点,他精疲力竭地回到家时,夫人“穿戴整齐,化了妆正端坐在沙发上等着他,要他立即出发,说,我现在就要去看,西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他解释说明天一早7点还得上班,她根本不听。他只好退让,开车跟她一起去。乌尔班说:“路上两个警察拦住我,友好地告诉我,西边接连出现两个写着30的白底交通标志不表示这里的时速是60公里。”

既然已经虽累不睡觉而睁眼掌握方向,既然已经不在东边打鼾而去西边开车,那就得到达勃兰登堡门。他做到了,从西柏林那边让人把他拉到墙上。站直了身子,朝东伸出了舌头,朝着【325】他记忆中曾被关过的那个房子的方向伸出了舌头。他被关是1961年8月13日,28年后,这也是他个人的一个胜利。

听不明白,给你解释明白。乌尔班向前探了探身子:“8月13号那天很热,我和一个朋友一起想到伤兵路去给摩托车买根链条锁,然后一起去游泳。我们从波茨坦出发,塑料袋里装着游泳裤。换车时一个警察拦住了我们,问我们去哪儿,我开玩笑说去傻子路^①。他一点不觉得这是开玩笑的事情。后来我才知

^① 伤兵路和傻子路这两个词在德语里词形相近,分别是“Invalidenstr.”和“Idiotenstr.”。

道,那是建墙当天,我当然一无所知,所有一切都是严格保密的,再小的玩笑在那些家伙那儿也不能开。”乌尔班和他的朋友被带到勃兰登堡门附近的一个房子里关了起来。1989年11月的那个夜晚,他就是朝那个房子的方向伸出了舌头。午夜过后他俩被放了出来,因为他让审讯人员相信了,塑料袋里装的只是游泳裤而不是逃亡的行李。

在一次大腿肌肉拉伤后他结束了运动生涯,想当体育和历史老师。上了大学,读完这两个专业又加了另一个:电子信息。带着这些文凭到了阿德勒斯霍夫,一步一步升迁,多年后坐到了柏林墙倒塌那天夜里的那个大办公室里。乌尔班说:“今天意义上的自由,德国电视台时代也不存在,但比其他地方多说一点还是可以的。你想,在一个大盖子下长大的,总想把这个盖子掀起来一点。我们就是这么做的,觉得很有趣。东德时候几乎什【326】么都是禁止的,所以我们每天都在打破一项禁令。当然不是每天抗上,也没有天天举着红旗绕场跑圈。”

乌尔班对所描述的自身形象感到满意。当时要实现他想做的事情也没觉得太难,他是左派,最多也就对社会主义东部建设搞点小破坏,确实是一个很小的。那时,他在附近买的一所房子以前是俄国人住的,得大修,修缮中缺某种建材,正常渠道搞不到,得想别的办法。阿德勒斯霍夫也在施工,院子里正好堆放着不少这东西。一天晚上,乌尔班把20马克塞到一个卡车司机手里说,装上一件这东西送到我家。司机果然照办。

星期六,他和邻居隔着篱笆聊天,邻居就是阿德勒斯霍夫工地的工长。乌尔班像往常一样问他工程进展是否顺利,是否一切在按计划进行,都顺利,他说,一切按计划,但是,总监同志设

想一下,不久前发生了什么,某一天夜里,竟然有人从堆放的建材中偷走了一件。

如今,乌尔班的办公室和当年那间 150 平米的在同一层上,当然没有那么大了。那时形式上他是属于德国邮政管辖,邮政只负责技术,节目内容由新闻局审查。乌尔班不仅是党员,作为尖子运动员,用占区德语的词来说,他也是旅行干部,可以到国外旅行。为了不失去这一特权,他得报告旅行的情况。作为技术人员,他写下在伦敦、巴黎或纽约看到的演播室的技术装备情况。在西方同行眼里,技术上,他是这个专业最好的人员之一,【327】他演播室的设备远超过西柏林竞争对手的。

1990 年 10 月,根据统一条约前来接收电视台的西部大员是当时巴伐利亚广播台的电视经理、忠实的基社盟人鲁道夫·穆尔芬泽尔(Rudolf Muehlfenzl),他第一个就问乌尔班,是不是党员,当然是,斯塔西呢?也有关系。乌尔班说:“听了这话他脸白了,我对他说,当运动员的时候以及后来,我写过几百份旅行报告,他可以上高克局去调来一一查阅,假如他能在某一份中找出我的问题,能发现一个我检举同事的例子,我立刻就自动走人。我对自己非常有把握,我知道,从没干过那些事。”

穆尔芬泽尔虽然没找到任何问题,但对乌尔班来说,1991 年阿德勒斯霍夫停止发射、所有灯光都熄灭时,他个人的前途也随之暗淡下去了。他休息了半年,在家修房子。西边有人知道他的能力,他在汉堡演播室得到了一份工作,从最下面重新做起,少说,多看,多学习。只有一次,是在杜塞尔多夫的一次会议上,他张嘴发言了,那些“自作聪明的经理们,根本不知道东德是怎么回事就来评判,我实在听不下去了,对他们说,你们不了

解我们,情有可原,你们的联邦情报局也同样不了解,否则到这一步时你们应该知道得更多才是。现在你们来了就想品头论足,对不起,不行”。

1997年,乌尔班重新回到了他热爱的阿德勒斯霍夫,此前他已经为德国中部广播电视、艺术电视台和VOX台建了演播室。乌尔班说:“在毫无生气、一片黑暗的场地上,我们一点一点重新点燃了灯光,这些年里,重建起了一切。”如今,柏林阿德勒斯霍夫演播室,汉堡演播室的全股子公司,是欧洲最先进的电视服务中心,拥有最佳装备的转播车,13 000平方米的转播室,其中最大的一间,2 400平方米,是世界第一。2004年以来,在汉斯-彼得·乌尔班总经理领导下,原本亏损的地方扭亏为盈。500名工作人员,大部分和他们的头头一样是土生土长的东边人,提供的服务从模拟技术到现场直播足球世界杯,周日晚间的安妮·维尔(Anne Will)访谈,从授奖仪式到电视连续剧,从化妆师到剪切台,应有尽有。

【328】

至今,他“每天都为统一感到高兴”,但也不排斥过去:“斯塔西当然是个犯罪团伙,但是,能说每一个在斯塔西工作的人,每个党员都是坏人吗?显然不是,不是斯塔西,不是党员的就都是好人了?也不是。”

迪特马尔·艾德莱因(Dietmar Enderlein)原则上同意这个看法,但每个人都可以拒绝同斯塔西合作。他也是党员,作为东德最高级别的三个军医之一,艾德莱因博士、教授当然得是党员。因为他相信那个制度,所以入党是自愿完成的愉快的事情。本来他是想当木匠和搞室内装修的,但是马上接着说:“东部建筑业那种情形,干了那行大概没什么可能在职业上有所作为。”

社会医学博士毕业后,他穿上军装成了军医,也佩有一件武器。东德灭亡时,他和赫尔曼、乌尔班同志一样,已身居高位。他的头衔是:格莱福斯瓦尔德大学军事医学系主任。他对现实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清醒认识,和其他许多人一样,知道东德在经济上已经不行了,但还有机会挽救,因为“不是东德经济本身不行,而是为它制订计划的那些人不行,对后来所发生的事情起决定作用的,是东欧市场的崩溃”。【329】

当剧变终于发生时,穿军装的教授清楚,他的仕途从此结束了。他始终如一地把剧变称为转折,不仅是因为他一直相信那个制度和它的改革能力,而且也因为知道那也是他个人生活的转折点。艾德莱因说:“到1990年12月31日人民军解散前,联邦军的战友们对我们始终很友好。甚至给我在慕尼黑联邦军大学提供了一个我这个专业的教授位置。”他含糊地说是搞反化学武器的材料研究。

他想起了一件逸事,口吻中充满了轻蔑。1989年,格莱福斯瓦尔德大学准备授予曼弗雷德·施托尔佩荣誉博士称号,遭到教授们激烈反对,他们都是坚定的共产党人,为什么偏偏要给一个教会的人这份荣誉,凭什么呢?艾德莱因被同事们推选出来,到柏林的最高领导——党中央去提抗议。艾德莱因说:“中央领导告诉我为什么教会的这个人应该获得这个荣誉,让我知趣地闭嘴不要出声。我照办了,我是当兵出身,习惯于服从命令。”施托尔佩写了一篇有关社会主义国家内教会的文章:“根本没什么内容,任何一个大学生交这种文章肯定不及格。”

没有凭吊1990年彻底灭亡的工农乐园,艾德莱因和几个同事一起贷款成立了美迪格莱福股份有限公司,在统一的德国,按

照资本主义规则运作：用商业银行提供的 1 500 万马克的贷款买下了格莱福斯瓦尔德军事医学系（所以起名美迪 Medi 和格莱福 Greif）所有闲置的地产和房产，从那里开始发展。养生饭店、医院、老年公寓，全部建在东部。现已发展到 23 家公司和 9 个医院。他手下指挥着 1 700 人，调门自始至终没变过。他也获得了年度企业家奖，他的政治关系网一如既往地好，从前他认识埃贡·克伦茨，后来是科尔，如今，不用说，他认识现任总理。

没有挫折，始终一帆风顺吗？

当然不能这么说。针对他有贪污问题和伪造文件的怀疑展开过调查，但是两年后，不仅调查停止了，而且还对他所遭受的不公进行了赔偿。作为从前的军人，他没有兴趣知道 1990 年以来他新增敌人的数字，只要知道有他们存在就够了。和洛塔·德梅齐埃持同一观点，他也认为，假如 1990 年能赦免所有随从者情况会好得多。艾德莱因说：“不是赦免那些真正有罪的，他们当然不行，而是那些只是相信了那个制度并与之合作过的。”

他马上得出发去法兰克福附近参加一个活动，临走又想起一件往事，兴致勃勃地讲给我听：“大概是 1995 年的时候，我被任命为柏林银行顾问委员会成员。第一次会议上，埃德查特·路透（Edzard Reuter）要求我介绍一下自己，我照办了，毫无遗漏、实话实说。全场一片沉默。晚餐时又谈到我的经历和东德，我对他们说：先生们，咱们的父辈，你们的和我们的，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纳粹。战后你们是被美国人解放的，我们被俄国人。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现实。”

【331】 迪特马尔·艾德莱因成功地面对了。美迪格莱福的年赢利额为 1 200 万欧元。他马上又解释说：“听起来很多，但我们一

直还在还贷款。”他说着笑了,作为一个有经验的东边人,他知道人之常情的嫉妒心在东部比西部要强烈得多。

阿克瑟尔·席尔佩特(Axel Hilpert)同志的军衔没有艾德莱因那么高,本来他也许还有升迁的机会,但人民把那些能提拔他的人都赶下台了。最迟到1989年11月9日,东德可以说已经名存实亡。化名“莫尼卡”、安全部二司的有功人员席尔佩特上校和其他斯塔西一样,在人民激愤的怒潮前在家里躲了些日子。不久,他便按照人民的要求,参加生产重新做人,靠老关系做起了房地产生意。

现在,他也堪称一位废墟上的建筑师了。和几个同伴一起,席尔佩特在波茨坦附近的施维洛夫湖畔建起了度假村,用他们自己的广告词说是“人间天堂”。特奥多尔·冯塔纳随时可以出来作证,他的塑像就立在花园中。统一在这里是板上钉钉了,因为席尔佩特总经理的“冯塔纳资产与经营公司”里,有一位合伙人叫汉斯-赫尔曼·提杰(Hans-Hermann Tiedje),他是当时还纯属西德的《图片报》的总编。这样两个原来根本不属于一起的,融合到了一起。投资总数为4500万欧元。欧盟提供了几百万资助,勃兰登堡州经济部也出了一些,州经济部长乌尔里希·容汉斯显然对各类建筑都很有研究,1989年7月还大胆地称赞过东德最宏大的建筑——柏林墙,这里的饭店设施开业时又大唱了一通赞歌。席尔佩特名下“这颗哈维尔河畔的明珠”为这一地区创造了140个就业岗位,这里本来几乎是无业可就的。

距此不远的首都柏林的政治家们也发现这个按西方风格建造 [332]
的别墅饭店是理想的会面之地。G8的财长们曾在这里讨论

全球化的功过是非。饭店“道—养生中心”旁边挂着造访过这个度假村的名人照片,除了拉封丹、梅尔茨、施托尔佩和朔依普勒、科尔、巴尔奇,还有深受东部人民喜爱的歌星施特凡尼·赫尔特尔(Stefanie Hertel)和施特凡·穆罗斯(Stefan Mross)。以海明威名字命名的餐厅里,厨师们的竞争对手是战无不胜的湖景、游艇和静静地等待战利品的鱼鹰。

席尔佩特的另一个生活已被深深地埋葬了。1974—1989年间,他给斯塔西写过很多有关别人生活的报告,但里面到底写了些什么,已无从考证。“莫尼卡”的原始档案在1989年12月由他的上级军官亲自销毁了。莫尼卡是一位女士的名字,她驾驶着一辆慕尼黑车牌的欧宝,在高速公路上超了席尔佩特的车。两辆车之间打了个调情的手势,两人在赫尔莫斯多夫出口休息站相见,一起喝了咖啡。“我们各自作了自我介绍,聊了会儿,交换了地址,半小时后挥手告别。她奔慕尼黑,我去苏尔。”这是席尔佩特未曾发表的自传中对那次相遇的描述。据说她是中央情报局的人,席尔佩特的第一个任务是搞清她的意图。

他说,从那时起到柏林墙倒塌那天的15年间,他“内心对斯塔西的距离”一直在加大,但显然掩饰得很巧妙,因为他的上司丝毫没有察觉,一个劲儿给他压担子、提拔他。当斯塔西的另一个部门因某些可疑交易中的“腐败”行为对他进行了侦查和【333】监听时,奈伊伯中将命令停止行动,因为对国家安全部来说,席尔佩特作为“莫尼卡”的角色比起他的正式职业——皮尔纳古董商社采购员要重要得多。

钳工出身的席尔佩特绝不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之人,他是沙尔克-格罗德科夫斯基领导下负责外汇创收的东德商业协调

局的主力。不仅作为斯塔西人员,而且在艺术品和古董特种交易中,直至东德解体,席尔佩特始终是那个制度的支柱人物。他说他一直对那个制度抱有怀疑,但从未听他发表过任何批评性意见。席尔佩特说:“半瓶酒下肚,我也可以毫无障碍地为世界社会主义干杯。但心里厌恶得不得了。最让我受不了的是所谓资讯访谈。你得到这样的任务,得利用别人对你的信任,把受害者引到一个秘密接头点,在这里我得向他刨根问底,旁边的房间里有人做记录并当场由上级军官作评价。”

他说他从没出卖过老战友,但他也“不愿同那些至今还在相信世界革命的家伙哪怕是隔着马路相遇”。更可恶的是:“那些记者,从没在我们的制度下生活过,根本不了解是怎么回事,现在却起劲儿地在废纸堆(指斯塔西档案)里挖耸人听闻的东西。”这是他在未发表的回忆录中写下的。

我这个记者在剧变之后第一次与他见面时,为了证明曾与当权者的密切联系,他给我带来了一块久经风吹雨淋的国界标牌,上书:不准跨越,否则将遭枪击。八年后,第二次见他时,他刚通过了联邦议会东德商业协调局业务审查委员会的质询,大腹便便地已在资本主义站住了脚。递过来的名片上写着他新开展的业务范围:“伦敦、迈阿密、哈瓦那、柏林房地产。”【334】

上回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巴登-巴登举行的德国媒体奖授奖大会上,他又兴高采烈地跟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坐在同一张桌子旁。我悄悄地问其中的一位,为什么偏偏化名“莫尼卡”的斯塔西席尔佩特有幸受到邀请呢?得到的是含糊其辞的回答:从前就认识,这人懂艺术,关系广,想在东边找个漂亮的湖区或做生意用得着。

想做吗？

不，我不想。

对艺术及其价值席尔佩特懂得虽不多，但是很懂价格。受商业协调局委托，他主要收购家具、油画和古董，这些可以从西方换回东德急需的硬通货。国家博物馆的仓库被卖空后，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搜刮私人藏品。对抢手的物件，席尔佩特及其同伙以外汇商店的购物券或一辆汽车作为交换，因为想买一辆车一般要等待10年。苏联生产的拉达牌小汽车国内价格是2.5万东马克。商业协调局用车换来的油画，到了西方价值2.5万外汇马克，这是出于意识形态原因对西马克的叫法。根据不同的汇率和外币收益率他们可以赚150%到300%。1988年进行的46笔“汽车交换生意”，交换价值为57.3万外汇马克，净赚98.2万西马克。

另一个获取艺术品的手段就完全是东德式的巧取豪夺了。艺术品稽查先到，税务稽查跟着就来。在斯塔西兼职的采购员【335】如果在家访时发现了私人收藏的艺术品，便报告给国家安全部。安全部便安排另一些官员来，指责当事人卖某一幅画或某件家具时没有缴所得税，税额是那件当然估价很高的藏品的90%。没有一个收藏家能一下拿得出那么多现金，于是，藏品被没收，当事人因偷税漏税被起诉，判决很快就出来。真正的物主蹲在监狱里的时候，古董和艺术品外贸企业已经把这丰厚的战利品卖到国外去了。客户主要来自联邦德国、荷兰和西柏林。弗里德里希火车站附近的“大都会”饭店里专有一层摆放着从人民手中征用来的物品供鉴赏，那里存放和不断增补的物品总价值从未低过75万西马克。

发生于1984—1989年间的强制征用有一百多起。拉特瑙的收藏家维尔纳·施瓦茨的遭遇便是其中之一。他被戴上手铐押去审讯,当他提出需要一位律师的时候,得到的回答是:“这里又不是西方。”他的收藏被全部没收,照惯常的方式换了银子。他因漏税被判刑五年半,后因西德赎买囚犯^①到了西部。这一交易中,国家外汇商能再赚一笔7万西马克的“人头钱”。剧变后,洛塔·德梅齐埃为他的当事人争取赔偿官司打遍了各级法院,最后总算获胜,但是当事人本人没能见到迟来的赔偿,赔付他后代的是东德的法定继承人联邦德国。

德国,你怎么样啊?

在我的旅行接近尾声的时候,遇到了一位生活在波茨坦的爱国者。京特·耀和^②(Guenther Jauch)肯定不赞成我的这个【336】说法,他反感所有把正常的东西拔高的说法、做法。他的州长普拉采克不在乎这些。在表彰耀和的功绩时,有一次他是这么说这位波茨坦名人的:“我们对他的褒奖之词好比用手电筒去照一位站在聚光灯下的人物。”说着还没忘了把他喜欢的格里尼克桥加进去:“太棒了,柏林墙刚倒,您就经过格里尼克大桥从柏林到我们这边来了,1989年冬天的波茨坦可不是今天的样子。那需要一位王子的慧眼,才能想象出,这座灰姑娘一样的城市将来会变成什么样。”

柏林墙倒塌那天,耀和同他当时的伴侣、如今的妻子台阿一

① 两德时期西德为在东德关押的政治犯、逃亡者等赎身,付给东德政府西马克,被赎出的人直接移居西德。

② 著名德国电视节目主持人。

起住在慕尼黑施瓦滨区。那天他真想当晚就和台阿一起出发奔柏林,去亲身经历德国的这一历史时刻,但没法说走就走,因为小女儿刚出生六个月,早已睡着了。每次出门旅行得预先计划和准备。“第二天早上4点,我们已经到了慕尼黑机场,因为担心,所有去柏林的飞机因所发生的事件会全部客满,所以想赶头班飞机走。没想到当天的每班飞机都还有很多座位。巴伐利亚人嘛,他们的宗旨是:我是我,普鲁士人在柏林把墙推到了,这是他们的事。看看电视就行了。飞机降落后,耀和把小女儿往生活在柏林的父母那儿一放,就和妻子一起从西到东,从东到西,来回穿梭了四天四夜。”

当时他们还没有立刻搬到波茨坦去。在慕尼黑的朋友们眼【337】里,波茨坦似乎是西伯利亚的某个地方。20世纪90年代,耀和一家先搬到了柏林采伦多夫区,京特小时候在那里上过学,因为在教堂做义工,所以每天很早就得起床。他们对波茨坦——东部这座蒙尘、被诅咒和沉睡的美丽城市的青睐是1995年开始的,那里显然比懒洋洋的采伦多夫刺激得多。

他们是第一批新德国居民。在旧制度时期,这座城市被系统地进行了异化,因为统一社会党要彻底铲除对普鲁士荣耀的记忆。1990年以前,12万居民中有多少在斯塔西那儿挣钱当然无从确定,有人说至少1/10,反正比东德其他任何地方都多。

如今,京特·耀和在波茨坦大约有20处房产。但他的样子全然不符合当地老住户对西部大款的想象。他对《明镜》周刊记者亚历山大·欧桑(Alexander Osang)(成功的东边人,德国记者中的佼佼者之一)说,促使他把钱投到破败的房子上去的动机不是像民社党诬蔑的那样为了无止境地少上税,而是因修复

后美丽房屋带来的愉悦。耀和说：“现在我买得起，房子是家产，不像股票，以后我孙子也不可能把它一下挥霍掉。”

典型的耀和话语。不在有什么、靠自己的能力能干什么上说大话。当地百姓始终注意着他和其他一些新居民，他能理解，没问题。但是如果成心整人，大家都适用的规定到了他这儿要变，比如地下室窗户的铁栏杆不是绕三圈而是得绕六圈，一向平和的耀和先生也会忍不住发火。

仍然墨守成规的当权者在这里看到了公民中产阶级的另一【338】面：绝不委曲求全。这的确是西德的一个特征，是多年挺起腰板做人的结果。业主耀和把这种态度带到了波茨坦，因为，“我永远也忘不了母亲在建一小幢连栋别墅时，隔三个星期就得亲自烤一个果仁蛋糕拿到建筑局去，求那里的官员开恩，同意在前院建个小车棚。”

这位不能说不知名的废墟上的建筑师在建设东部中积累的经验 and 看法打破了僵化的结构，他本人不想得到什么，却愿意付出。他只想让公民能和国家公务人员平起平坐，而不要老百姓低三下四求他们。他做到了。胜利中他也没有对人一概而论。新业主当中也有不少蛮横的，不守规矩的，得用法律约束他们才行；公务员当中也有不少精通业务、善解人意的。为表彰耀和为“战胜官僚主义障碍”所作的努力和贡献，他被授予“维尔纳-波霍夫奖”，10万欧元的奖金他全部捐给了那些得不到国家资助的社会机构和学校。

对此他只字不提。我们坐在一起，一边喝着原产自新西兰、现在波茨坦也买得到的葡萄酒，一边聊天的时候，他没有说他所有的广告收入全部捐给了生活困难的人；也没说为波茨坦城市

宫殿 Fortuna-Portal 的重建,他汇去过 350 万欧元;更没说为大理石宫的修复出资几十万,只附加了一个条件,房顶必须由国家出资加固。普拉采克在赞扬这位波茨坦的新居民时说,每个市长都希望他的市民能是这样的人。

【339】 1995 年以来,京特·耀和定居在波茨坦海利根湖畔。他说:“我在这儿已经住了这么多年了,不会再离开了。”

我对统一的总结是暂时的、主观的,这是本书开头写下的话。旅行结束了,这话同样可以写在这里。但这个结尾未免突兀。可是对统一现状没有现成有效的评价,因此也就没有一个对德国到底过得怎么样的简单回答。

现在,即使是在上阿玛高^①,如果一个服务员张嘴出来的是萨克森话,也不会有人大惊小怪了。这一情形让人觉得统一业已深入人心。西德的大学生也在格莱福斯瓦尔德或耶拿、德累斯顿大学上学而不会总想往家跑,未来的精英不分东西只去教育质量最高的地方。这说明,在有知识的年轻人头脑中,柏林墙已不复存在。东部的丑闻——腐败、欺诈、有组织犯罪,和西部的如出一辙,也许可以说,这点上,原本属于一起的,已经融合到一起了。

这样看来,西边的抱怨东边的,东边的抱怨西边的,倒是一个令人放心的情况正常的信号。比如巴登人和符滕堡人,几百年的宿敌,现在不是和睦地在同一个联邦州巴登-符滕堡州生活吗? 坏榜样吗?

当然是好榜样。“统一的德国过得怎么样”这个问题,如果

① 德国最南部巴伐利亚州境内的一个小地方。

回答是“还行,有时候好点儿,有时候差点儿”,那就没问题啦。

我们还远没到达这一步,但离这一步也不会太远了。最晚,到真正的统一的孩子,柏林墙倒塌时三岁、四岁、五岁的人,到他们来决定民族心态的时候,东西部现实存在的差别就像北南差别那样存在于现实之中,差别是有的。

那又怎么样呢?

“如果他们没死,就一直活到了今天。”好故事是这样结尾的。我可以接受这个结尾。

致 谢

感谢所有与我交谈的对象,不可能一一点名提到,也有的不愿被提到。

特别感谢我的朋友格奥尔格·阿尔特哈默 (Georg Althammer) 耐心细致、孜孜不倦地阅读我的手稿。

大事年表

1989年5月7日,东德地方选举,舞弊后的选举结果:民族统一阵线得票98.85%。

1989年9月11日,匈牙利为东德逃亡者开放边境。

1989年9月12日,东德民权组织“民主现在”成立。

1989年10月7日,庆祝东德建国40周年,柏林和其他多地发生群众抗议示威,与警察发生冲突。

1989年10月9日,7万人在莱比锡和平示威,高呼“我们是人民”的口号。

1989年10月18日,埃里希·昂纳克辞职,埃贡·克伦茨接班。

1989年10月23日,全国各地共50万人示威反对克伦茨,要求改革。

1989年10月24日,人民议院选举克伦茨为国家主席。

1989年10月27日,开放去捷克的边界。

1989年11月4日,近百万人参加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举行的示威。

1989年11月7日,总理斯多夫及其政府全体辞职。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开放。

1989年11月13日,汉斯·莫德罗担任总理。

1989年11月18日,解散国家安全部,更名为国家安全办。

1989年11月28日,赫尔穆特·科尔提出克服分裂的“十点计划”。

1989年12月3日,统一社会党中央和政治局全体辞职。

1989年12月4日,莱比锡人民占领圆角斯塔西中心。

1989年12月6日,埃贡·克伦茨辞职。

1989年12月7日,柏林召开圆桌会议。

1989年12月8—9日,统一社会党特别党代会决定更名为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格雷戈尔·居西任新的党主席。

1989年12月22日,勃兰登堡门开放通行。

1990年1月3日,圆桌会议决定建立理智大联合。

1990年1月8日,莱比锡星期一示威中“我们是一个人民(民族)”的口号第一次替代了“我们是人民”。

1990年1月15日,位于柏林里希滕贝尔格德斯塔西总部被冲击,文件销毁被制止。

1990年1月21日,埃贡·克伦茨被开除出党。

1990年1月21日,沃尔夫冈·贝尔格霍夫和其他39位名人宣布退党。

1990年1月29日,埃里希·昂纳克被捕。

1990年2月7日,“新论坛”、“民主现在”和“和平与人权动议”合并为“90联盟”。

1990年2月8日,成立解散国家安全办委员会。

1990年3月1日,汉斯·莫德罗主持的部长委员会决定,

所有国营企业改为资产股份公司,另外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1990年3月12日,圆桌会议最后一次会议,拒绝接受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3条。

1990年3月18日,德国联盟在东德第一次自由选举中以47.8%的得票获胜。

1990年4月12日,东德第一位自由选举产生的总理洛塔·德梅齐埃(基民盟)发表就职演说。

1990年5月16日,设立1150亿马克的“德国统一”基金,为货币联盟提供资金支持。

1990年5月18日,两德签署货币、经济与社会同盟协议。

1990年6月12日,成立托管局,首席长官为沃尔弗拉姆·克劳泽。

1990年7月1日,货币联盟生效,600吨西马克纸币以及500吨硬币被运往东德,西马克成为有效货币,工资、养老金兑换汇率为1:1,存款可按此比价兑换4000西马克,超出部分按1:2兑换。

1990年7月14日—16日,联邦总理科尔与戈尔巴乔夫会谈,苏联同意给予统一的德国全部主权。

1990年8月31日,在柏林签署恢复德国统一的条约。

1990年10月2日,人民议院最后一次会议。

1990年10月3日,德国统一的第一天。

参考书目(摘选)

Allertz, Robert(编者):《歌手与提白员——比尔曼、哈维曼与东德》,柏林,2006。

Baale, Olaf:《拆除东部》,慕尼黑,2008。

Behnke, Klaus/Fuchs, Juergen(编者):《瓦解灵魂:为斯塔西服务的心理学和精神病院》,汉堡,1995。

Berghofer, Wolfgang:《我的德累斯顿岁月》,柏林,2001。

Bischof, Olaf:《外贸协调局艺术品与古玩有限公司》,柏林,2003。

Braun, Matthis:《文化岛屿与政权工具——艺术科学院、统一社会党和斯塔西》,哥廷根,2007。

Danyel, Juergen(编者):《分裂的历史——两德对纳粹和抵抗运动的态度与处理》,柏林,1995。

柏林德国历史博物馆(编者):《一党专制与东德的日常生活》,柏林,2007。

Eik, Jan:《特殊事件:东德的政治与刺杀事件》,柏林,1995。

Ensikat, David:《小国家大城墙:东德介绍,适用曾在那儿和不曾在那儿生活过的人》,慕尼黑,2007。

Erlar, Peter/Knabe, Hubertus:《禁止通行的城区》,柏林,2005。

Gieseke, Jens:《米尔克集团:斯塔西历史 1945—1990》,慕尼黑,2006。

Gopsse, Peter/Strauss, Helfried:《世界之巢:莱比锡的文学生活 1970—1990》,莱比锡,2007。

Haase-Hindenberg, Gerhard:《打开柏林墙的那个人》,慕尼黑,2007。

Havemann, Florian:《哈维曼》,法兰克福/美,2007。

Herles, Wolfgang:《我们不是人民》,慕尼黑,2004。

Hertle, Hans-Hermann/Wolle, Stefan:《东德那时候》,慕尼黑,2004。

Höppner, Reinhard:《奇迹需要尝试:通向德国统一的道路》,柏林,2009。

Judt, Matthias(编者):《东德历史文献》,柏林,1998。

Juergs, Michael/Elis, Angela:《典型的东边人,典型的西边人》,慕尼黑,2005。

Jürgs, Michael:《托管人员——看英雄与恶棍如何兜售东德》,慕尼黑,1997。

Kahane, Anette:《我看得见你看不见的东西——我的德国故事》,柏林,2004。

公正年鉴教会编辑小组:《分裂的国家——德国统一展望》,柏林,2007。

Klaerner, Andreas/Kohlstruck, Michael:《德国的现代极右主义》,汉堡,2006。

Knabe, Hubertus:《施害者就在我们当中》,柏林,2007。

Laabs, Jochen:《捕影手》,哥廷根,2000。

Laabs, Jochen:《迟来的旅行》,哥廷根,2006。

Leide, Henry:《纳粹罪犯与斯塔西——东德的秘密历史政策》,哥廷根,2006。

Liebemann, Irina:《要是那样会怎样?要是那样就好了》,柏林,2008。

Loest, Erich:《地上的裂纹:一份履历》,汉堡,1981。

Melis, Roger:《无声的国家:摄影集 1965—1989》,莱比锡,2007。

Modrow, Hans:《我想要一个新的德国》,柏林,1998。

Most, Edgar:《遵资本旨意 50 年》,柏林,2009。

Mueller-Enbergs, Helmut/Wielgohs, Jan/Hoffmann, Dieter(编者),《东德名人生平词典》,波恩,2000。

Mueller/Enbergs, Helmut:《玫瑰木》教育与研究信息第 28 期,柏林,2007。

Platzeck, Matthias:《未来需要源头》,汉堡,2009。

Rathgeb, Eberhard:《积极的民族:德国的辩论 1945—2005》,慕尼黑,2005。

Reiher, Ruth(编者):《致以社会主义的和其他的敬礼——从日常生活解读这个已消亡的共和国》,柏林,1995。

Schalk-Golodkowski, Alexander:《德——德回忆》,汉堡,2000。

Scheer, Udo:《于尔根·福克斯——从文学之路走向反对派》,柏林,2007。

Schoene, Jens:《社会主义农村》,莱比锡,2008。

Schoeps, Julius 以及其他编者:《勃兰登堡州的极右主义》,柏林,2008。

Schroeder, Klaus:《统一后的德国——发生变化的共和国》,慕尼黑,2007。

Schroeder, Richard:《对德国统一之误读》,弗莱堡,2007。

Schulz, Helga/Wagner, Hans-Juergen:《东德回顾》,柏林,2007。

Sow, Noah:《黑白德国——日常生活中的种族歧视》,慕尼黑,2008。

Stern, Fritz:《五个德国和一个人生:回忆录》,慕尼黑,2007。

历史基金会(编者):《那一边:换一个角度看德国》,莱比锡,2006。

Suess, Sonja:《被政治滥用了吗?——东德的精神病院与斯塔西》,柏林,2000。

Suess, Walter:《斯塔西日暮途穷:当权者为什么没能阻止1989年的革命》,柏林,1999。

Thaysen, Uwe:《圆桌会议:人民在哪里?》,欧普拉藤,1990。

Thaysen, Uwe:《东德的中央圆桌会议:发言记录与文献(1—3册)》,威斯巴登,2000。

Unverhau, Dagmar:《国家全部纳粹档案》,明斯特,1998。

Wolle, Stefan:《起义之梦想》,柏林,2008。

Wolf, Friedrich:《打输的官司》,柏林,2009。

莱比锡当代史论坛(编者):《识别力——东德的专制与反抗》,莱比锡,2007。

人 名

(人名后数字为原书页码)

A

- Adenauer, Konrad 康拉德·阿登纳 28,49,128,256,303
Aly, Götz 戈茨·阿律 281
Aderson, Sascha 萨沙·安德森 276
Antonio, Amadeu 阿玛德·安东尼奥 208
Apfel, Holger 霍尔格·阿普菲尔 228
Appel, Detlef 德特勒夫·阿佩尔 218
Arendt, Erich 埃里希·阿伦特 294
Arendt, Hannah 汉娜·阿伦特 247
Arenstedt, Rosemarie 罗泽玛丽·阿伦斯特德 226
Augstein, Rudolf 鲁道夫·奥格施坦 256

B

- Bahr, Egon 埃贡·巴尔 23,55,91,119,153
Bahro, Rudolf 鲁道夫·巴罗 46,122,134

- Bartlog, Jürgen 于尔根·巴特罗格 27
- Bartsch, Dietmar 迪特马尔·巴尔奇 253, 332
- Bartsch, Kurt 库尔特·巴尔奇 279
- Bauer, Hans 汉斯·鲍尔 252, 262
- Becher, Johannes R. 约翰内斯·贝歇尔 46
- Beck, Sabine 扎比内·贝克 29
- Becker, Jurek 约莱克·贝克尔 279, 294
- Beil, Gerhard 格哈德·拜尔 99, 238, 272
- Berghaus, Ruth 鲁特·贝尔格豪斯 46
- Berghofer, Wolfgang 沃尔夫冈·贝尔格霍夫 20, 53—56, 62, 65, 70, 74, 76—78, 84, 96, 101, 109, 112, 114, 152, 156
- Berry, Chuck 查克·贝瑞 35
- Berthold, Erika 埃里卡·贝托尔特 291
- Beust, Ole von 欧勒·冯·博伊斯特 213
- Biederkopf, Kurt 库尔特·比登科普夫 124, 247
- Biermann, Wolf 沃尔夫·比尔曼 29, 47, 112, 276, 278, 291, 293
- Birthler, Marianne 玛丽亚娜·贝斯勒 31, 94, 122, 137, 147, 168, 251, 290, 297
- Bisky, Lothar 洛塔·比斯基 109, 267
- Blüm, Norbert 诺尔伯特·布吕姆 25
- Bohley, Bärbel 贝贝尔·波莱 48, 108
- Böhm, Horst 霍斯特·波姆 66
- Böhm, Tatjana 塔佳娜·波姆 104—107, 109, 115
- Böhme, Ibrahim 伊普拉希姆·波梅 56, 103, 113, 124, 144

- Böhmer, Wolfgang 沃尔夫冈·波梅尔 24, 118—192, 251
Bomba, Rainer 莱因纳·博姆巴 179
Bonhoeffer, Dietrich 迪特利希·邦赫费尔 46, 95, 100, 102,
120, 127
Bonhoff, Werner 维尔纳·波霍夫 338
Brandt, Willy 威利·勃兰特 28, 55, 91, 197, 253
Brasch, Horst 霍斯特·布拉什 290
Brasch, Thomas 托马斯·布拉什 46, 290—294
Braun, Volker 福尔克尔·布劳恩 275, 294
Brecht, Bertold 贝特霍尔德·布莱希特 46, 290, 293
Breuel, Birgit 比尔吉特·布罗伊尔 36, 40, 155, 182
Büchner, Georg 格奥尔格·比希纳 276
Bullerjahn, Jens 延斯·布勒扬 315
Bush, George 乔治·布什 90

C

- Caffier, Lorenz 洛伦茨·卡费尔 226
Carstens, Karl 卡尔·卡斯滕斯 128
Churchill, Winston 温斯顿·丘吉尔 224
Cohn-Bendir, Daniel 丹尼尔·康-本迪特 281
Czaja, Mario 马里奥·查加 303—308, 310, 313, 322
Czaja, Sebastian 塞巴斯蒂安·查加 313

D

- Dahn, Daniela 丹尼艾拉·丹 299

- Dammhayn, Stefan 施特凡·达姆海恩 180,187
Dickel,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迪克尔 72
Dickopf, Paul 保尔·迪克普夫 128
Dohlus, Horst 霍斯特·多鲁斯 72
Dohnanyi, Hans von 汉斯·冯·多纳尼 46
Dohnanyi, Klaus von 克劳斯·冯·多纳尼 192,194
Donda, Arno 阿诺·东达 99
Dörfler, Marianne 玛丽亚娜·多夫勒 109
Dresen, Adolf 阿道夫·德雷森 292
Dubcek, Alexander 亚历山大·杜布契克 287,292
Ducke, Karl-Heinz 卡尔-海因茨·杜克 103,127
Dutschke, Rudi 鲁迪·杜什克 284
Dziejynski, Feliks Edmundowitsch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
齐尔奇斯基 140

E

- Ebert, Friedrich(Sohn)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子) 293
Eggert, Heinz 海因茨·艾格特 247
Ehrmann, Riccardo 里查多·艾尔曼 89
Eigendorf, Lutz 鲁茨·埃根多夫 236
Enderlein, Dietmar 迪特马尔·艾德莱因 328—331
Endler, Adolf 阿道夫·恩德勒 278
Engels,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80,267,283,286
Eppelmann, Rainer 莱因纳·埃波曼 15—18,21,37,40,47,
109,115,125,151,259,264

F

- Fechner, Max 马科斯·费希纳 257
Fichter, Johann Gottlieb 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 46
Fischer, Joschka 约什卡·菲舍尔 285
Fischer, werner 维尔纳·菲舍尔 116
Flierl, Thomas 托马斯·福里尔 263
Fontane, Theodor 特奥多尔·冯塔讷 212, 217, 331
Forck, Gottfried 戈特弗里德·福克 116
Franco,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 48
Frank, Anne 安妮·弗兰克 210
Frey, Gerhard 格哈德·弗莱 200
Fries, Fritz Rudolf 弗里茨·鲁多夫·福里斯 275
Fuchs, Jürgen 于尔根·福克斯 277, 294
Fühmann, Franz 弗兰茨·福曼 289

G

- Gauck, Joachim 约阿希姆·高克 28, 69, 138, 143, 147—150,
153, 222, 264, 282, 327
Gaus, Günter 京特·高斯 22, 46
Gehlen, Reinhold 莱因霍尔德·格伦 128
Geiger, Hansjörg 汉斯约克·盖格尔 132, 147
Geipel, Ines 伊内斯·盖波尔 30
Genscher, Hans-Dietrich 汉斯-迪特里希·根舍 23, 54
Geyer, Heinz 海因茨·盖尔 245

- Gill, David 大卫·吉尔 142, 147
- Globke, Hans 汉斯·格罗普克 128
- Goldbach, Joachim 约阿希姆·格尔德巴赫 92
- Gorbatschow, Michail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75, 81, 90, 93,
109, 119, 167, 344
- Gorbatschowa, Raissa 赖莎·戈尔巴乔娃 76
- Grass Günter 京特·格拉斯 277, 300
- Groehler, Olaf 奥拉夫·格罗乐 255
- Gröllmann, Jenny 杰尼·格罗尔曼 295
- Großmann, Werner 维尔纳·格罗斯曼 259, 268
- Grube Rüdiger 吕迪格·格鲁贝 154
- Gysi, Gregor 格雷戈尔·居西 41, 47, 50, 56, 72, 90, 96, 101,
106, 109, 111, 114, 127, 133, 153, 214, 251, 261, 296, 310

H

- Hagen, Eva-Maria 夏娃-玛丽亚·哈根 294
- Hagen, Nina 尼娜·哈根 294
- Hager, Kurt 库尔特·哈格 144, 275
- Härtling, Peter 彼得·赫尔特林 275, 294
- Haseloff, Reiner 莱因纳·哈泽洛夫 179, 186—189
- Hauswald, Harald 哈拉尔德·豪斯瓦尔特 277
- Havemann, Florian 弗洛里安·哈维曼 134, 292, 295
- Havemann, Frank 弗兰克·哈维曼 134, 292
- Havemann, Robert 罗伯特·哈维曼 16, 119, 122, 134, 151,
256, 291

-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47
- Hein, Christoph 克利斯朵夫·海因 75, 280, 298
- Heinemann, Gustav 古斯塔夫·海涅曼 110
- Heise, Gunter 贡特·海泽 316
- Hemingway Ernest 厄纳斯特·海明威 300, 332
- Hempel, Johann 约翰·亨佩尔 65
- Henckel von Donnersmark, Florian 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克 296
- Hermlin, Stephan 施特凡·赫尔姆林 46, 293
- Herrmann, Richard 里查德·赫尔曼 315—322, 328
- Hertel, Stefanie 施特凡尼·赫尔特尔 332
- Heye, Uwe-Karsten 乌韦·卡斯滕·海尔 205
- Heym, Stefan 施特凡·海姆 294
- Hilpert, Axel 阿克瑟尔·席尔佩特 331—334
- Hitler, Adolf 阿道夫·希特勒 198, 201, 209, 223, 237, 244, 253, 254, 267, 291
- Ho Chi Minh 胡志明 285
- Hoffmann, E. T. A. 霍夫曼 211
- Hoffmann, Heinz 海因茨·霍夫曼 33, 35
- Hoffmann, Jutta 尤塔·霍夫曼 294
- Höfner, Ernst 恩斯特·霍夫纳 99
- Holle, Rolf 罗尔夫·霍勒 128
- Hollitzer, Tobias 托比阿斯·霍利泽 240
- Homann, Heinrich 海因里希·霍曼 254

- Honecker, Erich 埃里希·昂纳克 36, 50, 67, 71, 76, 78, 80,
85, 87, 90, 93, 96, 98, 109, 121, 239, 266, 268, 279, 294, 319
- Honecker, Margot 玛戈特·昂纳克 51
- Höpcke, Klaus 克劳斯·霍卜克 275, 279, 300
- Hühsemann, Wolfram 沃尔弗拉姆·胡泽尔曼 218, 214, 227
- Hunzinger, Ingeborg 英格伯格·洪钦格 291
- Hunzinger, Rosita 罗西塔·洪钦格 291

I

- Illner, Maybritt 迈布丽特·伊尔纳 206, 316

J

- Jahn, Günther 京特·扬 293
- Jauch, Günther 京特·耀和 336—339
- Johnson, Uwe 乌韦·强森 299
- Jörke, Hans 汉斯·约尔克 65
- Judt, Matthias 马蒂亚斯·约特 33
- Junghanns, Ulrich 乌尔里希·容汉斯 122, 331

K

- Kant, Herrmann 赫尔曼·康德 276, 278
- Kessler, Heinz 海因茨·凯斯勒 81, 91
- Kiesinger, Kurt Georg 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 128
- Kirsch, Sarah 萨拉·基尔施 294
- Kliem, Harald 哈拉尔德·克里姆 53

- Knabe, Hubertus 胡贝尔图斯·克纳博 147, 263
Kocks, Klaus 克劳斯·科克斯 272
Kohl, Hannelore 汉内洛雷·科尔 118
Kohl, Helmut 赫尔穆特·科尔 23, 47, 49, 52, 54, 74, 90, 118,
125, 168, 181, 304, 308, 330, 332
Kotenev, Wladimir 弗拉迪米尔·科特纳夫 267
Kraft, Hannelore 汉内洛雷·克拉夫特 39
Krenz, Egon 埃贡·克伦茨 32, 69, 72, 74, 76, 84, 87, 96, 99,
120, 259, 294, 330
Krug, Manfred 曼弗雷德·克鲁格 294
Krüger, Michael 米歇尔·克吕格 275
Külow, Volker 福尔克尔·库洛 279
Kunert, Günther 京特·库耐特 22, 278, 294

L

- Laabs, Joochen 约亨·拉普斯 298—302
Lafontaine, Oskar 奥斯卡·拉封丹 214, 252, 332
Landowsky, Klaus-Rüdiger 克劳斯-吕迪格·兰多夫斯基 306
Lang, Andre 安德雷·朗格 57
Lang, Martin 马丁·朗格 103, 127
Lange, Bernd-Lutz 贝尔恩德-鲁茨·朗格 86
Langhans, Rainer 莱因纳·朗汉斯 280
Langhoff, Thomas 托马斯·朗霍夫 278
Leide, Henry 亨利·赖德 112, 255
Lenin 列宁 22, 144, 267, 286, 290

- Lewis, Jerry Lee 杰瑞·李·刘易斯 315
Liebermann, Max 马科斯·李伯曼 261
Liebknecht, Karl 卡尔·李卜克内西 73
Links, Christoph 克里斯托夫·林克斯 258
Loest, Erich 埃里希·洛斯特 275, 277—280
Lohmeyer, Johannes 约翰内斯·洛迈尔 228
Lorenz, Frake 弗拉克·洛伦茨 22
Lorenz, Hermann 赫尔曼·洛伦茨 243
Luxemburg, Rosa 罗莎·卢森堡 73, 279, 295

M

- Maaz, Hans-Joachim 汉斯-约阿希姆·马茨 14—18, 20, 27,
30, 37, 41, 52, 282
Mahlsdorf Charlotte von 夏绿蒂·冯·马尔尔多夫 305
Maiziere, Lothar de 洛塔·德梅齐埃 46
Mann, Heinrich 海因里希·曼 46
Mao Zedong 毛泽东 284
Marcuse, Herbert 赫伯特·马库泽 46
Marx, Karl 卡尔·马克思 31, 64, 256, 267, 275, 283, 286, 294
Masur, Kurt 库尔特·马祖尔 86
Matschie, Christoph 克里斯托夫·马奇 109
Meckel, Markus 马库斯·梅克尔 55, 109
Menge, Helmut 赫尔穆特·门戈 297
Merkel, Angela 安吉拉·默克尔 50, 52, 122, 125, 167, 171,
189, 283

- Merz,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梅尔茨 169
- Meyer, Kurt 库尔特·迈耶 86
- Mickiewicz, Adam 亚当·米吉维茨 286
- Mielke, Erich 埃里希·米尔克 69, 76, 80, 85, 87, 98, 121, 132, 141, 143, 236, 239, 242, 244, 251, 263, 266, 268, 277, 289
- Mittag, Günter 京特·米塔格 76, 98, 123
- Modrow, Hans 汉斯·莫德罗 65, 71, 73—80, 85, 90, 98, 100, 111, 114, 119, 123, 127, 133, 138, 170, 251, 267
- Momper, Walter 瓦尔特·蒙佩尔 91
- Most, Edgar 埃德加·穆斯特 183, 194, 316
- Mross, Stefan 施特凡·穆罗斯 332
- Mühe, Ulrich 乌尔里希·穆尔 295
- Mühlfenzl, Rudolf 鲁道夫·穆尔芬泽 327
- Müller, Heine 海涅尔·穆勒 46, 294
- Müller-Stahl, Armin 阿明·穆勒-施塔尔 294
- Muregger, Dietrich 迪特里希·穆雷格 256

N

- Nebel, Carmen 卡门·内波尔 76
- Neiber, Erhard 格哈德·奈伊伯 67, 268, 332
- Nooke, Günter 京特·诺克 109

O

- Oberländer, Theodor 特奥多尔·奥伯兰德 128
- Oecknigk, Michael 米歇尔·约克尼克 155, 163

- Opitz, Willi 威利·欧皮茨 80
 Osang, Alexander 亚历山大·欧桑 337
 Otto, Bärbel 贝贝尔·奥托 98

P

- Palme, Olaf 奥拉夫·帕尔梅 109
 Pannach, Gerulf 格鲁夫·潘纳赫 294
 Paulus,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保卢斯 254
 Pieck, Wilhelm 威廉·皮克 135, 234
 Pierer, Heinrich von 海因里希·冯·皮尔 311
 Platzek, Matthias 马蒂亚斯·普拉采克 107, 109, 115, 123,
 166, 169—173, 222, 224, 272, 336, 338
 Plenzdorf, Ulrich 乌尔里希·普伦茨多夫 294
 Poche, Klaus 克劳斯·波赫 279
 Pohl, Klaus 克劳斯·波尔 293
 Pommert, Jochen 约亨·波莫尔特 86
 Poppe, Ulrike 乌尔丽克·波佩 103
 Pragal, Peter 彼得·普拉加尔 297
 Prager, Martin 马丁·普拉格 176

R

- Ranelow, Bodo 波多·拉梅洛 214
 Rau, Johannes 约汉内斯·劳 46
 Ratttenberg, Erardo Christoforo 艾拉多·克里斯托夫罗·劳滕
 贝尔格 113, 211, 217, 220, 222, 224

- Reiche, Steffen 施特芬·赖歇 109
Reuter, Edzard 埃德查德·路透 330
Richter, Klaus 克劳斯·里希特 146, 215
Ritter, Gerhard 格哈德·里特 40
Rohwedder, Detlef Karsten 德特勒夫·卡斯滕·罗威德
36, 271
Roßberg, Klaus 克劳斯·罗斯贝格 132
Rümmler, Erich 埃里希·吕姆勒 141

S

- Sakowski, Paul 保尔·萨克夫斯基 258
Schabowski, Günter 京特·沙博夫斯基 89, 172
Schädlich, Hans Joachim 汉斯·约阿希姆·沙德里希 277
Schädlich, Karlheinz 卡尔海因茨·沙德里希 277
Schalk-Golodkowski, Alexander 亚历山大·沙尔克-格罗德科夫
斯基 48, 71, 73, 96, 99, 271, 333
Schäuble, Wolfgang 沃尔夫冈·朔伊普勒 47, 169, 332
Schill, Roland 罗兰德·席尔 213, 219
Schiller,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席勒 286
Schindler, Karl-Heinz 卡尔海因茨·辛德勒 177
Schinkel, Karl Friedrich 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 46
Schipanski, Dagmar 达格玛·施潘斯基 303
Schleime, Cornelia 科内利亚·施莱默 276
Schlesinger, Klaus 克劳斯·施莱辛格 279, 293
Schmidt, Helmut 赫尔穆特·施密特 45

- Schmidt, Uwe 乌韦·施密特 241, 268, 272
- Schneider, Rolf 洛尔夫·施奈德 284, 294
- Schnitzler, Karl-Eduard von 卡尔-爱德华·冯·施尼茨勒
301, 323
- Schnur, Wolfgang 沃尔夫冈·施诺尔 105, 113, 124, 144, 151
- Schöberlin, Marinus 马利努斯·朔波林 215
- Schönbohm Jörg 约克·朔波姆 222, 224
- Schorlemmer, Freidrich 弗里德里希·朔雷梅 86
- Schreiber, Jürgen 于尔根·施莱伯 263
- Schreiber, Winfriede 温弗里德·施莱伯 213
- Schröder, Gerhard 格哈德·施罗德 44, 132, 194, 228
- Schroeder, Klaus 克劳斯·施罗德 27
- Schröder, Richard 里查德·施罗德 42, 47, 50, 90, 109, 117,
124, 149, 152, 173, 181, 190, 201, 239, 251, 282, 284
- Schulz, Werner 维尔纳·舒尔茨 109, 272
- Schumann, Kurt 库尔特·舒曼 254
- Schürer, Gerhard 格哈德·许雷尔 99
- Schwanitz, Wolfgang 沃尔夫冈·施瓦尼茨 138, 250
- Schwarz, Werner 维尔纳·施瓦茨 48, 335
- Seghers, Anna 安娜·西格斯 46
- Sellering, Erwin 埃尔温·赛勒林 315
- Seume, Johann Gottfried 约翰·哥特弗里特·索尔默 240
- Sindermann, Horst 霍斯特·辛德曼 98
- Sinn, Hans-Werner 汉斯-维尔纳·西恩 192
- Sodann, Peter 彼得·索丹 25

- Stadt, Jochen 约亨·施塔德 297
- Stauffenberg, Claus Philipp Maria Schenk Graf von 克劳斯·菲利普·玛丽亚·申克·冯·施陶芬贝尔格伯爵 244
- Steffel Frank 弗兰克·施特菲尔 310
- Sreinbeck, John 约翰·施坦因贝克 300
- Steinberg, Holger 霍尔格·施坦因贝尔格 246
- Steindling, Rudolfine 鲁道尔芬尼·施坦特林 271
- Stern, Fritz 弗里茨·施特恩 31
- Stoiber, Edmund 埃特蒙德·施托伊伯 169
- Stolpe, Manfred 曼弗雷德·施托尔佩 132, 137, 170, 223, 329, 332
- Stoph, Willi 威利·斯多夫 77, 98, 268
- Stauß, Franz Josef 弗兰茨·约塞夫·施特劳斯 256, 319
- Streletz, Fritz 弗里茨·施特雷勒茨 33, 36
- Süß, Sonja 索尼娅·聚斯 248

T

- Tabori, George 格奥尔格·塔波里 46
- Templin, Wolfgang 沃尔夫冈·坦佩林 109
- Teske, Werner 维尔纳·特斯克 243
- Thalbach, Katharina 卡特琳娜·塔尔巴赫 294
- Thatcher, Margret 玛格蕾特·塔策尔 90
- Thaysen, Uwe 乌韦·泰森 104
- Thierse, Wolfgang 沃尔夫冈·蒂尔泽 45, 137, 276
- Tiedje, Hans-Hermann 汉斯-赫尔曼·提杰 331

Thiefensee, Wolfgang 沃尔夫冈·蒂芬泽 260

U

Ulbig, Markus 马库斯·乌尔比西 228

Ulbricht, Walter 瓦尔特·乌布利希 266

Ullmann, Wolfgang 沃尔夫冈·乌尔曼 103, 115, 121, 122

Urban, Hans-Peter 汉斯-彼得·乌尔班 323—327

Uszkoreit, Hans-Jürgen 汉斯-于尔根·乌茨柯莱特 291

V

Vaatz, Arnold 阿诺尔德·瓦茨 68, 74

Vogel, Bernhard 伯恩哈德·福格尔 124

Vogel, Hans-Jochen 汉斯-约亨·福格尔 54, 264

Vogt, Michael Friedrich 米歇尔·弗里德里希·福格特
199, 200

Voigt, Udo 乌多·福伊格特 200, 203, 219

Voscherau, Carl 卡尔·福舍劳 55

Voscherau, Henning 海宁·福舍劳 53—58

W

Walser, Martin 马丁·瓦尔泽 275

Wegner, Bettina 贝蒂娜·魏格纳 135, 291

Weigel, Helene 海伦·魏格尔 46

Weigl, Sandra 桑达·魏格尔 291

Weiß, Konrad 康拉德·魏斯 109

- Wekwerth, Manfred 曼弗雷德·魏克维尔特 275
Wessel, Horst 霍斯特·魏塞尔 207
Wiegand, Joachim 约阿希姆·魏格安德 151
Will, Anne 安妮·维尔 328
Willemsen, Roger 罗格·维勒穆森 243
Wolf, Christa 克里斯塔·沃尔夫 88, 294
Wolf,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沃尔夫 267
Wolf, Markus (Mischa) 马库斯·(米夏)沃尔夫 90, 243, 266
Wolle, Stefan 施特凡·沃勒 131
Wollenberger, Knud 科努特·沃伦贝尔格 144
Wollenberger Vera 维拉·沃伦贝尔格 109, 144
Wötzel, Roland 罗兰德·沃泽尔 86

Z

- Ziegler, Martin 马丁·齐格勒 103, 115, 120, 127
Ziemer, Christof 克里斯托夫·齐默尔 65, 75
Zimmermann, Peter 彼得·齐默曼 86
Zumwinkel, Klaus 克劳斯·祖姆温克尔 159
Zweig, Arnold 阿诺尔德·茨威格 46

译

歌德学院(中国)
翻译资助计划

两德统一后，原本同属于一个民族的人们是否能跨越历史的障碍重新融合为一个整体？在他们眼中，今天的德国是怎样一种情形？统一后的德国社会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要想了解德国统一后的状况，就必须向德国人询问。民意调查发现：只有少数东德人对他们现在的生活感到满意，而大部分西德人认为对原东德地区的重建早该结束。这个长期分裂的民族的真实现状正是如此，情况有继续恶化的危险。在柏林墙倒塌二十多年后，作者走近德国统一的功臣，通过对各阶层德国人的采访，探究其中的原因，向读者展现了一个真实的德国。

ISBN 978-7-01-010444-7



9 787010 104447 >

定价：22.00元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德国统一现状

页数=326

SS号=13027802